目　录

序　言 ……………………………………………………………………（1）

第一部分

后工业社会的经济问题……………罗伯特·L·海尔布罗纳（1）
资本主义发展中的前资本主义和非资本主义因素：论弗雷德·希尔施和约瑟夫·熊彼特………………克利尚·库马（25）
未来技术所涉及的国际作用…………尤金·B·斯科尔尼考夫（58）

第二部分

马克思主义与现代化的意义…………弗农·V·阿斯巴图连（82）
工业社会的趋同问题——对理论状况的评论………………………………伊恩·温伯格（103）
发达社会主义理论是苏联的趋同观点吗？………………………………………………………杰弗里·W·哈恩（123）
社会主义与非社会主义国家的人的现代化………………………………………………阿历克斯·英格尔斯（142）

第三部分

世界体系中的危机与依附关系的转变………………………………安德烈·甘德尔·弗兰克（156）

发展经济学：我们学到了什么？
……………………………………………贾格迪什·N·哈格瓦蒂(176)
工业化与发展的估量 ……………………………………海伦·休斯(199)
国家发展战略的国际联系 ……………曼弗兰德·比内费尔德(228)
——变化世界中的紧张和机会

第一部分

后工业社会的经济问题*

罗伯特·L·海尔布罗纳

有一种观点认为，最近几年社会经济关系发生的深刻变化，表明我们的历史正在迅速进入一个“后工业”时代的新“阶段”，这种观点是值得商榷的。我不想否认经济领域里正出现结构、制度和行为上的深刻变化，他们的影响会扩及到社会政治生活的各个方面，① 但遗憾的是，我们用以描述这种现象的后工业这个词已带有某种时髦的性质。② 所以，首先应该尽可能清楚地阐明我们所指的向后工业社会演变的含义，包括澄清它与现在可能正在衰退的“工业”时代的关系，着重说明这个正在来临的时代真正的崭新之处。

---

* 本文选自詹姆斯·威廉·莫利主编的《未来的序幕——后工业化时代的美国与日本》，1974年。

① 这种说法是指某种经济决定论者的观点。在本文的结论部分我将专门论述这个问题。

② 目前关于后工业社会的文献很多——若全部列出，对一个注解显得太长了——在丹尼尔·贝尔的著作里可以找到有关这个概念最精妙的说法，其中尤其值得一提的包括在《展望》杂志1971年冬季号专题论文集中的他的论文；发表在《展望》杂志1971年春季号上的《后工业社会：一个思想的演进》；以及1973年出版的《后工业社会的到来》一书。亦可参考兹比格纽·布热津斯基的著作《在两个时代之间：美国在技术电子时代的作用》(1970年)。赫尔曼·卡恩和安东尼·威纳在《2000年》(1967年)一书中对后工业一词作了更加简明的定量分析。许多书籍引用了这个思想，其中目前被人广泛引用的是阿尔温·托夫勒著的《未来的冲击》(1973年)。

因此，让我们带着怀疑的眼光去探究通常对后工业社会的三种不同理解。

1.后工业社会是一种把经济活动的重点放在经济的"第三"部门的社会。

后工业主义这个定义促使人们把注意力集中在职业的变化上，这种变化早在19世纪就已初露端倪。① 正如每一个工业化国家的历史所表明的那样，在整个就业人员中，从事农业的劳动力人数缩小到了微不足道的一小部分：在美国，只有4%的劳动力从事农业，而且在以农业谋生的人员中有相当数量的人员是剩余劳动力。同时，由制造业、采矿业、运输业、建筑业和公用事业构成的工

表1 部分西方国家雇佣工人分布的百分比

		农业	工业	服务业
美国	1900	38%	38%	24%
	1970	4	35	61
法国	1950	35	45	20
	1970	17	39	44
联邦德国	1950	24	48	28
	1968	10	48	42
英国	1950	6	56	39
	1970	4	45	50

〔资料来源：美国：历史统计资料，第74页；经济指数（1972年）。欧洲国家：经济合作发展组织，共同体基本统计资料（1970年）〕

① 1811年，英格兰从事农业的劳动力不到总数的1/3；在整个19世纪上半叶该处有1/3以上的劳动力从事服务业。〔B·R·米切尔，《不列颠历史统计资料摘要》（1962年），第60页；S·库兹内斯，《近代经济的增长》（1966年），第106页。〕

业"核心"中的劳动力仍大致稳定在约占就业人员的总数 1/3 水平上。[①] 其余的就业人数——目前在美国约占就业人员总数的60%以上——受雇于提供"最终的"服务业内的各个部门。

各工业化国家的就业人口比例各不相同，但是这种"趋势"在所有的国家里都是显而易见的。<见表 1>

由此可见，统计资料能根据社会就业人员转移的情况充分显示后工业社会的定义。但对此略加评论分析还是必要的。首先，纵观各部门雇佣情况，主要变化不是在工业部门发生的。尽管在过去的 20 年里，工业部门的就业人数比例在英国和法国略有下降，但在德国却保持不变；而在美国，70余年来的下降幅度则是微不足道的。换句话说，当代大规模的部门转移与其说是自"工业"向"服务"业转移，倒不如说是自农业向服务业的转变。[②]

此外，我们一定要注意那些正在兴起的服务业，在服务业中某些工作正从非赢利性的家庭领域转移到赢利性的商业界。妇女就业明显增加（在美国，适龄妇女就业率从 1890 年的 18%增长到 1969 年的 30%），造成了服务业"就业"正在增长的假象，因为这些工作以前是在家里完成的，是统计学家所看不到的，而现在则出现在市场上了。洗衣业、餐馆业、专职护理老人业，甚至"福利"业的扩展所表明的服务性行业"就业"的增长有一半是虚假的。

当我们把就业的转移作为琢磨后工业时代含义的基础时，记

---

① 由于运输业和公共事业是生产无形商品的，故常被归入第三产业部门；而采矿业则被归入第一产业部门。由于它们在整体上和工业的进程都有联系，所以我在这里将它们都归入"工业"部门。

② 请读者注意，对这些统计数字一定要作仔细的说明。例如，农业部门部分就业人数的减少所表明的是农业方面的职业转移到了与农业有关的工业和服务业部门——比如，正在兴起的农机制造业、化肥业、政府行政部门和私有商业部门。这样，与农业有关的就业人数，或者在相当程度上比"正式"从事农业的就业人数还要多。参见 S·莱伯戈特，<经济发展中的人力>，(1964 年)，第 111 页。但不管怎样，基本的转移过程还是一目了然的，即摆脱农业，"穿越"工业，进入服务业。

住上述说明及区分是重要的。让我们扼要地概述这些也许可算作告诫的想法吧。

可以推测，在后工业社会制度下，就业变化的重要性在于，主要就业部门的改变使社会开始了新的历程，产生了新的需求。即使不对此假设提出不同的看法，我也要作一告诫，不要误认为就业变化是由于大批工人脱离工业部门所致。事情并不如此。而是与此相反，职业变化使人们得以"经历"的最根本的变化是从事农业（农场）工作的人数减少和通过市场成交的、与服务行业有关的工作相应增多。工业的"核心"大致保持不变。与一般想象不同的是工业部门的工厂工人——马克思戏剧中的关键人物——在社会劳动整个历程中所占的比例一直大致是相同的：不熟练、半熟练和熟练工人，亦即蓝领工人集团，1900 年占劳动力总数 25.5%，1968 年则为34.9%，主要的变化发生在这一集团内部，大多数不熟练工人提高到了半熟练工人水平。这样，即使后工业社会实际上代表了社会经济关系的一个新阶段，其理由也应从别处去找，而不应将某些工业部门不再成为工作环境作为理由。

2.后工业社会可能与这种现象有关：用于发展生产的投资发生了本质变化，从注重量转向注重质。

为了寻求"后工业化"的根本含义，我们应注意许多有关工业化国家内部增长的研究及其多少有点一致的结论：相对劳动力的人数或（不变）资本的数量而言，"知识"在促进增长方面所起的作用正在不断增长。① 根据丹尼森的研究成果，我们可以作此概括，美国在1929 年以前的 20 年中所增加的产量有 2／3 是通过增加投资及劳动力得到的，而在 1929 年—— 1959 年的 30 年里，由此

① 文献太多了，所以不能一一述及。重要的论述有M·阿布拉莫维茨的《1870年以来美国的资源和产量的趋势》（国家经济研究署）1956 年；罗伯特·索洛，《技术的变化和集中生产的作用》，《经济学和统计学评论》杂志，（1957 年 8 月）；爱德华·丹尼森，《美国经济增长根源》，（经济发展委员会）1962 年。

得到的增长是44%。与此形成对照的是，在1929年前的20年中，改善教育和训练对于增产只有13%的作用，而在1929年以后，这一作用是前一时期的两倍多。结果在上述两个阶段，技术的改善——说到底这毕竟只是知识的具体应用——在增长中所起的作用从12%上升到20%。①

正如丹尼森对一些西欧国家增长原因的研究所表明的那样，在这些国家中，就业比例也不尽相同，而劳动力大批转移的方向却始终如一。总之，毫无疑问，通过对工业化国家增长模式的统计调查表明，“与知识有关的”投资的重要性在日益增长，体力性的“劳动力”或者不变资本的绝对量的增加（例如，铁轨的增加）在相应地减少。

鉴于后工业主义的定义是强调就业部门的转移，我无意贬低人力“资本”所具有的重要性。② 然而，无论它多么重要，我仍坚持初衷，对后工业社会的这一特点持某种保留的态度。因为不这样的话，我们在以后研究时就会遇到许多棘手的难题。

首先，我们都已意识到，增长的意义是难以规定，无从捉摸的。那些所谓的国民生产总值其实常常是由集团专断地限定的产量，这与正在使用的任何福利概念都是格格不入的，甚至是风马牛不相及的。因此，这些“增长”尽管得力于现代知识之处甚多，却大多很少，甚或没有福利意义：大规模地扩充军备、开发宇宙空间、以及造成严重污染的生产走向了一个极端；而没有意义的发明、风格的

---

① 丹尼森，《美国经济增长根源》。

② 贾伦克·雅诺西，《经济奇迹的终结》，（1971年）。雅诺西有着丰富的想象力，把知识和“劳动力”或者“资本”作比较，说明它们各自的重要性。他要我们想象一下两个国家（一个是发达国家，另一个是不发达国家）人口瞬时转移的情况，他假定这两个国家一个是英格兰，另一个是内战前的巴基斯坦。他问道：“巴基斯坦”的人口曲线会迅速向上延伸；而“英格兰”的却会很快下降，这还用怀疑吗？

变换和清除污染的技术则走向另一个极端。一种是造成祸害或危险的增长，另一种则是虚幻或"防御性"的增长。总而言之，在我们能把知识投资的增加作为一种值得庆幸的因素，也作为一个简单的事实加以讨论前，必须把后工业社会增长的质量与工业社会增长的质量作一比较。

其次，在寻找转向知识投资的经济所涉及的问题之前，我们应该进一步深入探究知识投资本身正在增长的"事实"。通过探究，我们可以看到知识投资已通过许多途径得到了调整，其中一个途径是大量增加研究和开发。政府的统计资料表明，用于研究和开发的经费已从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的约 10 亿美元，增加到了70 年代初期的 280 亿美元。这个巨大的增额使许多观察家得出结论，现在我们已经使科学发现和应用的过程"制度化"，因此，经济内部动力的本质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更多持怀疑态度的观察家已经注意到，在最近几年，研究和开发的经费（除去通货膨胀的因素）呈上涨趋势，这是因为"研究" 范围的日常测试或市场销售程序的编制也包括在这些经费内。因此，据估计 1966 年用于新工业产品基础研究的实际经费不是 200 亿美元，而是 10 亿美元。①

此外，朱克斯，萨沃斯和斯蒂勒曼通过研究，对"制度化的" 发明作用表示了极大的怀疑，他们引用资料证明，在刚刚过去的发明创造的第三世纪中，重要的发明创造大多由个人或小公司所作。②这样，认为后工业社会制度化的知识投资和工业社会没有明显的区别是有些道理的。

就所谓的信息革命而言，进一步要说明的是体现在劳动力中

---

① 约翰·M·布莱尔，《经济的集中》，(1972 年)，第 15 页，所引用的估算由兰德公司戴维·诺维克所作。

② 《发明的根源》(1958 年初版，1969 年修订版)。也可参见布莱尔的《经济的集中》，第 215——227 页。

的教育"储备"的兴起。按通常的人均年教育费用标准计算，毫无疑问，这种储备已有明显的增加：在1900年，高中毕业生在17岁年龄的人口中只有6%，而在1970年，完成高中学业的人上升到了近80%。同样明显的是，在1900年，在18——20岁的人口中只有4%在大专院校学习，而今提高到50%以上。

现在，没有人否认，就象劳动力在部门间转移一样，这种变化确实预示着一种新的展望、经历和前程。我们以后还要谈到这个问题。但是，从体现在教育的较高储备这一事实跳跃式地得出社会"知识"的储备也已同时增加这一结论，似乎还嫌过急。因为在增加对劳动力培训的同时，也加强了劳动力技术的区分和专业化程度，比较一下广泛掌握各种能力的农民和工作有所限定因而知识面较狭窄的办公室职员的区别，就足以说明这一情况，与一般想象不同的是，我不能肯定，在后工业社会里，人们在提高正规教育的一般水平的同时，是否还会提高"知道如何去做"的一般水平。由于在正规教育方面，把学生置于更为广阔的历史、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背景之中，"知识"一类的东西必然在增长。从这个意义上说，后工业社会的一般公民与工业社会或前工业社会的一般公民相比，不但受到"良好的教育"，而且在自然科学、人的行为等经过概括的知识方面确实要多知道一些。然而，在较少概括的知识方面，其收获就要少得多。而在事关社会经济机制运行、极为重要的社会知识的分支范围里，后工业社会专业化教育的特点似乎是除了专业训练，个人工作能力明显减小——甚至还不如一个多才多艺，样样能干，而又样样不精通的农民（或工匠），他们只能眼看着破碎的器皿、抛锚的车辆、损坏的电气产品或者管件装置束手无策。

我们提出告诫，不要简单地把后工业社会看成是一个以"知识爆炸"为特点的社会，并不是要否认较多的教育投资在现代社会内部造成的有目共睹的深刻变化——在未来社会中也许会发生更为

显著的变化，其中首要的是在后工业社会预期会出现的生活方式的变化，对于由此而引起的问题，我们以后还会仔细考察。不管还有什么其它效果，延长学制的出现似乎总在鼓励人们去期望得到一个与蓝领职业不同的白领职业；这可能也的确违背那些"接受教育"人的意志，他们把许多体力工作视为谋生的适当途径，对于其收入通过与货物，而不是与纸打交道的方式获得，他们并不计较。毋庸置疑，预料中的这个变化和劳动力的实际转移——脱离农业和无技术的工业工种，服务业日益发展——是极为一致的。

其次，也可能更重要的是——尽管多半必然还是推测性的——正在以教育为基础形成一个掌握高度技术的技术员、科学家和专家的"阶层"，他们在整个社会经济体系中的影响也正在逐渐扩大。许多人已经注意到了这一"知识精英"的兴起。[①]这一新精英所拥有的实际权力究竟有多少，是否超过老的精英还不太清楚，然而，几乎确凿无疑的是，在这一体系的顶端产生了一个新的、以教育为基础的阶层，一种新的、神秘的气氛在包围着"科学家"这一知识型的后工业化制度的象征，这完全可与以前围绕着"工业巨头"的气氛相媲美。[②]就此而言，强调"知识"是后工业制度的特征并不错，尽管需要比通常更加仔细地琢磨出这个特征的确切本质。

3.后工业社会可被视为一个"后资本主义"社会，也就是说，可将其视为一种社会经济形态，在这一形态中，资本主义的传统问题将让位于一个后工业制度的崭新组织模式。

正如我以前对后工业社会制度的"想象"一样，我认为在这种

---

① 参见贝尔的《后工业社会的到来》，布热津斯基的《在两个时代之间》，J·K·加布雷思的《新工业国》，(1967年)和拙著《美国资本主义的局限》，(1966年)。

② 顺便提请注意，被寄予希望的新兴人物就象年老的企业家一样，也有矛盾之处，既是一个能够创造一个伟大社会的英雄人物，又是一种摧毁这个社会的恶魔势力。

看法中存在着一个真正的核心。19世纪末期和20世纪初期的资本主义所特有的严重阶级差异似乎正让位于一个在经济方面（即使社会或政治方面不一定）极为一致的社会。"福利"国家尽管事实上名不副实，终已成为现在所有的工业社会普遍接受的模式，并在确保收入、家庭津贴、公共卫生保险，对低薪阶层实行教育补助以及诸如此类的方面，带来了很大程度的"社会主义"。因不能增加需求而造成的制度的极度脆弱，由于公共部门的扩展而得到弥补。由于上述情况以及其它的一些变化，"革命的"无产阶级没有能够实现自己的愿望；况且如前所述，工业无产阶级的规模几乎原封不动。

于是，就有充分理由认为后工业社会是一个与其所继承的工业资本主义在经济行为的重要方面有所不同的社会。然而，象以前一样，在设法描述新的社会经济环境的本质时，诚如找出其区别那样，找出其连继性也是明智的。

其中最主要的趋势是一个其起源至少可以追溯到19世纪50～70年代中期的持续不断的趋势。这是一个缓慢的、不规则的，但是显然是不可逆转地朝着资本集中的方向发展的趋势。下面的统计数据是众所周知的：在制造业方面，1968年100个最大厂商的资产占了全部制造业大公司资产的约49%，这相当于1950年200个最大的工业厂商所占的比例。同时，1968年的200个最大厂商在全部资产中控制的部分相当于1941年的1000个最大的厂商在总资产中所占的份额。[1]罗伯特·艾伯里特一目了然地描绘出了经济社会的特征，把庞大而强有力的企业称作*圆心*，而把数量极多的小、弱厂商称作*圆周*。[2]

---

① 布莱尔，《经济的集中》，第四章。

② 艾夫里特，《二元经济》，1968年。

应当引起注意的是，我们还没有理解在整个体系的运行分成这两个部分后所呈现的态势。事实表明，实行垄断的圆心是导致经济无效甚或通货膨胀的根源；①至少有一个研究者证实，延伸出去的圆周则是经济不稳定的主要根源。②更为重要但却难以弄清楚的是，将这圆心和政治权力结构绑缚在一起的连接物的范围和性质。尽管许多事例证明这种连接物是存在的，但是权力的流动方向（从经济结构流向政治结构，或方向相反）还不太清楚，或许还不太稳定。③这不是本文所要解决的问题。我想着重强调的是存在着一个以某种方式与一个政治上的集权结盟的经济集权——这种情况基本上和“工业”社会存在的情况没有什么差别，顺便说说，在日本、法国、德国和其它即将进入后工业社会的国家里，我们同样能看到这种经济政治的协约。④

后工业社会的就业或教育结构的发展似乎并不可能改变经济集中这一特征。更可能的似乎倒是这一集中将会在正在急剧发展的服务部门中迅速进行，服务业现在受到它的严重侵袭（在仍是最少集中的农业部门，情况也是如此）。我们想把服务业描写成一个由大量独立的业主（律师、不雇他人的商户，单人企业）组成的行业；但实际上在服务部门，相当比例的就业机会是由一些垄断组织所提供的。在1970年，从事服务业的大约有4400万人（不包括公用事业或运输业），其中1300万人在政府部门工作；1500万人从事商业，400万人从事金融业（银行，经纪业，不动产业）。相对而

---

① 布莱尔，《经济的集中》，第152页，在此书的其它地方也到处可见。

② 霍德华·谢尔曼，《激进的政治经济》，（1972年），第110页，113—114页。

③ 与此有关的一些研究，可见《美国经济学会会刊》，1972年，第279—318页，尤可见考夫曼和梅尔曼所写的文章；罗伯特·恩格勒的《石油政治》，（1961年）；G·科尔科的《美国多元主义的衰落》（1961年）。

④ 参见A·舍恩菲尔德的《近代资本主义》（1965年）。

言，这些部门都不如制造业集中，但是就单位的绝对大小而言，大商行及其官僚组织正越来越显而易见。例如，仅29个零售联号商店就控制了全部商业资产的1/5，同样，一些大银行和保险公司的优势和发展也是众所周知的：15家最大银行的雇员数占了整个银行业的1/3；15家最大保险公司的雇员数则占了全部同业人数的一半左右。因而，工业资本主义的组织特征及其等级制度，官僚体制，尤其是它的集中趋向似乎都可能在后工业社会继续存在。

其次，既然我们已为前面已经论及的变化类型而费心，我们就应发现，几乎没有什么财富和收入的再分配。许多研究① 表明，美国最高阶层和最低阶层的收入份额是超稳定的；10%的最高层家庭收入约占全国总收入的30%，而30%的最低层家庭收入则不到总收入的10%。在最近10年里，这些比例大致保持不变，或者略向不平等处倾斜，人们原本希望在这10年里，后工业的变化会显示其影响的。

更为重要的是财富高度集中顽强地继续存在，1～2%最高层的家庭占有了约1/3的全部财产。对公司财产——尤其是最具战略意义的财产——的控制则更紧紧地集中在一小部分人手中，占全部家庭0.2%的首富拥有这些财产的2/3。② 顺便说一句，应该注意到，这种控制的极端集中并不是资本主义制度所特有的，在封建主义和社会主义（就权力可以谋求财富而言）中无疑也能找到这样的集中，资本主义所特有的现象则是对公司企业控制

---

① 参见G·科尔科的《美国的财富和权力》，（1962年）。也可见阿克曼，伯恩鲍姆，韦茨勒和津巴利斯特的《美国收入不平等的限度》，载于R·爱德华，M·赖克，T·韦斯科夫主编的《资本主义制度》，（1972年）。

② 罗伯特·拉普曼，《全国财产中首富的份额》，国家经济研究署（1962年），第24页。

的集中，尽管拥有财产的权势人物会从科技界征集新生力量，但还没有迹象说明在后工业背景下，这一集中将会因控制人员的增多而有明显的减小。

最后，我们要把讨论从结构转向功能。我们已经注意到，极不稳定的资本主义发展趋势似乎现正承受着草草急就的修补。我们只在此补充一点，前面讨论过的后工业化社会独特的面貌——就业部门转变和教育投资增加——本身并非是稳定趋势的根源（尽管你可声称，宏观经济学意义上的防御性武器本身也部分地是当代知识投资的产物）。不管我们可以多么成功地消除由大批失业和收入灾难性地下降所带来的威胁，也很少有证据可以证明后工业社会已经解决了资本主义活动模式所反映的问题。通货膨胀取代了通货收缩，但是前者与后者一样、实际上只是一种市场现象。大量的资源分配不当，尤可见于衰退的城市，这已超过了大量失业的问题，成为公众优先考虑的事了。但是，失误造成的则再次与市场机制的衰退和对私有制的特殊限制有关。更值得一提的是"资本主义"和不发达国家的关系在最近一个时期似乎更糟，我们甚或可以绝对地说，"帝国主义"时代的资本主义问题已经又成为众矢之的。

所有这种种因素都在提醒我们：无论我们还要对后工业社会的未来说些什么，我们都应该把后工业社会看作是资本主义的一个发展阶段，而不是资本主义"以外的"一步。在这个阶段可能会出现某些新的特征和问题——的确，我接下去将对此作一探究——但是，也一定能可望看到许多工业资本主义的结构上的属性，其中包括集中的经济权力和财富，极不平等的税前收入（或许还有税后收入）的分配，宏观功能失调，资源分配不当，这些现象都是由于市场在调节机制中的优势作用而产生的。

那么，我们就认为后工业社会并不存在，而只是一种幻想吗？

这不是我的目的。正如最近的工业资本主义显然在许多重要方面不同于亚当·斯密时代的小规模的资本主义，当代资本主义内部的后工业趋势也可能朝着那个预示重大变化的方向推进。

因此，让我回过头来重温我整理过的材料，以剖析那些对我来说似乎特别变幻莫测的事情。我们会记起，在这一切之中必须首先处理就业人员的部门转移事务，他们从农田转到工厂，最后进入办公室。对于这样一种规模浩大的重新安置就业的问题所带来的后果，尤其是人们还要考虑到服务业内部工种的不同，① 有可能作出概括吗？

不言而喻，要作这样的概括是可能的，但要加以解释就不那么容易了。我们称作或认为是"工作"事务的特点已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后工业社会的人就象工业社会的人一样，不具备进行社会活动所需的最基本的常识，只有在度假、旅游或选择衣着时，他才会感受到季节和气候的影响。不管怎样，工业社会的人尽管对他所从事的基本任务毫不知情，但他还是参与其事了，而后工业社会的人则与他们不同，他们连生产大量产品的环境也不熟悉。在商店及办公室，看不到工厂堆放垃圾的凄凉旷地及其四周高大电网；听不到工棚里的声响、没有肮脏的工作服、盛放午饭的木桶、油腻的积垢灰尘，在工业社会的工厂里人们对这些东西是习以为常的。变化还表现在管理监督的性质方面，工厂的汽笛、考勤和工头均不见踪影了。全部或绝大部分的服务性工作的特点都是环境整洁、衣着整齐或有一件令人肃然起敬的制服，不断地在"顾客"的眼皮下面工作，可以喝咖啡，进行电话洽谈。这绝不都是好事，尽管部分

① 让我们仅仅提醒一下读者，这一部门包括美国生活中官僚化程度最高的机构——联邦政府，也有官僚化程度最低的机构——私人企业、服务性行业，需要高度技术的工作（外科医生），只要很少技术的工作（档案管理员），报酬极高的人（艺人）和工资很低的人（仆人）。

是这样。工作时的自然危险是少了；但心理上的紧张程度却加强了。体力消耗大大减少了，但心理负担却大大增强了。

象这样根据印象推测工作环境的变化是很难得出结论的。例如，“异化”是加剧还是缓解了，就是我们很难有根有据地加以猜测的事；这至少是因为服务业所包括的工作可真是多种多样。然而，在充分认识到这种“社会学方法的”脆弱性之后，还是让我冒昧地作一猜测吧，将上述工作经历的改变和后工业社会的第二个特点，亦即延长就业人员正规教育时间、扩大教学内容结合起来考虑。这一猜测（也许未经验证，不能冠之以“假设”一词）就是延长在具有“白领”气氛的教室中的学习，是为了使这学习与预期的“工作”性质一致起来。也就是不仅使人作好知识的准备，而且要使人作好经验的准备，这些准备多半是为商店和办公室而不是为工厂或农场作的。当然，我们知道也有例外：农艺学家、工程师和少数类似的职业即属此例。但是，大体上我们还是认为这样的说法理由充分：在与“工作”有关的方面，教育培养的是读、写和计算，而不是处理问题的能力。因而后工业社会所鼓励的是维布伦称之为不能胜任“脏活”的“受过训练而无能的人”，这些人在追求正式大学学历的人中所占的比例越来越大。顺便说说，我必须指出，与工业社会相比，后工业社会的平稳发展更依赖于“次要的”劳动力的存在（退学者、季节性临时工、或受剥削的少数民族）。他们不断地被用来摘果子、挖沟渠、扫地、洗碗。

我认为，与“工作”含义方面的新观念一起出现的是人们越来越希望工作能得到保证。一个男子或一个女子一直要到21岁，甚至25岁才能实际摆脱所有经济需要的束缚，在此之前他们是受人抚养的，在这样的环境里他们理所当然地想得到某种经济上的供给，即使很微薄，也聊胜于无。假如后工业社会的教育制度下的大学毕业生强烈希望“工作”不再是什么令人羡慕的特权，而是一个

基本的权利——完成社会规定的长期教育之后所要求的正常报酬，是不会令人感到惊奇的。因而，要求保证就业，保证任期间不致失业，希望得到收入不致中断的"权利"，在向后工业时期的职业和教育结构过渡时似乎是顺理成章的了。也许，这只不过是把以前显然主要只在上层人士中流传的看法传给平民大众而已。

最后，我们讨论后工业国家的另一个新属性，由于存在我们以前已审视过的特征，这一特征的出现是不言而喻的，它与后工业社会的经济作用和非经济作用问题有关。

后工业社会的制度有可能强化了一个主要的趋势，这就是企业与国家不断加强彼此的协调，这种协调是公开的而不是隐秘的。当然，企业与国家协作的历史象资本主义本身一样的悠久；在上一世纪统治世界的放任主义的现实面前，它更象是一个神话。在后工业的结构内部，有许多力量似乎会使那种神话的色彩大减，而加强了公开合作的趋势。在面临广泛地希望"保证白领工作"的要求；面临补救资源分配不当所造成的灾难性结果；面临经济制度的圆心和圆周两极分化的不断加剧的情况下，保持充分的凝聚力是很重要的。有鉴于此，就似乎会更加需要某种类型的"计划"，在政治上也要能够接受这类"计划"。无疑，在不同的社会里，这种计划的形式和作用在施行的范围及效果上各不相同，并带有思想、传统及结构上的个性，但是在总体上，我预料到后工业制度会具有某些共性的东西，可将其描绘成一种"合作国家"，那就是说，在这样的国家里，圆心与国家的活动互不矛盾，和平共处，圆周的危险和不稳定会得到化解，至少会有大部分地承担其责。现在大家所接受的资源分配方式，也会受到公私双方一致的攻击。

我提出后工业趋势中易变的因素将促进公开的计划，并不是说这个阶段的资本主义政治经济问题一定比工业资本主义时期内的问题更易于解决。控制通货膨胀也许比克服萧条更加困难，无

论是作出判断还是在政治上找到对策均是如此。中等富裕的中产阶级力量和服务业工作人员的力量会给现行的“收入政策”造成很大的麻烦，其程度要超过他们在工业社会时期给决定工资的政策所制造的麻烦（从最近市政部门发生的情况中便可略见一斑）。①在后工业社会的宏观管理下，要说服多数收入在十个等级中属第四等级以上的人，为了改善最低三个等级穷人的处境，而放弃大量钱财，也许同样是一个难题。所有这些问题似乎都在进一步推动整个潮流向着我在前面已经指出过的企业-国家计划的方向前进。

至此，我们已从两个方面讨论了后工业社会：第一，分析了一些有关后工业社会词义看法中的不恰当之处；第二，指出了存在于这些看法中的真理内核。现在，我想换个角度继续讨论。首先想探究一下结构或转变方面的两个侧重点，除了我们已在前面核实过的外，后工业社会就是以此为存在条件的。最后，我准备就我们能预料到的这些变化带来的社会后果，提出一些难度很大的问题。

在从农业阶段，通过工业阶段进入以服务业为中心的，强化教育的、我们称之为“后工业”制度的过程中，可以预料经济会出现怎样进一步的变化呢？有两个这样的变化显得与这一过程有着整体上的联系，尽管我们将会看到这些联系在每个场合并不都是相同的。

第一个变化一定和工作的日益机械化有关，那就是和隐藏在经济转变过程本身后面的力量的进一步发展有关。无疑，技术是

---

① 琼·鲁宾逊在《经济学的异端》一书第93页中指出：在“传统”的等级制度下、对价格水准的控制最终还是取决于群体的默许程度，因此，事实上少数工资契约的确定就可决定工资的总额。“白领”性质工作的增加，教育日益面向多数人，会使这种内部的控制有所减弱，在“机会均等的条件下竞争”，一切束缚人的机制都会受到遏制。

造成劳动力在部门间迁移的主要因素，因为正是农村以及后来工厂工作的"技术化"的扩大，才解放了人力，使其流入经济的第三个领域。① 我们并不完全理解造成劳动力转移的技术按特有的顺序演进的原因，因此，关于将来，我们也难作出肯定的预测。但所有的迹象都表明，发明和革新相对来说将更集中在服务部门的工作中。原因似乎有三：1.在农业方面，劳动力的转移达到了极限(尽管在农业部门还可将一小部分的人赶离其工作岗位)；2.诚如我们所见，在工业的核心内，发明和革新几乎已进行了3/4个世纪，这就使这个部门的劳动力相对保持不变，因此，我们可以假定，如果技术的总力量和需求维持不变，就不会有很多劳动力脱离工业；3.对引进机器最具"吸引力"的部门是以前"忽视"技术的服务领域。② 在这个领域，劳动成本高，劳动效率低，而已达到新水平的技术力量已开始将许多迄今为止尚"不能用机器干的"活带入了机器的应用范围，结果我们就让售货机取代了售货员，让自动售货店代替了店员；也有了数控车床，自动支票读数装置，万能计算机。

机械化的这一进一步发展将会产生什么样影响？关键全都在于对该部门服务的需求程度。如果需求一如既往，而由于"自动化"，每个服务人员工作效率得到提高，那么服务业就可吸收目前劳动力的60～65%。如果需求增大或技术的应用较少，服务业所

---

① 看来在这里作一个简明的技术性说明是必要的。技术解放了人力，但是被解放出的人力流向取决于对不同部门商品的需要程度。如果对农业产量的需求是极富弹性的话，通过机械化解放出来的劳动力就会使整个农业产量增长的幅度比我们现在要快得多。制造业的情况大致相同。造成从事农业的人数急剧下降和从事制造业人数的相对稳定的，不仅有技术上的原因，而且也因为对"食物"的需求一成不变(恩格尔规则)，而对制造业的产品需求几乎都是灵活多变的。

② 参见J·施莫克勒，《发明和经济增长》，(1966年)，显然，在技术的发现和应用过程中，需求起着指导作用。

雇佣的人员在绝对人数和所占百分比的数字上均还会进一步提高。对“服务”的需求就象对“产品”的需求一样，也有可能最终达到“饱和”状态。更具体地说，诸如政府部门，零售业，教育，娱乐，财政咨询等部门的工作量也会有一个限制，因为人的需求是根据一定的收入水平而定的；而服务“量”(用我们花在上面的钱计算)提高的速度也许跟不上收入的提高。

在这种情况下，转移出来的劳动力向何处去呢？有几种调节的可能。一种可能是创建一个公共的就业部门，为从服务业转移出的劳动力创造就业机会。这个部门本身不需要限定在第三产业内部，而可以包括享受补助金的小农业、得到津贴的劳动密集型手工业、劳动密集型的公共建筑业等等。第二种可能是慎重稳健地削减就业人员，这可部分通过延长义务教育年限，部分通过降低退休年龄、部分通过缩短周工作日来达到。第三种可能是进一步扩大转移机制，允许一部分达到工作年龄的年轻人没有工作而能够生活，如果作此选择的话，要使他们的生活达到既定的社会生存水准。

我再重复一遍，所有这些调节都是必不可少的，如何调节将根据无法预料的技术上的替代和为适应不同服务行业的需要而出现的人员流动程度而定，这些调节表明着“传统的”资本主义机制将会精疲力尽。它们意味着我刚才说过的整体设计已达到了很高的程度。它们也意味着一个大规模运行的新体系也会感到不胜重负，在这个体系中被马克思和韦伯认定为历史基础的没有财产的工人阶级已经被一个不管怎样“没有财产”但也不必被迫按市场行情出卖劳动力的阶级所代替。所以，断言在“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和制度统治下运行的经济制度不能作出这些调整是鲁莽的，你只要去想想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的资本主义国家所显示的高度社会调节就行了。但机械化所引起的挑战的基本本质却是清楚的。由于服务

业的机械化程度日益加深，后工业社会可能将面临着劳动力“过剩”；如果个人对“服务业”需求的自然增长不能吸收剩余劳动力，那么就需要对销售过程进行大规模的干涉。

机械化问题的第二个方面已经引起了我们的注意。这是“自动化”对“工作”本身的心理和生理作用的影响。我们已经看到，“脑力”劳动取代“体力”劳动是后工业化社会的一个主要标志。即使在最简单的程度上，人类也已用拖拉机代替了锄头，用计算器代替了心算，用计算机控制的车床取代了夹头车床，人类在后工业社会所作的努力着眼的是管理，而不是直接“动手”。劳动特征在存在形式和经验感觉上的变化值得深思，但对经济范围以外的预测则缺乏可靠的根据。在本文的结论中，我们要重新提到这一社会预测问题。

后工业国家面临的第二个结构方面的挑战是在今后几十年里一定会面临的生态平衡问题，这个问题将随着人口密度的增加、污染的加剧、资源的枯竭而日趋严重。

生态问题从根本上说涉及面极广，而它的特定含义却很严格。问题是需要多少时间才能获得平衡以及技术上的修正所能达到的程度。① 这对于高质量的健康水准、可以容忍的增长限度以及说到底作为人类栖息之处的地球本身的生存，都是生死攸关的。毋庸置疑，生态的危胁所影响的并不只是后工业国家，而是所有的国家，尽管对各国影响的方式和时间有所不同，但就其对生活质量的直接影响来说，绝大多数的发达国家由于面临着严重的污染和资源消耗，所以是首当其冲的。

如果要作“认真”考虑的话，生态问题对后工业社会来说就是

① 参见罗伯特·海尔布罗纳，《发展和生存》，《外国事务》杂志，(1972年10月)，J·艾伦塔克，《生态平衡和定态》，《土地经济学》杂志，(1972年10月)。

一种当务之急。我们已经注意到工业核心的存在，当然也注意到它继续存在的重要意义，它和农业部门一起，支持着后工业国家的第三产业活动。然而，问题在于要对资本主义机制的扩张作一限制，这种扩张已通过资本主义公司的贪得无厌、不断敛财的行为表露无遗，如果工业部门内部的发展毫无牵制，超出了环境所允许程度的话，就可将其限制在一个适当的范围里。

在后工业国家内部所存在的许多新的紧张和功能失调的根源中，这种在工业内部隐约出现的要对扩张作一限制的问题是最难解决的。在过去进行资本输出是这种扩张的主要出路，现在这条道路已经关闭，因为在其它发达国家（当前对资本最具吸引力的地方）存在着环境污染问题；而在不发达国家则存在着政治问题。至于资本主义在国际上的扩张势头能在多大程度上转移到服务业上来，这还是一个难以断定的问题；但是前景似乎并不特别好，因为各种"服务"行业现在都大局已定了。

企图猜测工业公司能在多大程度上打进诸如娱乐、旅游、私人服务等领域是毫无意义的。重要的是要记住某种形式的"增长"及其带来的金钱梦，与其混杂在一起的"好"与"坏"，都是缓和紧张的必不可少的手段：这些紧张是因为需要把全部产品分成工资和产业的进益而引起的。在一个后工业社会里，工业的扩张必然由于环境所受到的公害而受到限制；大公司也找不到渗透入服务行业的满意手段，在这样一个社会里我们可以预料会出现严重的压力，表现为利润率下降以及（或者）为了社会产品的分配而进行的更尖锐的斗争。尽管还不知道"资本主义"能否调节这一类情况，但就象马克思和凯恩斯这样观点不同的经济学家也一致认为，这样一种趋势尽管不能肯定，但十有八九可以加速向实行"管理化的"公私合作国家过渡的进程，关于这种国家，我们已在上面讨论其他趋势时指出过了。

对于后工业国家的社会经济特点，我们已经放任自己进行了充分的思考，因而不免受到诱惑，要想从中得出一种带有纯属经验主义色彩的结论。然而我们抵制了这一诱惑，使自己在考虑将来可能会有的发展时，能对那个似乎已有定论但却属高度猜想的领域作一番探究。

这是一个有关经济"基础"和非经济"上层建筑"的经典问题，马克思对此有严格的表述，其来源还可以追溯到苏格兰历史学派。我们必须承认这样一个事实：我们对将要来临的事物形式所作的一切猜想，暴露出我们不管是自觉还是不自觉都是一个经济决定论者——真的，甚至是一个技术决定论者。换句话说，关于后工业主义的所有思考，都把因果关系的推断假定为从经济变化发展到政治变化和社会变化，尽管也会讨论反作用（比如，推行计划化），但社会演进中的经济动力仍是"预测"中的原动力。

这种把经济动力放在首要地位的做法排除了意识的作用，其之所以能占上风是因为我们在经济领域里感到了在政治及社会领域里看不到的"规律性"的运动，这些运动不管多么模糊不清，还是可以描绘出来的，而且在一个较大的范围内，还能推断出它们之间的相互影响。这些规律性运动之一就是作为资本主义制度特征的对利益的追逐。虽然这种追逐没有导致新古典经济学上的决定性的"平衡"解决，①但它使我们能相当肯定地预见到一些行为，例如：对削减价格的技术的追求，企业的集中（不管是出于提高效率的原因还是为了赢利而进行的财政控制），在还没有受到技术"侵犯"的工业中可能出现的经济规模，由于众人尽知的"增殖"规律以及其它一些规律的作用而扩大了的具有自主权的公私经费所起的关键作用。

① 关于这一点，尤其可参见A·洛，《论经济学知识》，1965年、1966年。

我还要强调指出，在所有的这些领域里，我们的知识都是极为贫乏的。短期的经济预测是以推测"已知的"行为功能及技术限制为基础的，因而显得错误百出，但长期预测则另当别论，因为经济生活的浪潮一再出现，从而肯定了自己，这是短期的幻想无法办到的。① 因此，不管我们敢于对后工业社会的轮廓作出多大程度的预言，我们必然要以这些经济的预测为基础，我们对政治事务的组织、社会的组织、文化生活方式的变化以及诸如此类的事可用怎样的"规律性"词语表述呢？除了少数叙述性的概括——米切尔斯关于寡头政治的"铁的规律"；韦伯对官僚政治组织的描述，弗洛伊德或埃里克森对心理解剖学及其发展阶段的概述——其它社会科学也通过预测理论途径提出了什么？答案恐怕是少得可怜。因此，不管经济决定论者的看法可能是多么地不精确或不完备，由于缺乏可供选择的"明确的"态度，我们不得不用这种原始的方法去预测未来。

这就向处于我们这样的地位的科学家提出了非常严肃的问题。不仅经济学的"运动规律"极不精确，甚至要略微自信地对特定的经济结构以及相应的政治、社会结构之间的联系进行描述也是困难的。我必须承认我是有所怀疑的，如果后工业社会的发展果真循着我所描述的那种经济轨迹运行，那么随之而来的将是一个更加独裁的政治结构，在缺乏教育的人中将会出现更多的无法无天的集团，而那些受过教育但依然受竞争性的、追求利益的教养支配的"中产阶级"，将会有越来越多的不安和烦恼。但这仅仅是猜测，也许人们能够制定出同样或更令人信服而又极为稳定的、具有共同道德的、同时个人也能得到满足的方案。

① 参见R·海尔布罗纳的《论经济预言的局限》，载于《在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

在形势极不明朗的情况下，阿道夫·洛可能一矢中的地道破了当代——实际上就是后工业时代——所定的调子的真相。他将其称之为"社会宿命论的终结"。① 他认为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不仅是自然活动，而且社会活动也被看成是"既定的"，毫无怨言的群众默默地接受了这种看法，按照神学的或政治的宗教词语对此作了解释，而这个时代已经结束了。

如果在感觉上认为这个深刻变化是确实存在的——我相信情况确实如此——我们对未来的看法也会由于带有某种程度上的"推测"而与这一时代的事实在根本上有所不符。在一个已经抛弃了社会宿命论的时代，未来将不再是"来临"，而将在政治意志及其经过仔细选择后确定的目标制约下被创造出来，不管这种创建是多么的粗糙，多么残酷，或者是多么完善。因此，在经济学内部或在与其相关的学科内寻找未来"明确的"前景也许是错误的，这种未来不会因为你对"规律性的"机制的研究而出现（尽管这些机制的残余影响对其可能有所影响），但可通过对社会目标进行政治上的选择而得到，因而达到这个目标的手段将成为社会科学研究的主要课题。②

当然，这使目标的选择悬而未决。关于这个极为重要的问题社会科学家无话可说，无论是顾问还是内行的"预言家"都是如此。他们必然要将其职责让位于伦理学家——他的历史教父——他的任务是提高人们对选择目标的认识。目标一旦确定，社会科学家才能再次在其位谋其政地发挥社会"工程师"的作用，这种作用虽然十分有限，但仍然是重要的。如果要对后工业社会下一个基本

---

① 阿道夫·洛，《当代高等教育恰当吗?》，《社会研究》杂志，1971 年秋季号。

② 参见 A·洛的著作《论经济学知识》和《当代高等教育恰当吗?》，拙作《论一种政治学的可能性》，《经济学问题杂志》，1970 年 12 月。

定义的话，那么我认为它是一个处于某个发展阶段的经济体系，在这个阶段，人们逐步地摆脱社会机制的盲目束缚，从而走向危险的但潜藏着自由的境地，在那里不管是好是歹，人类都将最终宣布他们是自己命运的主人。

卢柏军　译

资本主义发展中的前资本主义和非资本主义因素：论弗雷德·希尔施和约瑟夫·熊彼特*

克利尚·库马

"将过去的一万年，以及那一系列早期社会仅仅看作是我们的文明——大致上开始于1776年《国富论》出版时——的真正历史的序幕的习惯，至少可以说是过时了。这段插曲今天终于结束了，在设法探寻可能要走的未来的道路时，我们应当克制我们本能地步父辈后尘的习惯。"①

——卡尔·波拉尼

一

关于资本主义工业社会——无论是否这样称呼——的长远前景的问题，在这个社会诞生时就已经提出。人们为这个社会是否具有无限扩展和增长的能力的问题作了许多思考。人们都承认资本主义是一种独特的社会形态，它具有史无前例的活力和自我推

* 本文选自艾德里安·埃利斯和克利尚·库马主编的《自由民主的困境——希尔施〈增长的社会局限〉研究文集》，塔维斯多克出版社，1983年。

① 见波拉尼：《伟大的变革》，波士顿，1957年版，第45页。卡尔·波拉尼（1886——1964），匈牙利经济学家，政治领袖——译注

进的能量。所有其他文明社会，例如埃及、中国、罗马以及拜占庭，都由于其经济体系本身的局限而趋于停滞或衰落。在那些社会里，大自然先使它们繁荣兴盛，后来又使它们入不敷出。只有西方资本主义似乎发现了使之得以逃脱饥饿和贫困，惰性和衰败的秘密。

情况确是这样吗？弗雷德·希尔施属于一大批对这种乐观主义信念表示怀疑的批评家和评论家之列。在18世纪，英国正处在近代资本主义的青春时期，人们就这种新经济秩序的内在"进步性"进行了一场激烈的争论。① 一面是一系列重商主义法规的激烈反对者以及自由贸易的鼓吹者，诸如亚当·斯密和约书亚·塔克，他们争辩说资本主义国家前途无量，可望得到几近无限的增长和繁荣。一旦从重商主义的敌对和限制中解放出来，它们就可维持并加强其对世界其余部分的优势，把非资本主义社会变成为资本主义核心提供原料的边缘和附属省份。

反对他们的那些批评家和评论家则认为，那种自由买卖货物和人力的原则最终会使资本主义国家破产。大卫·休谟提出了一个关于经济衰退的一般规律：

> 在人类的事务中似乎存在着各种原因间的一种幸运的协调，它控制着贸易和财富的增长，并阻止其完全受一个民族的限制。……只要一个国家对另一个国家取得贸易优势，后者要获得失去的地盘就极为困难。……但这些失去的优势可以得到补偿，因为那些商业不发达，钱财也不多的国家，劳动力的价格却很低。因此，制造业逐渐移动其位置，离开那些它们已经使之富裕的国家，飞往其他地方，那里的廉价的供给和劳动力吸引着它们，等到它们也使其富裕了，就再次在同样原因

① 见洛：《18世纪关于经济进步理论的争论》，曼彻斯特学院，1952年版。

的驱使下离开那里。①

因而，从长远的观点看，任何走上了资本主义道路的国家都将从繁荣的高峰跌落到悲惨的深渊，一大批人将会失业。正是由于这种令人伤感的循环，休谟的朋友，凯姆斯爵士才将"货殖主义"社会看作是"双面的雅努斯"，认为它清楚地表明了"各民族在从弱到强，又从强到弱的圈子中循环"的一般规律。②

苏格兰的启蒙思想家们，尤其是亚当·弗格森，③确实属于那些对新的商业社会的灿烂前景最为怀疑的人们之列。④就我们所知，斯密本人对其的赞誉是极为有限的。他认为，隐藏在现代世界的无休止的活动后面的非理性激情，与其说出于功利或便利的要求，不如说是因为有虚荣心，亦即取得他人钦羡的努力。"因而，地位——那使长官的夫人们为之相互对立的伟大事物，是人生大半努力的目标"。⑤所有的辛劳和焦虑全都是追求财富所引起的，人们幻想它会带来安全和满足。但是，"自然以这种方式欺骗我们是一件好事。正是这种欺骗不断地唤起和保持人类的勤奋，正是它首先促使人类耕耘土地，建筑家园，建立城市和国家，发明和改进所有的科学及艺术"。⑥而且，众所周知，斯密对资本主义的精神和道德上的贫乏也是深为警惕的。在他较晚的著作中，他甚至逐渐

---

① 见休谟：《论金钱》，载于其散文集《道德、政治和文学》，伦敦，1903年版，第290——291页。

② 见洛：《18世纪关于经济进步理论的争论》，曼彻斯特学院，1952年版，第311——3301页。

③ 亚当·弗格森（1723——1816），苏格兰哲学家，历史学家。——译注

④ 见福布斯：《"科学的"辉格主义，亚当·斯密和约翰·穆勒》，剑桥杂志第7卷，第643——6701页。

⑤ 见斯密：《关于道德观点的理论》，印地安那波利斯，1969年版，第122页。

⑥ 见斯密前引书第303页，卢森堡：《亚当·斯密，消费者的趣味和经济增长》，载于《政治经济杂志》第76卷，第361——374页。

看到一种不可避免的物质上的衰退，"愉快和焕发"的进步状态将继之以"阴暗的"停滞状态及"令人伤感的"衰退状态。① 因此，即使在斯密的例子中，我们也面对着一种关于同时会出现衰退和腐败的发展趋势的悲观主义的预测，——在其经济进程的终点上等着的是物质上的衰退，而在这个进程中，社会则经受着道德上的腐败。②

因此，就在资本主义时代的开端，我们就已发现一种对资本主义达到其各种各样目标的能力的忧虑和根本性的矛盾心理。通常给予新的商业秩序的欢迎是谨慎而有保留的。人们觉得新秩序存在着一种不祥的非理性，任意的内在因素。甚至那些最为狂热地为其辩护的人也为它的未来而感到害怕。因此，如果我们发现那些看来最有说服力而受人欢迎的观点中，针对这个社会的过去的程度同针对它的未来的一样多，那并不奇怪。希尔施曼认为，资本主义对 17、18 世纪的许多思想家和政治家之所以有吸引力，不是因为任何所谓确定的优点，——因为这一类人在贵族式和知识分子式地蔑视商业方面，一般是很一致的——而正是因为在一个受到 17 世纪的连续不断的内外战争惊吓，变得精疲力竭的时代，对赚钱"感兴趣"，比争权求名更令人兴奋的追求，更能安全地发泄人的难以遏制的精力。③ 换句话说，这种吸引力是政治性的而不是经济性的，当然，绝对不是道德上的。"在一个寻求减少危害和恐怖的途径的年代，人们常常彼此造成对方的痛苦。商业及经济活动……被认为更为温和，这并不是因为对它们的敬意有任何提高，相反，对它们的任何偏爱都表达了要求离开某种（灾难性的）伟大的

---

① 见斯密：《国富论》，第一卷，第 72 页。

② 见海尔布隆纳：《进步的悖论：〈国富论〉中的衰退和腐败问题》，载于《思想史杂志》第 34 卷，第 243 页。

③ 见希尔施曼：《激情和利益》，普林斯顿，1977 年版。

愿望，因而这反映出一种继续存在的蔑视之情。"[1]约翰逊博士[2]评论道："在人类可用的方法中，几乎没有什么比赚钱更无害的了。"这同时抓住了这种吸引力的基本要点，以及常可从中看到的那种屈尊俯就的态度的根据。其他作者则更深地受到这种观点的影响，即认为商业不仅限制被统治者的激情，同样也限制其统治者的激情，因而较少势利的态度。萨伏利[3]写道："商业有助于生活中所有的高雅气质。"孟德斯鸠则宣称："如我们日常所见，平和的商业润饰和软化了野蛮人的方式。"按希尔施曼所说，资本主义的成功至少部分地是因为它是麻木不仁而缺乏激情的。那些以后被人道主义和浪漫主义的批评家们攻击最甚的特征——亦即那些导致资本主义"异化"、"一维结构"的特征——恰恰就是那些在早期阶段上使其如此富有魅力的特征。

无论希尔施曼的描述是多么会引起争议[4]，但总有一个独特的优点，即坚持了一个常常被忽视的观点：资本主义的出现只有在将它同它脱胎的那个（前资本主义）社会直接联系起来时，才能被理解。如果我们考虑到处理这个问题的通常的方法，这个可能被看作明显的陈词滥调的观点就会变得更为有趣。例如按标准的马克思主义的说法，资本主义社会从封建主义中产生出来是基于一个原则——市场，和一个阶级——资产阶级——同它们的封建的对应物完全相反。在《共产党宣言》的一些最为生动的篇章中，详细阐述了英雄——骑士式的封建贵族和乏味的资产阶级之间的深刻区别，（诸如资产阶级"把宗教的虔诚，骑士的热忱，小市民的

---

① 见希尔施曼：前引书，第58——59页。

② 萨缪尔·约翰逊（1709——1784），英国诗人、评论家、散文家和辞典编撰者。——译注

③ 萨伏利（1774——1833），法国将军，拿破仑的忠仆。——译注

④ 见盖尔纳：《奇观和困境：社会学理论文集》，剑桥，1979年版。

伤感这些感情的神圣激发，淹没在利己主义打算的冰水之中."等等)。尽管据说新社会是从旧社会的母体中成熟起来的，但新生的婴儿却明显地很少有其母亲的特征。这真是件咄咄怪事，无论在社会或自然之中都同样如此。

同马克思一样，马克斯·韦伯也强调这种不连续性。他的问题是阐述"资本主义精神"在西方世界的出现，这种精神同中世纪基督教世界盛行的对赚钱的态度全然不同，而且在世界的其他任何地方都找不到。但同马克思不同的是，韦伯借助于比较的方法和理解原则，在中世纪晚期的社会中，更深入地寻找资本主义观点的根源。他接受这样的观点，即宗教信仰渗透于文明之中，只有宗教才能成为一种新的伦理的泉源。这种伦理具有足够的强度和弹性，能够在传统文化的敌视之下维护自已。在他的《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他试图表明，由于这个新教教派的信仰和活动，新教成员是如何因其赚钱活动而受到尊敬，并在社会整体中变得举足轻重的。

这已经向希尔施曼接近了一半，但仍留有一个问题。韦伯已经表明，相对来说出身较为卑微的社会集团，如何能够借助于改革或再造传统的宗教观念，将其作为他们在经济方面的动机，同时在更广阔的社会中，为他们的实践提供辩护。经济活动因而是神圣的，应予提倡的，尽管这最终结果，即资本主义体系，当然完全不是16、17世纪的新教徒有意寻求的。希尔施曼则提出了中肯的问题：韦伯的理由对于"有抱负的新的精英"的动机似乎是有理的，但对中世纪的"守门人"来说又怎样呢?他自己的讨论想要说明，那些根据国家事务及自身利益的审慎理由行事的传统的精英和他们的顾问是如何会提倡商业精神，将其作为防治两败俱伤的战争的手段的。

按照这种意见，欢迎、提倡17、18世纪的商业和工业的扩展的，不是某些不掌权的社会集团或某个叛逆的思想体系，而正好是由那个时期的“权力结构”和“制度”中心所唤起的流行意见，这些流行意见所反映的问题是君王，特别是其顾问和其他有关的贵族所孜孜以求的。甚至从中世纪结束之时起，由于17、18世纪为外战争的不断增加，对于相当于宗教戒律的行为准则，能够构成同时对统治者和被统治者都必要的原则和约束的新的行为规则的寻求继续着。在这方面，商业和工业的扩展被认为很有希望。①

16

因此，希尔施曼甚至比韦伯更为强调新的资本主义秩序同近代早期欧洲盛行的权力结构之间的本质联系，这里他显示了更多的社会学的实在论。资本主义不能从完全的中世纪封建社会的对立面中兴起，也不能为边缘社会集团本身的行动所完成。这种类型的社会变迁及展示这样一种模式的重要事件是无例证可寻的。②无论其是否明显地是政治性的，革命性变动总是涉及一个“福隆德”③的因素，即至少是旧的统治阶级的一些代表所谋划或受到他们纵容的。封建社会的统治集团同最终破坏了其秩序的资本主义体系的出现必定有着牵连。这里必须强调，这种联系与另一种例

① 见希尔施曼：前引书，第129页。

② 这里的观点完全没有根本性突破，至少在英格兰是如此。早在16及17世纪就由麦克法兰(《英格兰个人主义的起源》)挑衅性地提了出来。限于篇幅和能力，这里不能就这个问题进行任何讨论。但人们至少可以说麦克法兰对于“资本主义的兴起”的含义所持有的观点是非常局限和狭隘的。问题不可能因为把注意力集中在确定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的法律和习俗上的定义而得到解决。问题更多地涉及社会价值，对工作和宗教的态度以及社团联系观念的变化的方式。而麦克法兰并未讨论其中的任何一点。

③ “福隆德运动”，又称“投石党运动”，指17世纪中叶，法国的两次分别由法院和贵族发动的反对专制制度的运动。——译注

如在英格兰的情况完全不同，在那里上层阶级的成员本身在商业和农业中从事资本主义的冒险。近代早期那些提倡资本主义的上层阶级这样行事，首先是由于国家方面的理由，而不是为了参加一场人人都可参加的资本主义竞赛。

这就使关于资本主义的起源和发展的问题的范围更为广阔：如果前资本主义的集团及其急于要做的事在其关键的初始阶段是如此重要，那么，它们不也可能同样留存于较晚的阶段？一般地说，非资本主义的因素也可能成为资本主义社会秩序的重要组成部分，即不是简单地成为其残余或遗留物，而是成为对其正常功能至关重要的支柱？传统的回答是否认其在资本主义较晚阶段中的重要作用，即使那些认为前资本主义因素在资本主义起源中有着相当份量的答案，也是如此。资本主义一开始行动，似乎就获得其自身的逻辑，以支配其以后的进程。对韦伯和希尔施曼来说，"意外结果"的原则在很大程度上排除了那些初始因素在以后的发展中的重要性。韦伯认为，新教徒看到了宗教被他们帮助创造的经济体系的世俗力量逐渐破坏，继虔诚的理查德·巴克斯特①而来的是自由思想家本杰明·富兰克林。对希尔施曼来说，这一原则起的作用多少有些不同——人们指望的事情并未发生——但结果是同样的。对资本主义将带来和平的希望，先是为法国革命和拿破仑战争，以后又为20世纪的世界大战和革命所摧毁。同这些希望连在一起的社会利益的命运也同样如此。

就在这里，我们直接面对着希尔施和熊彼特的贡献。同正统观点相反，他们坚持认为资本主义同它们的前资本主义的过去有着某种程度的联系，这种联系远远超过单纯的交错或共存，其量之大，有些类似整体性的共生。

---

① 理查德·巴克斯特(1615——1691)英格兰基督教清教派牧师。——译注

二

"在任何国家，任何时候，市场资本主义从来不是政治经济的唯一基础。"[①] 希尔施的论点是，按照对其本身的判断和根据它本身的条件，自由的市场资本主义是不能存活的。"按占有的个人化"原则使其运行的尝试——某种由于其自身发展逻辑所最终必然会推行的尝试——将使其陷入危机。这里，希尔施接受了较早由卡尔·波拉尼提出的观点。波拉尼认为"那种以为市场会自我调节的观念意味着十足的乌托邦。这样的制度不消灭社会的人力和自然资源，就一分钟也不能存在。它将在肉体上摧毁人并将其所在的环境变为荒野。"[②]

因而，市场社会从来没有实际上按其自己表达的自我调节的原则，通过"看不见的手"行使职能。不毁灭它自身就不可能这样做。但是，如何会造成那种曾经有过的印象，以为自由社会的自然秩序似乎就是市场社会呢？希尔施争辩说，曾存在特殊的历史条件，使得"自爱和社会"的平衡显得似乎可能。现今自由民主之所以会陷入困境，也部分因为误解了这些自由资本主义社会自然结构的特殊条件。市场资本主义是在"短暂的初始条件"下出现的。

> 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联系了个人的自身利益和社会需要。但现在人们并不认为，使得这种联系适用于广阔的范围的那些条件，是可以依赖的，会持续下去的，或可通过人为的行动很容易地予以维持的稳定不变的条件。毋宁说，它们在某些重要方面可以被认为是一些特殊条件，与以前的社会

---

① 见希尔施：《增长的社会界限》，伦敦，1977 年版，第 18 页。

② 见卡尔·波拉尼：《伟大的变革》，波士顿，1957年版，第 3 页。

经济体系之后的过渡阶段有一定联系。一般说来可算是仁慈的看不见的手是自由资本主义的有利的初始条件[1]。

那么，那些有利然而只是过渡性的"初始条件"是什么呢？首先是"完全的参与仅限制在少数人中间；这少数人在自由资本主义使大批人走上物质增长的道路以前就已经获得了物质上的富裕"。这个条件恰恰被自由资本主义的成功所破坏；其经济活动使富裕的观念成为可能，其自由原则又使拒绝任何人分享那种富裕——并日益平等地分享——成为不可能。这种初始条件的丧失引起的挫折，即"充塞效应"(crowding effect)在希尔施的"财富的悖论"及"分配的强制"等论题中有所分析（这些论题在本书的其他部分讨论）。

其次则是："这一体系是在一个与之不同的社会秩序的社会基础上运行的"，正是这种基础"支承着一个通过市场交易使个人自利原则发生作用的良好而有效的方法"。那些曾寻求通过有选择的政府干预和政府规定的行动，诸如通过税法和补助来纠正公认的自由市场体系的缺陷的经济学家，如凯恩斯负有肤浅的分析的罪责。他们忽视了"在制定相关的政府政策以及在将其有效地转变为市场机会时，社会责任感方面的精神气质的支持所起的关键作用。为什么指望那些控制者们自己放弃扩大其利益？"事实是，"个人自利的原则作为社会的组织方法是不完全的。它只是在得到某些与其配合的社会原则的合作时才能有效地发生作用。"亚当·斯密和约翰·斯图亚特·穆勒在资本主义的早期阶段都曾用不同的方式，或多或少地将这些起配合作用的精神气质视为理所当然的，因而他们对之并未多作评论。而他们的后继者们则正是处在这些精神气质由于个人主义的市场伦理的胜利而受到侵蚀的时

① 见希尔施：前引书，第11页。

代，因而正是在对其有着最大需要的时刻忽视了它们。用来修正"放任主义"原则的凯恩斯式的干预仅仅是加深了这个问题。"对放任主义的纠正，与其说是减少了倒不如说是增加了对个人行为中某种程度的社会倾向和社会责任感的依赖。这种已经作出的努力是在没有支持性社会道德的情况下建立一个日益清晰可见的社会组织。"①

因此，希尔施在"耗尽道德遗产"的题目下所作的这段叙述，将资本主义的成功的作用同其前资本主义的过去直接联系起来。市场体系在其开创阶段的弹性，被看成是稳固地依靠在"前市场社会精神气质的肩上"的。②"作为经济上的个人主义的下层结构保留下来的社会道德，是前资本主义，前工业的过去时代的遗产。随着时间的推移，随着同现行的带有腐蚀性资本主义价值观的接触，这种遗产已经减少。"③ 对这种道德及其与市场社会的直接关系的内容的最好的表述，见于涂尔干④ 对象赫伯特·斯宾塞那样的19世纪自由主义者的纯市场体系的哲学的简洁明了的回答："契约中所有的东西都是非契约性的。"这就是说，市场关系依赖于非市场的准则。"无论在哪里，只要契约存在，它依赖的规则就不是个人的作品，而是社会的作品。"⑤ 同涂尔干一样，希尔施认为，传统道德给予个人欲望和行为的限制极为重要。在他看来，这些限制在很大程度上来自传统宗教信仰中的"美德"。这些先于资本主义存在的美德被带到了资本主义的时代，并成为无拘无束的个人主义的必要制约。"真理、信用、承诺、约束、义务，这些以宗教信仰为基础的社会美德，现在被认为在个人主义的、契约的经济的施行中起着中

① 见希尔施：《增长的社会界限》，第11——12页，120页。

② 见前书第12页。

③ 见前书第117页。

④ 埃米尔·涂尔干（1858——1917），法国社会学家。——译注

⑤ 见涂尔干：《社会中的劳动分配》，伦敦，1964年版，第211页。

心作用。"① 因而，资本主义道德遗产的缺损伴随着传统宗教的衰落，因为"以宗教为基础的准则"是"来自正被取代的那套原则的幸运的遗产。"正是市场价值观念的力量和成功，逐渐破坏了宗教的信仰和实践。而且，这种结果被认为具有特殊的历史悲剧的因素。"归根到底，市场体系更为依赖的是宗教约束而不是封建体系，它抛弃了由习俗和地位的义务保持的社会纽带。但市场体系的个人主义和理性主义的基础仍然破坏了看不见的宗教支持。"②

引人注目的是，有那么多着眼于"自由社会危机"的现代评论家们，也同样觉察到了资本主义经济的道德基础退化的问题的核心：由于这些基础本身是以前的前资本主义结构中的遗迹，这个问题就变得几乎无法解决了。③早在 1921 年托尼④撰写《工业主义的

---

① 见希尔施：前引书第 141 页。

② 同上第 143 页。

③ 见布里坦：《民主的经济矛盾》，载于《英国政治科学杂志》，1957年版，第148 页；贝尔：《资本主义的文化矛盾》，伦敦，1976 年版；哈贝马斯：《理性的危机》，伦敦1976年版，第 48——49页；戈德索普：《通货膨胀，一个社会学的说明》，载于希尔施及戈德索普编，《通货膨胀的政治经济》，伦敦 1978 年版；吉尔伯特：《通货膨胀的社会学模型》，载于《社会学》15(2)，第185——209 页。

约翰·戈德索普在这里看到了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关于资本主义论述中的主要的不同：

"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在评价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时，存在着，并且在历史上也存在着明显的不同。经济学家们倾向于认为它具有趋向稳定的内在性质，至少通过他们能提供的专门知识进行巧妙的管理，能使其稳定下来。而社会学家则倾向于认为市场经济具有内在的不稳定性，或更确切地说，它会对它所在的社会产生一种持续的破坏稳定的作用，因而，只有在外来因素能弥补其缺陷的条件下，它才能不断圆满地执行其职能。而最为重要的外来因素，则是与这种经济风马牛不相及的，该社会对基本价值的某种一致看法所发挥的整体性影响；或者，最终以力量作为后盾的政府或其他机构推行的'紧急协调'的措施。"

见戈德索普：《通货膨胀》，载于《通货膨胀的政治经济》，伦敦，1978 年版，第 194 页。

④ 理查德·亨利·托尼(1880——1962)，英国经济史学家、社会学家、改革家。——译注

报复》时，他就已为此定下基调，使工业主义——按托尼的说法则是“堕落的工业主义”，遭到毁灭的并不是任何“人类天性中的缺点或瑕疵”，而恰恰是那种揭示了其权力中的缺陷的力量和观念。“由于剥夺了关于共同的社会和道德目标的任何概念，而这正是中世纪的基督教那样的宗教提供的，工业主义（即资本主义）就将人和国家投入“一个无限度扩张的历程，他们贪得无厌地掠夺有限之物，于是他们吞没了大陆和海洋，法律道德和宗教，最后，也吞没了他们自己的灵魂。[①]”

这种观点的总体结构已经够清楚的了：资本主义本身从本质上看是不道德、无目的的；个别的成果仅仅是市场“任意活动”的结果。但是，没有一种社会体系可以在没有道德的情况下运行。资本主义靠借来的道德所造成的借来的形势维持生命；在很长一段时期内，资本主义依靠“传统宗教和传统道德积聚起来的资本”维持生命[②]，这些都是与市场无关的因素。甚至那些世俗的自由主义、功利主义的哲学也能够为资本主义提供一套持久性的价值观念的原因，也就如邓恩所表示的那样[③]，仅仅在于它们受到了“影子一般的基督教意识形态遗产的框架的支撑”，它们自己的逻辑，以及它们为之服务的资本主义体系的逻辑，逐渐破坏了这些遗产，最终产生了一种缩小了的、机械的利己主义，并对似乎曾经施惠于它们的宽容和民主的自由主义价值构成了潜在的威胁。因此，在某种意义上，我们可以说，新教伦理不仅是资本主义的初始条件，而且是持续存在的条件；它限制了那种按单纯的功利主义的幸福原则算法应是毫无节制贪得无厌的需求和欲望。“一旦那种曾帮助限制

---

① 见托尼：《渴求的社会》，伦敦，1961年版，第47页。

② 见克里斯托：《对资本主义的两阵欢呼》，纽约，1979年版，第61页。

③ 见邓恩：《面向未来的西方政治理论》，剑桥，1979年版，第43页。

消费的积累——尽管不是资本的积累——的新教伦理在现代资产阶级社会中被切断，留下的就只有享乐主义。"[1] 于是，总的说来情况就如米切尔·沃尔策所表述的：

> 自由主义这些年来一直能不断存在下去，是因为它所产生的个人主义始终是不完全的，得到古老的戒律和忠诚、以及地方的、伦理的、宗教的或阶级关系的稳定模式的调节。未经此调节的自由主义是无法长期存在的。……自由主义对其历史性限制的胜利将是一场危机。[2]

在我看来，这些看法以及希尔施的观点无可否认都是正确的，这对理解资本主义的发展是至关重要的，资本主义的发展，包括其扩张性的增长，和为这种成长保存那些社会条件所必须的，源于其他价值体系的"社会的自我保护"的相反的运动，都至关重要。[3] 但是，还有麻烦之处。这些观点都是用含混的、一般的术语表述的，提供给我们的是一些抽象的术语，诸如"前市场的社会精神气质"、"传统道德哲学"、"古老的戒律和忠诚"，等等。正如这些作者所阐述的，人们指望这些术语在资本主义的戏剧中发挥主要的作用。但它们更象一些神秘的、任意漂浮的实体，缺乏任何真实的、物质的体现。这些影响的社会实质是什么？它们代表何种群体？它们表达的是谁的利益和观点？仅仅指出这些非资本主义因素的存在是达到理解的第一步，但如果就此止步，这种叙述在历史学和社会学的意义上就仍然是非常不完备的。

---

① 贝尔：《资本主义的文化矛盾》，伦敦，1976 年版，第 224 页。
② 见沃尔策：《不实的自由主义者》，纽约，1979年版，第 6 页。
③ 见波拉尼：《伟大的变革》，波士顿，1957 年版，第 130 页。

熊彼特[1]在很大程度上满足了这种需要。在很少的作品的字里行间，熊彼特概述了一种现代资本主义的社会学，其广度和卓越决不比马克思和韦伯逊色。他不拘泥于"一个古老的真理：死人总是统治着活人"，[2]对资本主义另作描绘。其独特之处，在于强调资本主义是一种复合的社会形态。它在两个互相关联的意义上是一个复合物，在历史学意义上，它展示了两个时代，亦即"封建"和"资本主义"时代的特征；而在社会学意义上，它带来了两个主要阶级，亦即贵族和资产阶级的印记，它们是两个极为不同的历史时代的产物。就此而言，资本主义只是社会体系的一种更为一般的特征的例证。

> 任何社会的形势都是先前社会形势的继承。从后者那里它不仅接收了其文化，气质和"精神"，而且还继承了社会结构和集权的成份……社会金字塔从来不是用一种材料筑成的，不是天衣无缝的。没有单一的时代精神，除非就其构造而言。这意味着，在解释任何历史进程或历史形势时，所作的描述必须得自那样的事实：其中许多东西只能由实际上同这一趋势背道而驰的幸存因素来解释。……本质上有所不同的精神和客观事物的共存，必须是任何一般理论的组成部分。[3]

将这样一种观点运用于资本主义这个事例，就不会把"前市场精神气质"的继续存在解释成某种人为地归纳出来的封建时

---

① 约瑟夫·A·熊彼特(1883——1950)美国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译注

② 见熊彼特：《帝国主义和社会阶级》，纽约，1955年版，第98页。

③ 见熊彼特：前引书，第11页。

代的残余，而是将其解释为仍有权势的贵族的阶级表述。按照熊彼特对这一进程的描绘，16到18世纪的欧洲绝对专制君主国家根据资本主义发展的需要，不断修改其政策，因而他们对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所创造的税收的依赖也不断在增长。但是，专制君主以及无论怎样反复无常，但仍是其同盟者的贵族，从不让他们自己成为资产阶级利益的俘虏，仍然很少在政治上从属于资产阶级。专利主义国家结构中的“封建成份”绝不仅仅是一个鬼魂：

> 这种结构的钢铁框架仍然由封建社会的人的材料组成，这种材料仍然按前资本主义模式行事；它担任政府官员，统率军队，设计政策——它作为一个阶级的控制系统行使职能，尽管它考虑资产阶级的利益，但它仍注意同资产阶级保持距离。这远不是某种返祖现象；这是两个社会阶层积极的共生，其中一方无疑在经济上支持另一方，作为回报，又在政治上得到另一方的支持。①

熊彼特说，这是“那个社会的本质”，而由此建立的结构的存在远远越出了资本主义发展的早期阶段。“贵族政治的成份仍然占主导地位，直至完整无损而富有生机的资本主义时代结束。”这样一个引起争论的陈述，如加上许多限制条件，在很大程度上显得是正确的。作为一种涉及欧洲社会长期发展的观点，它有助于解释可供选择的社会学理论——例如马克思主义——无法圆满地适用的许多事情。它能够解释多种多样的情况，例如法国大革命，② 英国的工业发展模式，③ 英国工人阶级在19世纪上半叶的成功及失

① 见熊彼特：《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伦敦，1976年版，第136页。
② 见摩马尔：《革命：欧洲观念的理论和实践》，伦敦，1972年版，第52页。
③ 见维纳：《英格兰文化和工业精神的衰落：1850——1980》，剑桥，1981年版。

败，[1]以及希特勒兴起以前的德国政治和社会的性质。[2]在所有这些事例中，问题都在于按照资产阶级社会是单一而统一的概念就毫无意义的一连串的阶级行动或联盟。必须将这些恼人的“偏离”和“复古现象”，例如法国贵族在1789年法国大革命中的积极作用解释清楚。熊彼特使我们看到这些不是“返祖现象”或“文化上的落伍”，而是资产阶级政治和社会发展的正常模式的表现。“仅仅包括企业家、资产者和无产者工人的纯粹的资本主义社会，如果确实能存在的话，其运行方式就会与我们在历史上看到过的截然不同。”[3]

这种资产阶级社会的正常秩序是多样化的，其社会结构的特色在于其基本上不是由单一的物质组成。它不仅由同时存在的既冲突又结合的成份，即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构成，而且由那些由贵族和资产阶级阶层间的关系构成，这两个阶层由于其特有的观点和行动准则，而被认为基本上是属于不同历史时代的。资产阶级社会就象双面的雅努斯：一个脸转向过去，而另一个脸则朝向着未来。“当代的社会金字塔不是仅仅由资本主义的物质和法律构成的，而是由两个不同社会的物质，两个不同时代的法律构成的。”[4]

这种结构上的两重性的事实使各阶级如何理解其“正常的”或“自然的”阶级利益问题复杂化，熊彼特举了帝国主义的例子。在19世纪晚期，资产阶级如何同帝国主义的政策和观点联系起来的呢？资产阶级社会的天然倾向是和平的；资产阶级“倾向于不断将其个人生活中的道德戒律应用于国际关系之中。”[5]在一个理想的资产

---

① 见莫尔：《服从的政治学》，伦敦，1976年版；见库马尔：《19世纪英格兰的阶级和政治行动》，载于《欧洲社会学杂志》24(1)。

② 见达伦道夫：《德国的社会和民主》，伦敦，1968年版。

③ 见熊彼特：《战后世界的资本主义》，载于克莱蒙斯编《熊彼特文集》，剑桥，1951年版，第172页。

④ 见熊彼特：《帝国主义和社会阶级》，纽约，1955年版，第92页。

⑤ 见熊彼特：《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伦敦，1976年第五版，第128页。

阶级世界中，战争是非理性、反功利的，是对贸易和工业的主要活动所产生的能量的转移和浪费。[①] 资产阶级的利益应当是和平的，事情通常也正是如此，从信奉自由贸易主义的英格兰中产阶级在19世纪大多数时期中的表现，便可略见一斑。

因此，资本主义国家中的帝国主义，部分地被解释为政治上占统治地位的贵族阶级的倾向和观点的表现，他们因适于战争而执掌大权，而战争也曾一度成为其生活中的主要事务。就此而言，他们代表了专制时代特有的行为形式的存留。但是，不仅在专制国家中形成的贵族，资产阶级也带有这种特征。尤其在欧洲大陆国家，资产阶级的产生，也应归之于专制君主同贵族的斗争，其程度；毫不逊色于资产阶级为创造自身而独自所作的努力。重商主义国家在追求他们自己的专制和王朝利益中创造了关税和贸易权利体系，并使其规范化。资产阶级在其发展的早期阶段特别依赖于专制君主的庇护和保护，以反对封建贵族。它逐渐习惯于贸易保护主义和家长式统治的战略，以发展其自身的利益，并反对其他阶级以及其他国家的资产阶级的利益。

> 这样，资产阶级乐意将自己铸入某个专制君主制的某个权力工具内……无论是出于自愿还是被迫，资本主义早期时代的贸易和工业依然极为盛行前资本主义的方法，带着专制制度的痕迹，并为专制君主的利益服务。资产阶级就带着这样的感情、思想以及行动上的传统习惯进入了工业革命。换句话说，资产阶级的形式是出于某种环境的需要和利益，这种环境本质上是非资本主义的、至少是前资本主义的，这种需要并不是资本主义经济性质的。它之所以会产生，只是因为早期的资本主义与另一种占压倒优势的生活和工作的模式共

① 见熊彼特：《帝国主义和社会阶级》，纽约，1955年版，第69页。

存。已经确立的思想和行动的习惯总会继续存在，因而行会和垄断的精神也就延续下来了。……实际上资本主义在大陆的任何地方从未占主导地位。现存的经济利益是由专制国家"武断地"造就的，也仍然依赖于这种国家的"保护"。象这样的工业机体是承受不了自由竞争的。①

由于资产阶级从来未从贵族国家那儿完全地夺得权力，因而"在资产阶级面前，国家仍然是一种特殊的社会权力"。但基于过去的经验，资产阶级逐渐将国家视为"逃避外部的，甚至国内敌人的避难所和保护者"。"资产阶级试图把国家拉到自己身边来，作为回报，它也为国家服务，为不同于自己利益的国家利益服务。"②它在专制政府的卵翼下生活，因而特别易受那些本质上同资本主义相对立的意识形态的攻击，它常常不需要外部的刺激，就拥护军国主义、民族主义以及帝国主义，以此证明自己是真正的民族资产阶级。这种意愿"可以证明达到了这样的程度：那本质上是帝国主义的专制主义不仅加在资产阶级的经济身上，而且还加在它的精神上——为了专制政府的利益而违背资产阶级自身的利益。"③因而，在最后的分析中，帝国主义：

不仅在历史学的意义上，而且在社会学的意义上，都是专制阶层的遗产；是其在结构要素、组织形式、利益组合以及人的态度的遗产；是专制国家部分地以早期资产阶级的方式改组过的前资本主义力量的产物。它决不能通过资本主义本身的"内在逻辑"发展。④

---

① 见熊彼特，《帝国主义和社会阶级》，纽约，1955年版，第90——91页。
② 同前，第93页。
③ 同前，第94页。
④ 同前，第97页。

就我们现在的目的而言，这种关于帝国主义的说法怎么有理并不重要，尽管20世纪“利维坦”式的帝国主义战争似乎证实了而不是否定了熊彼特的分析，而“处于战争状态”的国家的重新出现，则使他关于“前资本主义成份”的影响正在减少的意见显得过于乐观。然而更重要的是进行这种分析的方法。社会理论家们只是过份擅长用概念的吹泡器从稀薄的空气或某种与其一样虚无飘渺的物质——如“价值、权力或生产模式”——想象出抽象的“社会体系”。熊彼特与所有这些人一样，也想进行推理。但他的“社会体系”的材料却是真实历史的材料，无论是作为事件的历史还是作为进程的历史。他避开了过去200年来多数社会理论家所屈从的那种诱惑，即拼凑一种社会发展的进化计划，召唤出社会的前后相继的阶梯和状态，每一个阶段都有先进和落后的成份，都有遗物和残渣。由于他给予在任何时代的社会中均可发现并构成本质的社会成份以适当的份量和尊重，也由于他不为那些“返祖现象”或“复古现象”所沮丧——相反，他承认这是社会秩序的正常现象——他就能够阐述现代资产阶级社会，并至少能够通过其可靠性的测试：它被认为是最近社会理论中罕见的成就。目前，也不必要求更多的东西。① 重要的是，由于强调了资本主义发展中非资本主义成份的正常性，熊彼特不仅能够论述那些为人熟悉的资本主义的特征，而且还能论述那些不规则的和异常的特征。因而，他能够解释——在某种程度上，象希尔施这样的人就不能解释——资本主义如何能够既是无限制地扩展并适应于市场，同时又能够充分地（至少到目

① 作为熊彼特思想的非教条性质的特别有力的证明，人们或许可以补充说，即使在熊彼特最“纯粹的”经济学分析，他的《经济发展的理论》中，他也承认在商业循环的危机的原因中，“偶然事件”，即历史所起的作用十分重要，以至于能坦然地提出有可能根本就不需要任何一般性的理论。（见熊彼特，《经济发展的理论》，纽约，1961年版，第222页。

前为止情况如此）防止这种纯粹的资本主义的素质撕裂这个体系。

熊彼特的非资本主义的贵族政治当然不仅仅只是好战的，帝国主义的，它同样也体现了其他传统价值。它有一种几乎是宗教式的对土地的依恋，它对商业是怀疑和蔑视的，是家长统治的社会哲学的拥护者，如果经常随便地免除这种哲学的义务，剩下的就是某种对所有党派来说都有可能加以利用的思想体系。换句话说，它储藏了丰富的前资本主义的价值和想象，在资本主义所引起的社会冲突中对其有所需要时，就可将其取出。贵族在同其他非资本主义的势力——在不同的时期分别是教会、军队、官僚机器，农民以及工人——联盟的情况下，经常决定性地干预资本主义的进程，减缓或调整非单纯的市场体系的运行。贵族作为拥有土地的势力和土地完整的卫士，同农民一起，抵制土地的商品化和国际自由贸易的全部影响，因为其威胁着土地的全部使用，并是对全部小所有者的毁灭。① 在英格兰，直至 19 世纪中叶，贵族成功地保持了保护贸易制度，而在绝大多数大陆国家中，在整个 19 世纪中都是如此。同工人一起，贵族为工厂立法而奋斗，又同功利主义者一起，为济贫法改革而战斗。19世纪上半叶托利党同激进派的联盟确实是欧洲所有地方可见的最为成功、最为持久的反资本主义运动的素材。（这个运动是如此的成功，以致它竟将马克思和恩格斯引入歧途，认为他们已经发现了一个革命的无产阶级）。在其他地方，例如德国，一个由传统的土地所有者阶级治理的、具有浓重的家长政治色彩的国家，则提出了一些给人深刻印象的社会福利法案。毋庸赘述，在所有这些方面，阶级利益的考虑在其倡导者的头脑中无疑最为重要，而社会责任仅是其公开的外表。但其效果却仍然是将资本主义从其自身的困境中拯救出来，至少目前是如此。对市场体

---

① 见波拉尼：《伟大的变革》，波士顿，1957年版，第 178页。

系进行了控制以减弱由资本主义释放出来的社会力量或使其转变方向，不然的话，这些力量便可能导致一场社会的战争。

三

美国并未发生阶级战争。但另一方面，它呈现了一缕迷人的微光，使我们得以看到一个在很大程度上欧洲化的，但缺少封建传统的社会中所发生的事情。美国是欧洲人创造的，但却没有欧洲的过去。它是在欧洲思想的坩埚中，而不是在欧洲社会经历的熔炉中锻造出来的；它的发展决定于这样的事实，即如托克维尔① 所说，美国人"生而平等，而不是变成平等的"。和欧洲不同，美国不是在同封建贵族势力的革命斗争中赢得民主的；在美洲殖民地几乎没有封建残余。美国的小农和小商人的社会，一旦摆脱了英国王室，就能够在相对于束缚人的封建统治而言很是自由的情况下进行发展。这是我们可以看到的纯粹的资产阶级社会的罕见事例，它起源时是资产阶级的，发展时也是资产阶级的。②

在许多意义上，这都如托克维尔所宣称的，是一个"巨大的有利条件"；是一种给人以恩泽的遗产；这给美国生活的所有方面以一种独一无二的自由和民主的特征；但它也有破坏性的后果。正如路易·哈兹出色地表明的，它导致在美国对"绝对的自由主义"、"教条的洛克主义"的崇拜，这两个主义统治美国的政治，最终还会有效地阻止政治思想传统的出现。③ 政治思想是由政治冲突和政

---

① A·德·托克维尔（1805——1859），法国历史学家、政治学家、政治家。——译注

② 人们可以通过观察诸如拉美、澳大利亚等等由"欧洲的碎片"组成的社会进行这种富有趣味的比较研究，例如，可见哈兹的研究（《新社会的建立》，纽约，1964年版）。美国仅仅是其中研究得最为成功的例子。

③ 见哈兹：《美国的自由传统》，纽约，1955年版。

治的多样化哺育的，而这些东西正是那种流行的自由思想的势力在原则上，相当大程度上也在实践上所要摈弃的。结果就是某种关于自由的一致意见扼杀了一个多世纪来最为重要的政治思索和政治成果。

在欧洲，封建的、资产阶级的以及无产阶级的力量会聚于1789年。所有这三种力量在整个19世纪以及以后的年代里继续相互作用。它们彼此间的相互作用不仅使恢复了活力的保守主义、以及富有斗争性的自由主义兴起，而且也使社会主义兴起。所有这三者在美国都不存在。在美国1776年发生的事情纯粹是资产阶级的，因而自由的民族精神就象钳子一样桎梏了美国社会。随之而来的一切发展——霍雷肖·阿尔杰[①]主义，进步主义，新政主义——都只是自由主题的不同变奏而已。那里没有会导致某个伯纳尔[②]或伯克[③]的保守主义产生的资产阶级和贵族间的冲突。"南方的托利主义"由于其自身矛盾的压力而崩溃。在这个最为资产阶级化的社会中，由于缺乏欧洲的社会冲突，甚至不能发展起一种自觉的、复合的自由主义，以揭示人民反对贵族时的弱点以及贵族反对人民时的弱点；或推向某一个方向，例如出于对暴民的恐惧而被詹姆士·穆勒和麦考莱[④]所推向的方向，或出于对其诞生时期的民众反对封建国家的斗争的清晰记忆而被约翰·斯图亚特·穆勒和劳合·乔治[⑤]推向的一个更为激进的方向。汉密尔顿的"高度的"辉格主义的命运，以及共和党以后对阿尔杰主义的民主资本主义思想的信奉，都说明了欧洲类型的自由主义要在美国获得一席之地是如

① 霍雷肖·阿尔杰(1832——1899)，美国作家。——译注

② L·G·A·伯纳尔(1754——1840)，法国政治哲学家、政治家。——译注

③ E·伯克(1729——1797)，英国政论家。——译注

④ 托马斯·B·麦考莱(1800—1859)，英国史学家，自由党人。——译注

⑤ 大卫·劳埃德·乔治(1868——1945)，英国政治家。——译注

何的困难。

如人们所熟知的，社会主义的命运则更为凄惨，它甚至无法立足于美国的生活和思想之中。这不能简单地归因于那里没有真正的无产阶级——这种断言无论如何是十分可疑的，更何况其边疆正在不断扩展。这至少可以说是缺少封建传统和封建阶级的结果，后者在欧洲的存在为社会主义的发展提供了爆炸性的根源。欧洲的社会主义运动是由资产阶级、同样也是由贵族在它们的相互斗争中培育起来的。占有土地的贵族可以装作——甚至这样行动——反对自私和贪婪的资产阶级的人民的历史性保护者。从卡莱尔[1]式和迪斯累里[2]式的“封建社会主义”（如马克思指出的：“半是过去的回声，半是未来的恫吓”）之中，可推断出托利党的激进主义，在19世纪的欧洲扮演着多么重要的角色。确实，作为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组成部分，封建成份仍具有高度的重要意义。蒲鲁东、罗斯金[3]和莫里斯[4]之接受社会主义，说明社会主义的吸引力很大程度上应归之于它许诺恢复某种类似中世纪的公社和行会秩序的东西。而且，当贵族从社会主义的盟友变为敌人时，对后者也仍然是有帮助的。社会主义的成长不仅依赖于其作为资本主义敌人的存在，同样也特别依赖于其作为封建残余的存在。如马克思看到的，也如同德雷福斯案件[5]很好地说明的，尤其是在欧洲大陆，社会主义在反对资本主义的斗争中汲取力量，同样也在反对封

---

① 托马斯·卡莱尔(1795—1881)，苏格兰历史学家，散文作家。——译注

② 本杰明·迪斯累里(1804——1881)，英国政治家，保守党人。——译注

③ 约翰·罗斯金(1819——1900)，英国政论家、艺术批评家。——译注

④ 弗雷德里克·D·莫里斯(1805—1872)，英国神学家，基督教社会主义的倡导者。——译注。

⑤ 德雷福斯案件，德雷福斯是犹太血统的法国军官，1894年被指控出卖国家机密给德国，事后证明为诬告，此事导致了民主势力和反动势力间的尖锐斗争。——译注。

建势力的斗争中汲取力量。这种同时反对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双重的革命"，如马克思所预见的，将必定是欧洲社会主义的任务，而以后又被列宁和托洛茨基概括到关于所有"落后"国家的规律之中。（所谓落后国家，在实际上意味着除了英国，以及——具有讽刺意味地——美国以外的所有国家。）

"生而平等"这个致命的事实，使各种富有营养的主要社会思想：保守主义、自由主义以及社会主义不能流入美国。如果在早期殖民地的农夫和商人中盛行的那种大体上的平等得以继续存在的话，这种文化上的贫乏就不会那么重要了。然而，撇开奴隶制这种"特殊制度"的问题，到19世纪后半叶，社会不平等发展到象欧洲那样的程度时，这种平等就变得残缺不全了。这意味着美国既缺乏社会手段，又缺乏社会观念以对付全世界增长得最快的资本主义经济所造成的问题。美国在渡过"残酷剥削的资本家"① 时代时，除了重拾赫伯特·斯宾塞② 的牙慧以外，没有掌握什么给人以更深刻印象的东西，想到这一点很令人惊奇，但代价是昂贵的。欧洲模式的工业化的所有严酷的东西，实际上几乎不能同19世纪70年代到20世纪30年代美国劳工冲突的野蛮和痛苦相提并论。托克维尔已经观察到在19世纪30年代的美国，"在我们眼皮底下成长起来的工业贵族是世界上曾存在过的最为严酷的阶层之一。"③在1877年的群众性罢工中，100多个罢工者为雇主的私人军队、特别警察以及联邦军队的联盟所杀害。在这整个时代，联邦政府继续赞美这种私人和公共暴力的结合。在1894年普尔曼流血罢工中，有14000名罢工破坏者卷入，34名罢工工人被杀害，数百人重伤。没

① 原文为robber-baron，为美国历史上的名称，指19世纪末靠残酷剥削致富的美国资本家。——译注

② 赫伯特·斯宾塞（1820——1903），英国社会学家，哲学家。——译注

③ 见托克维尔：《美国的民主》，第二卷，纽约，1961年版，第194页。

有任何合法的政策或非暴力的罢工行动可证明其能够抗拒雇主的能力和下了决心的意愿;法院和政府使用武装力量来反对罢工者。结果,直至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几乎每一次主要的罢工都转变为死伤多人的流血对抗,① 每一次大罢工都被当作反叛或内战的萌芽,而对雇主特权的每次攻击则都被视为对国家的挑战。

马克思在《资本论》序言中写道:英国是展示了其他工业较不发达国家"未来景象"的国家。在不止一个方面,这都只是一个可怜的预见。托克维尔在使美国扮演这种角色时,判断得更为正确。美国是希尔施式梦魇的实现。这是一种无拘无束的资本主义,一种没有历史性限制的资本主义;那种限制欧洲社会曾如此长久地遏制住了其毁灭性的趋势。有些人曾争辩说,尽管不存在某种前资本主义的阶级,新教形式的宗教还是对美国资本主义体系作出了真正的限制。② 但很难找到这方面的证据。而且,无论如何,这种断言似乎都是基于对韦伯观点的误解或误用。韦伯说明了,新教伦理限制了个人自身的消费和生活风格,使其得以更为自由而有效地开发自然和社会的全部资源。换句话说,这种伦理鼓励在社会水平上最无限制地扩张和发展,它并没有提供补偿性的社会原则以限制这种发展。因而,如果新教对个人心理有某种制约性影响的话,它也完全不能在社会范围内随心所欲地遏制资本主义巨兽。事情恰恰相反。诚如熊彼特所说明的,只有那种具有市场之外或超越市场的利益和观点的社会力量的实体,才会赋予社会以真正限制资本主义发展的步伐和逻辑的能力。而美国明显地缺乏的正是这些社会力量。那里并不存在真正值得一说的那种既在

---

① 见布雷切:《罢工!》,波士顿,1972 年版。

② 见贝尔:《资本主义的文化矛盾》,伦敦,1976 年版,第 55 页;克里斯托:《对资本主义的两阵欢呼》,纽约,1979 年版,第 245 页。

资本主义体系之中、但又不属于资本主义体系的社会集团，如同我们可以作为例证而对欧洲土地贵族所说的那样。所有集团都多少是自愿地被引进市场的斗争之中，并整个地汲取了它的伦理。国家和社会，公众和私人的领域都互相融化在一起。因而，不论是在国家之中，还是在某个阶级的社会气质之中，都发现不了有关社会责任感或开明的家长式统治的非市场性传统。

留给美国人的是空洞的自由。如同涂尔干对这种反常状态所下的定义：这是一种"无限渴望的弊病"，"可能和不可能、正义和非正义、合法的和过分的权力和希望之间的界限，都是未可知的。"①可能性是，或似乎是令人眼花缭乱的；唯一不可饶恕的罪过就是没能抓住它们；而唯一可以接受的崇拜形式就是"发财致富"上的成功。美国权威性地变成了这样的国土，在那里，唯一重要的就是成功或失败。美国人从不考虑"在美国的世界中，就是那些胜利者也无法逃脱竞争。"②也不考虑从斯各特·菲茨杰拉德的小说到20世纪40年代的"黑白电影"都曾作过的有关"美国梦"的无数考察所提供的教诲，成功永远是闪烁而短暂的。失败毕竟更坏得多，尤其是在美国社会没有提供另一种价值以支持竞争性的商业体系之外的可供选择的生活方式时。因为成功是最高的标准，如何取得成功就只能是一个相对说来较少受人关心的问题。因而，不仅是完全受资本主义伦理调节的美国社会的目标，而且还有其手段，使它成为以反常状态为明确原则的社会制度的或许是独一无二的例子。③借以区别卡纳基④和卡彭⑤的并不是他们追求的目标，甚至

① 见涂尔干：《自杀：社会学的研究》，伦敦，1952年版，第253页。

② 见哈兹：《美国的自由传统》，纽约，1955年版，第221页。

③ 见莫顿，《社会结构和反常》，载于《社会理论和社会结构》，格兰科，1957年版。

④ A·卡纳基(1835—1919)，美国钢铁企业家。——译注

⑤ A·卡彭(1899——1947)，美国著名歹徒。——译注

也不是其采用的手段，在这两个方面，他们都是惊人地相似的。区别是在于：成功之神之赐福于前者的企业，而命运之神则诅咒了后者。正是在这种把社会变成一种运气发挥着法力无边的作用的游戏的过程中，我们极为清楚地看到了一个不受束缚的资本主义的“道地的逻辑”。

四

希尔施和熊彼特的论述的总的启示是：资本主义并非如马克思期望的那样由于其失败而被扼杀，而恰恰是由于其成功而被扼杀。资本主义通过扫除一切伴随着它前进的前资本主义和非资本主义的负载，而以其自身的逻辑破坏它自己。资本主义本身对于这种前资本主义的遗产所履行的提供给养的劳动并无意识，而认为这种遗产最好也不过是某种不必要的负担，而最坏则视之为前进路上的障碍，因而对它要么是漠然处之，要么是有意地敌视。它逐渐削弱宗教的力量，摧毁所有的自治组织，例如工人的行会及村社，逐渐消除非资本主义集团的力量或影响，或将它们完全拉进资本主义体系之中，因而致命地使自己朝着那些存在于自己的体系之中，正在为自己的垮台作着准备的趋势走去。

> 在破坏前资本主义的社会框架时，资本主义不仅破坏了阻碍其进步的障碍，而且也破坏了防止其崩溃的拱架。这种以其残酷的必然性而引人注目的进程，所涉及的不仅是消除某种制度上的累赘的问题，而且也是消除资本主义阶层的伙伴的问题，而与这些伙伴的同生共处是资本主义图式的根本要素。①

① 见熊彼特：《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伦敦，1976年版，第139页。

因而，这个观点从另一条线索得出了一个与马克思相去不远的一般结论，正如熊彼特温和地指出的："在将资本主义的衰败归因于其成功和归因于其失败之间，最终并没有多大区别。"[①] 究竟是什么与资本主义自身有关的东西将资本主义引向危机，在这一点上，希尔施和熊彼特同马克思观点不一，而且相互之间也不一致。希尔施特别选出了物质经济成功增长的结果，它将要求在"地位性经济"中的平等份额的两败俱伤的斗争强加给社会；对熊彼特来说，则是资本主义的经济成功带来了企业家职能的萎缩，企业的科层化以及资产阶级家庭的瓦解。由于受到其本身的创造物：一个异化了的知识分子阶级的攻击，它同时失去了基本的正统性和推动力。

这里不是对希尔施和熊彼特作出评判的地方，[②] 也不是对各自对资本主义流行病病因争论不休的其他理论的作者作出评价的地方。我们感兴趣的是，尽管在他们的分析中存在着种种分歧，希尔施和熊彼特都看到了，在发达资本主义的族系中出现了一种希尔施称之为"勉强的集体主义"的东西，熊彼特则将此称为"社会主义"。但由于他将"社会主义"狭义地限定为"通过集中的权力控制生产资料"，因而这同希尔施的集体主义概念："经济领域中的集体供应和国家调节的趋向"[③] 相去不远。

希尔施关心的是使这种集体主义更少勉强性，更充满活力，因而更有效地达到它的目标。他提出的更为精确的标准在本书其他地方加以讨论，这里我想通过总结加以讨论的仅仅是：希尔施的处方，由于与他关于资本主义的前资本主义道德框架有着同样的特

---

① 见熊彼特：《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伦敦，1976 年版，第 162 页。

② 对熊彼特的评判，见希尔特杰编：《熊彼特的远见：40年后的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纽约，1981 年版。

③ 见希尔施：《增长的社会界限》，伦敦，1977 年，第 1页。

征，总的说来也是有缺陷的，即它们是空中楼阁。这都是些根深蒂固的理想主义的东西。在他著作的最后一页上，希尔施陈述了他的总目标：

> 经济发达社会目前面临的主要经济问题是一种撤回到经济自我推进的界限之内的结构性的需要；反过来，这又要求在一个行将结束的过渡时期，对这种经济设法实施的收入和财富的分配的正确性，从外部加以审慎的证明。我们或许是接近了一个没有与之相辅的社会道德的明白可见的社会组织可能达到的极限。干脆也没有采取补救措施以弥补这种不足。……首先必须的不是技术性的方法，而是使这种方法付诸实施所必须的公众的承认。①

说这是在预测，或者是号召革命，或是某种非常类似的东西，并不十分过分。希尔施为达到这种目标而提出的关键手段之一，即考虑采取某种“似乎是利他主义”的东西，对这种推论仅有些微的改变，这样，追求自身利益的动机就被置于以集体主义为方向的行为支配之下，以克服以私人为目标的行为可以感到的缺陷。

> 最好的结果或许可以这样获得：将这种个人行为的动机操纵或导向社会的而不是个人的方向，即使这种动机仍然以私人性的选择为基础。这并不要求改变人类的天性，需要的仅仅是和伴随着过去时代的经济条件的主要变迁而来的社会习惯和道德标准的转变同样的人的习惯、本能或态度的改变。②

希尔施将“仅仅”置于引号之中，表明了他的可以理解的不安，

① 见希尔施：《增长的社会界限》，伦敦，1977年，第190页。

② 同前，第146页。

但这并不能掩饰这里所思考的变化是十分巨大的，同他所描述的过去的变化相比就更为明显。

伴随着如此重大的变化的将是何种社会力量？由于提倡这样一种社会道德，谁的利益获得了扩展？当然，最终每一个人的利益都将获得扩展，但这仅仅是以另一种方式陈述这个问题。难道这种变化是在集体的自我启蒙的令人目眩的闪烁中产生的吗？在私人的目标和动机仍占支配地位的时候，使人们集体地以明智的方式行动是困难的。对这一点，希尔施知道得非常清楚。[①]“个人能够觉察某种他们本身或他们的伙伴的需要，但仍然没有孤立地将其付之行动的理性的基础。同社会有关的个人便面临着在社会的和个人的需求之间的进退维谷的困境。”[②]这把我们带回到对“集体的手段”的需要，而这种手段则仍是一个高度抽象的概念，当希尔施以“首要的自由价值”为由，排除了“使个人对道德问题的判断及行为的选择服从于某个毛主席的思想”[③]之后，尤其如此。这里有一种解决办法，但他放弃了这个办法。这样，他就把自己置于人们熟知的不得不提着自己的靴子举起自己的尴尬境地。重新退回到“可以指望，随着岁月的流逝对社会道德的变化的结构性需求将会促进这种变化”[④]的信念，是特别绝望的自认失败。但他的分析所暗示的却是完全不同的东西。

确实，人们不能因为希尔施没有提供关于这种变化将如何发生的令人信服的叙述而责备他。其他许多看到了类似的变化需要的人也并不更为成功。[⑤]就熊彼特而言，他的“进入社会主义”的

---

① 见希尔施：《增长的社会界限》，伦敦，1977，第137页。

② 同上，第179页。

③ 同上，第180页。

④ 同上，第179页。

⑤ 例如，见希尔施和戈德索普：《通货膨胀的政治经济》，伦敦，1978年版，第214-216页。

描述也有其自身的问题，但在这里将它作为相对于希尔施的另一选择提出当然不是我的意图。无论是作出描述或开出处方，熊彼特的任务都更为容易。但是，尽管他对社会主义的态度有着一种他特有的超然的讽刺意味，他却清楚地看到社会主义不仅多少是不可避免的，而且也看作至少是资本主义获得有效的解救的可能。

> 我们的整个观点可以这样简要地说明：社会主义化意味着以大企业所规划的方式超越大企业；或者，——也是同样的意思——可以想象，社会主义的管理可以想象比较大企业的资本主义的管理更为优越，这正如大企业的资本主义已被证明要比竞争性的资本主义更为优越一样，一百年前，英国工业曾是这种竞争性资本主义的典范。……就蓝图的逻辑性而言，无可否认社会主义的蓝图是在更合乎理性的程度上构画的。①

无论如何，与以前的讨论一样，重要的不是纠正或讲述熊彼特关于社会主义的观点，而是他所采用的分析的形式。熊彼特指出了晚期资本主义的具体趋势，他争辩说，无论我们是否将这种结果称为社会主义，这种趋势正在大大改变资本主义，因而，假如我们仍用同样的术语称呼正在出现的社会秩序，就会成为明显的错误。这些趋势包括进行干预的国家的成长；公营和私营企业中的技术和管理的科层制的成长；以及一个同传统的私人资本主义者及企业家在利益和态度上迥然不同的领薪水的职业中产阶级的出现。战争和萧条的紧迫性进一步鼓励了这种发展。社会主义仅仅是对这些趋势的承认和使其合理化，主要的工作已经完成。“资本主义的进

---

① 见熊彼特：《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第195—196页。

程为社会主义铸造了物质和灵魂。"①

只要提出伯纳姆的《管理革命》和加尔布雷思的《新工业国家》，就能指出这种观点同大量同时出现的现代社会思想之间的亲缘关系，熊彼特本人无疑是这种思想的主要贡献者之一。但熊彼特的分析中使人感到亲切的却正是它在目前情况下所具有的力量。这起码暗示着，他所指出的那种改革的力量在西方社会最近的历史中是真实可见的实体，它们能否完成他所赋予的任务是可以争论的，但熊彼特确实给我们展示了为达到他指定的目标而应有的很可称道的手段。这恰恰又是希尔施没能做到的。从可以得到的证据看，未来似乎更多地属于熊彼特的"人民委员"，而不是希尔施的"疲惫的社会民主主义者"。

比较往往是牵强的，也可能招致非议。事实上，希尔施和熊彼特还是在并肩前进。他们都突破了传统的戒律和意识形态，用全新的、透彻的观点看待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他们都强调，这一发展的一些重要特征常常被忽视或被视为次要因素。在思考未来时，熊彼特是一个更为伟大的现实主义者，同他的贯穿始终的社会学的现实主义相一致。但他的现实主义却以牺牲他显然珍爱的那些价值为代价。而希尔施则显然没有视野广阔的想象，他的成就给人的深刻印象是：他抓住了现代社会最难以对付的问题，却没有放弃他对自由和人类价值的信念。谁的贡献更大呢？

陈江岚　译

① 见熊彼特，《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第220页。

未来技术所涉及的国际作用*

尤金·B·斯科尔尼考夫[①]

技术的进步及其日益增多的应用，对各国所面临的国际问题有着深远的影响。根据常识。这些影响原本是始料不及的。人们本来会这样认为：技术似乎不但不会削弱国家的主权意识，反倒会增强这一意识；不但不会妨碍弱小国家的出现，反倒会使其数目激增；不但不会使政府的外交态度、外交设想发生剧变，反倒会使其继续以“传统”的态度处理国际事务。

本文将概述技术的不断迅速发展所带来的国际问题，特别要强调技术对处理政府间事务的国际机构的影响。可能在今后的10～20年，技术的发展会要求国际的结构体系作出重大的变动，使其在规模、强度上均远远超出今天所需的程度。这是因为各自为政的国家活动将越来越难进行，因而也就更加强烈地需要国际机构的活动。由于技术决策的分散，这一需要更是“无法避免”，各国政府不可能对其横加阻挠或视而不见。从而，各主权国家都在为自身的安全、利益争斗不已，最重要的决策均在各国国内作出的

---

* 本文选自西里尔·E·布莱克主编的《比较现代化》，自由出版社，1976年版。本文在入选前，登载在《国际事务杂志》第25卷第2期（1971年号）第266～286页上。《国际事务杂志》系纽约哥伦比亚大学评议会的刊物。

① 斯科尔尼科夫系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政治学教授，著有《科学、技术和美国的对外政策》（1967年）和《技术对国际社会的强制作用：技术的发展和国际政治秩序》（1972年）。在1958～1963年，他曾任美国总统科学技术事务助理。

问题也随之出现了。这是关系到国际体系现行模式生死存亡的重要问题。与此同时，还出现了有关现存国际机构能力的问题以及各国政府应取何种态度应付不断变化的形势的问题。有理由认为：事实上，技术的发展已处在三岔路口，要么走向世界末日，要么步入人间天堂。空前灾难的种子已在许多地区播出，尤以受污染的地区为甚。很多资料表明：世界现在正面临一场不可逆转的环境变迁，因而需要采取果断、紧急的国际政治行动，尽管现有的资料尚不足以证明这一结论。①

国际机构的特殊作用可以分为以下几个类型：

（一）服务

1.信息交换

2.对自然现象所作的数据收集、分析和监测

3.咨询和建议

4.国家计划和国际计划的促成

5.规划的协调

6.联合计划的制订

7.小规模资金的筹集

（二）规范的制定和为此而做的安排

1.为制定规范而进行的数据收集和分析

2.标准和法规的制订

3.价格和利益的安排

（三）规则的遵守和争端的解决

1.按照标准和法规进行的监测

2.标准和法规的行使

① 见《人类对地球环境的影响》（麻省理工学院出版社，1970年），这是一份关于环境正处在危急状态的研究报告。

3.调解、调停和仲裁

4.有关标准和法规的起诉

5.判决

(四)行动

1.资源、技术的应用和开发

2.技术援助

3.对调查、分析和发展的指导

4.为开发规划筹集资金

一 环境的改变

这恐怕是受到公众和政治界关注的最新主要技术课题了。各国政府突然发现自己正受到越来越大的压力，要对"环境"进行保护。所有的国际组织也均在某种程度上直接参与其事，少数组织还以此作为自己活动的重要内容。为了方便起见，我们可将有计划地控制气候的技术(已有的或可能会有的)分成三种类型：微小的变动、暴风雨式的变动和大规模的气候变动。气候的改变也可能纯出天意。

在微小的变动方面，有关云的催化实验的资料表明：降雨量在局部地区可有5%至20%的增加。T·F·马隆预测，到1980年时，就"可用已经验证的技术在局部地区增减自然降雨量"，而到80年代末，"可能性更大，可在距操作地点顺风方向数百英里的范围内随意增减降雨量"。[①] 这样，在一国之内及两国之间，肯定会发生水

① 见T·F·马隆的《当今大气学的发展及其与外交政策的关系》，载在论文集《科学技术对美国未来的外交政策的影响》第82～97页上。该论文集系根据1968年6月16～17日美国国务院政策制订委员会和国家科学院科学与公共政策委员会特别小组在华盛顿特区召开的会议的论文编订。

的分配问题。其次，在操作方面也可能进行国际合作，因为实际的催雨活动随时都可能必须在别国的领土或国际水域中进行。最后，还会出现一个异乎寻常的问题：由大气生成的、无限的新鲜水资源该怎样分配呢？显然，分配国际资源的重大问题将会应运而生。

能够转移或压制飓风的前景也已指日可待。1968年8月在美国进行的碘化银实验看来颇有成效，第一天就使德比飓风的最大风速减小了31%，第二天又减小了15%。① 如果能改变飓风行进路线的话，那么就会出现因受损失或水被夺走而要求索赔的问题了。改变飓风的工作肯定必将在国际环境中进行，甚至有时有可能在几个国家的领土上进行。在技术方面还会出现其他大胆计划，例如，用化学制品（碳黑）融化北极的冰层，（苏联科学家常常提出的）在白令海峡上筑坝，驱散北极云层或将大西洋暖流汲入北冰洋海盆。② 其目的可能是要使北半球的气候发生剧变，尤其是要使广袤的西伯利亚地区变得温暖、潮湿。但是移动北极冰层的后果却难预料，可能效果良好（西伯利亚、欧洲、甚至远到南面的撒哈拉沙漠，气候均会变得较为温和适中，降雨量也会增加），但也可能因此出现一个新的冰河期，而格兰陵冰层的融化，更会使海洋水位大幅度升高。显然，在批准实施任何诸如此类的计划前，必须就其可能会有的后果取得大量情报。但是，我们应该认识到，获得实施这类工程所需的资财，也许并不超出一个大国的能力（建造白令海峡大坝完全是可行的，其造价与欧洲大陆的各大坝不相上下）。而且，尽管使西伯利亚变暖这样的工程所需代价极大，诱使人们进行的动

---

① 见《迎着风暴前进》，载于1969年12月25日的《新科学家》，总第44卷，第681期，第680页。

② 见P·M·鲍里索夫的《我们能够控制北极的气候吗？》，载于《原子科学家通报》1969年3月号，总第25卷，第3期，第43～48页。

机也可能是极大的。然而，世上又有哪个国际机构会经营这样的工程呢？

改造气候的技术还可使人获得战略或战术上的军事能力，从而会影响实力的均衡。它也可用于经济战、转移农业或水力发电所需的水。反之，它也可成为促进经济发展、促进繁荣的工具。它能发挥何种效用，可能主要取决于国际机构的作用，人们发展这种机构，本就是为了控制技术，分配技术带来的好处以及防止技术的滥用。

改造气候的技术直接依赖于人们对大气日益增长的科学理解。其基础研究和数据收集工作部分由国家进行，主要则由世界气象组织和国际科学联合会理事会所支持的二项规划承担。其中一项称作全球大气研究规划，另一项名叫世界气候监测。① 在深入实施这两项相互关联的规划时，就会极为需要新的或经过改组的国际机构。同时，在实施这些规划的过程中会获得一些知识，这也会涉及一些潜在的问题。在某种意义上，也就是需要“控制”这些知识的应用，使其与国际公认的目标相一致。

本世纪技术的加速使用，世界人口的增长，以及各国正在经历的都市化，都在无意之中自然而然地改变了气候。世界可能正面临一场大灾变。从1880年到1940年，地球的平均温度升高了0.4摄氏度，而最近25年来，则又降低了0.2摄氏度。② 过去80年来气温的波动究竟是自然的变化呢，还是人为的结果？人类的所作所为已会通过多种途径扰乱大气的热平衡。

其中之一是大气层里的二氧化碳的增加，预料矿物燃料消耗

---

① 见马隆的前引书，第87页。

② 见戈登·J·F·麦克唐纳的《人对地球的改造》，载于《技术评论》1969年第10、11月号，总第72卷第1期，第27～35页，除了注明的外，本文以下的资料也均引自该文。

的增长会造成这种情况。因此而形成的二氧化碳"层"会攫取地球表面的太阳能，产生一种温室效应。1940年以前温度的升高与二氧化碳的增多有关；此后温度的降低则可这样解释：大气的微粒污染正在破坏聚集在一起的二氧化碳。这就是说：城市、工业活动和农业活动所产生的尘埃能够根本性地影响温度的平衡，只是其作用与二氧化碳的作用恰恰相反。这些尘埃组成了一种栅栏，将太阳的光照阻挡在外，从而减少了到达地球的能量。另外，这些尘埃还组成了一些低层云状物的核心，这些云状物又将太阳的另一些光照反射回空间。"现在，大约有平均31%的地球表面被低层云所覆盖，如果这一比例增加到36%，温度就会降低4摄氏度左右，如果温度象这样降下去，地球就会回到冰河时代。"①

另外还会出现其他影响气温的可能途径。由于人为地改造地球表面，地球的反照率（摄入的太阳光照被直接反射出去的百分比）正在发生变化。人口稠密的城市地区和高速公路反射的光照要大于森林，农田。这些变化能降低地球表面的温度。还有一些未知因素的后果颇具破坏性，但其重要性尚不明显。例如：火箭在大气高层排出会影响光照传递的废物，喷气式飞机，超音速运输机排出水蒸气，从而产生冰结晶云雾的覆盖层。②可能把上述实例说得有些过甚其辞，但有一点却是简单明白的：由于"成倍增长的人"在成倍增长地使用技术，大气层会发生变化，而这又可能正在使地球的气候发生重大的变化。

世上已发生好几起对全球环境有着巨大潜在影响、引人注目的、经过事先策划的大规模行动，大气层原子试验的微粒回降即是

---

① 见里德·A 布赖森和韦恩·M·温德兰《大气污染对气候的影响》，这是作者向美国科学促进协会全国会议递交的论文。会议1968年12月27日的摘要（油印件）摘引了这些资料。

② 同上。

其中一例。可以枚举的还有美、苏的高空核试验以及美国所进行的用于军事通讯实验的铜丝极带轨道导航。有关这些行动影响能力的令人感兴趣的情况即可从这后两个事例略见一斑。①

在美国的1962年高空核试验(亦即海星计划)和铜丝极实验(亦即西津计划)进行前，美国政府发布了通告，在美国国内也就此进行了广泛的分析，预测了长期及短期的后果。事实上，美国政府为西津计划作了令人难忘的努力：事先公布了分析的情况，还鼓励其他国家的科学家提出他们的分析意见。但世界的科学界并不因此而不对其作出实际的否定：西津计划恰恰为他们的预言所说中：铜丝极掉离了轨道。②海星计划的情况没有这么糟，但也出现了出乎意料的重大后果：一些由此而被释放的电子被地球的磁场所吸收，科学实验的进行会长期受其影响。③

在列举这些事例时，有两点必须指出：第一，在实验前所作的科学分析并非绝对可靠；第二，尽管美国为表明它是实际负责的而允许将有关安全的实验情况公之于众，但在世界各地的科学界对这些计划提出疑问，美国本身也明知估计错误的后果将是全球性的，而并不局限于美国一国的情况下，它还是准备径自将这些计划进行下去。

这些仅是人类大规模干预环境的一系列现象中的少数例证，但仅此我们也可得到一些教训：知道国际机构在将来是必不可少的。为了对大规模的特殊行动的全部后果有所准备，我们必须使自

---

① 见尤金·B·斯科尔尼考夫的《科学、技术和美国的外交政策》(麻省理工学院出版社，1967年)第84～92页。该文系为一次扩大的通讯实验讨论会所作。

② 见I·I·夏皮罗的《西津偶极天线的下落》，载于1966年12月16日的《科学》，总第154卷第3755期，第1445～1448页。

③ 见伯纳德·罗韦尔的《空间的污染》，载于1968年12月的《原子科学家公报》，总第10期，第42～45页。

已多知道一些环境变化的情况。进行技术控制的机构可有多种形式，可以是具有独立的国家性能的国家，也可是"不偏不倚"的国际机构。但要获得起诉、判决、监督、执行以及损失估价和索赔等辅助机能，则非国际性的机构莫属。

我们可能必须考虑由世界各国共同为某种大规模的技术行动负责，甚至由各国共同采取行动，以这种方式来分配利益、切实关心或许会有的有害的副作用。有些规划由于代价高昂，也可能不得不通过国际性的竞争来完成。

随着人口的迅速增长，工业化、都市化范围的迅速扩大，社会的需求和消耗会以几何级数的速度增长。预期到1985年时，世界人口会从 1970 年的略高于 35 亿一直增加到近 50 亿，如果目前的那种尚不能令人满意的经济水平维持不变的话，粮食、能源和自然资源的需求量也要增加 40%之多，[①] 而事实上，各国的经济水平都会提高，工业化的程度也会相应提高，因而，这种需求量的增加还要变得更大。为了满足这些需求，我们得使用大量的肥料和杀虫剂，得在运输和燃烧方面增加大量的燃料，得处理更多的农业和工业的垃圾，得将更多的农田改造成房屋和公路，得砍伐更多的森林，得寻找更多的淡水资源……，而这一切，都将大大改变我们现在所处的环境，大大加剧环境污染的情况。这个问题并不简单，而是庞大复杂、牵一发动全局的，如果不从整体考虑，某一方面的变化所涉及的情况就难以充分处理。

我们已把使用DDT及与 DDT 有关的氯的有机化合物控制虫害，作为养活世界人口、增强人的身体素质的主要手段。但是我们

---

① 见联合国秘书长为联合国经济和社会委员会所作的备忘录《世界人口情况》。文件编号为E/CN、9/231，1969 年 9 月 23 日（第 15 届人口会议，1969 年 12 月 3～14 日）。

现已认识到：在食物链上不断使用这些杀虫剂，会使某些动物的生命难以维持，许多种类的动物已濒临绝境。人类生活的背景已遭破坏，在某些方面，目前的情况已超过可以接受的程度。近来最令人头痛的情况或许是有人报导说：DDT能干扰海中浮游生物的光合作用，这会对海里的生物资源产生灾难性的后果。[①] 现在有些国家已禁止或严格限制使用与 DDT 有关的化合物，美国是在 1969 年 10 月中旬执行这样的法案的。能否获得DDT的代用品现在尚无定论，但即使能取得代用品，其代价也很大。因此，我们必须作出艰难的抉择，要么经受饥饿、疾病，要么逐步提高 DDT的使用程度，而决定是否扩大使用 DDT，则意味着在经济增长和萧条之间作一选择。由谁来作此抉择呢？是否可另辟蹊径？归根到底，由谁来掏腰包？值得注意的是在联合国及其他国际组织进行辩论时，发展中国家对污染问题的关心要比发达国家少得多，这是可以理解的。

一个国家的类似硫酸的含硫工业污水流入另一国，后者就会要求赔偿损失。[②] 这个问题很容易解决，只要使用无硫燃料就可以了，但是这样就会断掉中东和委内瑞拉的石油市场的生路。而现在的情况是油船越造越大，以满足文明世界对能源日益增长的需要，因而，海洋的石油污染已成为一个严重的威胁，鸟类、海洋生物的生活、繁衍均大受影响。仅仅一件事故也会酿成一场大祸，而开发海底石油时，一不小心就会触发这样的事故，而且在不久的将来，这类开发肯定会剧增。不管用何措施减少这类危险，至少都会使油价上涨——而这会带来政治上的后果。

---

① 见保罗·R和安妮·H·埃里克的《有关海中食物的神话》，载于《星期六评论》，1970 年 4 月 4 日，第 53～65 页。

② 见肯尼思·梅兰比的《英国有条件免遭污染吗?》载于《新科学家》，1969 年 9 月号，总第 43 卷，第 668 期，第 648～650页。

一般说来，处理垃圾的工作量大得惊人。单就美国而言，今天的垃圾数量即估计有：烟雾和有害气体1.4亿吨，汽车700万辆，纸2000万吨，罐头480亿只，瓶罐260亿只，废石块和残渣30亿吨，另外还有与其他各种垃圾一起排出的热水50亿加仑。① 由于人们有意识地发展用塑料等材料制成、不能在环境中消融的容器的生产，这一问题变得更加严重。

预期核动力将成为主要的能源，这样，其使用量就会增大，安全处置原子垃圾的问题也会大为吃重，而这又会连锁反应地使核动力的经济状况发生变化。甚至"正常"运转的核动力工厂的相对来说程度较低的辐射，也会成为一个严重问题。②

环境变化所涉及的国际作用

调查、分析正在发生变化的环境并进行资料的收集，已成为当务之急。其目标如下：

1. 不折不扣地、持之以恒地弄清变化的进展。
2. 对当前发展趋势可能造成的后果作出判断，并对可容忍其发展的限度作出规定。
3. 必要时寻找可替代现有实践的办法，或对现有实践作出修改。
4. 就各种可行之路所需的代价，所能得到的好处列出严密的数据，以供政治决策之用。

显然，实行这套措施已成燃眉之急，许多国际组织现在也已认

---

① 见联合国秘书长在联合国经济和社会委员会第47次会议上的报告《关于人类环境的问题》，文件编号为E/4667，1969年5月26日，第5页。

② 见巴里·康芒纳的《对环境的态度：一种几乎是致命的错觉》，1968年12月28日作者参加了在得克萨斯州达拉斯举行的美国科学促进会年会，这是他在"技术干扰所带来的未曾预料的环境公害"专题讨论会上的致辞。

识到这点。[①]然而，开展情报工作(在政治上)是很容易的，但就所搜集的情报进一步采取行动却较困难。

首先需为污水、固体垃圾的处置、油船的航线，船只遇难时的行动制订出国际的规则，其实，各国如想进行自由贸易，也需一个统一的标准。哪里的污染较难对付，需在内部作出非常的限制以改进这一局面，哪里就会发生严重的政治问题。例如，如果需要限制每年草地的覆盖面(因要考虑地球的日光反射率)，或者必须限制某项专门技术的每年使用量，那么，我们就会使许多以前从未遵守过任何形式的国际规章的地区(有些国家甚至连自己的国内规章也不遵守)受到影响。如果可以断定某项新技术的发展可能会严重加剧环境问题的话，那么，甚至连是否限制该技术本身的研究和发展这样的事，也会引起严重的政治争论。预期会有的和平使用核爆炸技术和改造气候的技术，以及现在已有的超音速飞机技术，均很有可能受到限制。

制订准则也意味着对其他方面，尤其是分配方面的问题作出规定，因为规定试验的标准或禁止使用某项技术而花的代价，并不是由各方平均地承担的。当然，停止使用一些杀虫剂、除草剂或制造代用品所花的代价，不能仅用金钱计算，还要从人类的生命和健康着眼。各国由于其特殊的地理位置，对某些资源的依赖或对某些工业制作法的强调而在控制工业垃圾上所花的代价各不相同。应由谁来掏腰包?是厂商，是客户，还是受污染之害最深的国家?怎样作出判断?一个国家在国际贸易中所处的竞争地位会受到其所采取的措施的很大影响。因此，仅仅为了能进行公平的竞争，也应制订国际性的规则，而现在大家普遍使用的规则会损害一些国家的

---

① 见联合国秘书长就1972年在瑞典召开的联合国大会将要讨论的人类环境方面的总目标所作的报告:《关于人类环境的问题》。

竞争地位，为了这方面的原因，也应提出平等的问题。

要在分配方面发挥作用，就需要有一个起诉和判决的机构。至关紧要的是要有大家公认为正确的技术分析手段。为了能解决有关国际准则受到侵犯的事务，还必须履行估计受损情况、处理索赔要求的手续。最后，为了确保服从，还要履行监督、强制执行的手续。这些措施可能仍将是"消极的"，就象现在常有的那样，这就是说各国只有在计算过它们所能得到的最大好处后，才会自觉地遵守规则。如果说现有的方法不够完善，那么就可能必须采取更为"积极的"手段。

二 海 洋

人类最早的一些技术开发就集中在海洋进行，人类最先试图用国际法加以限制的地方也是海洋。今天，海洋仍是最新技术的应用场所，因而人们在对国际法重作考虑或重新制订时，也把海洋作为对象考虑。人类为了获取水下的有机资源和矿物资源，迅速地发展了这方面的技术，对这些资源、尤其是海底石油的可能分布状况也日益了解，另外，人类对能源的需求也在成倍地增长——由于这一切，人们对与海洋资源有关的政治和法律问题争论不休。因在海洋投资可望回收很高的利润，所以对海洋的技术开发颇具刺激性。人们也因而会到越来越深的水下环境工作。希望在海底大陆的隆起部分发现"世界最丰富的矿物燃料"，正是进行技术开发的动机所在，也是人们希望得到的报酬。[1] 海底还有其他可资牟利的资源，尤以锰、铜、硫和"碎岩"矿物为甚。

① 见P·M·法伊，A·E·马克斯韦尔，K·O·埃默里和B·O·凯彻姆的《海洋科学和海洋资源》，载于埃德蒙·A·格利恩所编的《海的用处》一书第17～68页。该书由美国国会、哥伦比亚大学出版(1968年)。

当然，必须要处理的主要国际问题是谁拥有海底上下的资源，因而，谁才有权在大陆架以外的地方开发、牟利？不管为了制订海底的规则要签订什么规则方面的协议，都必须具有决定谁可进入海底的手段，同时也必须具备根据公共协议分配所获利益的手续。另外，监督和强制执行决议、规章和规则的手段也是必不可少的，不管它是由国际机构执行，还是根据国家实体间的协议进行。

有关海洋生物资源的国际问题，包括几个重要的方面。第一，当前的渔业工作和技术正朝最大程度地增产的方向发展。这是个颇有争议的问题，有些科学家估计，海洋潜在的捕获量不会大大超出现在每年的捕获量（约 6000 万公吨），粮食和农业组织估计，可望达到的最大值，要小于现在产量的 1/3。①事实上，在技术不断改进、为捕鱼所作的努力不断增大的情况下，如不采取有效的控制措施，渔业资源就会消耗殆尽。第二，对迁移型鱼类的了解正在不断增进。这种了解可使一个国家捷足先登地捕到一些鱼，按照传统，这些鱼本应由另一些国家在其迁移过程的另一个阶段捕获；这种了解也可使人在这些鱼产卵前的迁移阶段捕获它们。如果发生这样的情况，就会产生麻烦。第三，已有可能进行水产养殖，那就是说，已有可能人为地改进海的营养价值并“饲养”海鱼。

在不久的将来，另外一些具有巨大经济或政治意义的海洋活动，也将成为广泛的技术的目标所在。运输船只将朝大型化、快速化方向发展，真正的潜航运输船只或许也会出现。在军事应用方面将发展用作威慑的大型化、低噪声的核导弹潜艇，制造更多的潜艇侦知设施，或许还要发展更多的反潜力量。由于陆地武器越来越容易遭到攻击，海中的导弹发射也就变得越益重要，很有可能完

① 见 1970 年 4 月 9～15 日在罗马召开的粮食和农业组织渔业委员会第 15 次会议文件《既定的和预测的世界计划中的渔业问题》，文件编号为 COFI/70/3，1970 年 1 月 26 日。

全取代陆基导弹。这样，在军备控制方面，将不可避免地把海洋作为首要的目标，其实，情况现在已是如此了。

由于如上所述，海洋的使用正在不断增加，海洋环境的拥挤问题也就随之出现了。同一片海洋可为人多方利用，渔船、运输船只、潜艇、无人控制的浮标和长期的钻井井台有可能挤在同一个地方。因此，可能必须制订一个有关航道的全新规则。

所涉及的国际作用

不管为深海海底制定什么管理方法，都必然会涉及国家权辖之外的资源开发。因而，颁发许可证的有关当局就会卷入进去，这意味着标准的制定和选择的决定。如果能通过那种管理方法规定海底管理的真正职责、资源的所有权，那么也就能规定一整套的职能：通过制定规则颁发许可证，监督规则的执行，起诉、判决和实施。

渔业方面的规则也具同样作用：可决定把利益、权利给哪一国，不给哪一国，拥有进行起诉、监督和强制执行决议的机构；有能力独自开展情报工作，取得情报。对于因滥捕而耗尽饱含蛋白质的水族资源的问题，也需采取类似的步骤加以防止。至于因对海洋的多方使用而使海洋日益拥挤的问题，尽管影响要小一些，也要靠国际机构处理。

三　外层空间

进行空间发射活动的大国无疑会继续其空间活动，尽管政治上的紧迫性不怎么大。① 无疑，人们对通过空间获利、通过分担

① 这一节的情报来源甚多，但尤为值得一提的是美国国家科学院和国家研究委员会的报告《地球人造卫星的有益应用》（华盛顿特区，1969 年）和巴特尔纪念学院的报告《经过选择的空间目标和目的及其与国家目标的关系》（1969 年 7 月 15 日）。

费用缩小开支的兴趣会越来越大。在讲究利益的时代，人造卫星的应用由于会有助于农、林活动的计划、管理，几乎肯定会取得进展。卫星系统能用各种传感器材细查广大区域，为水的使用、分配、庄稼收成的预测、以及其他许多土地管理活动提供价值无法估量的情报。一旦这样的服务正规地纳入国家经济体系，就会成为必不可少的工作了。

卫星的另一种令人兴奋的作用是搜寻矿藏和生物资源。卫星可被用来勘探矿藏，至少能用来确定可望进行开采的矿藏的方位。人们可通过这一类情报取得经济和战略上的大量利益，但也会因情报的控制、获取、这些技术的应用及采取国际行动的问题而头痛不已。

为了满足人们对通讯频道越来越大的需求，用于通讯联络的卫星数目会大量增加。通讯系统本身可能会变得越来越高级复杂：频道容量会变得很大，(地理上的)波束覆盖面会受到严格限定，功率会增大，还会具有其他的特殊性能。现在尚不清楚将来究竟会出现一个单一的全球通讯系统，还是会同时存在多重的国家通讯系统。但不管怎样，对频率的需求会增大，频谱的分配问题也会严重加剧。家庭或集体通过经过加强的天线接收卫星的直播节目的工作，尚未取得进展。但联合国卫星直播工作组估计，到1975年，这一工作在技术上就是可行的了。① 然而，要使直播系统得到切实的发展，还必须建立复杂的经济、政治和技术的准则。

对出于研究、勘察、开发、监测和实施计划的目的而观察地球及其环境，人们正兴趣日浓，这会导致以卫星为中心的数据收集和传播系统的发展。这些卫星都很高级复杂，装有自身的传感器，其

---

① 见联合国和平使用外层空间委员会关于卫星直播工作组的报告。文件编号为A/AC.105/51，1969年2月26日。

传感器还与遍布全球的译读站连接在一起。这样的卫星系统会增加频率和轨道空间分配的压力，而且会引起管理、经济效率、情报保密、联合计划等方面的国际(相对国家而言)问题。

空中运输的扩展与高速海洋运输的推广一样，也需要大大改进航行的空间，在今天，对横越空间的通道的需要已是有目共睹的了。卫星的航行系统可能为这种需要提供了最吸引人的答案。频率和轨道的适当分配将象管理问题一样，再次成为核心问题。

空间技术所涉及的国际作用

上述情况极为清楚地说明新的国际机构肯定会产生，事实上也确实产生了一些，其中最著名的有国际卫星组织，那是通讯卫星的联合组织，还有欧洲空间研究组织和欧洲发射工具发展组织。我们所需的国际作用首先是促使上述的许多卫星系统发挥作用。在多数的情况下，国家的所有权和国家的活动并不适当，因为人们是为了政治上的理由才让其长期存在下去的。通过空间的能力获得的某些情报将在经济上、甚至战略上具有严重的后果，其中尤以新资源、鱼类运动及气象方面的情报为甚。因而，有关情报的所有权及其带来的国家利益和商业利益的问题，必须由国际组织处理。

一旦某些通讯系统开始工作，——例如，进行气象预报，控制航行及空中交通，制订收获计划，整个人类活动就离不开它们了。因而，由于平等及政治上可行性方面的原因，将会出现强大的压力，要使这些系统由国际共管。在使用这些系统时，会因各地的费用、利益各不相同而发生纠纷，因而，也必须有一个国际机构来处理。有些通讯系统有赢利的潜力，或至少会严重影响同一领域内陆地通讯系统潜在的赢利。只有通过国际行动，才能解决复杂的平等问题。在采购设备时，也会遇到经济平等问题。哪些国家将收到发展和采购的合同呢？国际卫星组织现在正被这个问题所困

扰。希望分享发展、生产通讯卫星所带来的经济上和技术上的好处，显然正是隐藏在竞争投标后面的一个动机。

对分摊空间发展和开发的费用的兴趣，可能会鼓励人们寻求空间的合作，而且所作的努力远非我们今天所能想象，在这过程中，国际机构或许会介入进来。直播卫星则会引起棘手的问题：卫星本身的技术标准，电视的标准，广播的覆盖面及干扰（包括失真），当然还有频率和轨道的分配。也不能排除会对广播内容采取某种形式的国际控制。在地面近处的空中活动将大为增加，因而需为可以预见的各种空间的使用制订空间制度，规定标准，分配所使用的空间。由于军事上也在使用空间（主要是监视、通讯、跟踪），而且还有更多的潜在可能性，这项任务会变得大为复杂。

四　自然资源

获得自然资源——矿物、有机物和水文资源——是永远受到关心的问题。不管在短期内情况如何，这个世界所能提供的矿物及矿物燃料总是有限的。在近十年内，全世界的金属需求量以每年大于6%的速度增长。[①]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全部金属产量也不过略等于大战后消耗的金属。有些资源，如氦、汞、锡、银、锰、铬、钛、钼和钨已经或行将告缺。[②]其中氦、汞由于性质独特，就目前所知，尚无令人满意的代用品。用于核能的矿物也有同样的特点。因此，必须对这些矿物采取保护措施，还必须使这些措施具有国际意义。但现在我们对全球资源的实际情况了解得并不够，未到应有的程度。

---

① 见T·S·洛夫林的《已发现的土地中的矿物资源》，载于《科学技术对未来的美国外交政策的潜在影响》第43页。

② 见普雷斯顿·E·克劳德的《有关世界矿物资源的估价的探讨》，载于上注所引书，第50页。

要想依靠市场机构提供低含量矿物的办法来取得那些金属是行不通的，因为这样的矿石分布极不集中。铅、锌、汞都有这样的特点，一些不在其基本蕴藏之处的较普通的矿物也是如此。要想使含量极低的矿石变得价廉物美是不可能的，因为处理、加工低含量矿石，耗资巨大。[1] 始终恼人的是，人们想要有效地使用现有的资源，是出于将来的需要，而不是根据目前的技术、经济条件。

资源匮乏所涉及的国际作用

最为紧迫的当务之急是对地球外壳进行进一步的地球化学方面的调查，以确定真实的资源情况。由于世界资源分布不均，也无法确知这些资源的贮藏量，要求由国际共同管理及有效使用这些资源的压力将越来越大。美国和其他发达国家现为最大的原料消费国，它们可能为了自己将来的发展，正在捷足先登地优先使用这些资源。这会成为严重的政治问题，会造成一种压力，要求创设一个机构以管理、分配和调整这些资源的使用。另外，资源使用量的增加直接关系到污染问题，因而，就象需要限制各国对各种原料的消费一样，也会为了控制污染的需要而制定规则。

五 粮　　食

20 世纪 60 年代后期的绿色革命看来至少已推迟了一场威胁到全世界的饥荒，但它只是由于以下几个因素碰巧凑在一起才发生的：使新的种子得到充分利用的新技术及时地发展了起来；重要地区的气候均很良好以及农民们愿意种植新的品种。然而，只要人

---

[1] 瓦洛夫林的前引书，第39 页。

口的压力还在继续增长，这些发展就只能是暂时的缓解，而不是长期的解决。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所设计的"指导农业发展的世界计划"，强调了从当时到1985年为止的一段时间里与粮食有关的问题和需要，它指出：在这一时期，农业产量的增长必须超过1962年的平均2.8%的增长率，达到每年平均增长3.2～3.8%，平均增长率的这一变化实质上过于旷延时日了。何况，这项设想并不包括改变现在尚不完善的粮食质量和热量摄入量。如果还要考虑到某种正在增长的需求的话，那么发展中国家所需的年增长率将是3.9%[①] 总之，世界范围的大饥荒已有可能长期紧缠我们不放了。

粮食问题所涉及的国际作用

有关国际作用的问题，大多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这儿讨论的情况却与众不同，大体能保持一致：人们尽管对这问题很关心，也作出有限的努力，试图找到应付良策，建立了某种纯粹用于解决这一问题的国际机构。但是，这一问题主要还是由各国自行处理。然而，粮食问题及如何使其得到更大程度发展的问题也有可能正在受到世界各国越来越大的注意，而且由此会在国际的范围里出现一些实质性的新的作用，或原有的作用会得到扩大，这些作用包括管理和分配钱财、肥料、杀虫剂、水、机器等方面的资源，以使粮食的生产充分，分配合理，质量提高。如果发生大危机突发的特殊事件，不管是世界范围的饥荒，还是环境方面危机，这样的作用就会得到极为迅速的发展。

---

① 见G·切尔竴的《要么面临饥荒，要么采取明智的策略》，载《新科学家》1969年10月23日，第44卷，第672期，第178～181页。

六 人 口

人口控制无疑是当今世界在未来的50年中面临的最严重的环境问题。从经济、文化和社会学的观点考虑，人口的增长务必要受到控制。但是这条含义清楚的规则却包含着许多问题。其中一个很简单的问题是怎样进行控制？另外还有一些问题则涉及到一些相当微妙、敏感的问题，例如：人口数量应是多少才最适当，这些人口应在各种族、民族间作何分布，如何推动这一工作的进行，等等。有一点是很清楚的：地球(包括广阔的空间)的资源是有限的，供养不起无休无止地不断扩大的人口。而且，不管人们认为人口数量应是多少才最适当，只要它大大超过假定在1985年或2000年将要达到的数目(60亿以上)，就难以保持(至少目前还是如此的)西方的价值标准，当然，价值标准是会随着人口的增长和新技术的发展而发生变化的，就象今天的标准与过去的相比已有所不同。

总有一天会强制性地实行生育控制，要进行这种社会控制，很可能必须以国际上的通盘考虑为基础，至少所作的国际考虑不会少于各国自己的考虑。在近期内，生育控制方面的直接干预可能仍然只是一种个人的事情，至多只是国家内部的事务，但是，对出生率不加限制，会产生国际影响，从而很可能造成要求限制生育的强大的政治压力，在这种压力下，生育限制一定会得到全面的实行，至少会得到普遍的赞同。而这就意味着要随之签订某种国际协议，设立某种国际机构，以便于这种得到同意的限制得以实现。另外，即使个人的意志或政治的意志也与此不谋而合的话，也还存在着一个如何控制出生率的问题。现在已在使用许多法律、社会、技术和心理方面的生育控制技术，这些技术大多围绕着家

庭设计的想法进行。这种家庭设计的处理方法本身并不错，但却使决定由家庭自行作出，而个人的选择完全有可能使平均出生率变得太高，这种情况即使在早已进入发达行列的社会里也在所难免。

与此同时，发展适用于这项任务的化学药物的前景并不令人乐观，因为存在着法律上、政治上的问题，这些问题至少不会少于技术上的问题。适于当此重任的是只服一剂便长期有效的药物。最为理想的则是能制造出一种既可长期避孕，又能使其暂时失效的药品。如果要求国家控制，这类技术便会很容易得到改进。然而，目前为研制、测试这种新药而进行的工作却很难使其得到发展。① 困难在于：1)，新药是由美国粮食和药物管理局在美国的环境，而不是其他国家的环境里试验的。2)，新药的研制会因为安全条件的严格而耗资巨万，从而令人望而生畏，同时，测试阶段颇长，也难解人口问题的燃眉之急。3)，尚不存在独立的国家或国际的科学上诉机构，故美国粮食和药物管理局也无从在科学的基础上向这类机构提出自己的决定或要求。② 人口控制所需的技术尚有待进一步的发展，——这是一个尚有争议的观点，因为许多人相信，目前用于家庭设计问题的技术以及健康发展计划对此足可应付裕如了——因此，需要采取一些新的国际行动，以改变这项发展的基础规划。

总　评

斯坦利·霍夫曼言简意赅地评论道："主权国家的船只正在漏

---

① 见卡尔·杰拉西的《新生育控制化学药物的发展预测》，载于1969年10月24日的《科学》，总166卷，3904期，458～473页。

② 同上。

水。"以前有关独立意识及各国可以随心所欲地行事的说法都只是些想入非非的错觉，在今天技术大量发展的情况下，这些说法充其量也只能说只有一部分是正确的。在使用这许许多多的技术时，各国出于利己的考虑，不得不彼此达成协议，从而约束了自己的行动自由，不这样做，它们就会将这些技术拒之门外，或者就会遭到各式各样的报复。对于这样的约束，各国是听其自然地任由其进行的，就此而言，也可认为这些约束是各国自己所设置的。但是，不管怎么说，这些约束正是对国家主权的限制。令人触目惊心的是国家主权遭到侵蚀的程度。从根本上说，在20世纪80年代将成为不可或缺的一切国际作用，今天都已初具雏形。今天人们将如何看待注重国际作用的思想，也取决于人们对现有的国际体系是否有能力演进成80年代所需事物的估价，然而，即使今天尽所有政府间组织之力能很好地应付形势的话，数年之内必会增加的工作、职责也会使人不胜重负，除非今天就未雨绸缪，有意识地预作准备。另外，国际机构的工作尽管在某些领域颇有成效，但总的说来还是使人产生怀疑：若不进行实质性的改革，是否能在使人负责方面为发展、增长提供充分的基础。

国家的自由活动所受到的约束将越来越大，国家的职责也将越来越多地流入国际组织，这意味着决策地点将被迫逐渐从国内流入国际的竞技场。国家并不会丧失它们对某些特殊问题的控制权，但越来越多的问题将在国际领域里解决。看来很有可能出现这样一个趋势：各国内部的利益集团将越来越依赖于各自领域里的国际组织，国际决策的扩展将会得到加强。

然而，也会出现逆流：现正在此讨论的技术课题的政治、经济上的特点正在日益明显。过去，它们并未受到政府的青睐，但现在它们所包含的意义却使它们红得发紫，跻身政治舞台的中心。这些特点的出现意味着控制权的丝毫丧失都必将引起强烈的民族感

情。因而，赋予国际机构些微的职责，也会遇到抵抗，因为这样一来，政府所能行使的控制就会受到限制了。这些特点的出现还意味着这些技术课题会显得更象今天的国家安全、权力关系那样的“高度政治化”的问题，并会受到政府更大的关注。

但是这些问题在社会中到处可见，与个人及利益集团又直接休戚相关，因而各国政府永远不可能一锤定音地独自对其作出决定，事实上，国家的一体化政策本就仰仗于国际组织的有效工作，以后甚至会变得更难独自施行。对于那种必不可少的一体化，我们可能必须指望国际的力量来提供，而不是首先依靠国家的力量。如果出现这样的情况，就又会出现一个使决策逐步国际化的途径了。

这些因先进技术及其副作用引起的问题的本质，在于强调事物的联系。慢慢地，将不能清楚地将这些问题划归贴着“海洋”、“农业”、“健康”等标签的盒子，它们彼此之间的影响将变得更为重要。当前的问题在于使国际组织所进行的裁决、协调变得简单易行，这无论对国内还是国际都不会错，也将成为未来的一个主要问题。况且，现代技术体系及组织体系的复杂庞大也已使革新的任务变得无比困难。

我们已可指出，在某些国家里已出现希望的曙光：公众对本文所分析的问题，尤其是有关环境控制及污染的问题正兴趣日浓。这种兴趣正通过政治活动表现出来，最终确实会导致对人类及其工作进行某种控制。不管这种控制是国家的还是国际的，都是为了生存所必须进行的。随着公众对人类身处的环境兴趣日增，人们似乎会越来越多地认识到：如果影响所及并非本国一国的话，政府就无权单方面地在技术领域里行动。这种认识将如何进一步深入，人们尚在拭目以待，但它必将成为向国际决策方向迈进的重大行动的先决条件。

技术本身也存在着一种带有危险的“鲁德”[1]色彩的令人头痛的反作用，至少就美国而言是存在这种情况的。由技术引起的问题可能还得通过技术本身来解决，因而这种反对技术的反作用还会长期存在下去，出现在人们为保护未来的环境而已步入的进程中。它首先会施加压力，将科学技术的预算压低到最低程度，对于理解，改善世界所面临的自然、社会问题至关紧要的那些领域，它也会插手控制，紧紧地抓住不放。

国际组织必然会在一个政治环境中发挥作用，但这个政治环境也会发生变化。核武器竞赛及国际局势紧张的加剧，都会大大影响本文所提出的问题的可能会有的解决。超级大国之间政治事务的发展也会明显地对国际机构的演变产生深远的影响。中国也必然会出来参与这些与技术有关的问题的解决。你也可以预见，对主要利益的争夺将成为南北关系紧张的一个重要根源。

不管今后20年内政治的发展将至何种地步，“不可避免的”技术发展必然会对国际体系提出重要的新要求。怎样来决定适合于国际体系发展的道路，必然（部分地）取决于人们就今后20年内的需要而对现有的国际机构所作的评价。是仅仅“渐进”便已足够有余，还是尚需对现有的国际秩序进行“革命”，人们的判断还不一致。各国政府及各个国际组织会及时地认识到这一问题的严重程度吗？即使稍对国际体系作一改革便可应付局势，就可对此掉以轻心吗？显然，理解这些问题，已成为迫在眉睫的当务之急了。

朱兆荣　译

---

[1] 鲁德，反对机械化、自动化的人。——译注。

第二部分

马克思主义与现代化的意义*

弗农·V·阿斯巴图连

现代化的概念

虽然人们已就"现代化"的概念写了许多理论的和经验的文章，但它基本上仍是一个短暂的概念。主要因为从这个词的原义来看，"现代"的性质是暂时的，而不是固定的绝对的。诚然，人们用当前的范式为现代化规定了确切的定义，但这基本上是一种随心所欲的行动。这样做的目的，是当这种范式的基本设想受到批判检验时，以及它的意识形态的或基本价值的参数受到怀疑时，避免产生麻烦的问题。从概念上看，范式应当具有超价值性或观念形态性，但现代化的范式却不可能具有这种性质。因为现代化与"西方化"(即起源于18世纪的西欧社会、经济和政治价值体系与结构)有着历史的联系。西欧的价值观和结构是产生现代化理论构想的深厚土壤，同时它们还最明显地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用来衡量一国现代化速度和水平的经验指数，二是西方作家、学者不断产生的对于"美好生活"的想象。

---

* 本文选自查尔斯·加蒂主编的《东欧的现代化政治——对苏联模式的检验》，美国普雷格出版社，1974年出版。

由于现代化与西方化两个概念之间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故现代化被假定是一个具有许多范例的标准规律，而不仅是一个经验主义的概念。然而，用听起来更加中性的现代化的概念，来代替明显受到文化限制的西方化这一标准概念，并不能解决有关的理论上的难题，而只是回避和抹杀难题，以便加快理论的发展。而一旦西方化被认为是现代化的具体表现，并被视为发展的必需的必然的和普遍的一个阶段，那么现代化究竟是一种命运，还是一种选择，是必然的还是自由的，是绝对的还是相对的，诸如此类的重要问题，仍然没有提出。

在这方面，现代化与西方另一个基本的价值观念即"进步"联系起来了。因为就象西方化一样，现代化也代表进步。这样就形成了一个循环：进步由现代化所决定，现代化由西方化所决定，西方化便成为进步的经验历史的具体参照物。

人们是否愿意把现代化同进步和西方化等量齐观，这并非重要问题。现存的现代化的范式是具有价值的，其价值理应得到承认，只要不排除建立其他类型的发展，或仅仅是存在的可能性(因为发展本身已经呈现强烈的规范特色)。人们在历史上选择西方化和现代化为社会存在的形式，只是由于要在充满激烈掠夺竞争的世界上进行自卫和保证安全，而不是出于他们的价值准则。这方面，最有力的例证就是，面对同样的威胁，日本上层决定使社会现代化，而中国上层傲慢地蔑视西方化，两者大相径庭。下面这种假设似乎是有道理的，如果不是具有现代技术和精良武器的西方威胁着东方文明的话，不论是 19 世纪后期的日本，还是稍后时期的中国，都不会放弃他们自己的社会存在形式，而自由地选择西方的社会存在形式。除非人们相信为生存而进行的斗争是不可避免的和长期存在的，可以假定，某些社会阶层既不会选择进步，也不会选择西方化和现代化，因为现代化虽然会给他们带来真正的利益，但

同时也造成骚乱、动荡、忧虑，精神上和道义上的变动无常。相反，当他们不受到其他社会制度的外来威胁时，他们可能会选择一种平静、和谐与社会平衡(甚至社会停滞)的存在方式，这种存在方式强调存在的直觉美学方面。当然，(除了文化人类学者外)，用西方的话来讲，这样的选择被认为是停滞的(原始的)，思想迟钝的(传统的)，或是倒退的(反动的)。

西方的思想传统，包括马克思主义在内，是由两种不同的但现在已混为一体的文化遗产合成的。这两种文化遗产使西方文化区别于其他文化传统，并深刻地反映在进步与现代化的概念之中。第一个遗产是希腊——罗马的理性经验主义。它强调逻辑顺序和结构，系统的调查研究，规律性和必然性，它在现代科学技术中发展到今日的顶峰。第二个遗产是犹太基督教的预言救世的传统。它反映在历代产生的乌托邦思想，对于"美好生活"的幻想，精神上的复兴和创新，救世主义与世界大同中，它在现代人道主义中发展到今日的顶峰。这两种西方思想传统经常处于矛盾冲突之中，矛盾的尖锐性往往比我们观察到的更激烈，而它们之间的相辅相成和彼此依赖也比我们观察到的更密切。

包括马克思主义各派别在内的当代社会科学，都展开了哲学的探索，以便找到这两种因素间的永久不变和能说明问题的关系，尽量减少这两种因素间的矛盾冲突的破坏性后果。现在这一问题已在各种认识论、历史哲学和发展理论中得到解决。人们的目的、向往和西方人道主义价值观，都在发展理论中科学地获得实现。同时，发展的理论满足了西方的科学理性主义和预言救世主义这两种精神准则。康德、黑格尔、孔德和马克思成为西方的思想巨人，他们很明确地调和西方思想中这两个组成部分。当代所有的马克思主义与非马克思主义的范例和社会发展的理论，都是从上述巨人的思想中派生出来，折衷而成的。

也许，马克思主义代表着最雄心勃勃的系统的尝试，以调和科学和预言的规则。马克思试图把救世的预言转变为科学的预见，以解决这个问题。大多数现代化和发展的最新理论，也试图为人们接受和采纳更好的、更合乎需要的价值和规范，提供一种科学经验主义的合理化基础。在《费尔巴哈论》中，年轻的马克思热情洋溢，斗志昂扬，当他断言以前所有的哲学都只是寻求解释世界（希腊罗马的科学理性经验主义因素），而他的哲学则寻求改变世界（犹太基督教的预言救世乌托邦因素）时，他可能是过于自负了。因为一大批哲学家（空想主义思想家，特别是空想社会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也在寻求改变世界，他们给人们提供了可供选择的未来观，以便取代现存的社会制度。在许多人中，只有列宁认识到，马克思从空想社会主义者的思想中获得借鉴。但同样确实的是，马克思具有试图把预言和空想奠于科学基础之上的思想。他借鉴了黑格尔的辩证法，以便从矛盾对立中推导出逻辑和理性。这样，就能使混乱的幻想转变为经验的秩序，预言转变为预测，空想转变为现实，价值转变为事实①

尽管马克思及其在苏联的门徒，强调其思想体系的决定论和唯物论的基本原则，以维护其科学信誉，但是，马克思主义，尤其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比某些非马克思主义发展理论更强调其唯意志论的和唯心主义的方面。② 由于马克思和列宁都是人文主义者，而

---

① 作者对这个论点的进一步发挥，可参见《当代苏联国家学说及其哲学基础》，载《美国政治学评论》，1954年12月号，第1031——1057页。

② 这里对"马克思主义"和"非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与现代化理论的划分，完全是为了行文方便。我们不想对它们进行精确地划分，也不想造成这种印象，即所有的非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都是同样的，也不是用"马克思主义"这个词，把所有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混为一谈。"马克思主义"这个词更应该被理解为马克思和苏联理论家共同承认的一些马克思主义理论，以及苏联及其他共产党国家所推论、修改与发展的马克思主义原则。而且，我们应该承认，马克思（接下页）

不是科学家，因此马克思主义的预言的成份超过科学的成份，是不足为奇的。他们首先关心的是社会的变化，而不是科学的变化，科学的变化从属于社会的变化。也就是说，价值观和未来观决定了科学前进的方向，而不是相反。于是，在马列主义发展理论中，意识形态起着决定其构造体系的作用。价值观和规范不是自发地偶然地产生，而是受到特定的精英即共产党的严格控制和指导。共产党的领袖们确定发展的意图、目的和先后顺序，计划与决定价值观的各个参数，物质的发展就在这些参数内进行。

另一方面，非马克思主义的发展理论，往往相对不关心价值、目标和意识形态，因为现代化的目的即其过程本身。现代化被设想为时间和空间中的普遍性，现代化的过程是由自然力无意识地推动的。价值和目标是现代化的过程本身所产生的，当社会以机械似的精确性，相继走向发展的更高阶段，价值与目标也自然得到加强。发展的定义主要取决于能用数字衡量的成就水平，它表现为各种指数。从现在的发展可以推知和预测未来的发展水平和速度。从一个阶段到另一个阶段的运动过程即所谓"现代化"，即进步，现代化的物质方面的发展可以科学地加以衡量。在某些方面的增长水平和速度接近西方国家的时候，社会就成为"现代化"的，或曰西方化的。这一理论的重点是过程本身和科学似的方法论的发展，这一发展过程可产生假设（价值）和预言（空想）。这样，现代化进程艰难地产生出新的价值和目标，而这些价值和目标又朦胧地勾划出下一个阶段的发展。因此，这一理论认为，无需特定的精英去保证控制价值或防止发展的偏离。尽管它承认，在不发达的

（接上页）主义—苏联理论反映了马克思主义的主导思想，成为制定政府政策的基础，因而它已不仅是一种分析性的理论。而"非马克思主义"理论基本上是由独立的学者所提出的个人分析原则。他们提出的模式和理论也许能，也许不能影响政府的政策。

国家和共产党国家里确实存在着"现代化精英"。他们动员社会的和物质的资源，树立发展的目标和重点，规定社会的价值观和目的。在现代化进程中，"现代化精英"究竟是必不可少的中介，还是可随意选择和听其自然产生的，这在大部分非马克思主义发展理论里是不清楚的。

因此，苏联的和非苏联的发展理论具有大量的相同设想和价值。苏联的和西方的发展的理论都渗透着进步的观念，极大地诺调预言和科学，并把社会发展视为社会依次走向更高阶段的发展。它既不容许横向发展的更多自由，也不容许在一个特殊的阶段过于深化，而只强调从一个阶段向另一个阶段的运动。这在苏联的理论体系中，强调得更厉害。苏联的理论迫使发展经过几个阶段，缩短某些阶段，甚至跳过某些阶段。这样，其理论也允许相当的灵活性，以适用于同时共存而处于不同的或不平衡的发展阶段的各个社会。① 苏联的发展概念比西方的概念更加教条，因为它更有意图，价值与规范十分明确，具有使命感，目标固定。与西方发展理

① 当然，马克思和恩格斯不赞成跳越或缩减发展阶段的观点，虽然他们承认在这些阶段内有加速发展的可能性。

马克思写道："一个社会即使探索到了本身运动的自然规律，它还是既不能跳过也不能用法令取消自然的发展阶段。但是它能缩短和减轻分娩的痛苦。"卡尔·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纽约，现代图书馆版，第14—15页。（此段译文系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一版序言，第11页。1972年中文版——译者。）有一次马克思和恩格斯曾随便谈到，俄国可能会跳过为社会主义作准备的资本主义阶段，社会主义社会已经在更发达的社会里建立起来，这社会既可以作为一个模式，也可以作为支持社会主义的根源。后来马克思、恩格斯放弃了这一特殊的迷人的想法。因此，恩格斯写道："俄国同任何地方一样，已不可能从原始的农业共产主义中发展出更高的形式，除非那作为模式的更高形式已存在于别的国家之中。凡是这种更高的形式可能历史地实现之处，它都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必然结果。"然后他叫其俄国通信者不要绝望，因为资本主义在俄国是不可避免的："资本主义展现了新的视野，开辟了新的希望……看一看资本主义在西方已经完成和正在做的事……没有一种巨大的历史之恶不以历史的进步为补偿……但愿命运能完成它的使命吧！"卡（接下页）

论一样，苏联也把发展看作是竖向的，而不是横向的，所以，苏联的发展观念不接受发展的各个阶段是平等的观点。对共产主义者来说，共产主义绝对明确地是发展的最高阶段。而对西方的现代化理论家来说，发展的工业阶段、后工业阶段或群众高消费阶段，只是当时发展的最高阶段，它可能只是过渡到一个更高的尚未开始的新阶段的跳板。因此，许多西方理论包含这样的内容，即所有的国家都会或应该达到这个最高阶段。苏联作者们也一样断定，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是社会发展的最高阶段，所有的社会都不可避免地走上这条道路。①

由于苏联的和非苏联的发展理论从同一个思想传统中产生出来，因此两者在许多方面彼此相象。它们对发展阶段的说明也几乎一致。它们差不多都把发展分成五个阶段：

现代化理论	马克思主义
(1)"传统原始社会"	(1)原始共产主义社会。
(2)"传统文明社会"	(2)奴隶社会。
(3)"过渡社会"	(3)封建社会。
(4)"工业革命"社会	(4)资本主义社会。
(5)"群众高消费"社会	(5)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社

（接上页）尔·马克思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通信选集》，纽约，国际出版社，1942年，第515页。

① 塞缪尔·P·亨廷顿和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不同意对于非西方发展理论所进行的概括，他们的观点引人注意。有些人认为，发展的"最高阶段"对一切社会都是必然的，或者一切社会都向往并能够逐渐通过发展的扩散，达到更高阶段。他俩都不接受这种观点。亨廷顿进一步引入"衰退"的观念，认为这是发达社会或发展中社会都可能出现的发展阶段。因此，他反对马克思主义的、苏联的以及许多非马克思主义的发展理论中认为进步是必然的观点。参见塞缪尔·P·亨廷顿，《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美国康涅狄格州，纽黑文，耶鲁大学出版社，1968年；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在两个时代之间》，纽约，维京出版社，1970年。

会[①]这两张图表在许多方面已超出了发展的阶段。由于苏联的分类是在历史范围之内发展起来的，所以苏联的分类也就是社会历史的阶段。而西方的阶段是非历史性的，只是为经验地确定现存社会的类型而构想出来的。因此，苏联的阶段划分是很教条的，表现在它已不能有效地处理当代不发达国家的各种社会状况。马克思主义的经典的阶段划分产生于19世纪中叶，它已无法包容和说明当代不发达国家的社会状况。虽然苏联学者对不发达国家进行了大量的经验的调查研究，并且提出了许多颇为混乱的次阶段理论，以调整其教条的僵硬性，但他们仍不敢篡改马克思的社会历史五个阶段的提法。

(特别令人不解的是苏联概括出来的一套陈词滥调，即有一种非社会主义的"非资本主义发展"。蒙古被苏联看作"非资本主义"发展杰出的样板，它已经非资本主义地发展了近50年。这是一个非常灵活的概念，它能解释一切用马克思主义—苏联理论框架无法说明的社会。有时，它被作为一种政治手段去赞扬或承认反西方的不发达国家，这些国家主张或追求莫斯科官方未承认的形形色色的社会主义。这方面的某些概念同许多次阶段理论一样，只是昙花一现，便不再提起。苏联所以设想出这套理论，是为了弥补马克思主义发展理论无法解释不发达国家的不足。这套理论在马克思那里除了作为笑柄外，一定不会得到首肯。然而，马克思似乎也承认，至少是含蓄地承认，他的五阶段发展论不适合某些非欧社会，他提出的费解的引起争议的"亚细亚生产方式"，也不符合他的

---

① 参见，例如布鲁斯·M·拉塞特等：《世界政治和社会指标手册》，美国康涅狄格州，纽黑文，耶鲁大学出版社，1964年，第293页—303页。在彼得·H·默克尔的《现代比较政治学》中的概述。纽约，霍特、莱因哈特与温斯顿出版社，1970年，第23—90页；以及W·W·罗斯托：《经济增长的阶段》，纽约，剑桥大学出版社，1960年。

辩证的模式。因为马克思明白表示过，革命前的俄国，可能处于"亚细亚生产方式"的状态，或在其发展中成为"半亚细亚生产方式"。直到最近，苏联作者仍被禁止探索1931年所谴责的"声名狼藉的亚细亚生产方式"的含义。甚至今天，人们在深讨这个问题时，仍是相当小心谨慎的。一般来说，苏联作者都不适于以"亚细亚生产方式"为依据，为不发达国家提出新的发展阶段理论。如果苏联作者们发现，毛泽东的中国代表了一种"亚细亚生产方式"，那倒是不足为奇的。)①

虽然苏联的现代化和发展的理论，与非共产主义的现代化和发展的理论，是同一西方传统的不同变种，但这并不是说，两者是可以互相更替的，也不是说两者可产生类似的可比的制度、组织、价值观与社会关系。苏联的发展理论在许多重要方面与现代其他发展理论是不同的。

1.苏联理论的价值体系，包括其未来观，是一种绝对化的"不断趋于进步的"价值观，是19世纪末叶的乌托邦思想。苏联人坚信其理论是优越的、排他的和决定性的。由于马克思科学地确立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的理论，作为历史决定的发展的最终产物，这就标志着预言和空想的终结。西方工业化和现代化的阶段被称为发展的低级阶段，即资本主义阶段。尽管资本主义能产生许多变异，并能进行横向发展，但它仍旧不过是通往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辩证道路上的一块平凡的里程碑。因此，人类已不再需要预言家及早期的文化传统，马克思成为最后的可靠的预言家，他不是预言上帝，而是预知历史和科学。

2.由于马克思主义发展理论指定无产阶级这一特定社会集

---

① 见卡尔·韦特福谷尔，《东方专制主义》，美国康涅狄格州，纽黑文，耶鲁大学出版社，1957年。他煞费苦心地企图从马克思的"亚细亚生产方式"中得出一个"水利社会"，并使它成为一个能分析苏联和其他共产制度的概念。

团，作为人类进步的源泉，因此这一理论明显地是唯意志论和目的论的，而不是决定论和开放的，虽然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的观点与此截然相反。马克思主义的唯意志论的内容，在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得到了指数级的发展。马列主义认为，共产党是无产阶级必不可少的先锋队，是无产阶级价值观和雄心壮志的保护者，是社会发展的催化剂。用非马克思主义的发展理论的术语来说，共产党被定为许多“现代化精英”中之一种，只是适合形势的需要被自由选择出来，而不是发展和现代化的必要的前提。

3. 在马克思主义的思想结构中，现代化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1)决定社会政治性质的内容，它确定了高级与低级的价值观、规范和社会关系，根据它们所属的特定发展阶段，进行排列。(2)衡量物质技术程度的数量方面的内容，它以人类的能力、科学、技术和经济的增长来确定与衡量。在苏联的思想结构中，现代化的第一个内容是至高无上的和决定性的。而第二个内容是辅助性的，独立于第一个内容，并且可在较低级的价值体系、规范和社会关系中发生，它既可用于实现不公平与反动的目的，也可用于达到公平和进步的目的。这样，人们就能区分不成熟的和现代化的资本主义，但“资本主义现代化”的性质属于较低的层次，低于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所反映的现代化。不论现代化的资本主义多么发达，它只是在第二方面发展，基本上仍是处于比较低级的横向发展阶段。另一方面，例如处于社会主义社会的保加利亚，比起最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尽管其技术与经济仍是落后的，但它代表了现代化的更高形式，因为保加利亚会将其能力用于实现公正的目的，其能力会比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提高得更快，更有成效。

这个结论有待于进一步的检验，因为它明显地背离了正统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这一结论源于以下历史事实，即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诞生于不成熟的资本主义社会(俄国)。而对马克思来

说，社会主义应该首先在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建立。这意味着，俄国的社会主义被迫接受一个额外的任务，就是要发展成一个具有先进科学技术的工业化社会，而马克思本来认为资本主义历史阶段就可完成这一任务。马克思并不认为社会主义是资本主义的代理人，或者是可以选择的阶段。在他的一篇谈到历史规律发展的文章中，马克思提出一个观点，即反对由发展的高级阶段去完成低级阶段的社会历史功能："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们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存在的物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① 马克思在特别论及俄国时，再次警告说："如果俄国趋向于成为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它必须首先使其相当一部分的农民转变为无产者，才能做到这点；然后，在它投入资本主义的怀抱后，它将象其他世俗民族一样，体验到资本主义的冷酷无情的法则。"②

但是后来列宁和斯大林都表明，甚至在后资本主义社会中，唯意志论的力量都大于决定论的力量。斯大林又企图证明，实现资本主义并不一定需要农民转变为无产者，农业社会转变为工业社会的过程。现实是斯大林确实造成了另一种有效的工业化和现代化的新过程。所谓"建设社会主义"，基本上是在不发达的共产党国家中发展资本主义和实行现代化的代称。

苏联现代化和发展理论的这三个特性，使得人们把比较共产党国家与非共产党国家的现代化中的难题，作为研究的重点。非共产主义的现代化理论，避免涉及现代化的价值意图和目标的麻

---

① 卡尔·马克思：《选集》2卷集，纽约，国际出版社，1942年，第1卷，第356—357页。（此处译文摘自《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83页，1972年中文版。——译注）

② 马克思和恩格斯，同前引书，第354页。

烦问题。也就是说，发展的内容与要旨，它注意的中心是发展的形式、过程和各种指数，这些被认为具有普遍性，因此是超出于意识形态、信仰体系和价值规范的。这种超脱意识形态和价值观而设计的普遍范例，经常会产生超出范例的印象，得出条条道路通往现代化和各社会最终趋同的结论。它包含着技术会影响意识形态和价值观的意思。

现代化不可避免地具有价值观问题。这一问题经常表现在，现存的范例无法令人满意地确定现代化的政治和社会的标准，尤其是政治标准。但是，人们经常把这一问题当作纯粹的语义和定义问题，抱怨缺少统计数字，数据不可靠或数字的不可比性，从而掩盖了真正的困难。人们很少承认，这个问题是超出于统计学的，而且统计学的分类也往往由内容或意图的分类来决定的。最明显的困难是"政治现代化"的概念所引起的。人们有时反对使用这一概念，认为它完全是主观性的，本来就既不能衡量又无法比较，而现在却把它当作可以衡量的东西。(塞缪尔·亨廷顿对于发展总体概念中的"政治现代化"概念，进行了长篇论述，包括论及政治衰退的可能性。在他的概念里，一个社会可能在政治方面是"现代化"的，同时又处在动员人力物力资源和能力的低级发展阶段，或者处于相反的状态。此外，衰退可能从一个方面扩散到另一个方面，或者在两方面同时衰退。尽管亨廷顿的政治现代化或政治衰退的标准，不象苏联的标准那样经常表现出命定性，但他的理论在某一方面却与马克思的思想相类似。那就是他的理论允许在一个单一的社会里可能有不同的现代化阶段，但不是在子系统变化的关系中，而是在全部领域中。)[1]

人们进行各种尝试，去确定"政治参与"的普遍的定量指标，诸

---

[1] 亨廷顿，同前引书，第32—39页。

如选民登记、党员人数、选民的选举态度以及选举结果。在这方面缺陷特别明显，这样做常常没有什么意义，因为从这一前提出发，在非共产党国家可以从这些指数中得出结论，而在共产党国家中，这一前提就不适用。

这些不仅是语义学或方法论的问题。共产党领导下的制度产生它自己的组织、体制、集团和社会关系，无法在其他国家中找到确切的对应物，因此是不可比的。人们使用的语言经常是相同的，但它们包含的意义极不相同，并且社会主义的独特性经常反映在共产党设计的统计分类中，这种分类对它们是有意义的，但对其他现代化理论家却不是必需的。所以，对于共产制度来说，扩大公有制的成分，消灭或缩减私有财产，消灭、减少或增强某些社会阶级和集团，限制加入宗教和建立宗教机构，扩大集体化等等，都是现代化的重要标志，甚至比经济和技术的指标更为重要。尽管上述标志都是可以衡量可以定量的，但是在非苏联现代化理论中，又有什么是它们的对应物呢？又有哪个非苏联的现代化理论，会把这类过程奉为现代化的标志呢？

决定论的现代化理论和唯意志论的现代化理论

现代化和发展的理论分成两个主要的类型：决定论的和唯意志论的。现在西方绝大多数理论属于第一种类型，而苏联的或共产主义的理论则属于第二种类型。一种理论越自诩为科学、严密和精确，它的外表便越是决定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强调发展的决定论性质，直到资本主义社会，包括资本主义社会在内。但是，自从无产阶级觉悟和无产阶级革命开始发展，决定论的发展便让位于唯意志论的活动。标准的唯意志论代替了分析的决定论：资本主义是自己发展和进化，而社会主义则是被人们建立起来的。苏

联的现代化和发展的理论，作为一种唯意志论的理论，强调人类意识在建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中的决定性作用。而在资本主义和前资本主义社会里，非人力的历史力量继续起着决定作用。甚至，在非社会主义社会里革命觉悟的发展，也被认为是历史决定力量作用的结果。而随着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到来，人类的意识开始与其物质基础分离，并且被认为是发展的自主的和决定性的作用。

唯意志论的发展理论历史悠久，受人尊崇。它们都强调人类意志和行动的作用，但是它们也许在主旨、目的及人类现代化动因的特性上观点不同。过去的某些理论把发展的创造性作用和进步归于伟人和具有非凡天才和能力的个人。伟人和天才的观点成为未来发展的目标，他们的意志与活力促进了发展的进程。另一些理论强调人类集合成一个推动力，无论是一个社会阶级（如马克思主义所主张的），一个民族，还是宗教或种族集团，形成自封的或充分发挥才能的有创造力的少数。这少数人提出未来的远景，并以其意志与能力去完成它。

唯意志论的现代化理论，首先把人作为发展过程中的主要动力，这种理论需要一个现代化的代理人。也就是说，需要有能力对现存社会实体进行理性选择的人，需要有意志和能力使社会向着他们所向往的方向发展的人。由于现代化的代理人的能力增强，觉悟提高，因此促进了现代化的过程。有些现代化代理人可能以各种天赋的标准，去增强其能力，同时限制补充新的精英。而有些现代化代理人通过社会化，扩大其队伍，从人民大众中补充精英，主要根据人的功绩、献身精神、行为、成就来选择精英，尽管天赋的标准也可能在一定程度上保留着。共产党解决现代化的方法属于后一类型。虽然，共产党自封为现代化的代理人，它的最终目的是使全体人民现代化，并设想所有的人都同样能够现代化。其平等主义的设想既表现在无阶级社会的目标上，也表现在消灭一切体

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差别上。

现代化来源于“现代”一词，意思是具有新的性质，或者更直接地说，这是具有当前性。因此，它本来没有规范的和价值观的内容。然而，如早先所注意到的，现代化看来已经具有标准的意义，它强烈地主张，取得这种现代性，既是人们所需要的，也许也是必然的。因而，现代化就象一把发展的利刃，在连续不断的时间的任何一个点上，它总是向着最近或当前挺进。马克思主义的发展理论明确地考虑到，所谓相对意义的现代化和绝对意义的现代化。竖向地从一个历史阶段到另一个历史阶段的运动，就是相对意义的现代化。而现代化的最高终极目标，就是共产主义，它不是现在可实现的，而是在未来才能实现的。社会从奴隶社会走向封建社会，从封建社会走向资本主义，或从资本主义走向社会主义，是相对意义上的现代化全过程。这种运动是不可抗拒的，但其步骤和速度还是可以有所不同的，这主要是因为发展的不平衡，以及在历史上任何一个时间上，各种发展阶段的社会总是同时共存的。因此，对马克思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来说，现代化即指朝着特定方向的发展，即朝着预先规定、确实预先决定的社会状态发展。因此，马克思主义者在接受卡尔·多伊御的“社会动员”的公式时，几乎没什么困难。多伊御认为“大量旧的社会的、经济的和心理的行为都被瓦解和破坏了，人们变得能接受新型的社会化和行为方法”，[1]这一过程是现代化的必要先决条件。但是，共产主义者又在一系列特殊问题上与多伊御有分歧。首先，“社会动员”的过程既不是被动的，也不是自发的，而需要一个积极的“动员者”。其次，人们并不只是变得能接受任何一种新型的社会化和行为方式，而只是接

---

[1] 卡尔·多伊御：《社会动员和政治发展》，载《美国政治学评论》，1961年9月号，第494页。

受一种特定类型的行为方式和社会化，这种类型是由动员者即现代化的代理人所规定、计划、引导和促进的。在共产党国家中，现代化动员者即共产党或马列主义政党。

从最广泛抽象的意义上看，现代化是在人类发展中造成新的机会和选择，包括心理的、思想的、政治的、社会的、文化的、经济的、甚至情感的选择。它只是追求新的东西，有时只是迷恋行为方式、信仰、社会的经济的政治的组织方式和关系中的最新变化。共产主义者反对以下观念，即现代化意味着无限制选择新的机会和自由，追求任何新的观点、前景或空想，采纳任何新型的行为和关系。相反，他们设想，新事物本身并不是合乎其需要的。由于人的创造性，新的机会和选择层出不穷，这种选择可能会允许不公平、专制、压迫的新形式，以及其他反社会的不合乎需要的行为方式。所以，共产主义者同意现代化可造成新的机会、选择、观点和前景，不过必须仔细筛选它们，并把这些选择分类，合乎需要的就要实行，不合乎需要的就禁止实行，有些可用可不用的，要视情况而定。

在这点上，作些说明也许是有益的。当最发达的社会持续不断地现代化时（美国、瑞典和其它西方国家），它们发展了新的行为规范、制度模式、结构和关系，也就是说发现了现代化的新的标志。如果人们同意存在衰退的可能性，下降也是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阶段，那么这些以指数表示的变化中的模式，实际上可能是衰落的标志，而不是超现代化。这也许特别是指以下情况，有些标准和行为方式以前被认为是不正常的、病态的、机能失调的，因此遭到禁止和限制。而现在这些东西在发达社会中盛行起来，并被看作人们自愿选择的，而不是反常行为；是人们自由选择的，而不是病态的模式；是具有多种功能的，而不是功能失调的；因而也就不再被禁止或限制。因此，许多最现代化的社会表现出越来越高的犯罪率

和犯罪面、政治暴力行为、非法出生、堕胎、同性恋、色情文学和吸毒。所有这些从前都被认为是社会病症，也就是社会反常状态。这些标志相反可能会无意地化为表示超现代化的指数，并且成为还未现代化的社会追随的目标。这一点也有助于强调价值观和统计指标之间的联系，也就是说，现代化的理论和范例都有预定的处理过的价值标准，并且再一次暴露出在许多现代化的定义中的基本的封闭性，即现代化是所谓现代社会性质的理念化。

因此，共产主义的现代化观点，赋予现代化以伦理道德的内容。而在非共产主义的现代化理论中，这一内容根本没有或十分模糊。共产主义现代化观点确实坚决主张，一切现代化理论都必定有其内在的道德伦理内容。为什么目的而现代化，为什么人而现代化，对共产党人来说是重要的问题。他们不同意这种观点，即现代化的内含可能是无目的的，或者是超意识形态、超价值的。

当然，这一观点既不同于所谓自由民主多元化的现代化理论，也不同于纳粹法西斯主义的现代化理论，虽然它与二者都有一些重要的共同特点。自由民主多元化的现代化理论尽管各有特点，但它们往往把现代化规定为一个过程，可以最大限度地寻求新的机会和选择，发展各种思想、观点、预见和空想，仿佛是由历史的市场来决定选择，而不愿给历史指出一条必经之路。它们对于众多的选择给以最小的限制，对于发展只给以最低的约束。只有个别机会和选择可能被禁止，因为那是倒退的和造成机能失调的（也就是说，它决定人们集合成较低的或较高的种族和集团）。但是，一般说来，一切不被禁止的东西都准许发展。新的机会和选择被视为自发的发展，它们具有多形性和多向性。竞争性的机会和选择表现在互相冲突的价值观、生活方式、规范、行为方式之中，甚至表现在怎样重建社会的同时并存的可供选择的观点之中。文化和道德都变成相对的，并造成平行而又竞争的各种过程和社会化的制

度。目的已四分五散，社会意志已支离破碎，由于强制的中心体已经消失，个人的约束发展成如赫伯特·马库斯所谓的"抑制性忍受"的结果，这种忍受是消极的、抑制性的，并且是反社会的选择和自由。

另一方面，苏联的和共产主义的现代化观点，意味着有意识地动员人力和物力资源，尽量利用机会，实行所许可的选择，尽快消除被禁止的旧选择，并阻止那些自发产生而不合乎需要的新的选择。这样，就禁止自由选择活动的各种模式，而只强制实行政治的社会的经济的行为的某些形式和过程。

我在这里要偏离主题，简要地提一下纳粹主义或法西斯主义的现代化制度。毫无疑问，正如杰弗里·巴拉克勒夫和其他人所指出的，希特勒所建造的大厦显示出许多被定为现代化的特性。①他摧毁了容克地主阶级的权力，开创了能够接纳新精英成员的社会结构，发动了一场社会革命。他大大促进了社会流动性，通过公民投票、群众性的政治和社会组织，扩大了群众参与。他迎合青年和妇女，通过规划大规模的公共工程，消灭了失业。他亲自关心劳动问题、八小时工作制、劳动条件、文化、教育、艺术，以及最重要的，关心提高经济生产率。用巴拉克勒夫赞许地引用的一位作者的话说，希特勒拖着德国"连踢带叫地进入普通人的世纪"。在1939年，甚至弗兰兹·勃克瑙都感动地承认：在纳粹统治下，"一部分上层阶级直接被消灭了…… 不可能有比这更彻底的革命了。"②的确，纳粹主义是沙文主义者，而不是世界主义者；他们认为人类是不平等的，而不是平等的；他们以战争和暴力而骄傲，而不是谴责

① 杰弗里·巴拉克勒夫：《罪责和纳粹》，载《纽约书评》1972年10月19日。《自由主义者和德国历史》(同上刊)1972年11月2日。《关于德国历史的新观点》(同上刊)1972年11月16日。

② 沃尔特·拉奎尔：《重写历史》，载《评论》1973年3月号。

它们。自然，这一切以戏剧性的形式，提出了现代化的论理道德内容的问题，或者说，现代化能否在非道德的关系中确立。自然，共产党人对于把纳粹主义作为一种现代化制度，几乎不感到困难，因为他们承认，纳粹主义在经济和生产领域中的现代化，但是否认其在政治和社会领域中的现代化。

从经济现代化到政治发展

纳粹德国和战前日本的现代化的经验，与当代发展中国家的经验一样，有力地说明，政治的发展和社会经济的发展能够在不同的轨道上前进。社会经济发展可能朝着经济的甚至社会的现代化前进，而政治发展可能背道而驰，或者发生偏离。亨廷顿认为，"把政治现代化规定为从传统政治向现代政治的运动，以及把政治现代化规定为社会、经济和文化现代化的政治方面和政治结果"，二者是不同的。他的这一区分十分重要。他写道："第一种定义确定了理论上的政治变化的方向，而第二种定义描绘了已在实现现代化的国家中实际发生的政治变化"，"二者之间的差距往往是很大的"。① 他更进一步注意到，"在实行中，现代化总是包含着变化，经常也包含传统政治制度的瓦解。"但是，不象大多数现代化作者所确定的那样，"现代化并不必然包括走向现代政治制度的重要运动"。我应当补充一点，在战前德国的事例中，希特勒破坏了魏玛共和国的现代政治体制，以便释放新的变革力量，开辟新的道路，允许另外一种自由选择的机会，等等，以加速德国在另一套意识形态和价值参数范围内的现代化。因而，亨廷顿的论点可以扩展成，现代政治制度可能象许多传统制度和社会一样，成为进一步现代

① 亨廷顿，同前引书，第35页。

化的障碍。

当我们考察东欧现代化的过程时，这个论点更为适用。战前的东欧各社会决非都是传统的或类似传统的社会。固然，有些国家如波兰、匈牙利、罗马尼亚和南斯拉夫，仍然保存着发展逾千年的社会结构的强大残余，我们可称之为半封建性社会，这主要是指其大部分农村而言的。以匈牙利为例，那里封建贵族依然统治着农村地区。在1935年，至少有54.6%的农田集中在仅仅1.7%的农庄手里。而另一方面，72.5%的贫农，只有全部可耕地的10.1%。中小型农庄(25.8%)拥有余下的(35.3%)耕地。[①] 但是，战前的捷克斯洛伐克却并非如此。尽管它有许多缺陷，斯洛伐克和鲁塞尼亚发展缓慢，可在1937年，不管用什么标准衡量，捷克斯洛伐克的政体都是现代化的。然而，在共产党领导下，捷克斯洛伐克也象匈牙利的半封建的社会和政治秩序一样，不加区别地进行同样的社会破坏和重建，以便为发展和现代化的新模式和路线铺平道路。此外，在30年代中期，纳粹主义和法西斯主义尚未把这些国家投入长期的黑暗前，除了阿尔巴尼亚，也许还有保加利亚，所有东欧国家都已存在现代化的城市人口，其数量和影响日益增强，他们广泛地热情地参与到本国的政治生活中去。人民中的现代化的核心，主要是资产阶级、有产阶级和各种专业人员。他们后来都被摧垮，以便开创"旧"秩序所阻碍的前景。

因此，我们必须谨慎地重新研究现实，而且要分析那种众所周知的强词夺理的论调，似乎苏联势力进入东欧，就象海格力斯一样，完成了一项必要的吃力不讨好的任务，清扫了千年积累的社会废墟。虽然苏联势力能够被确切地形容为象海格力斯一样强大，

---

① 见贝拉·A·巴拉萨：《匈牙利计划经济的经验》，康涅狄格州，纽黑文，耶鲁大学出版社，1959年，第245页。

但是它的清扫活动却搞错了地方。因为它不仅扫除了社会污垢，而且把宝贵的社会和人类资源也不加区别地扔掉了。结果是苏联的社会、经济、文化和政治的制度、结构、规范、价值观、变化过程和社会心理态度，成为东欧各国未来的发展和现代化的模式，这是不足为奇的。

陈如风　译

工业社会的趋同问题*

——对理论状况的评论

伊恩·温伯格

引　　言

各工业社会是否正在变得越来越相似？自从社会科学形成以来，上述重要问题尽管有时令人遗憾地被当作一个假设，但总的来说，它已成为引起人们兴趣的主要理论问题。对于进步持乐观态度的哲学家，都赞成趋同论，因为他们相信全“人类”可臻完美，而不是只有社会中的特定群体才可达到这点。① 主张人而非人群是基本的研究单位及进行思考的前提，这是一种激进的反对人的相对性的观点。因为如果一切人都以同样的方式行事，那么社会组织的形式必然具有相同的基本分析特性，并朝着相同的结构组成发展。从道德上说，善是无处不在的。塞缪尔·约翰逊评论道：“暹罗国王向路易十四派遣了使臣，而路易十四却没有向暹罗国王派遣使臣。”可是，在《拉塞拉斯》中，约翰逊把他关于外交使命的文学虚构扩大到阿比西尼亚，大概这是为了从他的思想中清除种族优越

---

* 本文选自西里尔·E·布莱克主编的《比较现代化》，自由出版社，1976年版。

① 约翰·B·伯里：《进步的理性概念》（纽约，多弗，1955年）；卡尔·贝克尔：《18世纪哲学家的天堂》（纽黑文，耶鲁大学出版社，1935年）；金斯利·马丁：《18世纪的法国自由思想》（纽约，哈珀和罗，1963年）。

感的成分。崇拜高尚的野蛮人，不仅是18世纪浪漫主义的一个方面，而且表明了，欧洲人、甚至法国人都可以从其未开化的同时代者的简朴生活中学习某些东西。象哲学家一样，许多人认为，以仁慈的专制君主形式出现的国家，保证了社会的不断改进，他们往往把知识分子的中层群体，看作君主在这个伟大事业中的盟友或顾问。各种社会的政治结构都趋于一致，即都具有强大的国家和知识精英以及成熟的舆论（这个词起源于18世纪革命前的法国），似乎并非是不可能的。在法国大革命时期，当米拉波没能把这一远见付诸实践时，趋同观点便遭到了失败。于是，革命前的乐观主义变成了孔德和德梅斯特的悲观主义。[①] 孔德还试图保留其前辈的某些乐观主义，而德梅斯特似乎至少后退到了菲尔默的观点：否定成文宪法的有效性，赞颂政权神授的合法意义。[②]

实际上，哲学家并不象他们所显示的那么激进，他们受到重农主义和重商主义观点的强烈影响。他们为仁慈的专制君主所作的辩护，导致了两种倾向的流行。这两种倾向对于后来研究现代化和工业社会趋同问题的理论家，具有持久的影响（在工业社会中，趋同是现代化理论的一个组成部分）。第一种倾向是，这些理论家宣扬一种流行的浪漫主义思想。他们把权力分散的稳定性和中世纪哥特人的野蛮说得神乎其神，并利用这种神话反对能动地看待渐进的社会变化和仁慈的君主专制的有效的权力集中。第二种倾向是，他们背离了培根、霍布斯和洛克所建立的经验主义传统。培根等人断言，政治制度都具有民主基础。而这些思想家则认为，国家和社会成员是相互分离的因素，当它们均衡地结合在一起时，

① 利昂·布拉姆森：《社会学的政治背景》（新泽西州，普林斯顿：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61年）。

② 见约瑟夫·德梅斯特的《论上帝和社会》（伊利诺州，芝加哥：亨利·雷尼尔，1959年）。这本著作写于1808—1809年。

就形成了一种君主政治制度。按照这一观点，每一因素所起的作用在理论上可以用数字公式来表示，每一因素的强度可以加以衡量，稳定性和有效性可以用科学术语进行解释，并转换成政治制度的一种理想模式。君主承受的天意没有得到重视，因为上帝的影响被看成是无法衡量的，而且不可能预示后来的语言哲学的地位。

哲学家是按照体系来思考的。他们把牛顿的力学引入社会研究，作出了贡献。他们将自然科学的理论类推到社会，加强了他们的观点：国家是系统地组织起来的社会。然而，尽管他们对实际事物怀有兴趣，本质上却不是经验主义的。

19 世纪，在复兴的亚里斯多德主义和达尔文的影响下，进化理论得到了发展，它使马克思、斯宾塞和其他学者相信，尽管工业社会的起源不同，它们却具有共同的目标。至于世界的其余部分，由于西方和世界历史之间被认为存在着一种不可分割的联系，所以也可以期待会出现相似的发展。① 马克思认为，所有的生产过程和社会组织最终都将建立在科学原理的基础之上。② 因此，这些原理的相似性，暗示了社会在结构和功能方面的趋同。马克思、利斯特、赫尔德布兰德和布克创立了经济发展的阶段理论，这些理论具有共同的方法论的假设，即各个社会都以分阶段前进的共同方式向工业化发展。③ 工业主义的成功增强了有关进步的观念，确实如费伊所说，它已被人们作为公理加以接受。④ 文化相对论并没有过

① 格哈特·马苏：《西方文明的特点：西方历史学家的观点》，载《美国历史评论》1962 年 4 月第 61 卷第 3 期，第 608 页。

② 伯特·F·霍塞利茨：《卡尔·马克思论经济和社会长期发展》，载《社会和历史的比较研究》1964 年第 6 期，第 162 页。

③ 亨利·威廉·施皮格尔：《经济发展的理论：历史和分类》，载《思想史杂志》1955 年 10 月第 16 卷第 4 期，第 520 页。

④ 西德尼·B·费伊：《进步的观念》，载《美国历史评论》，1947 年 1 月第 52 卷第 2 期，第 232 页。

时。通过强调新教伦理来解释资本主义在西方的出现，毕竟是韦伯对社会学理论的独特贡献。在其他宗教中还没有新教伦理的对应物。但是对于工业社会趋同现象的解释几乎没有触及文化差异。这也许是因为工业化仍然局限于欧洲和北美。与这些地区跟世界其他地区的民族的文化差异相比，这些地区的民族间的文化差异是微不足道的。此外，经济学家从他们的哲学前辈那儿借用了人的概念，结果接受了有关人类行为的普遍假设，而丝毫没有考虑这些假设可能受文化限制的问题。从某种观点来看，它们是非常正确的。因为在构成理论模式方面，由于经济理论不受文化相对性的干扰，从而能够大大超越其他社会科学。然而重要的是，无论经济科学在诸如价格理论这样的领域里取得什么进步，它对于文化以及历史学、社会学和人类学等学科的忽视表明，它决不可能产生经济发展和工业化的理论。自然，已经提出的这些理论，往往在某种程度上能够对西方的发展作出解释，因为西方发展过程中的历史学因素和社会学因素正是建立这些理论模式的前提。只有在这些理论被应用到西方以外的国家时，它们的前提才变得极其明显。①

以上这种知识社会学的有限的和必然是肤浅的解释证明，趋同理论和现代化理论来源于两个多世纪的社会和政治理论。我们的目的是要表明，在现代化理论中仍然存在着趋同的成分，但我们对其中某些因素仍不太了解。结果，这使趋同理论变得模糊不清，并把外来的和历史上是错误的或有限的思想，引入了现代化的研

① 波斯坦在批评当前经济发展的"高土"模式时指出，"人们所提出的支持绝对强调工业的大部分理由都是经济方面的，而大部分经济方面的理由又都是历史的。"M·M·波斯坦："从欧洲农业历史看不发达国家的农业问题"，载《第二届经济史国际会议》第2集(艾克斯，1962年，第11页)。

究。趋同理论理应受到更多的重视，我们将尽力挽救这一理论。

趋同：一种理论的状况

专门论述趋同的可能性的经验理论著作数量甚微。它们主要论及以下内容：工业社会需要的职业结构的出现，著名的人口过渡理论，从扩大家庭向核心家庭的变化，志愿和正规的两种劳动力组织的共同方式，每人实际收入的增加和消费市场的出现，高收入和教育与政治民主的相互关系。① 在许多对工业主义和社会变迁的讨论中，都有衡量趋同的内在标准，这些标准不一定与现代化的技术理论相联系。人们往往假设，不断加剧的分化，个人主义，动员被传统束缚的力量促进市场，科层制和其他制度的发展，国家权力的不断增长，对于普遍承认的技术原则的依赖，以及相似的综合机制的发展，这些形成了正在实现工业化的社会的共同方向。在这一过程中，社会要经历本质的变化。② 我们经常在有限的、非宏观

---

① 亚历克斯·英克尔斯和彼得·罗西：《全国性的职业声望比较》，载《美国社会学杂志》1956 年 1 月第 61卷，第 329—339 页；西摩·马丁·利普塞特和莱因哈特·本迪克斯：《工业社会的社会流动》（伯克利和洛杉矶：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1959）；金斯利·戴维斯："人口过渡"，载于艾米泰和伊娃·埃齐奥尼编辑的《社会变迁》（纽约：基础书出版社，1964 年第 187—194 页）；M·K·涅姆科夫：《联合家庭是工业化的障碍吗？》，载《世界比较社会学杂志》1960 年第 1 卷，第 109—118 页；威尔伯特·E·穆尔和阿诺德·费尔德曼：《发展中地区的劳动义务和社会变迁》（纽约：社会科学研究委员会，1960 年）；小马里恩·J·利维，《现代化和〈高现代化〉的几个结构问题：中国和日本》，载于 E·F·萨齐帕尼克编辑的《远东经济和社会问题讨论会记录汇编》（香港，香港大学出版社，1962 年第 10 页）；西摩·马丁·利普塞特：《经济发展和民主》，载《政治家》（纽约，加登城：道布尔戴·安科，1959 年第二章，第 27—63 页）。

② 见S·N·艾森施塔特：《现代化、增长和多样性》，载《印度季刊》1964 年 1—3月，第 20 卷第 17—42 页；如果想了解其中某些标准的反面论证，可见他的《现代化的失败》，载《经济发展和文化变化》1964 年 7 月第 12 卷第 4 期，第 345—367 页；西里尔·E·布莱克：《现代化的动力》（纽约：哈珀和罗，1966年）；（接下页）

的社会学比较研究中，看到许多实际的证据。[①] 的确，对比较研究感兴趣的学者，虽然可能承认趋同有其内在标准，但似乎经常忽视大量的趋同现象，而执意强调少数趋异现象。对于苏联的研究也许是个例外。在该研究中，他们似乎只满足于指出苏联和美国间的趋同现象。[②]

也许由于缺乏在理论上证明趋同可能性的经验研究，尤其是在先进的工业社会中，它使一些学者对趋同持怀疑的看法。[③] 因为最近出现了一个批评的浪潮，它否定甚至最有限形式的趋同。继英克尔斯和鲍尔之后，费尔德曼强调了美国和苏联之间的有限的趋同现象。[④] 霍奇，西格尔和罗西发现，从 1925 年至 1963 年，尽管美国工业化的方向和劳动力的结构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但是美国的职业威望的等级顺序仍保持不变。霍奇、特雷曼和罗西还论证了工业社会和非工业社会在职业威望等级顺序方面的 相 似 性。[⑤]

（接上页）尼尔·J·斯梅尔塞：《变化的机制和对于变化的适应》，载于伯特·F霍塞利茨和威尔伯特·E·穆尔编辑的《工业化和社会》（海牙：穆顿，1966 年第二章第 32—54页）；卡尔·W·多伊奇：《社会动员和政治发展》，载《美国政治学评论》1961 年 9 月第 55 卷第 3 期第 493—515 页。

① 有关支持有限比较研究的论据可见 R·本迪克斯：《比较社会学研究中的概念和通则》，载《美国社会学评论》1963 年第 28 卷，第 533 页，他警告说，"许多概念不是真正的通则。"

② 皮蒂利姆·A·索罗金：《美国和苏联的相互趋同：混合型社会文化》，载《国际比较社会学杂志》1960 年第 1 卷，第 143—176 页；欧文·罗易斯·霍曼威茨：《工业发展的社会学概念和意识形态的概念》，载《美国经济学和社会学杂志》1964 年 10 月第 23 卷第 4 期，第 363 页；马歇尔·E·迪莫克：《苏联的管理——与美国的比较研究》，载《公共行政评论》1960 年夏第 20 卷第 3 期，第 139—147页。

③ 如果想利用现有的资料，尤其是有关先进工业社会的趋同，可见伊恩·温伯格：《现代化，精英和阶级》，载于伊恩·温伯格编辑的《英国社会》（纽约：艾瑟顿出版社）。

④ 阿诺尔德·S·费尔德曼：《工业社会的性质》，载《世界政治》1960 年 7 月第 12 卷，第 618 页。

⑤ 罗伯特·W·霍奇，保罗·M·西格尔和彼得·H·罗西：《1925—（接下页）

因为在工业社会里发现了家庭制度的多样性，也因为在某些社会里核心家庭制度的存在可能先于工业化，①工业主义和核心家庭制度间的联系受到了怀疑。布鲁默考虑到早期工业化对劳动力的影响，有意识地驳斥了工业化和社会瓦解之间存在一定关系的观点。他说，工业化的过程对社会的作用是"完全中性的"。②戈德索普否定阶层化模式的趋同是工业社会发展过程中固有的现象，他特别提到了美国和苏联。③德·施韦尼茨对工业化和民主间的联系提出了疑问。④克罗泽在对先进工业社会的管理组织进行研究时，强调了几个主要科层模式的文化起源。尽管海尔等人发现了这些模式的一致性，但是文化对于界定管理角色的影响，仍给他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⑤克拉克·凯尔及其同事，在回顾他们大学对于工业主义的深入研究的计划时发现，工业化产生的一致性是，对意识形态的热情衰退，对中央政府和教育发展的重视增长，除此之外，在工业化的过程或目标方面几乎不存在一致性。各工业社会趋同于混乱状态，人们把它称作"多元工业主义"，但是这并不是一种各

（接上页）1963年美国的职业威望》，载《美国社会学杂志》1964年11月第70卷第3期，第286—303页；罗伯特·W·霍奇，唐纳德·J·特雷曼和彼得·T·罗西：《职业威望的比较研究》，载于莱因哈德·本迪克斯和西摩·马丁·利普塞特编辑的《阶级、地位和权力》（纽约：自由出版社，1966年第309—321页）。

① 威廉·J·戈德：《工业化和家庭变迁》，载于伯特·F·霍斯利茨和威尔伯特·E·穆尔编辑的《工业化和社会》（海牙：莫顿，1966年第12章第237—259页）；彼得·拉斯莱特：《人口历史和社会结构》，载《国际社会科学杂志》1965年第17卷第4期，第582—594页；《我们失去的世界》（伦敦：梅休因，1965年）。

② 赫伯特·布鲁默：《早期工业化和劳动阶级》，载《社会学季刊》1960年1月第1卷第1期，第5—14页。

③ 约翰·H·戈德索普：《工业社会的社会分层》，载于保罗·哈尔莫斯编辑的《工业社会的发展》（基尔：1964年10月第97—123页）。

④ 小卡尔·德·施韦尼茨：《工业化和民主》（纽约：自由出版社，1964年。）

⑤ 米歇尔·克罗泽：《科层现象》（芝加哥：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64年）；梅森·海尔，埃德温·E·吉塞利和莱曼·W·波特：《经理角色的文化模式》，载《工业关系》1963年2月第2卷第2期，第95—117页。

元均衡的状态，从逻辑上说，多元使趋同的可能性得以存在，但是它又回避了这种可能性。他们设置了方法论的假定，即工业化过程由不同方面的精英操纵，本应证明前工业社会具有趋同性，但是，结果却自然地导致了趋异性。①

费尔德曼和穆尔似乎认为，趋同可能只局限于工业制度的"核心"成分，因此所有的工业社会最低限度都有以下这些成分。

"这个核心包括工厂生产制度，建立在复杂的、广泛的劳动分工及技术等级制度基础上的分层制度，广泛的物资和服务的商品化，以及它们通过市场的转换，能够满足职业和分层制度中各级要求的教育制度。"②

但是两个作者都强调了趋异的成分。穆尔在别处简练地说，"我们还不是兄弟。"③他对社会变迁的快速和预言结构相似性的困难，比其他任何一个当代工业化理论家都更加敏感。④

心理学家和社会心理学家似乎是唯一对趋同充满信心的理论家。英克尔斯在他的探索性研究中，把工厂制度和职业结构作为已知变项，从刺激—反应的模式出发，发现尽管存在着文化差别，但是不同国家的人都以相似的方式对工业主义作出反应。⑤戴维•

---

① 在他们的类型学中，精英是指中产阶级，王朝精英，革命知识分子，殖民地的管理者和民族主义领袖。克拉克•凯尔，约翰•T•邓洛普，弗雷德里克•哈比森和查尔斯•A•迈尔斯：《工业主义和工业人》(纽约：牛津大学出版社，1964年)。

② 阿诺德•S•费尔德曼和威尔伯特•E•穆尔：《工业化和工业主义，趋同和变异》，载《第五次社会学国际会议会报》(华盛顿特区，1962年，第146页)。

③ 威尔伯特•E•穆尔：《共同文化的产生》，载《汇合》1955年7月第4卷，第238页。

④ 见他的《社会变迁》(恩格尔伍德•克利夫斯，N. J.：普伦蒂斯•霍尔，1963年)。

⑤ 亚历克斯•英克尔斯：《工业人：地位与经验、感性认识和价值观念的关系》，载《美国社会学杂志》1960年7月第66卷第1期，第1—31页；又见他的《人的现代化》一文，载于迈伦•韦纳编辑的《现代化》(纽约：基础书出版社，(接下页)

麦克莱兰的追随者证明，成就趋向是经济增长的一个结果，高度的成就需要是经济增长的前提。①

在社会学家中，利维可能是唯一准备承认趋同可能性的理论家。他说，随着现代化程度的增加，"相对现代化的社会之间的结构一致性程度亦增加，而不论这些社会的原来基础是如何多种多样"。② 他列出了一张表示美国、苏联、英国、法国四个工业社会趋同的图表，并表明它们逐渐地"向着几乎不可能达到的高度现代化"趋同。③ 承认自己的观点得益于利维的西奥多森认为，在瓦解和重新整合方面存在着相似性，在非西方社会的经济发展中存在着对于西方的模仿。④ 利维的证据十分有力，因为他完全承认历史发展中存在着差异性或相似性。但是他说的是，无论差异性还是相似性，对于社会沿着发展道路继续前进都无关宏旨。应当把着眼点放在未来而不是过去。此外，还需要考虑的是发展中社会和发达社会的未来，而不是这些社会的早期的特定环境。因此，利维

(接上页)1966 年第 10 章，第 138—150 页)；和W·A·韦斯科普夫撰写的《工业制度和个性结构》，载《社会问题杂志》1951 年第 7 卷第 4 期，第 1—6 页，如果想《用心理学分析》韦伯和发现 16 世纪后期英国清教主义的现代化的精神根源，见兹维戴·巴布的《英国人性格的起源》，载《历史心理学问题》(纽约：格罗夫出版社，1960年第 145—218 页)。

① 见戴维·C·麦克莱兰：《取得成就的社会》(普林斯顿，N.J.：范诺斯特兰德，1961 年)；罗伯特·A·莱文：《梦想和行动》(芝加哥：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66 年)；伯纳德·罗森：《巴西的成就特征和经济增长》，载《社会力量》1964 年 3 月第 42卷第 3 期，第 341—351 页；诺曼·N·布雷德伯恩和戴维·E·伯卢："对于成就的需要和英国工业的增长"，载《经济发展和文化变迁》1961 年 10 月第1期，第 8—21 页。

② 小马里恩·J·利维：《现代化和社会结构》(普林斯顿，N.J.：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66 年第 2 卷，第 709 页)。

③ 同上，第 710 页。

④ 乔治·A·西奥多森：《对于工业化的接受及其对于非西方社会的社会模式所产生的结果》，《美国社会学评论》1953 年 10 月第 8 卷第 5 期，第 477—484 页。

通过承认历史，完成了至关重要的忽视历史的行动。他与格申克龙这类理论家的观点完全相反，格申克龙强调他所谓的D（一个国家在经济增长开始时的落后程度）是自变项。D形成了工业化的过程，依变量是工业和社会组织中的异质性。①

并且，利维还极大地影响了有关政治发展和政治制度趋同可能性的研究。阿普特明确地说，对于正在实现工业化的社会来说，经济变项是自变量，政治制度是依变量。②因此，"工业化将产生或多或少是不可避免的结果"。其中四项关键的结果是：对于信息的需要，科学精英的增长，多元群体的形成和科学精英对于其它现代化群体的领导。③正在实现工业化的社会具有作为民主价值观念"载体"的重要群体，因此对于民主制度来说，趋同的前景不能说是确定无疑的，但决不是不可能的。④这显然是复兴了圣西门学派和列宁主义关于智者治人的格言，对群众的迟钝或落后感到失望的分析家和活动家，总是最热衷于这一格言。⑤

---

① 见亚历山大·格申克龙：《工业发展的类型学——分析的工具》，载《第二次经济史国际会议》（艾克斯，1962年，第487—505页）。格申克龙没有否定西欧工业化进程的相似性，但是否认这一模式对东欧的有效性，并含蓄地否认它对D程度明显较高的当代不发达地区的有效性。见他的《用历史观点看经济落后》，载于伯特·F·霍斯利茨编辑的《不发达地区的进步》（芝加哥：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51年，第3—29页）。

② 戴维·E·阿普特：《现代化的政治》（芝加哥：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65年，第460页）。

③ 同上，第447页。

④ 同上，第459页。

⑤ 圣西门想建立一个"牛顿委员会"，来管理被法国革命打乱了正常秩序的世界。见他的《一个日内瓦居民给他的同代人的信》（1803年），载于费利克斯·M·H·马卡姆翻译和编辑的《圣西门选集》（牛津：布莱克韦尔，1952年，第1—11页）。刘易斯·S·福伊尔论证了这些理论是受经济周期论影响的，见《什么是异化？——一个概念的来历》，载《新政治学》，1962年春第1卷，第116—134页。

趋同：现代化和进化-功能主义

趋同的概念往往不可分割地与现代化理论联系在一起，同时，现代化理论又借助于帕森斯、穆尔、斯梅尔塞、利维和艾森施塔特的进化-功能模式。① 现代化被解释成，为了增加人类成就而使用无生命的资源，从而对相互依赖的社会体系的结构安排产生了多重结果。② 社会从小规模、传统的、亲属联系的和相对一致的单位，朝着具有高度分化的组织和角色的大规模的工业社会发展。家庭式的传统活动，限制了活动体系的规模；市场式的工业活动，扩大了活动体系的规模。无生命资源的应用"迫使"（应用穆尔的术语）社会制度中互相依赖的成分适应工业主义。③ 但是，即使有意识地进行改变是工业社会的一个共同特征，即使各社会以不同方式解决其与工业主义有关或无关的各种问题，工业社会确是各社

---

① 威尔伯特·E·穆尔说，功能均衡模式"实际上是有关现代化结果的概括中的重要主体"。见《社会变迁和比较研究》一文，载《国际社会科学杂志》1963年第15卷第4期，第524页。又见塔尔科特·帕森斯：《社会——进化和比较的观点》（恩格尔伍德·克利夫斯，N.J.：普伦蒂斯—霍尔，1966年）。尼尔·J·斯梅尔塞：《社会关系的现代化》，载于迈伦·韦纳编辑的《现代化》（纽约：基础书出版社，1966年第8章，第110—121页）。小马里恩·J·利维，同上。S·N·艾森施塔特：《关于政治和经济发展中的社会学论文集》（海牙：穆顿，1961年）；《社会变化和分化》，载《美国社会学评论》1964年6月第29卷第3期，第375—386页。《现代化，抗议和变化》（恩格尔伍德·克利夫斯，N.J.：普伦蒂斯—霍尔，1966年）；并可参考他的其他一些著作。阿诺德·S·费尔德曼：《进化理论和社会变迁》，载于赫伯特·R·巴林杰，乔治·I·布兰克斯坦和雷蒙德·W·麦克：《发展中地区的社会变迁》，（波士顿：申克曼，1965年第11章，第273—284页）。

② 利维说，"一个社会现代化的程度，取决于其成员利用无生命的能源的程度，以及利用工具扩大增加其努力的效益的程度。"见上，第1卷，第11页。

③ 威尔伯特·E·穆尔：《工业的冲击》（恩格尔伍德·克利夫斯，N.J.：普伦蒂斯—霍尔，1965年，第12页）。

会共同的"归宿"，人们还总是否认一种共同的目标。对于这种研究方法的反对，变成了对于趋同本身的反对。对于趋同论的批评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

一、认为趋同论往往不加批判地接受进化理论，以此解决作为均衡分析的功能分析所长期面临的困境。这种解答的效用是颇成问题的，因为社会学研究往往不可分割地与跨部门的分析连结在一起，新进化论可能只是对长期存在的方法论问题的一种理论的和有限的解决方式。许多现代化理论所固有的概念，都重复了哲学家的非经验的和思想认识的错误。这些现代化理论涉及到：处于支配地位的科学精英整体，国家的不可避免的和日益扩大的作用，它对于经济增长过程的促进作用，以及截然划分理想的现代性与传统社会的僵化野蛮。这些错误在克拉克·凯尔及其同事所写的著作中表现最突出，他们在著作中发展了一种工业化精英的类型学。希尔斯充分了解各精英间的竞争，就连他似乎也在一些著作中过分突出了知识分子精英。[①] 塞利格曼强调说，为了达到发展的目的，对精英们必须进行"整合"(使其成为一个整体阶层?)。[②] 其基本假设是，发展具有能使精英从群众中分离出来的作用。精英是最杰出的现代化的人，他们希望建立一个国家，使他们的领导地位合法化，并把群众动员起来。精英们对于现代性的矛盾心理，经常被当作残余的反殖民主义而未予考虑。精英的权力与国家权力的扩大自然是相互交织在一起的。艾森施塔特在其著作中充分强调了这点。

有趣的是，对于工业化和现代化中的精英的强调，发生在先进

---

① 见爱德华·希尔斯：《新兴国家政治发展中的知识分子》，载《国际政治》1960年4月第12卷，第329—368页。

② 莱斯特·G·塞利格曼：《精英的补充和政治发展》，载《政治杂志》1964年第26卷，第612—626页。

社会的分析家正注意到他们在西方的存在的时候。①除了哲学思想的复活之外，还应当对强调精英问题作些重要说明。如果精英出现在所有的先进社会之中，那么他们的权力可能互相抵消，他们也可能把过多的时间花在讨价还价上，而不是放在决策上。高水平的教育意味着精英们不可能自封为专家，因此他们付出的大部分努力是为了使自己在受过教育的、心怀不满的外行前保持领先地位。专门化意味着任何精英——不论是政治型的还是专家型的——在本质上都是不完整的。科学精英可能过分依赖于政治上的要求，以便建立一种永久的权力基础。在发展中国家里，精英们受到国际政治和经济现实的限制，受到他们对其下属的有限控制的限制。②他们对于现代性的矛盾心理，可能仅仅是由于既欢迎变化又希望保存本社会文化而产生的合乎情理的认识矛盾。

二、认为在趋同论中，社会制度间的相互依赖被夸大了。然而只有费尔德曼和穆尔提到这一点。③就象工业化的定义基本上是技术性的一样，紧密的相互依赖性所产生的结果往往是功能-技术决定论式的。这种结果与马克思主义相似，即用功能-技术决定论来代替经济基础的原动力。有趣的是，历史学家西里尔·布莱克大大强调了技术的重要性。作为分析社会早期对于工业化的适应的一种手段，这种强调有其长处，但是就象与其相类似的马克思主义一样，它的预言也是蹩脚的。这一理论的前提限制了工业社会的多向性发展，虽然在结论中它赞成差异性。另一方面，穆尔

---

① 见苏珊·凯勒：《超越统治阶级：现代社会中的战略精英》（纽约：兰多姆·豪斯，1963年）；杰伊·M·古尔德：《技术精英》（纽约：奥古斯塔斯·M·凯利，1966年）；要了解不同的观点可看罗伯特·A·达尔：《对于统治精英模式的批判》，载《美国政治学评论》1958年6月第52卷第2期，第463—470页。

② 费利西亚·J·戴伊鲁普：《不发达国家的政府活动的局限性》，载《社会研究》1957年夏第24卷第2期，第197页。

③ 阿诺德·S·费尔德曼和威尔伯特·E·穆尔，同上，第166页。

和利维等理论家对现代化的扩散、尤其是技术扩散极为看重，尽管批评他们的人抱怨说，结构-功能主义并不赞同这点。但是，有一点很重要：技术的扩散就象政治模式的扩散一样，是经过文化过滤的。技术也并不例外。由于技术特别依赖于抽象的科学原理，因此它对于社会组织的影响是多种多样的。

三、人们认为，趋同论有关进化的假设，即社会制度中现代化的各个部分的"存活"以及社会制度朝着工业化和高度现代化"转变"，可能导致所谓的"全面改造"的错误观念。这一理论消极地认为，"传统"行为模式必然会消失，而趋同也肯定会发生。有时，一个理论家会过份认真地对待帕森斯的模式变项，并主张从普及到专一或从特殊到普遍的简单的线型进步。① 这类趋同似乎排斥了任何有意义的、与工业化无关的和局部的社会变迁的可能性。

承认"全面的"工业社会变迁的理论，往往使人们全面肯定波拉尼和罗斯托等学者，他们基本上是社会发展"阶段"论专家。② 例如，泽博特采用了罗斯托的模式，在对美国、苏联和不发达国家进行考察后，他得出结论说："完全有理由指望世界经济将趋同于某些共同的特征"。③ 按照对现代化所下的技术定义，没有一个社会能够跳越这个过程，因为所有的社会都对无生命的资源进行某种最低程度的利用。④ 而且，在长时期中，渐渐地将没有一个社会能够逃避"全面改造"。阶段论专家应用了由西方工业化推断出来

① 伯特·F·霍塞利茨：《经济增长的社会学面面观》（格伦科，伊利诺斯：自由出版社，1960 年），社会学理论经常被这种简易的二等分所吸引，尤其是滕尼斯的《公社和社会》，涂尔干的《机械的和有机的团结》。

② 卡尔波拉尼：《伟大的改造》（纽约：法尔和莱恩哈特，1944 年）；w·w·罗斯拉：《经济增长的阶段：非共产党宣言》（纽约：剑桥大学出版社，1960 年）。

③ 西里尔·A·泽博特：《竞争共存的经济学：通过增长而趋同》（纽约：弗雷德里克·A·普雷格，1964年，第 146 页）。

④ 利维说，"现代化是一个普遍过程，它涉及到我们所有的人"，同上，第 31 页。

的模式，把它综合成一套普遍原理，根据其定义，正在实现工业化的社会都趋同于西方模式。霍金已注意到这一事实，即这些理论是中世纪等级思想的复活，它们的古老未能阻止它们的再现。①人们只是缓慢地认识到，具有能动作用的西方工业化的某些方面，诸如都市化，并没有理所当然地在其他地方也促进发展。②

因此，功能上的紧密相互依赖，包含着走向"全面改造"的趋同，这就造成了"重现"的谬论。它意味着，正在实现现代化的社会，必定"重视"先进的现代化社会的成长过程。因为在一种相互依赖的社会制度中，现代化的强制力会对社会进行全面改造。该模式假设，先进的工业社会已经实现趋同，它们已经达到某种终点或平衡。这种错误的观点最初出现于19世纪的胚胎学。那时黑克尔认为，从生理上说，一个人在其个人成长过程中，将重复整个人类的一般发展过程。结构功能主义认为，功能上相互依赖的不同制度领域能够成功地进行整合，"重现"论接受了上述思想，同时还具有累积增长的前提。艾森施塔特比其他任何理论家更多地应用了"整合"和累积增长的概念，有时把它作为一种希望，有时似乎作为智穷力竭时的救星。

西方技术在发展中国家的扩散，常常被误认为那里必然出现西方的结构。把现代化主要看成是一个信息传布过程的勒纳坚持认为，制度不能简单地输入和适应新的环境，但它们具有改造作用。他说，"传统社会正在从地球上消失，因为人们不再希望按照

---

① 玛格丽特·T·霍金：《16、17世纪的早期人类学》（费城，宾夕法尼亚大学出版社，1964年）；该书认为，城市革命导致了埃及文明的僵化及在其顶点的停滞。克里斯托弗·霍克斯《欧洲文化和历史的史前根源》，载于杰奎特·霍克斯编辑的《过去的世界》（纽约：艾尔弗雷德·诺夫，1963年，第491页。

② 关于城市化在新兴国家的不利作用，见菲利普·M·豪泽：《对城市化的评论》，载于菲利普·M·豪泽和利奥·F·施诺编辑的《城市化研究》（纽约：约翰·威利，1965年第1章，第1—47页。

传统社会的规则生活。"[1]这句话的含义是，非西方社会的结构过于僵化，并对工业主义抱敌视态度，故必然会阻碍经济的增长。但是纳什把一家工厂作坎特尔实验的研究表明，工业化并不需要破坏传统的行为模式。[2]工业化无论是原生的还是衍生的，从逻辑上说，它都无须造成先前存在物的破坏。但它往往有助于这个破坏过程。人们经常忘记，第一个工业国英国，在19世纪时具有保守的结构，并被冯·兰克看作欧洲中世纪制度残余最多的国家。[3]

四、必然性的概念，哲学乌托邦理论，"全面改造"，紧密的功能相互依赖和"重视"论，往往使得现代化理论成为遗传的和目的论的理论。有时理论家精明地预料到这种批评，为了逃避目的论，他们否定趋同论以保全自己。利维是通过正确使用"结构要素"来逃避目的论的，因为如果仅仅由于这些要素是必需的，就承认它们的存在，那么目的论就是其结果。[4]但是，分析家往往持有控制论的发展观点，即经济或政治要素都是一种输入物，它能以恒定方式改变制度，而制度又在预先注定的道路上发展。于是，就象凯尔等人所做的那样，为了逃避趋同，他们就从在本质上是宿命论或纯机遇的学说中寻找掩护，既否定预言的可能性又否定预言的责任性。并且，这一点还不十分清楚，即趋同事实上并不是作为机遇变异的结果发展起来的，更不是作为纯机遇的结果发展起来的。目的论根

---

① 丹尼尔·勒纳：《制度的改造》，载于威廉·B·汉密尔顿编辑的《制度的改变》（达海姆，N.C.：杜克大学出版社，1964年第1章，第14页）。

② 曼宁·马什：《原始的农民经济制度》（旧金山：钱德勒，1966年，第110—119页）。虽然坎特尔的实验环境几乎与外界接近，但是连纳什都对自己的实验结果感到吃惊。

③ 乔治·P·古奇：《19世纪的历史和历史学家》（纽约：朗曼斯·格林，1928年，第93页）。

④ 见小马里恩·J·利维的《结构-功能主义分析》，载《社会科学国际大百科辞典》（纽约：麦克米伦，1968年）。

据预先选定的一些变项解释现象，借以阻止精确的历史分析。这是以少容多，无法做到的。

五、趋同论认为，在工业社会中，一定的心理和社会心理的条件，造成了个人在性格结构上的相似。现代的经济人似乎都具有这种心理，并具有同样的成就需要等观念。相反，我们所见到的是具有普遍特性的工业家或企业家。这种经济人的概念，与19世纪的经济人一样，不过是一种文化的反映。①这些分析往往忽视社会结构，或假设社会结构具有如此强烈的柔韧性，以至于输入一次成就需要就将引起惊人的连锁反应。因此，在发展中国家，企业家主义具有重大意义，但是正象巴雷特在对伊格博的研究中所指出的，企业家主义可能是结构的一个方面，而不是一种输入。②结构安排在理论上只是假设的，但其特殊性和相似性必须根据经验建立。企业家的理论一般是精英理论，并遇到了它们所固有的困难，对此我们已在前面论及。

趋同的可能性

至此我们已论证了以下几点：1.现在专门证实趋同的经验研究为数甚少；2.趋同的概念已与进化-功能主义的现代化理论联系在一起；3.现代化理论家经常否定工业社会的趋同，而进化-功能主义的谬误似乎必然会导致现代化社会的趋同思想。

还需要阐明两点重要的意见。支持趋同论的少量经验研究，可以被合理地加以扩大。此外，一些看起来否定趋同的经验证据，

---

① 丹尼尔·勒纳：《制度的改造》，载于威廉·B·汉密尔顿编辑的《发展理论》，《加拿大社会学和人类学评论》1966年2月第3卷，第1期。

② 斯坦利·R·巴雷特：《伊格博人在接受工业化方面的成就因素》，载《加拿大社会学和人类学评论》1968年5月第5卷，第68—83页。

诸如最近关于职业威望等级顺序的研究，也可以用来支持趋同论。只要我们记住，各个社会可能随着工业化过程而发生趋同，因为在这个过程开始之前，它们就已经有了许多共同之处。因此，如果把具有共同文化背景的社会群体加以比较，如果把趋同的概念阐述得更具有相对性，那么这点便显得更为真切。先进社会和不发达社会间的差距，以及就这两种社会进行概括的企图，掩盖了如下的事实，即使在西方，大规模的工业主义也只是最近刚刚出现的现象。因此，我们在这一早期阶段所看到的趋同便是非常值得注意的。大规模工业主义的崭露头角，必然会消除对于现代性和传统性的截然分割，同时也强调趋同的相对性。工业社会为什么如此复杂和互不相同的原因之一，是前工业社会的结构并没有消失。趋同的相对性也必须与对年代顺序的了解联系在一起。人们在论及工业化的先驱者和后继者时，经常认为，他们间的唯一重要差别在于，后继者在经历相同过程时，具有某些有利条件。然而，英国、美国、法国和德国实现工业化的时间相对是一致的，这意味着，在一定的技术和社会结构下，工业化过程的方向必定相似。今天，试图实现工业化的一批国家，尽管怀有与先进国同样的目的，但可能经历完全不同的过程。这些国家可能必须对传统发动比西方工业化过程中所发动的更为激烈的攻击。众所周知，先进国家共同的结构安排，诸如被英克尔斯假设为工业化条件的集中起来的工厂、工业城市和劳动力，都可能完全不是某些后进国家工业化过程的特征。

同时，现代化理论的演绎方法，既否定趋同论，又在逻辑上导致趋同论。它忽视经验证据，使得人们难以通过另外的资料进一步发展理论。应该加以强调的是，这是针对理论构造方法本身的批评，而不是对功能主义的批评。正如贝尔肖指出的，正在实现工业化的社会的病状之一是，为经济增长所必不可少的各方面制度

之间缺乏相互依赖。① 功能分析是揭示缺乏这些相互联系的唯一方法。但是功能性的相互依赖必须经验地取得，以便顾及到各方面制度间的相互依赖的必要性、时间跨度和强度。因此，如果对工业主义在不同社会里所必需的和由其带来的相互依赖进行比较，相互依赖的经验产物就能导致建立趋同的经验基础。但是，假定社会制度的不同成分之间具有紧密联系，这种做法是危险的，正如穆尔所一直强调的，必须适当考虑到它们之间配合的松散性。如果发生变化的首要因素是工业部分，尽管相互依赖的关系会迫使社会制度趋同，但是配合的松散性意味着，某些成分将不会被迫发生变化，而某些与工业部分较远或与工业部分相对缺乏联系的成分，可能与变化无缘。这样，各社会间的趋异就能在理论上被接受。这种趋异限制但并不抹煞趋同的可能性。

结　论

如果我们能避免进化-功能主义的现代化理论的方法所固有的错误，也许能挽救趋同论，把它作为一种进行比较分析的有用的手段。本世纪初，戈登韦塞在其人类学同行前为趋同论辩护，把趋同视为理论上和经验上的一种可能性。我在这儿推荐的观点与他的颇为相似。② 他在发展的广泛性中看到了局限性。他否认遗传趋同，而主张“依赖趋同”，他把依赖趋同描写为“来自不同根源但在共同的文化媒介影响下发展起来的相似性”。③ 工业社会和正

---

① 西里尔·S·贝尔肖：《与经济增长有关的社会结构和文化价值》，载《国际社会科学杂志》1964年第16卷第2期，第223页。

② A·A·戈登韦塞：《文化发展中的有限可能性原理》，载《美国民俗学杂志》1913年第26卷，第259—290页。

③ 同上，第269页。

在实现工业化的社会的趋同，也许就是从社会适应大规模的工业主义的有限可能性中发展起来的相似性，尽管很明显，工业化过程发生的时间各异，过程本身的特点不同。这种相似性应该通过经验产生，除此之外，没有其他的进一步的含义，诸如目的论或贯彻始终的共同性或者基础上的相似性。这个理论的最基本的内容是，适应的有限可能性与起源的多样性成为对照。趋异也是预料之中的，因为可能出现多种不一致的变化，当然这些变化不会是一片混沌。我们的比较研究将既赞成趋同也赞成趋异，不预先排除这两种理论可能性的任何一种，因此这样的研究将大有希望。

费涓洪 译

发达社会主义理论是苏联的趋同观点吗？*

杰弗里·W·哈恩

从表面上看来，苏联的发达社会主义理论，与本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初西方盛行的“趋同论”极为相似。这两种理论的基本出发点相同，都强调社会变化基本上是经济发展作用的结果。西方的趋同理论家因而认为，工业发展带来的社会的和政治的后果多少具有普遍性，因此，随着时间的推移，成熟的工业社会在许多方面变得日益相象。按照这种观点，意识形态和民族的差异都被中性的技术大大地缩小了。技术是现代工业社会的发动机，而一切工业社会，不管是共产主义的还是资本主义的，都将稳步地跨入一个美好的全新的后工业世界。苏联的发达社会主义理论家同样认为，他们所谓的“科技革命”会产生普遍的社会后果。然而，他们竭力否认一种观点，即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社会将丧失其阶级性，并将变得彼此相似。

下文首先把多数西方趋同论者认可的工业社会模式，与苏联的发达社会主义模式作一比较。比较的重点放在两种理论中类似的经济、社会和政治的变化上。其次，概述苏联和西方的批评家对趋同理论的主要批判。东西方对趋同论的否定，看来都是出于意识形态上的而不是科学上的考虑。没有一种批判对趋同论作过真

---

* 本文选自吉姆·塞罗卡和奥里斯·D·西蒙主编的《苏联集团的发达社会主义：政治理论和政治现实》，美国，1982年出版。

正科学的估价。这就需要建立一种判断标准，这些标准能在经验上衡量，并能用数据验证。①结论部分提出，苏联和西方批评家主要出于意识形态的原因排斥趋同论，这种做法是草率的和毫无根据的。然而，发达社会主义的理论可能无意中会重新引起对以下问题的兴趣，即由于苏联也赞同以技术求发展，那么在苏联将发生哪些与其他成熟的工业社会相似的社会变化。

趋　同　论

尽管有各种各样的"趋同"理论，②但最引人注目的是50年代末和60年代提出的工业发展的观点。回想起来，这种观点一般比较温和乐观，③是不足为奇的。在西方，50年代是一个相对稳定的经济发展阶段，国际事务方面的冲突也相对少些。在发达社会中，人们普遍认为新技术是进一步提高生产力的关键，而新兴的"第三世界"将得益于技术转让，才得以开始进入通向工业化的"经济发展阶段。"④发达工业社会中阶级冲突的消失和各阶级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使人连想到会出现一个清一色的中产阶级的社会，在这

---

① 迈耶在他的著名文章《趋同论》一文中也提出了这一观点。该文收入约翰逊主编的《共产主义制度的变化》(1970年)一书，第338、341页。

② 同上，见337页，《四种方法的概要》。

③ 除了下面脚注中列举的一长串名单外，属于各种各样趋同论的，还有凯尔等著的《工业主义与工业人》(伦敦：海涅曼公司，1962年)。涉及范围较小的，有杜韦尔热的《政治导论》(巴黎，1954年)。迈耶举出了多伊彻，或许因为后者写了《未完成的革命》和关于托洛茨基的三部曲。但是，马克思主义者多伊彻从未把趋同看作是相互的。或许还应该包括阿尔蒙和科尔曼，因为他们提出了以经济发展为基础的政治制度模式，尽管他们两位都未预言趋同。参见《发展中地区的政治》(普林斯顿，1961年)。迈耶关于苏联是一个"以放大的形式发现"的团体结构的观点，正如他自己在《趋同理论》中指出的那样，代表了一种趋同思想。同上，参见他的《苏联的政治制度》(纽约，约夫公司，1965年)。

④ 参见罗斯托《经济增长的阶段》(伦敦，剑桥大学出版社，1960年)。

种社会中，意识形态问题已与人们无缘。[①]

20年前索罗金提出的对未来持乐观主义的看法，现在看来似乎是合理的。他曾写道，如果战争能避免，苏联和美国都将趋向一种把共产主义和资本主义的优点溶为一体的"综合型"国家。在西方，政府将在经济管理中起更大的作用，而从斯大林主义的经济危机年代解放出来的苏联，将变得更灵活、更自由。[②]

索罗金的预见很快得到加尔布雷斯[③]的"新工业国家"和贝尔[④]的"后工业社会"的响应。1966年加尔布雷斯在与《纽约时报》刘易斯的谈话中，也许最清楚地表达了他的乐观主义态度以及对理性和进步的信念。趋同思想溢于言表。他说道：

> 技术的本质，支持技术的大团体的本质，以及技术需要的计划的本质，具有其自身的规则，这种规则在所有工业社会中引起一种巨大的趋同现象。在东欧社会，趋同现象使权力从国家分散到企业；在西欧社会，它正在导致某种特别的计划。我们能够想象，几年以后这将促成一种既受计划又受市场影响的不易区分的混合体……。高度的科学观念和高技术专门化的要求，再也无法使知识分子顺从统治者，它们必然引起知识分子的探究精神，并由此产产一种衡量知识分子自由程度的标准。[⑤]

---

① 参见贝尔《意识形态的终结》(纽约：科利尔书店，1961 年)。

② 索罗金早在 40 年代初就表示过他相信趋同，参见索罗金《俄国和美国》(纽约：达顿公司，1944 年)。另见他的文章《美国和苏联的相互趋同》《国际比较社会学杂志》(1960 年 9 月)。并收入索罗金主编的《我们时代的基本趋势》(纽黑文：大学出版社，1964 年)一书。

③ 加尔布雷斯《新工业国家》(波士顿：霍顿·米夫林公司，1967 年)与《富裕社会》(纽约：新美国图书馆，1958 年)。

④ 贝尔《后工业社会的到来》(纽约：巴西克书店，1973 年)。

⑤ 加尔布雷斯谈话录《加尔布雷斯眼中的世界》，纽约《时代周刊》(1966 年 12 月 18 日)，第 92 页。

认为先进的工业社会必定与富裕、世界和平和“知识分子的自由”联系在一起的信念，迅速受到挑战。来自左右两方面的评论家们认为，工业社会的忧虑多于希望。赖克否定了工业社会的价值，因为它阻碍个人的成长，是非人道的。他提出了一种新“意识”，这种新意识以“他们是什么”来评价人，而不是以他们消费什么或谋得什么职位来评价人。① 罗扎克描述了一代人对先进的工业社会模式中合法经济状况的反感，称这种倾向为“反主流文化”。② 最后，罗马俱乐部在《增长的极限》的研究报告中，断定人口的指数级增长将迅速减少有限的资源，带来的是较低的而不是较高的消费水平，工业社会模式的技术并不是万应灵药。③ 西方工业经济中，经济增长停滞不前，伴随着严重的通货膨胀和高失业率，看来已进一步证实了这个悲观的估计。在60年代初抱有的改善东西方关系的希望，由于1980年恢复冷战的对抗性的形势而不复存在。

60年代乐观的趋同理论几乎可以肯定是错了。但是，如果忽视工业社会模式对社会变化所作的解释（这种解释正是趋同论的核心），那也将是一种错误。不论好歹，工业化确实引起了社会变化，技术进步确实影响了人类行为和价值观念。这一点和下面将论及的发达社会主义理论最相似。为了便于比较，让我们综合考虑公认的工业化带来的主要的社会变化。④ 这些变化和工业化一样，可以被看作是一系列前提，而其中的每一条都是自变项。

---

① 参见赖克《生机勃勃的美国》（纽约：兰多姆书店，1969年）。
② 参见罗扎克《反主流文化的形成》（加登城：双日书店，1970年）。
③ 罗马俱乐部《增长的极限》（纽约：全球书店，1972年）。
④ 这些前提包含在前面部分论述工业社会的文献中，尤其是凯尔等人的著作，参见前注。莱恩在《苏联的政治与社会》（第2版）（纽约：纽约大学出版社，1978年）一书中提出的类似的书目同样有用。这个目录绝不是唯一的，所涉及的问题也不是每位提出某些趋同论观点的人都能接受的。

社会工业化在经济方面造成：

1.农业人口的比例减少；工业人口比例增长。

2.技术日益成为提高生产率的重要根源。

3.劳动的分工日益复杂，职业流动迅速增加，以成就而不是以门第出身衡量人。

4.具有高度的结构分化；计划周期变得较长，根据现代科层制的原则实施管理，即强调等级关系。

5.对体力劳动和无技术劳动的需求减少，这类劳动已被自动化所取代；白领职工和专业人员的人口比例增长。

社会工业化在社会方面造成：

1.人口增长率得到控制；小型核心家庭取代了扩大家庭；妇女从抚养孩子的角色中解放出来参加工作。

2.由于扫除文盲和普及教育，贫富悬殊的阶级差异的传统社会，被中产阶级社会所取代；建立在所有权基础上的阶级差别正在逐步消失。

3.都市化使人际关系变得淡漠，人们更加独立自主。

4.由于我们更多地通过传播媒介，而不是通过直接接触了解别人，通讯联系变得更依靠技术；单线联系取代了多线联系。

5.在文化方面，价值观越来越世俗化；人们从相信宗教神学的解释，转变为相信努力工作、科学技术、理性和进步；一种新兴的"工业文化"形成了。

社会工业化在政治方面造成：

1.由于普及教育的结果，大量民众有了参与政治的要求。

2.由于决策者精英必须更加依赖技术专家的专门知识，政治权力扩散了。

3.国家在经济计划和技术管理中，起着越来越大的作用。

4.运用法律成了"普遍性的"而不是"特殊性的"事；成文法取

代了习俗和惯例。

工业社会模式并未预示任何两种社会的完全雷同。但是，它确实意味着，在工业社会之间，相似远比差异更重要，与非工业社会比较，尤其如此。在这层意义上来看，1956年赫鲁晓夫上台后，苏联生活水平的提高和非斯大林化，似乎证实了人们的预料，苏联人的行为开始接近先进的工业社会的方式。但是，到了60年代末，苏联人发展了自己的“成熟的”或叫做“发达的”社会主义理论。我们现在需要注意的是，苏联的理论与趋同论的相似之处与不同之处。

发达社会主义

赫鲁晓夫在1961年的党纲中宣布，苏联已结束建设社会主义的阶段，到1980年将建成共产主义。他使其后继者在解释这段话的真正含义时，遇到了棘手的意识形态上的难题。苏共总书记勃列日涅夫认为，《党纲》实际上是指建成完全共产主义的第一阶段，即发达社会主义的特殊阶段。苏联认为，这是他对发展马克思主义作出的卓越贡献。[①] 这被称为“发达的”或“成熟的”社会主义时期的阶段，将持续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并不知不觉地逐渐发展到共产主义。尽管“发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界线模糊不清，但从社会主义发展阶段到发达社会主义阶段，却有明显的标志，即必须有科技革命作为全新的生产基础。科技革命就是运用科学去完成提高生产的任务。在这场“革命”中，技术渐渐取代在生产过程中的体力劳动，由此，不仅从根本上改变了劳动的性质，而且也改变了

① 实际上，勃列日涅夫显然想修改《党章》，以表达他的观点。参见他在苏共二十六大上的讲话(1981年)，《苏联报刊文摘》第30卷，第9期，第14页。

生活的许多其他方面。[①] 按照苏联的观点，发达社会主义就是把具有普遍性的科技革命与社会主义的优越性结合起来。

这里没有必要追溯这种理论的演变过程和它对苏联的内外政策的影响。这方面的研究其他人已做得很好了。[②] 本文最重要的目的就是说明，苏联已提出以下观点，即经济发展新阶段将必然引起“经济、社会、政治和文化各个生活方面”的变化。[③] 苏共中央意识形态方面的后起之秀苏斯洛夫，1979年出版了一部著作，也许对苏联官方的观点作了全面的概括。依照苏斯洛夫看来，向发达社会主义的转变，将产生十大基本变化。它们是：

1.在使用科技革命新成果的基础上，保证生产力发展的高水平；

2.进一步发展社会主义所有制的两种基本形式——国家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并使其逐步合并。

3.稳步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这是社会主义国家经济的主要目标；

4.在长时期内继续贯彻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基本原则；

---

① 可参见有关科技革命的两篇好文章，费多谢耶夫《科技革命的社会意义》(载达伦多夫等主编的《科技革命：社会状况》，伦敦，塞奇，1977年)以及霍夫曼《当代科学技术和社会变化的理论》，载《苏联科学研究》第9期(1979年2月)，第10页，另见弗勒隆《技术和共产主义文化》(纽约，普雷格出版社，1977年)。

② 请特别注意参见埃文斯《苏联意识形态中的发达社会主义》，载《苏联研究》第29卷(1977年7月)，凯利主编的《勃列日涅夫时代的苏联政治》(纽约，普雷格出版社，1980年)。莱尔德和霍夫曼《科技革命，发达社会主义及苏联的国际行为》，见霍夫曼和弗勒隆主编《苏联对外政策异论》第2版(纽约，奥尔丁公司，1980年)。关于东欧的发达社会主义理论，参见西蒙《波兰的发达社会主义、改革政策和参与》(1981年4月11日在伊利诺斯大学举行的中、西斯拉夫会议上提交的论文)及纳尔逊《罗马尼亚工人和党的冲突》，见《共产主义问题》杂志(1981年9—10月期)。

③ 塞米诺夫《列宁论社会主义社会的辩证发展》，《哲学问题》第4期(1980)，第52页。

5.社会结构的逐步变化：工人阶级的领导作用得到提高，工人阶级与其他阶层的联盟得到加强，苏联各加盟共和国和各民族在共产主义理想的平等团结的基础上，增加社会的一致性，并趋于社会同质化，在思想和政治上达到空前的统一；

6.变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为全民的社会主义国家，包括深入全面地发展社会主义民主；

7.进一步提高广大群众的教育和文化水平，培养他们的政治觉悟、成熟的思想和马列主义科学世界观；

8.加强与社会主义兄弟国家的合作；

9.对外政策的制订要保证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发展创造更有利的国际条件；

10.在人类生活的所有领域中，提高共产党和工人党的领导作用，是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首要条件。①

这里摘引了苏斯洛夫的话，因为它是官方公布的准则，也因为其表述极为谨慎，并被大多数人接受。但除了这个一般的叙述之外，人们还能发现苏联各行各业专家论及的一些更特殊的变化。为了行文方便，易于比较，我们将象上文论及工业社会模式时一样，分别论述发达社会主义的经济、社会和政治的变化。②因此，照苏联的观点，发达社会主义将产生如下变化。

---

① 苏斯洛夫《马列主义与现时代》(莫斯科，1979年)第10—11页。

② 在前文引用过的凯利教授的文章中，可能对发达社会主义的经济、社会和政治变化作了极好的概述，这种概述所依据的苏联文献比本文提到的要广泛得多。最近，这个作者还对贝尔预测的后工业社会的经济、社会和政治变化，与苏联否认的变化作了比较，文章题为《后工业社会和发达社会主义在理论上是一路货》。参见凯利《发达社会主义即后工业社会》(在1981年9月5日纽约美国政治学协会年会上散发的论文)第3页。这两篇文章对本书作者帮助很大。

经济变化

1953年斯大林逝世时，给他的继承人留下了有着严重结构缺陷的工业化的经济。因为在斯大林时期，苏联投资的重点放在重工业部门，因此农业基本上毫无发展，消费品供应不足而且质量低劣。况且，五年计划基本上建立在产量增长指标的基础上。在积累原始资本期间，这些指标可以显示高增长率，但有了工业基础之后，这些指标从本质上来说就不够了，因为它已不能促进经济继续增长。在许多方面，科技革命可以看作是苏联对这些结构缺陷的反应。另一个促成因素是迫在眉睫的劳力不足，这是人口增长率迅速下降的结果。60年代初下降已很明显，人们当时就已预料到这点。现在需要通过提高劳动生产率来补偿劳力的不足。

正如前文所述，科技革命的本质是将科学运用于生产任务。在运用科学时，有一个从"粗放性"到"集约化"的发展变化，也就是普及机械化和自动化，来提高劳动生产率。① 提高劳动生产率被看作是提高农业和轻工业生产的关键，而农业和轻工业的发展与苏联生活水平的提高关系最密切。农业和轻工业从斯大林对重工业的沉迷中解脱出来后，平衡和"按比例"的发展才能成为发达社会主义的特征。

成功地利用科技革命来提高生产率，主要取决于其他两个经济部门的发展：高技术工业和科学研究团体。如同凯利指出的那样，苏联相信科学和技术是经济发展的核心，贝尔断言后工业社会的特征是以"理论知识为中心"，这两种观点几乎没有差别。② 但

---

① 塞米诺夫，《发达社会主义的理论及其向共产主义的过渡》，载《哲学问题》(1980年第7期)。

② 凯利《发达社会主义即后工业社会》，同前注。

是，根据苏联的观点，发达社会主义的"社会主义"，首先是指按劳分配原则，而不是共产主义的按需分配；其次，是指以集体农庄为基础的所有制形式，还没有完全被国家所有制取代，尽管经济正朝着国家所有制发展。

社会变化

苏联理论家坚信，发达社会主义必然会引起许多社会结构的变化。值得注意的是，他们没有谈及阶级结构，因为已经没有产生敌对阶级的财产基础。他们只承认有两个"非敌对阶级"，即集体农民和工人；还有一个"社会阶层"即知识分子。但在60年代中后期，苏联社会学家勾画出一种更为复杂的社会结构状况。更突出的是，他们指出了"阶级内"差别，这种差别反映出技能水平、教育水平和报酬的不同，而阶级内差别的增大是工业发展的后果。①尽管发达社会主义将使阶级之间的差别逐渐缩小，但是因为技能的重要性增加，因为分配仍将是"按劳取酬"，②因此，阶级内差别实际上将日益扩大。只有到了完全的共产主义，这些差别才会消失。至于谈到工人阶级和知识分子的差别，那么具有更高的教育水平和技术能力的工人阶级最终将会出现，尽管这需要较长时间。消灭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之间的差别需要的时间更长。③最后，发达社会主义也将消灭各民族在政治上和经济上的差别，而只保留一些次要的文化差别。因此人们已越来越经常地用"同质性"

---

① 参见哈恩的论述《苏联社会学家在制订社会政策中的作用》。见雷纳克主编的《苏联社会科学家和政策制定》（纽约，普雷格公司，1977年），第48，49页。

② 皮切内夫《苏联共产党战略战术中的发达社会主义理论》。《真理报》1981年5月8日。

③ 参见鲁特克维奇《发达社会主义社会的社会结构》《真理报》1975年7月4日。引自《苏联报刊摘印本》第21卷，第5期（1975年9月）。

和“一体化”来描述发达社会主义社会结构的演变。

苏联的许多观点可以与工业社会模式进行比较。首先，工业社会模式也提出，在财产所有制基础上的阶级差别会消失，并使全社会形成基本上单一的阶级。其次，工业社会保留着以教育和技能为依据的地位差别，教育和技能被看作是工业社会运行所必不可少的。第三，根据贝尔的观点，新的统治精英将是一个“知识阶级”，一个顺应科技革命的群体，包括科学家、创造新技术的专家以及使用新技术的管理者。最后，现代化也必然缩小民族差异。在发达社会主义社会和工业社会中，传统的行为方式都已日益减少其影响，诸如家庭规模、妇女作用、地区性人口迁移和出生率的统计表明，两种社会的类型基本相似。现在，许多苏联专家承认这些社会变化或多或少是工业化的普遍结果。①

政治变化

工业社会模式认为，现代工业发展将导致国家在管理社会中的作用扩大，出现专家治国、扩大政治参与、确立普遍性的法律规范，照最乐观的理论来看，还包括一定程度的世界和平。随着发达社会主义而出现的政治变化，和上述内容极其相似。在国家的作用方面，无产阶级专政将让位于“全民国家”，② 在某种程度上，这意味着作为强制工具的国家，将如同列宁和恩格斯所预言的那样逐渐消亡，取而代之的是强烈的法律意识和更普遍的政治参与的

① 参见维什涅夫斯基《人口统计革命》(莫斯科：统计出版社，1976年)第236页。

② 下文大多依据季克哈米罗夫《发达社会主义国家》一文，见《哲学问题》1979年第10期。1977年的苏联宪法看来反映了这些政治变化。这个观点在勃列日涅夫的《通向共产主义道路上的历史阶段》(《世界马克思主义评论》1977年第12期)一文中发挥得更全面。

结合。更多的群众可以通过地方政府机构苏维埃和公众组织参政。与此同时，由于需要专家来指导科技革命，国家的管理和行政作用实际上在提高。就是说，不仅在经济领域，而且在社会的所有其他领域，国家的计划作用将大大加强。整个社会变得更复杂，技术专家在制定决策中的作用也相应变得更加重要。在所有工业社会中，知识的专门化经常为科层制开辟道路。

在发达社会主义时期，党的作用也要加强。如果能够把党看作苏联社会各集团竞争要求的大代理人，那么党的作用确实不得不扩大。因为随着各种选民的剧增，很可能展开更多的竞争。反过来说，这要求党不仅具有政治技能，而且还要通晓技术。如果情形果真如此，人们可以期望，苏联下一代领导者将不再把改革的建议当作威胁。至少人们可以指望，1953年以后兴起的领导人，对世界的看法和现领导有所不同，现领导仍然受到斯大林掌权时的社会主义观点的影响，疑虑重重，谨小慎微。

最后，在国际关系方面，苏联人的著作提出，在发达社会主义时期，“世界各力量之间的相互关系”定将朝着有利于世界社会主义的方向转变。这被看作是进步的必然的世界历史过程，除非它被核战争打断，否则这种进程将产生世界和平。实际上，苏联接受的“趋同”观点只是苏联统治下的和平，那时全世界都赞成苏联的马克思主义观点。这种关于世界的看法，天真地低估了当今世界社会主义的多样性。它使人想到苏联人和工业社会模式的鼓吹者一样，是主张思想中心论的，后者把世界和平看作是大多数国家接受美国式的民主。

苏联对趋同论的批判

尽管在苏联的发达社会主义理论和西方的工业社会理论之

间，有着明显的相似之处，但是，苏联人把两种制度之间存在"趋同"的任何说法，都看作是对苏联的肆意攻击。然而，苏联对趋同论的批判却是连篇累牍和大肆声张的。批判的规模和形式因对象不同而差异很大，但其基调归结为一点：苏联是社会主义社会，而美国则不是。对这一点作些解释是有益的。

苏联反对任何一种趋同观点，不同意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社会会发展成单一工业模式。这种观点的依据是，两种社会的所有制关系不同。资本主义制度仍然存在着生产资料的私有制，它必然会引起占有者和生产者之间的对立的阶级关系，人们总是以占有者阶级的利益来管理社会。社会主义消灭了生产资料私人占有制，同时也摧毁了阶级冲突的基础。只有在这样的社会中，才有可能以全民的利益来治理国家。既然工业社会仍然保留资本主义的财产关系，先进的工业社会时期经济发展的好处只能继续为少数人享用。这反过来只能导致阶级对抗的加剧而不是缓和。根据苏联的观点，两种社会的发展特点将是差异性增加，而不是一致性增加。它把"趋同"理论斥为资产阶级辩护士维护垄断资本利益，试图使现社会长治久安的理论依据，因而是一种反共产主义的手段。

苏联论及国家在现代工业社会的作用时，也充分表达了这种观点。苏联作者同意，国家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会提高。然而，如果说在自由资本主义时期国家的作用还是消极的，那么在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时期，国家空前积极地参与了对工人阶级的剥削。关于这一观点的权威论述，可见切尔尼科夫教授在《真理报》上发表的论文。罗斯托和加尔布雷斯特别引用此文。切尔尼科夫写道：

> 趋同论者认为，资本主义国家在经济中的作用正在增强，这个论点本身并没有引起异议。但资产阶级思想家避而不谈

一个决定性的问题，即国家的社会本质是什么，在再生产过程中，在管理和规划经济时，它代表了谁的利益。事实证明，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制度的作用是维护社会上层的利益。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巩固，只会使金融寡头扩大其对国家的全部生活的压迫。①

苏联理论家并不否认，工业发展的结果确会造成一些共同的特征，他们认为，这种相似是形式上的而不是本质上的。正如加尔布雷斯指出的那样，炼钢的技术过程在新西伯利亚和在加里、印弟安纳可能是相同的。但是，这种过程不能与更大的社会相分离，因为社会将决定怎样使用技术。社会主义制度主要的优越性，除了合理分配利益以外，还有它的控制、计划和管理能力。格维希阿尼教授在撰文论述工业化的历史付出了环境污染的代价时，同时表达了上述观点。他写道：

在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个别企业之间，在怎样完成技术和组织任务方面，确实有某些相似之处；但当我们谈及整个社会时，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的本质差别便显而易见。今天，当科技革命带动了整个社会进程之后，社会主义制度在组织和管理社会生产方面的无可争议的优越性就特别明显……。

当代资本主义生产的速度和方法，加快了自然资源的枯

① 参见切尔尼科夫教授《趋同论是反共产主义的一种手段》，原载《真理报》(1969年9月16日)，转引自《苏联报刊摘印本》第9卷，第9期(1969年10月31日)。在过去的10年中，苏联的批判千篇一律。现在有一种有趣的新说法，即既反对"社会进步悲观主义者"，也反对趋同论。参见德门乔诺克和塞米诺夫《对当代资产阶级社会进步理论的批判》，原载苏联《哲学问题》1979年第12期，转引自翻译本，1980年秋，第13卷，第2期。

竭、生态平衡的破坏以及生物圈的污染，对人类造成了真正的威胁。只有合理组织一切经济活动，有目的地引导社会发展，才能避免这种危险。①

总之，苏联人反对社会制度之间相似性不断增长的所有观点，特别反对资本主义不经过生产资料国有化，就能发展成为社会主义的论点。虽然科技革命造成的进步可能是普遍性的，但结果却不同。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科学和技术为特定的私人利益服务，而不为公众利益服务。因此，对科技的应用自然是特定的和随意的，必然会造成污染、城市衰退、失业等问题。只有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才能制定适当的计划解决这些问题，也只有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科技革命带来的生产力的提高，才有可能为全社会服务。正是在这种意义上说，苏联对趋同论的批判基本上具有意识形态的性质。

西方对趋同论的批判

西方文献中大多数对趋同论的批判，与苏联一样具有意识形态特征，两者相映成趣。西方学者也强调独特性；认为无论苏联多么工业化和现代化，它仍然是极权主义的和非民主的。这种独特性往往被归之于文化的影响，而文化来源于历史和传统，其影响比工业化的经验更强烈。俄国人不可能变得和我们一样，似乎还可列举很多论据，只因为他们毕竟是俄国人。但根本的不同在于他们是共产主义者，而我们不是，因为西方专家的前提是，民主和社会主义经济是水火不相容的。趋同论最激烈的一个批评者沃尔

① 参见格维希阿尼《科技革命和社会进步》，原载《哲学问题》，1974 年第 4 期。

夫，就是按照上述思想路线抨击加尔布雷斯的。他断言"趋同论是有害的谬论"，他进而写道：

> 人们很容易忘记技术是中性的、自由的，它既可以用来解放人，也可用来奴役人，可以给人信息，也可以强迫人洗脑……。哈佛大学教授加尔布雷斯在苏联大学里不可能当教授；美国人争取民主行动组织主席加尔布雷斯在苏联不可能当政治领袖；著作家加尔布雷斯如果坚持两种制度正在趋同，他在苏联就不可能出版其著作……。
>
> 总而言之：趋同论将经不起历史的考验，也经不起这两国的现实的检验。可能发生的情况是，每个国家将继续在本国的传统、惯例和制度的影响下，朝着各自的未来发展。保存或改变传统和制度，更多地是由人的行动而不是事物本身的力量所决定。①

沃尔夫教授指责趋同论极其有害，因为它没有强调我们有自由而他们没有。与此同时，布热津斯基和亨廷顿合著的《政治权力：美国与苏联》一书也批判了趋同论，尽管批判得比较温和。两位作者一开始就详尽地考察了两国的异同之处，接着检验了趋同论。在大段的分析之后，作者就趋同论提出了四个基本论点。第一，经济发展并不一定会产生一种共同的工业文化，在政治文化领域尤其如此。作者以"古代社会"为例，说明"并非相同的经济模式注定产生相同的政治结构"。他们以纳粹德国为例，论证技术成就并不一定产生民主。第二，他们认为，由于在苏联，经济发展是人

① 沃尔夫《苏联和美国，对趋同论的挑战》，载《人文主义者》（1968年9—10月）第8页，温伯格也持同一主张，见《工业社会的趋同问题》，载《社会和历史的比较研究》1969年1月。

为强加的，而在西方则或多或少是自发的，因此美苏两国的政治和社会之间存在的关系是根本不同的。第三，尽管苏联将逐步发展为一个相对"富裕的社会"，但这是"富裕的集体主义制度"，它并不妨碍继续实行自上而下的政治控制。事实上，富裕可能是消除苏联社会内部斗争的一个根源。最后，他们不同意工业社会的趋同会造成更太平的世界秩序的观点。他们得出的最后结论与沃尔夫的极其相似，即认为苏联将是一个例外，因为它仍将是不自由和极权的。

> 西方现代化的一般趋势是向专家统治发展，西方与苏联观点的不同在于，在发达国家里，它同时将维护公民的自由和人权，尤其重要的是它同时具有政治制度的多元化，以全面接受人民的观点和意见……。在苏联，进一步现代化很可能同时意味着，极力保持党的官僚在政治上和意识形态上的垄断，以及禁止任何政治意义上的社会的或意识形态的多元化。①

结　　论

苏联和西方对趋同论的否定，主要都出自意识形态上的考虑，而不是对工业社会模式在解释社会变化时有何益处作出经验的估价。按照苏联的观点，社会制度不能趋同的主要障碍是经济原因。美国不会与苏联相象，因为美国是资本主义的。苏联官方思想认为在理论上可行的唯一趋同论观点，就是西方资本主义的解体和一切社会最终进入共产主义。总之，我们必须赞成他们关于未来

---

① 布热津斯基和亨廷顿《政治权力：美国和苏联》（纽约：瓦伊金出版公司，1964）第434，419—436页。

的观点。当然苏联人也了解共产主义不会在短时间内实现。另一方面，西方对趋同论的否定更具政治性。人们认为，苏联的制度不会与我们的相象，因为它不能容忍政治多元化；因为它是主张共产主义的，必然也是极权主义的。照这种看法，如果苏联的制度想具有任何与我们的制度相同的地方，苏联人就应当采纳西方式的民主原则和做法。而批评者坚持认为，只要苏联仍然主张共产主义，它就不可能采纳西方的民主。

在顺着上述思路考虑问题时，趋同论的反对者有意无意地避开了下面这个中心问题。趋同论提出的问题不是美国能否变得更社会主义，或者苏联能否变得更民主，而是两国是否以相似的方式发生变化，以便对现代工业发展的某些基本内容作出反应。苏联人认为，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制将使阶级冲突永远存在下去，因而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社会不可能有更多的共同点，这实际上是以哪个社会"最佳"的价值判断，排斥了从经验上考虑工业化和社会变化之间的相互关系。

布热津斯基和亨廷顿的观点也存在着同样的问题。照他们的观点，衡量两种制度在任何程度上的相似的标准就是看苏联能否变成民主国家。① 由于苏联也自称是"民主的"，因此，语义上的区别最终又发展成价值问题（即谁对民主一词下的定义是正确的）。最近在苏联开展了有关政治参与的讨论，政治参与肯定对任何民主化的概念都是必不可少的。既然苏联都在进行讨论，它是否民主呢？如果不引入价值标准，就无法使用民主概念，这将使人们进退两难。在讨论什么是"名副其实"的参与时，我们必然提出衡量的标准问题。为什么美国对于政治参与的经验研究认为，苏联公

① 布热津斯基和亨廷顿《政治权力：美国和苏联》（纽约：瓦伊金出版公司，1964年）第429—436页。

民的参与不如美国公民的参与“重要”呢？[①] 再说，趋同论的悲观主义者指出，任何技术统治的社会基本上都是反民主的，尽管它可能保留民主的形式。[②] 无论如何，以这些论点作为理由，对趋同论进行批判，都只会成为关于价值观念的争论。然而，现存的经验证据告诉我们，由于现代工业发展的作用，两种社会已经在社会、经济和政治变化方面显示出相似之处。

我的结论是，对趋同论作比较客观的评价时可能应当承认：它在某些方面的解释作用大于另一些方面，它对一般趋势的解释比对特殊情况的解释更有用。毫无疑问，趋同论在有些重要方面是有欠缺的。它较少关心文化和历史的差异，而前文论及的趋同会增强和平民主的观点，可能既是种族中心论的，又是过分乐观的。然而，仅仅出于意识形态的理由来否定这种理论，似乎同样没有根据。尽管苏联官方力图使用发达社会主义理论维护其权势，尽管苏联会反对我们的做法，但我们仍然可以利用发达社会主义理论，展开关于现代社会变化性质的更广泛的讨论。

蔡文之　译

① 提出比较美国和苏联的政治参与问题的两篇文章，分别是利特尔的《美国和苏联的群众政治参与》，载《比较政治研究》第8卷，第4期（1976年1月）和霍夫的《苏联的政治参与》，载《苏联研究》第28卷，第1期（1976年1月）。里格比作出反应和批评，他认为要从“质”上加以区别，参见里格比的《霍夫论苏联的政治参与》，载《苏联研究》第28卷，第2期（1976年4月），巴里的《对霍夫观点的批判》，见亨德尔主编的《苏联的考验》第5版，北西图阿特，玛斯：达克斯巴顿出版社，1980年），以及利特尔的观点，见《政治参与和苏联制度》，载《共产主义问题》第29卷，第4期（1980年7—8月）。

② 参见迈耶《趋同论》中关于这些观点的论述。同前。

社会主义与非社会主义国家的人的现代化*

阿历克斯·英格尔斯

问题的说明

一切社会运动的思想内容之一，是关于人的特性的观念，以及对于人应该成为什么样的人的展望。在那些旨在改变宗教秩序的运动中，人们关注的重点常是这类问题。[①] 即使是在那些主要改革经济秩序和政治秩序的运动中，有关人的本质和人际社会关系的思想，也总是人们考虑的中心。因而，如果我们要理解革命的共产党在其执政的国家里发起和领导的社会变革的过程，就必须揭示和理解他们关于人的社会特性及其应该如何发展的思想。

在本文中，我希望能阐述苏联和中国这当代两大共产主义革命运动的领导人所追寻的思想，它给人的特性和社会关系造成了变化。这种变化和其他发展中国家所发生的自发变化极其相似。[②]

---

* 本文选自马克·费尔德主编的《共产社会现代化的社会后果》，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出版社，1976年版。

① 激进的宗教运动的重点经常和改变宗教仪式联系在一起。但是进一步的考察揭示，对仪式本身的重视，表达了人们对仪式如何体现和反映价值和人际关系的潜在的关注。

② 我没有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特别是东欧包括在内，主要是为了方便，而不是由于原则问题。苏联和中国在共产党取得政权时，在很大程度上是"不发达国家"。这点对某些共产党国家也适用，如阿尔巴尼亚和保加利亚。而另（接下页）

毫无疑问，社会主义国家的现代化过程更为自觉，目标更为明确，为达到目标而动用的资源也更为巨大。然而，在我看来，它远不是唯一的历史过程。这种为创造新型的“社会主义的人”而作的斗争，仅仅是把表现传统观念并以传统模式行动的人，转变为具有所谓现代观点、价值观和行为的人的更广泛过程中的一种特例。

社会运动中人的两种模式

我们可以把激进的运动在人的特性和人际关系问题上的观点主要分成两种。我把一种称之为民粹主义的（populist）观点，另一种是精英主义的（elitist）观点，二者均不带有评价的性质，更无贬低之意。

民粹主义运动的精英分子认为，他们自己以及他们所属的具有颓废、腐朽、邪恶特征的阶级，都必须被消灭，用一套新的人的特性和人际关系取而代之。这确实是他们的社会理想和日常标准。他们普遍认为，这些新特征并不是什么新东西，它只不过在逝去的岁月中失落和萎缩了。运动的拥护者们设想，这些失落的美德仍然存在，并在某些“人民”中表现出活力，因此可以寻觅到它们。这“人民”通常指传统的村民或者简单朴实的劳动群众。他们恰恰是因为被排除在文明发展的主流之外，未进入历史，还保存着淳厚的古风和高尚的人际关系。这应当是现今世间的准则。这种倾向在不同程度上成了俄国民粹主义者的特征，也在犹太复国主义运动中以特异的方式重现，它是大多数美国中西部民粹主义的基础，它在印度被纳入甘地主义，它也是构成当代美国青年反主流文化的

（接上页）一些国家如捷克斯洛伐克，在共产党统治时属于欧洲最工业化和现代化的民族国家。本文必须简明扼要，囊括各种类型组合已超出了本文的可能。

实质性因素。

精英主义则与此截然相反。精英主义者不相信群众能体现大多数宝贵的品质，而认为普通群众的个人品质明显地成为阻碍历史运动前进的主要问题。当应该积极行动时，群众却消极等待；当应该坚定不移时，他们却随随便便；当应该刻意复仇时，他们却宽恕原谅；当需要在严密的纪律下高度地组织起来时，他们却分散自己的精力；当需要完全专注于实在的组织问题时，他们却热衷于细枝末节。这种观点认为，除非群众改变他们的素质，即除非把他们改造成新型的人，否则不能指望群众完成其历史使命。但说来奇怪，这种新型的人近在眼前，恰恰体现在革命领导者身上。领导者只须不断地激励自己，向群众揭示未来；而群众仅需模仿领导，向领导学习，保证接受再教育。这就是实现人和社会的必要革命转变的基础。

毫无疑问，上述分类法和所有类似的方案一样，不免有粗糙和夸张之处。但我认为，正是这两种极端相反的一般模式，确定了一种标准，据此我们能够较少失真地确定各种激进的政治运动的范畴，不管它们属于左翼还是右翼。

在马克思列宁主义运动的实例中，我将证明，虽然这一运动掺有某些民粹主义成分，但一般说来，它明显地倾向于精英主义。

马克思列宁主义中的民粹主义成分主要地可以从笼罩着神秘气氛的无产阶级概念中找到。马克思的观点认为，历史赋予这一阶级的唯一任务，是将资本主义转变为共产主义，将人类带到社会发展的最高阶段。由于无产阶级和生产资料的关系，他们培养了管理工业文明所必要的组织性和合理性，因而有能力完成这一历史使命。鉴于后资本主义社会必须建立在现代工业生产的原则基础上，故预期的转变不可避免，无产阶级的领导作用乃是历史的必然。

但是，还存在一个难题。资本主义社会不可避免的变革，除了遭到没落的统治阶级用暴力阻止以外，还有别的障碍。障碍在于这一不幸的事实，即大部分无产者实际上并不具有其阶级在理论上应有的品质。无产阶级的"错误意识"突出地表现在他们的宗教信仰和宗教活动中。即使在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中，也广泛地散布着一套历史上不合时宜的，政治上不受欢迎的价值观、人生观和人际关系模式。

马克思从未解决怎样对待错误意识的问题。他好象认为，或者在无产阶级日益增长的贫困冲击下，问题自会消蚀，或者在和其他将要吞没资本主义制度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历史力量相比时，问题无足轻重。但是列宁勇敢地正视了这一问题。列宁对于共产主义理论的特殊贡献，恰恰在于他具有一种直觉，抓住了这一难题的症结。他打破了僵局，从而使得马克思主义中的民粹主义因素领导共产主义运动的状态，决定性地转变到我称之为精英主义的方向。

列宁的见解首次清楚地表述在《怎么办?》一文中。他竭力证明，由于群众缺乏革命觉悟，革命不可能自发产生。因此，历史需要有献身精神的、紧密组织的职业革命家小团体来推进共产主义运动。列宁提出，运动的中心任务之一是向群众逐渐灌输他们所缺少的品质，训练他们的组织性和纪律性，提高他们的认识，激发他们的阶级觉悟。忠诚的职业革命家提供了仿效的榜样，他们"从外部"把自己的形象带给群众。他们不断重申自己确乎是无产阶级的一部分，而且是唯一的更觉悟、更先进的"先锋队"，使得这"局外人"被认为是运动创始人而得到群众认可。在我看来，尽管列宁接受马克思的基本原理，我们还是得承认，列宁已把马克思主义，至少是部分马克思主义，转变到我称呼的精英主义一边，否则就无法正确理解列宁的思想和他领导党的早期实践活动。

苏联的人的现代化道路

当列宁及其同志在1917年执政时，面临着一些前所未有的问题和另一些与众不同的问题。当然，从很多方面来说，他们面临的局面类似于近二三十年来许多不发达国家领导人所遇到的情况。这些问题不全是经济、政治或者军事问题，其中包含了心理——文化定势的主要部分。他们发现，群众的特性，特别是人的生活模式，人与自然，人和社会之间的交互作用，并没有最大限度地把人民统一到革命所期望建立的生机勃勃的新社会秩序中。

初创的苏俄明显地带有不发达的种种标志：文化水平很低，学校发展不足；大众交通工具分布有限；与高出生率相伴的高死亡率；农村人口的过分集中和伴随而来的低水平工业化，等等。人的主观因素不可避免地要和这些客观条件相联系。经过1917年革命，沙皇俄国人口中的一部分已从心理上跨过了现代化门槛，但是这些人只构成非常弱小的社会阶层，它仅包括知识界的一部分，工商界的一部分中产阶级，以及人数不多的城市工业劳动者的一部分。社会的其余部分在不同程度上表现出典型的被传统束缚的人们的观点倾向。

我们在人的现代化研究中已确认，我们经验地定义的那种理想的现代人，是一组互相联系的个人品质的综合。① 用“现代”一

① 关于发展的社会和文化因素的哈佛计划的材料，参见阿历克斯·英格尔斯《人的现代化》，载《现代化：增长的动力》（纽约：基础读物出版社，1966年），迈伦·韦纳主编，阿历克斯·英格尔斯《使人现代化》，载《美国社会学》期刊第75期（1969年），第208—225页；阿历克斯·英格尔斯和戴维·H·史密斯《走向现代》（坎布里奇：哈佛大学出版社，1974年）。关于衡量个人现代性的其他报告，参见J·L·M·瓦森的《非洲的传统抵制西方化》，载《英国社会和临床心理学》期刊第6期（1967年），第81—96页；约瑟夫·卡尔《现代思想之测评》，（奥斯汀：得克萨斯大学出版社，1968年）。

间标志这一综合的特征，其正确性可由以下两点得到证实：在纯理论方面，它构筑于外在的合理性基础上，即在这一范畴里所提出的问题的要旨，和我们关于人的现代性的理论概念相符合。其次，标准方法的运用也证实了把这组个人品质的综合称之为"现代"的合理性。表现出这些个性综合的往往是那些受过较多正规教育的人、大众媒介的使用者、城市居民，最重要的是那些产业人员和现代化的经济部门中的人员。

在列宁、斯大林和整个共产党纲领所展开的旨在把苏联人民改变成动员起来的、工业化的、集中的、科层化的民族的过程中，个性综合的各种要素与我们研究的模式中的因素是相似的。我们曾在阿根廷、智利、东巴基斯坦、印度、以色列和尼日利亚这六个发展中的非共产主义国家里，在人员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人的现代性的主要成分。为清楚起见，将其列举于下。我将既描述现代人模式的各种要素，同时也概略地指明它和苏联官方概念中的理想公民有何相似。①

① 遗憾的是，对我来说，没有资料能使人对苏联官方的理想公民概念作综合评论。可从下列资料中浮光掠影地得到有益启发：阿历克斯·英格尔斯《苏维埃俄国的舆论》，（坎布里奇：哈佛大学出版社，1950年）；玛格丽特·米德《苏维埃权力观》，（纽约，麦克罗-希尔出版公司，1951年）；雷蒙德·A·鲍尔《苏联心理学中的新人》，（坎布里奇：哈佛大学出版社，1952年）；朱尔斯·莫内罗《共产主义的社会学和心理学》，（波士顿，比肯出版公司，1953年）；卡尔·J·弗里德里克主编的《极权主义》，（坎布里奇：哈佛大学出版社，1954年）；雷蒙德·A·鲍尔、阿历克斯·英格尔斯和克莱德·C·克拉克洪《苏维埃制度的运转》，（坎布里奇：哈佛大学出版社，1956年）；H·康特利尔《苏联领导人及其对人的控制》，（新泽西州新不伦瑞克：路特杰斯大学出版社，1960年）；阿历克斯·英格尔斯《苏维埃俄国的变化》，（坎布里奇：哈佛大学出版社，1968年）；孟尔·D·霍兰德《苏联的政治灌输》，（纽约，普莱格出版公司，1972年）。以上引用的部分资料讨论了与官方行动鼓励的模式经常矛盾的模式，补充了对苏联理想公民的描述。对这一模式的更明晰的陈述可见内森·莱特斯《政治局的运行机制》，（纽约，麦克罗-希尔出版公司，1951年），关于最近的情况，可从苏联的众多地下出版物的概述材料（samizdat）中得到。

然而，在叙述这两种并列的模式之前，必须先提出一些注意事项。第一，以下描述的现代人的品质应视作相对的而不是绝对的。因此，当我们说现代人对民众领袖的忠诚发生变化，改变了更为原始的联系时，仅仅在和同一文化中传统人相比较时，才是正确的。这一定义使人毋需割断他对传统领袖的全部或大部分忠诚和联系就能现代化。第二，必须认识到任何一般模式应用于具体历史环境时，必定有所区别和选择。因此在苏联，再三重申个人与其民族或宗教团体的最初联系，在某些特殊情况下，可视为最现代性的，而不是人的传统性。例如，苏联著名犹太科学家中就有这样的人。但这种特例不会使人误以为模式适用于大多数情况。第三，我们应该注意，下面两种模式可视为经验的真实，但在程度上有重大不同。现代人的模式已经过广泛的经验检验。而与之对照的苏联公民的理想模式，只不过是苏联问题研究者对官方资料中纲领性观点分析的产物。

要素 1：现代人日益从父母和教士等传统形象的权威中独立出来，并注意维护这种独立。他们变得更忠诚于政府领袖、公共事务、工会、合作团体，等等。

苏维埃政权注重把个人对最初社团的忠诚转移到其他对象上，特别要求个人忠于共产党和苏维埃国家。苏联早期的肃清“资产阶级家庭”和东正教影响的运动就是突出证明。在以后的各个发展阶段，苏维埃政权以更大的努力，去培养个人对国家的高度忠诚。这种延续至今的作法是苏联历史上最显著的特点。委婉地说，这种运动在外界经常被视为带有强烈的国家主义色彩。

当然，这种忠于共产党、绝对赞同和支持共产党领导的思想可以概括成党性，它始终被有力地灌输给人们。的确，从1930到1950年，这方面的巨大努力已经达到了长期目的。与此同时，特别是那种极端效忠和献身于斯大林个人的作法，导致了苏联人自己

称呼的"个人崇拜"。当然，斯大林逝世之后，情况已经正常化了。在苏联的某些闭塞地区，人们忠诚于巨大的亲属关系网，忠诚于自己的部落，忠诚于地方宗教领袖，仍然超过对苏维埃国家的忠诚。但总的说来，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更不用说70年代，从现代性的第一个要素来看，可说绝大多数的苏联人已经完全而且相当稳固地站在现代化一边。

要素2：现代人对公共事务和地方政治表现出浓厚的兴趣，并积极参与其中。

在苏联，对于个人现代性的这一要素，有着不同的有时甚至是具有一定压力的解释。苏联人积极参加公共事务，并不意味着个人或者追求自决权的团体自主地参加，而是意味着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任务。这些任务是由党的领导指明的达到目的之手段。个人现代性的这一要素在上述范围内，方得到苏维埃制度的优待，并在苏联公民模式内最终得到重视。在地方党组织中积极工作，以鼓动家的面目出现，参加工会和其他集体组织的各种活动，给编辑写信，等等，这些都是希望苏联公民积极从事的活动，是建设社会主义的宏大规划的一部分。

要素3：现代人力求随时掌握新闻信息，他们更喜欢国内外新闻，而不是体育、宗教节目，或者纯粹的地方新闻。

苏联领导人不断关心的是充分发展大众传播媒介，并在人民中充分宣传新的世界观，这已有足够证明，毋庸赘述。有关国家发展过程的新闻和消息，少量的国际新闻，几乎成了苏联大众宣传的全部内容。宗教事件理所当然地不予报道，连体育新闻也只占很少的份量。

要素4：现代人在征服自然、掌握机械、改进人际关系的实践中，对新经验和新方法持开放态度。

苏维埃制度自然不鼓励人们进行政治实验，也不允许其人民

持有这样的想法，即除了在共产党的绝对唯一的领导下建立的制度外，还有其他的制度值得认真考虑。但是苏维埃制度在很多其他方面，在家庭、学校、农业和工业中的新型社会组织方面，有着长期试验的历史。苏维埃政权的目的之一，总是培养公民乐于接受这种革新，尤其是用来改进技术的革新。这种革新导致产生新机器、新技术，或者是把劳动力与其生产任务相联系的新方法。

要素5：现代人相信科学和医学的功效，在生活的困难面前总是避免宿命论的观点，力争主动。他相信人能够学会主宰自己周围的环境。总之，他表现出注重个人功效和社会功效的意识。

投身于变革自然和社会，使之符合人类的美好理想，是共产主义世界观的核心。它在苏联既特殊地表现为"建设社会主义"的概念，也具体地表现在典型的苏联经济活动的巨大工程中。比如，第聂伯大坝就象是"建设主义"(constructionism) 这种世俗宗教的圣殿。以后，苏联的第一个宇航员的近乎神化也提供了类似的说明。在困难面前的消极被动，更不用说宿命论，在苏联几乎被当作原罪。成为一个布尔什维克就意味着他能战胜一切困难。因此，坚持培养"意志"，特别是培养建设的意志和完成任务的意志，成为各级苏维埃教育的基本组成部分。

要素6：与功效观念密切相连的是，现代人注意掌握时间。他们根据时间安排自己的日常工作生活。对他们来说，预先计划是个人和国家事务的基本内容，而时间观念本身只不过是对计划的更大考虑的一个方面。

现在，苏维埃政权为训练苏联人民的、尤其是从农村招募来的工人的时间观念而进行的斗争，已经成为遥远的过去。当时由于个人住房困难，没有安稳的居住条件来保证他们在工厂和办公室的必要的工作时间，曾使这一斗争大大复杂化。再加上城市公共交通系统的不可靠，使矛盾更为尖锐。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尤

其在1970年代，这些问题看来大部分已经解决了。

鉴于已讨论到计划，还有一点要说。苏联的政治经济体系最清楚的特点之一或许就是对计划的强调，以及由全体人民承担义务，努力完成计划。这是众所周知的。

要素7：现代人充分重视个人的机会，他对完成自身的教育、获得各种技能、改善个人的条件均表示兴趣，特别是对他的孩子获得教育和职业抱有很高的希望。

前已述及，现代人注重功效而不是消极认命。个人现代性的第七个要素在某种意义上是这种观点的延伸。他不接受自己生活中天生的或既定的地位和条件，而是坚持不懈地努力加以改进。在现代工业环境中，获得额外的教育、技能和生产特长，是人实现其雄心壮志的几种主要方法。苏联消灭了私人企业，对私人资产的积累和使用严加限制，导致人民把改善自身条件的努力几乎全部集中在得到额外的教育和技能上。除此以外，只有少数人宁可在党组织机构中向权力道路前进。

中国的情况

呈现在我们面前的中国共产主义在某些重要方面和苏联的发展虽有显著不同，但毛泽东和他的合作者在中国大陆为巩固政权所遇到的挑战中，有许多特点与列宁、斯大林当初努力使苏俄现代化的情况十分相似。在教师参考书和儿童教科书中，① 清楚地反

① 特别幸运的是，我们得到了共产党中国小学课本的详尽而高质量的分析材料。这些教学参考书由在北京的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1958年到1964年在北京和上海使用，以指导小学一年级至五年级的学生。参见查尔斯·P·里德利、保尔·H·戈德温和丹尼斯·J·杜林《中国模范公民的形成》，(加利福尼亚州斯坦福：胡佛研究所出版，1971年)。

映出中国领导人希望在其公民中灌输的品质。对这些书籍进行分析，便可明显地看出，对我们所规定的现代人的品质的考虑，是怎样全面地渗透在共产党中国的教育过程中。

例如，教师负有"培养学生的建设性、计划能力和创造性"的责任（第46页）。"生活指导"一节的基本目的是："培养儿童的自我认识能力和自主性，培养他们的革命理想、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精神"。（第49页）。为了达到这些目的，要求教师采用"竞赛和挑战的方法来激励儿童的首创精神和事业心"（第50页）。从"共产主义道德"的原理出发，应该教育儿童"反对一切人压迫人的现象，不分民族和地区，为解放各种剥削制度下的全体劳动人民而斗争"（第54页）。

教学参考书简略叙述的上述目标，在儿童教科书的课文主题中也得到反映。课本中很大一部分内容涉及共产中国和传统中国的一般社会组织、共产党、人民解放军，还有从科学基础知识直到简单的个人卫生问题。自然，课文告诉孩子们，旧社会一切皆坏，新社会一切都好。然而对我们来说特别重要的是，通过施教而灌输的日常生活的信念和价值观，所培养的人的方向，课本选用的材料所赞赏的个人品质。通过研究课本，得知他们赞赏的"工作信念"包括："只要功夫深，铁杵磨成针"；"科学是万能的"；"只要掌握规律、努力工作，人定能胜天"。

此外，课本认为特别值得赞扬和仿效的个人品质有："勤学苦练"；"坚韧不拔，锲而不舍"；"有志者，事竟成"；"为建设'新'社会而献身"；"慎思远虑"。（第191—192页）。

从以上把儿童社会主义化的引录中，能清楚地发现我们先前确定的现代人的大多数特性：忠诚于国家和超地方性组织；积极参与公众事务；积极而又自主的个人抱负；消息灵通，对公共事务保持兴趣；个人和社会功效的观念；容纳革新和新经验，等

等。

我们的现代人模式和中国领导人造就青年的模式之间，有广泛的相同之处，同时也得承认苏联和中国的重点各不相同，它们中的任何一国和其他处于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发达国家或者和采用混合经济模式的发展中国家之间，也有显著差别。例如，中国特别强调农民优秀品质的重要性，强调与之相关的勤俭节约。苏联则更多地认为其理想公民要么是高技术工人，要么是科学家和专业人员。另外，苏联和中国的模式中，对个人表现和个人自主问题的看法，都和非共产国家的现代人观念大相径庭。前者着重强调的是集体目标、集体利益和集体性，而不是个人的发展。

不过，非共产世界中不发达国家的现代人研究以及苏联、中国体系的理想公民定义表明，它们确有一致之处。这种重要的相似已经超越时间、空间和文化的局限，提出了所有发展中国家面临的共同问题，即怎样使它们的人民形成新的价值标准，引导他们更完全更有效地参与新兴的城市工业社会秩序。

个人现代化的变迁

当然，我们关于个人现代化的模型过于抽象。我们在传统性和现代性之间人为地划了一条线，将个人象棋子一样沿着这条线摆来摆去。A在一定范围内连续走这个方向，B则朝那个方向。这样做我们便掩盖了现代化过程中的冲突、斗争、困难和个人现代化所付出的代价。

例如，当对部落、宗教、家庭的原来的忠诚转移到国家、党、公社、工会上来时，就有冲突和斗争。阿基贝在他的小说中敏锐地揭示和描述了尼日利亚土著在其现代化进程中与忠诚于氏族、家庭

的心理抗争的感受。① 在苏联，努力打破信徒对东正教的虔信和忠诚这一严酷的史实，不会很快就被忘却。相对而言，我们对中国的有关情况仍很不了解，犹如雾中看花；但是我们很容易就能想象，中国人已挣脱了孔夫子孝悌忠信的文化束缚，成了绝对忠诚于国家法令和地方人民公社的人。

当然，不仅在传统要求和现代需要之间存在矛盾，最重要的问题还在于理想的现代人定义中，各要素之间的冲突。现代工业秩序既要求个人具有首创精神，即独立自主，自行其事；也要求他能调节自己的行动，把自己的活动与现代大型组织培养和依靠的复杂的相互依赖性联系起来。但各种要素之间充其量只能形成脆弱的平衡，在许多场合必定会发生原理和要求的猛烈冲突。在苏联和中国这样的制度中，问题似乎格外尖锐，国家过于强调其人民对集体目标的献身，以至于人民很难同时保持其高度的个人创造性。

后现代化的人

苏联不再是一个欠发达国家，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它在某些方面已明显地进入发达国家的行列。它日益成为处理那些更多地在后工业社会才出现的问题和事务的国家。在国家发展的这一阶段，一般人的现代性从统计数字看已不再有什么问题，但是个人现代性的结果可能成为制度的一个严重问题。

根据社会经济发展各阶段都有相应类型的人的原理，后工业社会必定会有后现代化的人。由此，我们开始了个性和社会结构的相互关系全面刷新的时代。我们可期望个人品质在某些方面再

---

① 参见钦努亚·阿基贝《事业的崩溃》（纽约：麦克道维尔·奥伯伦斯基出版公司，1961 年）；艾德姆的《上帝之箭》，（伦敦：海涅曼出版公司，1965 年）和《人民的一员》，（伦敦：海涅曼出版公司，1966 年）。

次成为注意的中心，其中有些品质将超越不同社会经济制度的界限，而有些仍带着这种或那种制度明显的痕迹。例如，在苏联和美国，都可以发现日益增长的对过分科层化的不满和憎恶，深感个人必须更多地控制自己的生活。在这两种社会中，都存在的普遍倾向是对无限增长的理性表示怀疑，为阻止破坏生态结构的脆弱平衡而激烈的争辩。

但在其他方面，这两种制度对于后现代化人的侧重面看来有相当的差异。例如，非共产国家的后现代化倾向包括对地方自治主义的强烈兴趣；对贫困、不受教育和落后的经济生活方式的浪漫的美化；衣着和头发式样上的古典派、象征派或其他与众不同的风格；排斥理性，追求超自然的灵感。这一切现象在苏联的反主流文化中表现不突出。苏联的运动在个人衣着和道德方面比较保守；它注重理性和实践，不崇拜感情和感觉；它坚持确实履行法律和宪法的保证，不强调启示录式的或者超自然的想象。

夏建平　译

第三部分

世界体系中的危机与依附关系的转变*①

安德烈·甘德尔·弗兰克

近500年间，日益增加的很大一部分人类生活在一个统一的世界经济体系中。体系中基本上不变的不平等结构和不平衡发展，正如它的生产方式一样，是建立在富裕与贫困，发达与不发达，周期性的扩张与停滞的两极分化基础之上的，而且加剧了两极分化。世界体系中诸多的变化带来更多的是希望，而不是现实。我将回顾资本主义危机的主要历史，以及当今世界的经济危机，以追溯资本主义的结构和发展。然后我将考察脱离依附资本主义发展体系而选择自力更生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最近的经验和不远的前景，包括社会主义经济重新与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发生关系的最新趋向。这项研究还将考察在不远的将来摒弃依附和改变世界体系的现实性。

这个统一的世界经济体系由许多非常不同的部分组成。发达

---

* 本文选自罗那德·契尔考特和德尔·约翰逊主编的《发展理论：生产还是依附》。

① 本文主要根据三次学术演讲改写而成，两次在东京外国研究大学，一次于1980年在希腊雅典的地中海研究会议中心作关于《向社会主义转变》的学术演讲。感谢德尔·约翰逊先生特意提供大量编辑上的帮助，将这三次演讲合成一篇论文。

的北方和落后的南方；资本主义的西方（当然包括日本）和社会主义的东方。我们将指明世界各个不同部分各自的特征，包括第三世界，它变得越来越分化。在世界体系中，存在不同的生产方式（我喜欢称为生产关系）。今天，在世界的许多地方，前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依旧非常盛行，同时存在资本主义雇佣劳动生产关系，或许还有后资本主义（指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然而，重要的是，在一个统一的资本主义体系中，各种生产关系结合起来对资本积累的世界过程起作用。它们共同的特征和作用我已在早些时候的其它地方考察过了。①

世界体系历经周期性的经济危机，危机贯穿其全部历史。经济危机即指某段时期，在此以前的生产扩张不能再在同一的基础上持续下去。为了在危机中求生存，体系必须承受巨大的经济、社会、政治和文化的变动，包括技术的改变。需要降低生产成本：削减工资、把工厂迁移到生产成本较低的地方、以及（从长远看，特别重要的是）革新技术。在危机时期，新的发明创造需要巨额投资，使它们能在下一个扩张阶段成为新的生产基础。

世界体系今天再次面临这样的危机。关键在于世界资本主义体系是否有能力作出必要的调整。如果不能，毫无疑问它将自取灭亡。如果它能够作出某些调整，那就有理由相信，象经过调整的战后年代那样，它将经历又一个扩张时期。这可能发生在 10 年或 15 年之后，也许需要更长的时间。在这个调整的阶段，世界又要经受经济、社会、政治和文化的动荡。

在危机时期，还有一个趋势，领先的经济大国，现在是美国，将失去它的统治权，受到新兴经济强国的挑战，现在是西欧和日本。20 世纪 60 年代，欧洲的生产率的增长是美国的 2 倍，日本几乎是

① 参见后面的三个注释。

美国的4倍。到70年代，这些国家的生产率的增长速度都放慢了，而且从1979年开始，美国的生产率下降了。这就是美国地位相对下降的真正的经济原因。统治的中心美国，已不可能迅速地作出某些必要的经济、社会和政治调整，来和能更容易地作出调整的新兴经济强国竞争。

世界体系极不平等。资本积累过程，虽然是个单一的过程，在不同地区和不同部门却很不相同，而且由不同的生产关系所产生。它也极不平衡，生产相对停滞的阶段紧接迅速扩张的阶段。这二者是有联系的，不平等性在经济停滞或危机发生时急速地改变了。而且作为对积累危机的反应和结果，会发生进入或退出、联系或脱离世界体系的现象。

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发展简史①

我们的历史评论是倒叙的，上文已谈到最近的一次经济危机，现在再回溯前几次危机。目前的危机开始于20世纪60年代，即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的经济扩张阶段之后。这一扩张阶段完全依靠1914年到大战之间的长期危机所带来的变革才得以实现。这些危机包括第二次世界大战，30年代的大萧条，法西斯主义的崛起，苏联和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以及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发展。换句话说，这些危机导致了经济、社会和政治的巨大变革，为新的经济扩张打下了基础。战后发展的另一个基础是危机中劳动工资率大幅度下降，它部分由于原始积累过程，即在非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基础上进行资本主义积累。我可以举出实例，如德国大

① 这一节根据弗兰克著：《世界积累：1492—1789》（1980年），《依附积累和不发达问题》（1979年）。

量依靠的东欧集中营劳工，以及东欧国家普遍存在的对劳工的虐待。类似的积累形式还有日本帝国主义的大东亚共荣圈。危机时期也是大英帝国地位绝对下降的时期，以后美国取得了支配地位。这也是不存在哪一个帝国主义强国能够称霸全球的时期。这是解释疯狂的两次大战发生的一个重要因素，大国将通过战争来决定由谁继承大英帝国的世界统治。

这场明显地增强资本主义的危机影响深远，旷日持久，它发生在1896年至1913年扩张阶段之后。在此之前是1873年至1895年另一次重大的世界经济危机，而这场危机又发生在1850年至1873年另一次扩张阶段的后面。简要言之，1967年至80年代是停滞阶段；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到1967年是扩张阶段；1913年至1940年是停滞阶段；1896年至1913年是扩张阶段，1873年至1895年是停滞和危机阶段。

1849年至1873年的扩张阶段类似于20世纪的战后年代。当时，大英帝国是世界经济和政治的主导力量，称为"英国统治下的和平"，就象第二次大战后"美国统治下的和平"。这次扩张导致新的危机，类似于今天资本积累的危机阶段。危机的转变主要表现为英国的地位相对下降，而美国和德国，接踵而来的是俄国和日本开始兴起，并都向英国挑战；在工业化国家中发展了垄断资本主义；至关重要是古典帝国主义的发展和重新瓜分殖民地，特别在非洲。这些就是新的世界体系产生的经济和政治基础。新的基础保证了1896年至1913年的经济扩张。

而且，在每一次重大的危机中，一段时期技术发明总是迅猛涌现，新发明的目的是在新的生产部门中努力降低成本和扩大生产。在熊彼特看来，这些发明随后就导致了创新。对新技术工序大量投资，建立新的主导工业时的创新为世界资本主义的下一次经济扩张奠定了基石。在简要地对危机时期作历史性的评述之后，我

们还将回到创新这个主题。

1816 年至 1848 年又是一次半停滞和危机时期，它引发了西欧 1848 年著名的革命。它承接第一次巨大的经济增长时期，即从 1790 年左右到 1815 年拿破仑战争结束，通常被认为是工业资本主义的发轫期。在经济史的解释方面，我离正统的经济学愈来愈远了，因为马克思主义者、康德、拉季耶夫的门徒和其他许多人，不仅认为这段时期是历史上的转折点，而且认为它是资本主义制度的开始。这在英国正是工业革命的时代。许多人会争辩说此前没有什么资本主义，因为工业劳资关系不占统治地位。因为没有工业，就无所谓工业资本主义或者任何类型的资本主义。我的解释与此根本不同，这个问题与本书的主题生产方式有很大关系。

考察一下 1762年至1790 年这段时期。当时面临着资本积累的危机，结果发明了降低成本的技术，尤其是在纺织工业中的发明和瓦特的蒸汽机，它们为工业革命奠定了技术基础。然而，直到 1790 年至 1815 年之间的经济扩张同第一次工业革命发生联系，这些领域内的真正的技术创新才出现。接着的 1815 年至 1848 年是相对停滞和经济危机周期，人们发明了生产机器的机器，从而导致了那个世纪中叶的又一主要的投资高潮。换言之，第一次工业革命是消费品生产的革命，特别是纺织品生产。有时被称为第二次工业革命，或至少是工业革命第二阶段，是纺织机器生产的革命，此前纺织机器是手工生产的。现在机器也由机器生产，如纺织机器，蒸汽机，由动力蒸汽机发动的机车，以后还有蒸汽船。随后在从 1873 年至 1895 年经济危机期间，技术发明为技术和工业革命的第三阶段打下了基础。这次革命的基础是电力和石油，还有内燃机，它导致了汽车的出现，汽车使世界上大部分地区的社会面貌焕然一新。在本世纪 20 年代至 40 年代，新技术渗透到石油化工，电子工业和核能领域，它们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经济扩张提

供了技术准备。当前，我们显然又处在一系列降低成本的技术发明的开始阶段，这些发明的基础是微型集成电路，生物工程（即遗传学和增育基因以产生新的生命形式的新技术）。技术飞跃也许还要扩展到能源领域，它将为本世纪末的技术革命创造条件。

以上我把讨论局限在世界经济体系的中心，作为这一系列扩张和收缩的一部分，多少还讨论到了经济发展过程中世界中心从大英帝国向美国的转移。而帝国主义的兴起，作为一个世纪以前1873——1896年经济危机的后果，却几乎没有提到。

直到1816年，印度制造业的出口大于进口。整个18世纪和19世纪初叶，印度是向世界其它地区出口的大国。工业革命的一个重要基础是印度纺织工业的摧毁和所谓的印度非工业化。马克思讲到原始积累和生产者与生产资料的分离，即土地所有者失去土地，工具所有者失去工具，成为领取工资的工人无产者。当然，这正是英国发生的情况，它可以作为这项研究的主要样本。马克思1852年在《纽约论坛报》上发表的著名文章中指出：从英国这面镜子里，能看到印度的未来。如果这一论点是正确的，那么它实际上还没有发生，因为很明显，印度至今没有象英国那样发达。相反，在资本主义发展的过程中，无论西方还是北方，生产者与他们的生产资料分离之后，就作为无产阶级工资劳动者，再被吸收进生产过程。这带来了极大的苦难，马克思看到这一点，而恩格斯淋漓尽致地把它写在关于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的书中。在今天叫作第三世界的南方，这个过程根本没有发生。在农业、制造业和手工业中，生产者确实也与他们的生产资料分离了，但与北方不同，他们并没有作为工资无产者真正地重新并入或被吸收进生产过程。在这方面，马克思犯了严重的错误。直到1816年，印度制造业的出口仍远远大于进口。除印度外，在今天属于第三世界的许多其它国家，当时仍然是本地的制造业供给本地的消费。工业革命在世

界范围内把制造业从全世界转移到今天称为"传统"的工业化国家，从而使世界其余地区非工业化。1800年前后，西方、东方和南方(除在某些部门如武器制造方面)技术差距并不大。通过西方的工业发展和今天称为南方的地区的非工业化，技术差距开始拉大了。第二次工业革命期间，情况更糟。19世纪中叶，西方继续用机器制造机器，技术差距真正扩大了。因为南方这次也没有加入这一进程，它落后了两个阶段。它不仅不能象西方那样用工业化方法生产制成品，也没有能力为工业生产制造机器设备，这两者第三世界都依靠从西方进口。

在20世纪30年代的经济危机中，进口取代政策给一些国家带来了若干工业。在当前的危机中，通过鼓励出口的出口取代政策，在某种程度上显然开始了第三世界重新工业化的过程，有些所谓的传统工业从北方或西方向南方转移。然而，在西方这些转移的工业大半已比较陈旧和过时。西方国家正在继续进行基本上依靠技术生产技术的新科技革命。首先是消费品的生产，其次是生产物资的生产，现在则是生产技术的生产，西方(现在当然包括日本)从事技术的生产，使得南方国家有可能生产某些消费品和生产物资。同时，西方在技术生产的新过程中保持垄断权，因此，科技差距继续扩大。

我以上只描绘了经济危机和经济扩张的最简要的历史轮廓。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根深深地扎在工业革命之前的土壤里，而传统史学和马克思主义史学总是认为它植根于工业革命。这里没有篇幅加以深入的探讨，但我要提一提。如果仅仅根据欧洲或英国的经验来理解资本主义和它的历史，仅仅考察18世纪末封建主义向工业资本主义的转变，然后分析它向其它地区的传播，那末我们会遗漏历史上和当代资本主义发展的某些本质的东西。而如果过去的资本主义发展的本质被遗漏了，那就根本谈不上理解当代和

未来历史发展的实质。鉴于以上原因，我认为至关重要的是，通过历史来把握现实，通过研究统一的世界经济体系发展中的世界联系，来理解历史和现实。这个体系的根深埋在好多个世纪之前。尽管世事多变，尽管有一个又一个地区、文化和民族的加入，这一体系还一直保留着某些重要的特征。我认为这些基本的结构特征至少有以下几点：它是一个统一的体系；地区之间很不平衡；它经历了连续不断的不平衡发展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危机时期比扩张时期更长，并且对于发展过程来说，也许是更重要的。对我们说来，重要的是世界正再次经历一个新的周期性经济危机。最近的经济危机的政治解决方式基本上要依阶级斗争的结果而定，就如历史上决定于阶级斗争的结果一样。

当前世界经济危机面面观①

当前世界经济危机，是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资本积累的又一次总危机，类似于半个世纪以前（1914——1940/1945年）和一个世纪以前（1873——1896 年）的经济危机。经过两次大战之间的最后一次重大危机，经济在战后重新繁荣起来。这次经济增长持续到1973 年，但事实上它在 1967 年就开始减慢，转入一次新的相对停滞和经济危机时期。起初，这次危机表现为利润率下降和新的周期性衰退。1967 年经济出现衰退，但不包括美国和日本，前者（后者部分地）是因为美国以财政支出维持越南战争。在这次衰退中，工业化资本主义国家（北美，西欧，日本，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官方公布的失业人数高达 500 万。1968年至1969年的经济复苏中，失业

① 这一节是弗兰克两本书的摘要：《世界经济体系中的危机》（1980 年），《第三世界经济危机》（1981 年）。

人数有所下降。接着是1969年至1970年的衰退，美国和日本也名列其中。工业化国家的失业人数上升到1000万。

这次衰退后果极为严重。衰退前，世界市场充斥着美国为支持越南战争而发行的美元。60年代中期，工业生产国的相对劳动生产率起了很重要的变化。欧洲劳动生产率的增长速度是美国的2倍，而日本又是西欧的2倍。在1969年至1970年的经济衰退中，经济增长率下降，使世界市场相对竞争力的改变和美元泛滥的情况更加恶化，结果导致尼克松于1971年8月15日宣布"新经济政策"和日本所谓的"尼克松冲击事件"。尼克松在美国实施工资和物价管制政策，美元与黄金脱钩，美元贬值，以及对日本的进口商品征收10%的差别附加税。他有效地摧毁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由布雷顿森林会议建立的以固定汇率为特点的国际货币体系的基础，从而为汇率波动和美元贬值大开方便之门。这一决策试图增强美国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结果美国的出口迅速增加，尤其是武器和农产品。紧接着的1971年到1973年出现了经济复苏，但是为期短暂，而且导致1973年至1975年的世界性大衰退，官方公布的失业总数将近1500万，美国约占900万。

1973年至1975年的衰退结束了日本的高速经济增长。在1974年，日本象其它西方工业国一样产量下降。自那以后，1975年到1979年又一次经济复苏，其中美国失业人数再度减少，而加拿大、西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失业人数却继续上升。西方工业世界的失业总数在所谓的复苏期间从1500万增加到1700万。1979年至1980年，新的衰退袭击了西方世界，失业总数增至1980年的2300万左右。经济合作和发展组织预测1982年失业总数将增至3100万。这个数目几乎等于一个工业大国的全部劳动力，而且，这仅是官方的统计数字。实际失业人数比政府公布数字高得多。这对日本说来尤为正确。例如，1974年日本登记的失业人

数为73万。但根据一份《就业状况调查》，实际失业人数达327.6万人。实际男性失业人数是官方登记的2倍，女性则为10倍。这个数字还不包括另外400万人，即只有部分工作而希望更长时间工作和对寻找工作失去信心的人。目前，这个问题由于工人被迫提早退休而更加严重。

投资也减少了。利润率在1967年就开始下降。它对经济政策的重要影响是，经济扩张主义要求保持的凯恩斯学派政策被放弃了，这被认为会产生通货膨胀。各处的凯恩斯学派的经济扩张主义被通货紧缩政策所代替，以降低生产成本。在工业化国家，这项新战略表现为施行紧缩开支政策、福利国家的衰落和试行降低实际工资。这在某些国家比另外一些国家成功。实际工资在美国和英国下降了。在70年代的一段时期里，日本的实际工资也下降了，即通货膨胀率超过了货币工资增长率。这项降低成本的努力使投资的性质发生了变化，用以降低工业生产中使用的劳动力和劳力成本。

为了使这些措施合理化和法律化，人们经常呼吁回到传统的价值观，回到国家团结，回到经济和政治民族主义。一句话，在工业化世界中，政治态度显著地向右转。这次转变明显地表现在美国罗纳德·里根和英国玛格丽特·撒切尔的当选及其政策之中，也表现在澳大利亚的弗雷泽政府和新西兰的马尔登政府中。日本的政府与地方议会和议会选举都表现出向右转。在西德、斯堪的纳维亚和其它地方，甚至工党和社会民主党都明显地右倾，奉行更保守的经济政策。实际上正是詹姆斯·卡拉汉的英国工党政府和美国的民主党总统吉米、卡特首先放弃了凯恩斯学派的经济措施，在各自的国家执行新的紧缩政策。这就是他们为什么失去选民支持的原因。选民现在支持保守党和共和党，它们仅仅继续执行和扩大同样的货币主义紧缩政策而已。在工业国中，只有法国稍微

向左转，但法国对密特朗政府的经济政策有许多严格的限制。

另一种降低生产成本的方法是把部分生产工序从人工成本较高的地方迁移到较低的地方。这项政策适用于使用大量劳力的工业，如纺织业，服装业，制鞋业，玩具业，电子元件业等。最近，由于经济危机而陷入困境的资本密集型工业（以及污染性工业和支付高昂的反污染费用的工业），如汽车工业、造船业、钢铁工业和石油化工业，也逐渐转移到第三世界和社会主义国家。里奥·格兰德河以南的墨西哥北部边境在60年代开始见到新建的工厂，其产品向美国市场出口。接着，南朝鲜、香港、台湾和新加坡开始了60年代末所谓出口导向的经济增长，生产劳动密集型的商品向国际市场出口。特别是南朝鲜和东南亚（香港除外），大部分都由外国资本投资，尤其是日本的投资。

在70年代经济危机的影响下，工业的地区调整过程扩展到马来西亚和菲律宾（当这项政策在1972年实施时，马科斯总统公布军事管制法决非偶然），以及泰国、斯里兰卡、印度、巴基斯坦、埃及、突尼斯、摩洛哥、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各国、所有的加勒比海国家（古巴除外）和大多数拉丁美洲国家。在世界经济危机的影响下，国际分工急速地改变，通过农业综合企业，第三世界成为增加农产品产量供给出口的地区，也引进了新的陆地与海底的采矿技术。第三世界对新的国际分工最重要的贡献是廉价的劳力。而且，他们的政府为国际资本提供各种优惠条件，包括在几年内为公司提供免税的休假日。第三世界国家提供各种基础设施，如港口、机场、铁路、廉价电力、廉价水和无偿使用的土地等。他们甚至建造厂房，向国际资本提供政府贷款或为私人贷款作担保，吸引在他们的国家投资生产，向国际市场出口，以与其它提供同等条件的国家竞争。

国际政治经济机制，通过在第三世界和社会主义国家中重新

安排制造业、农业、采矿业，甚至某些金融业的地点，促进新的国际分工。国际金融体系则为推动这一机制添薪加油。工业资本主义国家的衰退和通货膨胀（即所谓滞胀），再加上油价日涨，使第三世界中的非石油出口国（和某些社会主义国家如波兰）的国际收支逆差急剧恶化。为了弥补日益扩大的逆差，这些国家逐渐转向私人的国际资金市场，它则把石油输出国组织的部分剩余资金转回借给这些国家。另外还以高利率贷给它们一些资金，而工业化国家因为投资很低不会去借如此高利率的贷款。由于借款的增加，特别当借款国无力偿还而需要重新安排不断增大的借款时，私人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ＩＭＦ）作为中介人，合伙或分别对第三世界（和某些社会主义及发达）国家加上了苛刻的经济和政治条件。在获得进一步的贷款之前，各国政府被迫在它们提交的"意向书"中，接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一揽子标准的"限制条件"，内容通常包括通货贬值，削减政府开支（特别是消费者补贴和公共福利），各种降低工资的措施，优待私人资本尤其是外国资本。当人民试图抵制强迫降低他们的生活水准时，这些条件有时会造成"ＩＭＦ式混乱"。（有人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推翻的政府比马克思和列宁加在一起的还多）。该组织鼓励下的第三世界政府政策有一个重要的政治经济后果，尽管还不成为普遍规律，即通过降低第三世界劳动力的价格吸引国际资本和国外进口商（降低工资和通货贬值），实现出口导向的经济增长，支持那些通过出口能获得经济利益的第三世界的国内经济力量。这样，国际金融体系和第三世界国家债务的筹措，为促进基于第三世界出口的新的国际分工格局火上浇油。

所有这些经济政策的政治后果是必须压制劳工的力量，以维持低工资或削减工资。继墨西哥之后，巴西是拉丁美洲的典型例子。1964 年军事政变后，巴西的工资降低了 40％以上。1976 年

军事政变后的阿根廷，工资削减超过50%。(其实在政变之前，由于1974——1975年庇隆政府右翼的经济政策，实际工资业已开始降低。)在智利，政变后的实际工资减少了2/3，工资指数从100下降到30左右。失业人数从4%上升到20%，然而下降到15%，复又升到30%。为了做到这一点，首要任务是必须摧毁或控制工会，经常是从肉体上消灭工会领导。禁止所有反对派势力，把人民投入监狱，拷打，暗杀和流放。其次必须重组经济，从生产适销国内市场的产品，即所谓的进口取代政策，转到生产出口商品。

在20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初最后一次大危机中，第三世界经历了国际收支危机，赚不到购买进口商品的外汇。象墨西哥、巴西、阿根廷、印度和南非等国家开始自己生产制成品供应国内市场，用以替代进口产品。但要做到这一点，他们必须进口资本货物：机器和用于生产这类货物的新技术，他们只得通过出口来支付这些进口的资本货物。为了出口，他们邀请多国公司带着资本和设备来他们的国家，结果不得不大举借债。50和60年代，这个运动遍及其它第三世界国家，特别是许多拉丁美洲国家。满足国内市场的进口取代政策需要人民有钱购买这些商品。因此劳工运动与为国内市场而进行生产的资产阶级结成同盟。这一同盟支持民粹主义的、比较民主的民族主义政府。当这些国家的经济从进口取代的经济增长模式转到增加向国际市场输出的出口导向经济增长模式时，它不再依赖国内市场购买它们的工农业产品的需求。工农业出口产品要求尽可能低的生产成本，军人政权压低了生产的工资成本。

然而，这要求巴西、阿根廷、智利和其它第三世界国家的经济和政治结构作出重大的调整，还必须在政治上镇压生产满足国内市场需求的工业部门的势力及其劳工力量。结果，独裁政权和军政府采取高压的政治措施。这在70年代的第三世界是司空见惯

的事情。镇压首先对准劳工力量，其次是部分资产阶级，以便达到重建经济使之服务于出口生产的目的。这正是南朝鲜镇压金大中和菲律宾镇压阿基诺的政治经济背景。两者都是资产阶级的领袖，反对采取革命的手段而赞成更民主的方式。他们是这些国家中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利益的政治代表，这些人的利益依靠国内市场的发展。因此，至少必须在政治上消灭这些经济利益及其政治代表人物。专制政府和与国际资本特别是与美国、西德、日本的多国公司有密切联系的国内资产阶级结盟。在国内，这个联盟的政治基础是军队，军队是巩固联盟关系的主要力量。这就是发生在南朝鲜、菲律宾、智利、阿根廷和其它国家许多事件的政治经济背景。经济危机造成的严峻的政治经济形势，才是席卷第三世界国家的政治镇压浪潮的真正原因。

经济独立战略和革命战略[①]

总的来说，人们普遍认识到帝国主义、殖民主义、新殖民主义和依附资本主义的消极后果，现在，加上促进出口带来的压力及其经济的、政治的和社会的代价，使第三世界掀起了无数次的运动。这些运动的形式和目的各不相同：民族解放，社会主义革命，非洲社会主义，经济独立，集团的和一国的自力更生等等。但正象许多革命家所承认的，夺取政权非常困难，而把革命成果应用到大众解放上去就更成问题。对当代经验的考察为我们指出了革命的某些局限性，也许透彻地了解局限性，还能找到克服它们的办法。

革命过程意味着国内权力的转移和大众参政，以及取得更大

① 这一节的内容在拙文《全球危机的动力》(阿明等著，1982 年)中有进一步阐述。亦见本人 1982 年 8 月国际政治学协会大会上待发的论文(里约热内卢)。

程度的对外独立。第三世界中的变动总是追求这两个目标或其中之一。有些国家的变动并没有真正追求独立或者权力重新分配和大众参政。例如，苏加诺统治下的印度尼西亚，印度，大部分非洲"社会主义"国家，1961年至1964年古拉特统治下的巴西。这些国家都惨遭失败。有些地区试图实行对外独立，即从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相对地脱离出来，但并不同时进行深入的国内社会政治改革，如纳赛尔统治下的埃及和迄今为止的缅甸。这些政权统治时间稍长一些，但为时并不太久就完全失败了。萨达特总统屈从地采取重新联合的政策，部分地就是接受了纳赛尔政权重大失败的教训。缅甸也迅速采取了联合政策。另外，一些国家并不过于推行对外独立政策，但在不实行对外独立的情况下致力于某种形式的国内重组。例如，恩克鲁玛统治下的加纳，阿连德统治下的智利，在某种意义上也是如此。它们遭到了灾难性的失败。

经验教训之一就是，国家不独立，人民不参政就没有出路。仅仅试图对外独立而不进行国内改革也不能解决问题，而且会更快地遭到孤立。只进行国内改革而没有对外独立也非常危险，实行起来很困难，并且可能是个灾难。对外独立与国内改革，社会与政治动员，这两者相辅相成，而且是迅速深化结构改革，使其不半途而废所必须的。唯一可能成功的国家是今天我们称为社会主义的国家——大力实行对外独立和国内政治变革使我们确实可称之为社会主义。除此之外的其它道路，无论是非资本主义道路，还是非洲社会主义的人民民主道路等等，都不能获得成功。

试行对外独立，不管是否推行国内政治变革，这些经验都有一个奇怪的现象，即虽然独立是自愿的主体，但很快却变成辅助性的，而且由非自愿的独立或"不稳定化"加以补充。基辛格用"不稳定化"指智利阿连德政权的政策，即存在强烈的从外部破坏对外独立和国内政治改革的意图(当然，市场体系的作用助长了不稳定

化)。由于国内吉斯林分子的第五纵队推波助澜，出现了一种压力，使国家对外的独立比原计划推行得更快更远，或者至少国家是在(国内和国外)对抗这一过程的反对派控制下实行对外独立，而不是在推进这个过程的政治势力的控制下自愿对外独立。那就有理由慎重地研究实行独立的现实可能性。事实上，独立不仅是进步政府所奉行的政策，而且是反对进步政府的武器。这个事实提示我们要对独立在今天世界上的效用作理性的反思。

另外两项当代的发展需要我们对目前独立和自力更生的前景寄予巨大的关切。其一是，显然，第三世界新近独立的革命政权对经济独立和自力更生的热情减弱了，更不用说取得成就。前葡萄牙属地几内亚比绍，安哥拉，莫桑比克，通过长期的革命游击战争(和葡萄牙1974年革命)获得独立，但他们都没有从世界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中脱离出来。苏联告诫安哥拉不要成为另一个古巴。在安哥拉的古巴人保卫着提供安哥拉主要外汇来源的海湾石油设施。安哥拉其余的外汇收入靠咖啡和矿产，也主要出售给西方。莫桑比克至今依赖南非(矿业劳动力供给的减少原因不在莫桑比克的政策，而与黄金的价格和生产有关)。"莫桑比克解放阵线"政权回到早先的政策，莫桑比克人重新依靠西方的援助、贸易和私人企业。同样的情况发生在其邻国津巴布韦。前游击队领导人、马克思主义者罗伯特·穆加贝接受萨莫拉·马谢尔的劝告，在伦敦兰开斯特宫的谈判桌上作了妥协，如不这样做就得失去莫桑比克对他的游击队基地的支持。后来穆加贝声称自己不仅是实践的而且是实际的马克思主义者。他承认需要保护外国资本，维持与南非的经济关系，与罗得西亚白人合作。他也没有进行以前许诺过的土地改革。

在尼加拉瓜，桑地诺政府同意偿还索摩查的债务(许多债务是为了与他们作战而欠下的)。它的附加的政府条件是以新债取代

旧债，作为其经济和政治代价，不得用这笔钱引进资本和进口消费品而用来还债。桑地诺政权否决了更苛刻的选择，即否认索摩查债务，从此切断向尼加拉瓜提供信贷的来源，因而它将再也不能进口货物。同时，桑地诺政府寻求保持混合经济中的私有经济，避免承认自己是社会主义。另外，在那些自称为马克思主义的和社会主义的国家(有些则在一二代人以前就这样声称)中的发展也应引起了我们的关切。

社会主义国家的复归①

社会主义东方也处在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中，这也是引起我们关切的一个理由。不仅在贸易方面，而且在生产方面，它们又迅速地合并和重新加入到资本主义国际分工体系中去。而且经互会国家也都面临日益严重的生产方面的经济危机。它们各国和整个经互会只完成了1976——1980年五年计划制定的目标经济增长的一半，有的甚至不到一半。

波兰的生产下降了，经济出现负增长，1979 年减少 2 %，1980 年减少 4 %，1981 年下降 14%。这方面波兰也许是陷入最严重危机的例子。它受到了两方面的压力，一方面苏联要向它的东欧伙伴提高石油价格，另一方面，由于经济衰退而它们向西方的出口面临困难。它们在国际上处于"剪刀差危机"，使人联想起新经济政策时期及其后苏联的国内危机。通货膨胀率上升(如报上所说的，通货膨胀跑到东方去了)。他们没能从经济危机的影响中摆脱出

① 这一节根据《世界经济体系中的危机》(弗兰克，1980 年) 有关社会主义经济一章改写，亦见弗兰克的《全球危机的动力》的有关社会主义的章节。在两篇文章中作者均有深入的阐述。

来。这与波兰工人的反抗，1980——-1981年的经济危机加深和随后的高压政策不无关系。

在大萧条和战争期间发生的重大危机中，社会主义者和社会主义是欢迎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他们喜欢经济危机，反对资本主义。在当前的经济危机中，有证据表明社会主义世界根本不欢迎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事实上，它是反经济危机和支持资本主义的。它尽可能地促使资本主义经济复苏，甚至致力于消除经济危机的影响。保加利亚总理托多尔·日夫科夫说得很清楚："西方的经济危机直接地、深刻地影响我们，因为我们和西方有贸易和其它联系。我们希望危机尽快地过去"。那样，社会主义可以恢复（与西方）日常的商业来往。中国的邓小平雄辩地说明了这一点，至少在当时，他代表亿万中国人民。他和美帝国主义结成同盟，希望中国尽快地与世界资本主义经济重新结合起来，宣称到2000年要把中国建设成为世界工业强国。

波兰的经济危机和其后的政治危机，捷克斯洛伐克和罗马尼亚日益严重的经济危机，东欧和苏联面临的全面经济困难，清楚地表明，经济组织的根本重组和政治的彻底调整迫在眉睫（波兰已经发生）。造成这种困境的主要原因是企图把世界资本主义经济体系（本身也处在危机中）的广泛一体化与经互会国家中经济和政治的僵化嫁接在一起。摆脱困境的出路之一是退出世界体系重新经济独立。尽管这是可能的，但能否成功却大可怀疑。这需要在国内作出难以接受的经济和政治调整。另一种选择是克服资本主义一体化和社会主义僵化嫁接的困难，（自相矛盾地）进一步参加到世界资本主义经济中来，在国内辅之以实行政治上的灵活性（最终可能代价较小）。这也是中国和越南所走的道路（更不用说柬埔寨流亡的红色高棉政权现在已经放弃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这也是北朝鲜一些人所采取的政策，他们以此避免金日成的儿子成

为接班人和过去政策的维护者。

所有这些并非说社会主义的尝试是错误的或无用的。社会主义国家在全面福利方面获得很大的进展。社会主义国家能够满足世界银行公布的"基本需要"。它们的生产增长了。但在提高生产率方面却不很成功。他们动员并投入了所有力量来扩大生产，因此产量增加了。例如，比较一下中国与印度，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等国与土耳其和希腊，或者举苏联这个典型例子：通过社会主义革命，他们现在能够重新参加世界资本主义分工，尽管有完全不同的国内生产基础（即工业化）和完全不同的国外竞争力。

然而，它们的经济增长接近极限。1970 年左右大多数社会主义经济似乎达到了极限，除非它们重新组织生产，提高劳动生产率来充分增加产量。在这里，社会主义经济看来不很成功。提高生产率的需要是它们转向西方技术和重组国内经济的主要原因。但提高生产率要以失去它们早先获得的社会主义相对经济平等为代价，如东欧和现在中国的经验所表明的。

这些社会主义经验既很重要又极有益，但它们没有确切地达到预期的目标，无论国内的或国外的。法国大革命没有使农民掌权，俄国革命也没有使俄国工人掌权。它们在国内带来的并不是我们原来所理解的社会主义。社会主义起初被认为是通向共产主义的一个过渡阶段。今天，如果要证明东欧"实际存在的社会主义社会"，在任何意义上是通向共产主义的过渡阶段，恐怕是极其困难的，甚至是不可能的。相反，如果今天它真是在向什么阶段过渡，那更可能是在向资本主义过渡。

但是，资本主义本身由于经济危机正在过渡和改变，其中社会主义经济的复归和第三世界通过出口导向的经济增长参加新的国际分工的类似的改组，是一体化的促进因素。它们在经济危机期间对生产成本必要的下降和重组世界经济的资本的能力作出了贡

献，为以后可能的新的资本主义经济扩张奠定了基础。这些以及另外一些发展是否会根本改变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结构和运行，仍有待观察，但在不远的将来，这几乎是不可能的。

吴伟卿　译

发展经济学：我们学到了什么？*①

贾格迪什·N·哈格瓦蒂

国家的财富、贫困及其民众，构成了发展经济学的研究范畴。它所研究的问题的复杂性如此之大，其困难程度对于它的研究者来说，无论是苏斯洛夫式的人物，或是政府行政工作人员，都是难以估量的。

我认为，陈述这些困难的最好方法是提醒你们，在上世纪末本世纪初，几乎没有人预见到现代日本的戏剧性崛起；同样，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也很少有人预料到台湾、南朝鲜、新加坡和香港等远东经济后来会出现繁荣，成为成功发展的例子。喜爱日本文学的人或许和我一样对夏目漱石这位伟大的日本小说家感兴趣。据说他在1884年进入大学之际，原想成为一名建筑师，但是有人劝他，“在象日本这样一个穷国里，建筑师无荣耀可言。在这里，永远不会有建造象圣保罗教堂那样具有伟大历史性建筑的机会！”

---

* 本文选自杰恩·格罗斯曼的《财富与贫困》，英国MIT出版社，1985年。

① 本讲稿中所述内容曾以不同形式发表：比利时安特卫普大学发展研究中心10周年纪念大会上的中心演说；菲律宾马尼拉亚洲开发银行著名演说者系列节目的演说辞；作为巴基斯坦伊斯兰堡巴基斯坦发展经济学学会发展经济学系列讲座的两份讲稿之一；在纽约东方经济协会第10次会议午餐会上的演讲辞。这些场合中所得到的评论充实了讲稿内容。扬·廷伯杰恩、贾斯特·法兰德、黎基·纳亚和撒伊特·纳维，此外，霍利斯·彻纳里、帕德马·德赛、S·古汉、艾伯特·希尔施曼、W·A·刘易斯、伊恩·利特尔、戈朗·奥林、保罗·罗森斯坦-罗丹、西奥多·舒尔茨、阿琴·桑古普塔、T·N·斯林尼瓦森和保罗·斯特里坦提出了颇有裨益的建议。

此文摘自《亚洲发展评论》2(1)，1984年第23——38页。

在发展经济学中，唯一正确的结论是，不可能有结论。这种说法或许是对的。正如琼·罗宾森[①]评论印度时所说，无论你作何评价，相反的意见也同样正确。然而，我们不必过于失望。因为，如果仔细观察发展的进程和与此相应的发展经济学中的观念变化，我们就能学有所得，即使这种学习意味着扬弃，而通过扬弃的学习胜于从复制中进行的学习。必须提醒你们，今天我所说的会带有主观性，它只反映我在过去25年中作为发展经济学学者的思想发展。实际上，在一个如此广阔和复杂，又是我们如此关心的重要领域中，只有用我们自身的直接经验进行阐述，我们的观点才能鲜明突出。

1

发展经济学在战后的最初几年中形成，其显著特点是它的乐观主义精神。这一学科产生于对于政策问题的考虑，这可见于保罗·罗森斯坦-罗丹在1943年《经济杂志》上发表的著名论文，以及拉格纳·诺克斯在1953年发表的经典著作《不发达国家资本构成问题》。乐观主义的观点是，不发达国家的发展和通过发展消灭贫困，相对来说是一件容易的任务。而且，我们能把今天许多发达国家中提高群众生活水准的漫长进程，引进到当今不发达地区，并使其迅速完成。这种乐观主义源于两个基本因素。

首先，存在着这样一个简单的事实。这门新兴学科中的主要人物，寻找的是一些单纯的、几乎是单一因果的发展理论。于是，他们建立起一些明确的或模糊的模式。这些模式似乎是为政策制定者提供如何发展经济的简单教科书。我不想争辩说，这是一种

① 琼·罗宾森(1903～　　)英国女经济学家。——译注

不适当的理论。哲学家亨利·柏格森曾经说过，时间的伟大在于其阻止一切事件同时发生。同样，经济理论的主要优点是，它防止我们同时考虑各方面的问题。然而，简单的经济学理论和服务于政策的理论处方确实导致了我所注意到的乐观主义。

实际上，那时有两种这样的理论，两者都注重资本的构成，并视之为发展的关键。我将在后面论述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是发展，而不是贫困和收入分配？我还要论述，我们中的许多人当时认为，增长本身不是目的而是连续对贫困开战的方法，而今天讨论这些问题时，如对此提出异议，简直就是无知。但现在我要谈的是不同发展理论的问题。

（1）在两种这样的理论中，有一种理论注重如何动员投资。这种理论仅仅把发展中的问题认定是不能实现投资，而计划及政策制定者的任务就在于识别导致这种不幸后果的制约因素，然后去克服它。保罗·罗森斯坦-罗丹的观点是，这种制约因素来自今天我们称为囚犯的困境，也来自于他描述的另一个问题：各自为政的企业家们因为在隔绝的状态下不能确信他人也会同时投资，也会产生对别人产品的需求，所以也不投资。于是产生了罗森斯坦-罗丹的著名处方：由政府制定协作投资计划，即“平衡增长”的方案；随之而来的当然是发展文献中制订计划的理性推理。

奇怪的是，艾伯特·希尔施曼1958年在《经济发展的战略》一文中评论罗森斯坦-罗丹时，对发展中的基本问题提出了相同的解决方案。他认为，发展的任务就是刺激投资。虽然这部名著中有许多重要见解和观点，如刺激投资产生的联动作用，但就其全部实际意义而言，它支持一种反计划的思想模式。他提出，中断进口并向国内的企业家展现随之而来的、稳定的市场，就能刺激必要的投资。仿照“刀耕火种”这一农业作业方式的说法，我称其为“刀耕增长”(slash and grow)的进口取代式发展战略，虽然产生的增

长很可能极为有限，以至最终多半会发展成为“刀耕停滞”(slash and stagnate)的自我毁灭的战略。

(2)但是这些发展理论很快地由其它理论作了补充。后者不注重如何动员投资这一人们称之为原始积累的问题。它们的着眼点是继之而来的、分离的然而又是互相联系的一系列问题：投资的数额(最优化储蓄问题)、投资的去向(投资的分配问题)和采用何种技术(技术的选择问题)。

然而，在政策制定方面最重要的突破来自于一些简单的增长模式，其中以哈罗德-多玛模式(Harrod-Domar Model)最为著名。你们一定知道;哈罗德-多玛模式是一个简单的构成物：增长率简单地表示为S/V这样一个比例，这里S是储蓄的平均率，V是边际资本产出率。如果初始收入为1/0，储蓄率S就产生储蓄S1/0；当转入投资时，因为资本产出率为V，这些储蓄便以{(S/V)1/O}的比率提高收入。因此，由于具有固定的储蓄和资本产出率，这种经济的特征便是以S/V的比例指数式的增长，这如同你告诉一个人第一个数取左边的，下一个数取右边的，然后永远保持重复的动作。

这种广为接受的模式的含义既激动人心又让人放心。它意味着发展的中心问题仅仅是增加专门用于投资的财源。随之产生的是两种政策上的意义：一是关于国内的储蓄，二是关于国外的援助。如果政府要想达到5%的增长率，这既体面又在政治上易于对付，如果边际资本产出比例平均为3：1，那么，纯投资率将被定为15%。因此，如果一个不发达国家从5～7%左右的低储蓄开始起步，便毫无希望立刻实现目的投资率。所以，首先必须确立一项通过税收旨在逐渐提高国内储蓄的管理政策目标，直到这一特别时期的终结时(譬如三个五年计划)这个国家达到15%的纯储蓄为止。这样提高国内储蓄必定反映了通常使财政部长头痛的国内政

治考虑。其次，当储蓄率被迫向15%的"自足"目标上升时，所要求的国内投资和可能的储蓄之间出现的差距将要由外援来填补。随着时间的推移，国内储蓄提高了，对外援的需求将在15%目标储蓄率实现时逐步减少并趋向消失。

这就是50年代到60年代间构成许多发展计划基础的基本的关键政策合成物。这一公式似乎不可怀疑。而且这也构成了沃尔特·罗斯托于1960年发表的《经济发展的阶段》这部名著的基础。有趣的是，在这本书中，最后的阶段（国内储蓄率提高到得以自我维持的水平的阶段）是显著的起飞阶段，而且这一预测象似并不承认还有一个叫做追降阶段的不容乐观的可能性！

其次，这种关于加速发展可能性的乐观主义同时也产生于这样一种流行的看法：在不发达国家中，还有等待开发的"潜在资源"。拉格纳·诺克斯比别人更强调这一点。在他的1953年的经典著作中，他花费了不少笔墨来讨论如何在农村中招募工人，并让他们去完成投资项目；如果其消费不至于被留在农村的人吃光，如果农业的产量可以维持（比如象存在剩余劳动力或"隐蔽失业"的情况），那么，那里便有"隐蔽投资"潜力的明显的可能性！我无须提醒尊敬的听众，"隐蔽失业"和"隐蔽投资"这些概念是如何地吸引人；在本文中我没有时间继续讨论下去了，只能说这些概念以不同的方式，在不同的程度上，出现在保罗·罗森斯坦-罗丹和W·阿瑟·刘易斯①（1954）的一系列主要著作中（同样可见于哈格瓦蒂，1982年的著作）。这里我仅提到了几位主要的经济学家。

艾伯特·希尔施曼以一种截然不同的见解，从汤因比式的独特观点（他抛弃了这一观点，后来转而赞同可能出现退出、发声和效忠诚的选择性反映的理论）出发，对这种潜在资源的乐观主义态

① 阿瑟·刘易斯（1915～ ）英国经济学家。——译注

度表示支持。发展的过程不受财源的制约，当经济中出现紧张和压力时，增长的失控将向人们提出挑战，并引起应战的反应：潜在企业家的崛起、技术突破，等等。诺克斯及其他人认为，只有通过计划的方法才能开发潜在资源，而希尔施曼则认为，潜在资源表现为不协调的、反计划形态的发展过程，只有当其产生了必要的不平衡时才会得以开发。在这一意义上，诺克斯的潜在资源的概念更接近以那种应时的马克思主义观点为基础的乐观主义。这种观点认为，革命将导致"新人"的出现。他们可被动员起来，去实现受外力指导的崇高事业。

乐观主义不仅渗入到增长的问题中，而且渗入到增长对于最终改善贫困的影响这一关键问题中去。那时，并不是每个人都清晰地讨论增长和贫困的联系问题。令人惊奇的是，在50年代中，很多经济学家，在分析诸如技术选择等一系列问题时，并不把它们对贫穷及收入分配所可能产生的影响明确地作为论述对象。因此，当他们之中的一些人最终迟缓地、好象有所发现似地转入贫穷问题时，我并不感到惊讶。但是，若断言增长曾被普遍视为目的本身而不涉及贫困问题，这无疑是平庸的胡言。当听到有人说贫困问题最近才被发现，也才刚刚被提高到作为发展目的的高度，我是多么地惊奇！因为，如果回顾一下我自己的一些文章，就完全应该期望把1966年出版的题名为《不发达国家的经济学》一书中的第一章标题为"增长"，可结果却是"贫困和收入分配"。请注意，这决非偶然，决不是在许多年后意外地成为一种新的正统观念的或然性。我在60年代初曾与一位印度伟大的计划制定者帕兰博·潘特一起工作。他传播了"最低收入"这一概念，并强调计划的目的在于向所有的人提供最低收入，以满足基本需要。那时我们观察了各个国家中职能的和普遍性的收入分配，看看是否能从中了解到一些有关收入的发生和分配过程的情况，以提出对(绝对)贫

困产生持久作用的政策措施。① 根据来自这一研究的想法，我们作出了作为解决贫困的唯一可靠方法的快速发展策略：通过提供工作来提供收入，让更多的人就业挣钱，使生活水平达到贫困线之上。这一策略在对贫困的开战中将取得中心突破，但是它必须与土地改革相结合，这种改革包括政治上可行的再分配。另外，这一策略还应同提高公众在清洁水源、卫生设施、医疗服务和教育方面的水准结合起来。

这就是向贫困开战的"脱贫"(pull-up)策略。看来，这一策略在印度有着更为突出的意义。在那里，人们不能期待再分配措施对贫困产生的直接影响会有什么重大结果。米哈尔·卡莱基这位著名的波兰经济学家在印度时对我说过："印度的问题出在剥削者太少而被剥削者太多"。当然，这种"脱贫"策略在今天西方的论坛中被称为"逐渐滴入"。里根总统将这种策略与对世界经济最发达的福利国家的攻击相提并论，使这一策略名誉扫地。但是，在不发达国家中，当这一策略与可行的再分配改革和社会消费的供应结合在一起时，不能不认为是具有进步意义的。而且我们的乐观主义确实也渗入了这一雄心勃勃的计划：增长将是快速度的，而且它将持续地帮助越来越多的人的生活达到贫困线以上，通过一代人的努力，这一消灭贫困的计划最终会产生实实在在的结果。

回顾早期发展经济学中的乐观主义，我还必须对悲观主义的两个重要组成部分加以描述：一个很快消失了，但另一个却成为许多发展思想的核心。突然消失的悲观主义涉及这样一种观点，即

① 帕兰博·潘特和我在这些问题上意见一致。我们两人都研究过我那时为此目的而收集的关于收入分配的资料。我曾以经济学教授的身份在1962年加入过计划部印度统计学会，我的工作是在计划委员会中为潘特充当"智囊"。在潘特主持下写成的、基于我们讨论审议的一些主要的正式文献，在1962年8月由计划委员会远景规划部发行，其中一部分由T·N·斯林尼瓦森和P·K·巴德汉(1974)重印。

在不发达地区居住着这样的种群，他们无疑是人类的一部分，可是他们却不具有"经济人"所拥有的素质。因此，如果出现价格刺激，农民不会以多生产来响应；给予更高的工资，土著人则提供更少的而不是更多的劳动力；风俗和价值观要高于贪欲和价格。在很多人看来，这种行为显得是多么地"不合理性"，富有经验的经济学家总是避免谈论这个字眼，因为，这样来描述反映个人好恶的行为只能是不合理性的。有人意识到，不发达国家的人们有根本不同的经济动机。这种意识有着漫长的思想史。我们可以回想一下16世纪西班牙对美洲的征服史，这一历史记录了人们对土著印地安人的引人注目的看法。官方的印地安历史学家奥维多宣称，这些土著人普遍是："懒散和邪恶的，忧郁和怯懦的……一个躺着懒于动弹的民族。"而多米尼加派修道士们因为渴望见到他们自己的精神作用，在印地安人身上发现了一种可爱的性格。在拉斯·卡萨斯看来，印第安人符合"亚里士多德规定的过有道德生活的全部要求"！

没过多久，经济学家们就发现，公认的正统观点过于极端，因此主张一种非真实两分法。例如，在战后的最初几年里所进行的实际研究越来越多地反映出，穷困的农民使用的是能使成本降到最低的技术，他们对价格刺激的反应也相当强烈。西奥多·舒尔茨1964年撰写的关于改变传统农业的重要著作是一本小册子。这本小册子最大程度地改变了我们在这方面传统的悲观主义，也使他无愧地赢得了诺贝尔奖金。自从这一著作问世后，"农民会对价格作出反应吗？"这一问题转变为"这类农民会对怎样的价格作出反应？"这使我想起了那些俄国人，他们在打量未来的女婿时，不问他是否喝酒，而是看他喝醉时表现如何！同样，当向我们的西方朋友说明，我们印度人的经济反应与他们的经济反应并无多大差别时，我告诉他们，我们虽然相信生命轮回，但是，象别的人一样，我们把今世的福利看得比什么都重要。

如果说，由于缺乏经济人而阻碍穷国发展的悲观主义论调很快销声匿迹了，那么另一种悲观主义却阴魂不散。它含蓄地或明确地构成了许多学说的核心，而且在许多人看来，它一向是不言而喻的。这种悲观主义涉及不发达国家在战后的年代中发展的外部环境。令人吃惊的是，许多主要的经济学家对外贸机会抱悲观的态度。和拉格纳·诺克斯一样，他们认为，由出口导致的增长时代一去不复返，而且不能期望贸易成为一种"发展的动力"；他们还以不同的方式论证，贸易机会如今受到极大的限制，以致发展策略必须越来越转为内向型和进口取代型或相似的类型。

这种"出口悲观主义"在拉格纳·诺克斯 1953 年的著作中表现得很明确。这也见于他的 1959 年的《威克塞尔演讲集》。在这部演讲集中，诺克斯从这种悲观主义出发，推断出他的解决方法，认为，不发达国家必须致力于反映内在需求结构的平衡增长。同样，这种悲观主义在劳尔·普雷维什[①]的一系列文章中也是明显可见的。文章提倡在拉丁美洲实行"进口取代型"政策，因为他担心，初级出口品的贸易条件越来越糟。这种悲观主义在罗森斯坦-罗丹和希尔施曼的理论中则表现得不那么明确，因为如果潜在的企业家们能够有把握以固定的世界价格出售其产品，诱导投资就不成其为问题。

因此，归根结底，发展经济学家对于发展的可能性还是抱有乐观的态度，也就是说，快速发展是可能的，并将很快地对贫困产生影响，这反映出在国内变革可能造成的困难这一问题上的种种幼稚态度。与这种乐观主义相抵并形成对照的是：对于促使国内发展过程进行的外部条件抱悲观主义态度。

① 劳尔·普雷维什(1901～)曾任阿根廷财政部长、农业和财政问题顾问、中央银行总裁，现任《拉美经委会评论》主编。——译注

2

实际情况是，50年代和60年代的发展告诉人们，国内的问题更为复杂，而关于外部条件的悲观主义却是没有根据的。少数国家，特别是远东四小龙，不抱悲观态度，而且迅速采用EP（促进出口）策略，获得了巨大利益，这一事实在今天已勿庸置疑。只有那些总是以偏见取代经验事实，或者那些因为将采用EP策略等同于反动政权而对其抱有轻蔑态度的人才不这样认为。这两种反对EP策略的原由特别使激进经济学家中的极端分子恼火。

目前，在世界银行（巴拉萨）、经济合作发展组织（利特尔、西托夫斯基和斯各特）、美国经济调查局（哈格瓦蒂和克吕格尔）和基尔协会（唐吉斯）等组织中，许多卓越的经济学家和大规模的研究项目为我们提供了具有深度的证据，而悲观主义者却拒绝正视这些事实。这使人想起，今天还能看到的对无产阶级贫困化的持续信仰。也使我想起一位著名的美国政治学家告诉我的一个故事。他遇到了一个可能是幸存下来的最后的托洛茨基党派中的斯里兰卡党员。这个托派分子认为美国不走正道。对于这个结论我的朋友幽默地回答道：是的，我也知道，但是你为什么这样认为呢？噢，这位托派人士说：你没有在科伦坡看见那些双筒望远镜、照相机和极为出色的先进的工程机械产品吗？这些东西都带有自己的名字，如松下、三洋和索尼。但是谁都知道，日本人不可能造出这些东西：他们只善于生产一些一美元一件的女衬衫。很明显，美国的产品假借日本商品的名字打入了亚洲市场！

至于将EP策略等同于反动，我不能接受这种认为两者有必然联系的说法。必须承认，远东四小龙在不同程度上是凭借铁腕，而不是无形的手来统治的。此外，回顾一下就会知道，采取直接集权手段

的政治控制的政权可能遇到较少的麻烦，从事实看，外向的工业一般来说意味着政治权力和政治控制要小于内向型的、依靠国内市场的进口取代式工业，后者可通过法律许可和数量上的分配来进行控制。这种控制会导致出现裂痕和由此产生的众多政党的政治权力，而这些政党将填补这些裂痕。这样看来，这种集权的政体比多元政体更愿意转向ＥＰ策略。但是，自相矛盾而且不幸的是，也可以说，集权政体更可能采用优越的ＥＰ策略；把这解释为ＩＳ(进口取代策略)的优点和ＥＰ策略的污点是毫无根据的。

也许，这些采取促进出口策略的国家所取得的胜利并不表明这种策略本身的成功，而是表明，经济上的成功来自于承担风险、找出和抓住机会。反对冒险的出口悲观主义者在战后眼看着贸易机会从他们身边滑过；称为远东四小龙的熊彼特[①]式的冒险者以及紧随其后的巴西等国，抓住了机会并取得了成功。经济奇迹是在现实中创造出来的，而不是凭空产生的。我倾向于这样的看法，对这种以对话形式流行的拉丁美洲故事中的风趣妙语不以为然：我并不认为存在着什么经济奇迹；那么德国的奇迹呢？噢，那是由于德国人刻苦勤奋；那么日本的奇迹呢？那是因为日本人善于创新；那么巴西和墨西哥的奇迹呢？噢，只有这些才是奇迹！顺便提一下，我们总是千篇一律地把最成功的经济行为描绘成一种奇迹，正如卡莱尔把经济学描绘成"沉闷的学科"一样。我想知道，列维-斯特劳斯[②]对此会作何评价。

但是，如果说那种早期发展中的关于外部条件的悲观主义被50年代和60年代黄金时代里世界经济中的一些辉煌的贸易发展

① 熊彼特(1883～1950)美国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译注

② 列维-斯特劳斯(1908～)比利时社会人类学家，结构主义的主要倡导者。——译注

所改变，那么，与此相反，发展经济学者关于国内发展的乐观主义却在严峻的现实面前碰壁了。

我必须立即指出，战后年代中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速度高于原来的发达国家在19世纪发展的鼎盛时期创下的历史速度，甚至也超过了它们自己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一般来说也是独立前的年代里的发展速度。另外，众多发展理论家或实践者，如保罗·罗森斯坦-罗丹和霍利斯·彻纳里分别在50年代和60年代为发展中国家规划了发展速度。而许多发展中国家（虽然不是绝大多数，尽管我们恰当地加上印度）的结果却超出了他们的规划的速度。戴维·兰德斯（1970年）将工业革命所导致的新纪元描叙为解放了的普罗米修斯；用这一美妙的措词来形容发展中国家的平均经济增长是适当的，并不十分夸张。我以前在麻省理工学院的学生戴维·莫拉维茨在他1977年的杰出的分析报告《经济发展的25年：1950～1975》中，收集和分析了这些事实和见解。它们恰如其分地证明了这样一个观点：早期的经济增长乐观主义并不完全是错误的。然而，在这里我要加重“完全”这个词的语气。

在哈罗德-多玛-罗斯托模式中，一般来说，增长的加速必然导致投资率的上升。确实，历史地看，我这样思考——当我们回顾历史的时候，事实本身趋于消失，得到的可能全部是推测和假设：我曾用嘲笑的口吻反驳那些严格的计量历史学家说，“真正”的历史总是在事实结束时开始的——过去三个世纪的历史可划分为三个阶段：（1）前工业革命时期。这一阶段中的技术变化甚微，积累率很低，因此，其特征为，增长率实质上可忽略不计；（2）工业革命时期。它导致增长率有所提高，但仍处于每年只有1～2％的范围内。这反映了技术知识空前地加速发展，但不管是否有计划，投资率却没有相应地发生明显和持续的上升；（3）我们所处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现代阶段。发展中国家在该阶段中显示出更高的增长率，

一般超过4%。这既反映了吸收技术的速度提高，也反映了由国内储蓄有计划的增长和外援的输入而导致的投资率的稳定上升。但是，即使发展中国家的高增长率与高投资率有关系，高投资率也并不必然导致高增长率。与前述概念相反，这种关系只是必要的，但不是充分的。

而且从根本上说，在应当如何按增长率来划分国家的等级这一问题上，早期的预言往往不灵。莫拉维茨记录下在罗森斯坦-罗丹的预言中，缅甸、印度、阿根廷被荒谬地列入四个高度成功的国家的名单中。你一定知道，劳尔·普雷维什来自阿根廷。他喜欢用这些话来取悦朋友，他说，世界上有四种国家：发达的、发展中的、日本和阿根廷！然而，我们之中许多人也可以这么说，就好象这也适用于我们自己的国家。

我想，就是在这一点上，我们认识到了在学术上犹豫的好处。我们认识到，持续的增长往往是一个艰难的过程。我们在我们简单的模式中所参照的明确或不明确的行为关系确切地说都过于简化；往往预料不到事情会产生偏差。我将用一些生动的例子来阐明有关外国援助的问题。你们会回忆起在50年代，哈罗德-多玛模式如何被用来将外援看作国内储蓄的补充。在实行过程中的一种典型假设是，国内的储蓄就其性质而言，独立于外援流入，但不包括税收政策力求提高国内储蓄率这一意义。但是，在实践中，外援却好象对国内储蓄产生抑制作用。虽然这一确凿的事实没有厚实的概念基础，但是，我们还是担心，援助在某些情况下可能妨害而不是帮助国内储蓄率的上升。这种担心不是没有理由的。而我们早期的模式和论点根本没有考虑到这些给真正的外援接受国带来烦恼的复杂因素！还有，当给予粮食援助时，人们认为，增加供应来源会有助于接受国的发展计划。但是，正如西奥多·舒尔茨原来提醒我们的那样，粮食援助常常对接受国的农业生产产生抑制作用。

但是，假如这些情况证明了援助以不可预料的方式起反作用，那么这种援助政策也将被认为时而会发生挫伤作用。虽然有些人对依附概念嗤之以鼻，但是，我们必须认识到，对于接受国来说，资金外援的中断会造成“财源危机”，它将成为可能出现的不稳定的根源；这一概念是我在 1975 年的一篇题为《外资、依附、不稳定和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可行性》的文章中形成的。我是记取了智利的经验教训。在那里，由于阿连德总统的政策在意识形态上转为左倾，这激怒了基辛格博士，使他很快做出了报复，外援就此中断。为了避免你们认为我仅仅是指中央情报局，因而，我要使你们明白，苏联从中国的突然撤走，留下了未建成的工厂无人照料，在这一做法上，两个超级大国是半斤八两。

发展过程复杂性的意识，削弱了我们对如何产生稳定增长所持的乐观自信。而对那些寻求采用分析的方法，把政治作用与更加正统的经济学理论的系统阐述相结合的人来说，这种意识提供了一种有意义的促进因素。例如，目前对于研究发展的学者而言，仅研究发展中多国公司的角色而不考虑这样一种可能性是困难的。这一可能性是，一旦我们考虑到政策本身将受到发生在东道国的精英、东道国政府和多国公司之间的共生关系的政治性约束，对贸易和资本流动的税收与津贴政策的最佳混合体也许完全不可行，虽然这种最佳混合物是我们经济学家的独创，表现为提供给东道国趋于最大限度福利的政策选择。简言之，发展经济学家已加入了以严格的分析的政治经济为对象的经济学理论日益汹涌的潮流。这是一门新兴的，然而是蓬勃发展的学科，我将其命名为DUP (directly,unproductive profit-seeking直接的、非生产性的利益寻求)活动理论。

但是，这一受到抑制的乐观主义的主要方面却无疑地成为发展和贫困间的联系环节。与我们的期待，当然还与我们的希望相

违背，增长对贫困的冲击是缓慢的，而且确实是一个相当微妙的过程。

我必须承认，我完全不同情持这样一种观点的人，他们认为，战后发展的经验已确实证明，我们中那些寄希望于依靠增长削减(绝对)贫困的人已名誉扫地。在过去20年中，这种断言在一些多国慈善机构的文件中屡见不鲜。但它是错误的。这里我们不宜对这种断言做全面的考虑。只要有以下的论点便足够了。

首先，作为这种断言基础的统计资料仅勉强胜过关于后工业革命的英国的统计资料。后者使一些著名的历史学家，如埃里克·霍布斯本和麦克斯·哈特威尔争论不休。他们的争执点是，工业革命是否导致无产阶级的贫困。三种令人沮丧的观点需要加以甄别：(1)收入分配变糟了：西蒙·库兹涅茨[①]推测，收入分配起初随着增长而恶化，而后会有所好转；(2)而且，随着收入分配的恶化，底层的绝对收入(大约有20%)继而下降，因为较低的收入份额比重由于增长而超过了较高收入的总数；(3)甚至，底层社团的平均每人所得亦有所下降。[②]在理论上，从贫困的观点出发，这些持续恶化的结果在理论上很易于下定义；然而，实际上它们又同样是难以衡量的。我认为，根据可以得到的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证据，要满怀信心地断言这三种结果中的任何一种都代表着一种主要趋势，或是一种在任何主要的发展中国家里都存在的最终确立的结果，是很困难的。当手头的证据与我们的论点相违时，我们不会立即对它加以反驳和轻视；这对自己绝对有利。但是我必须要说，我觉得我难以做到站在统计经济学家一边去反对一个富于想象的观

---

① 西蒙·库兹涅茨(1901～　　)美国经济学家。——译注

② 当然，占人口或家庭(大约)20%的底层社团内部有我们熟悉的问题，即在这一阶层中的收入分配很可能随着按人计算(平均)收入的下降而恶化；由于随之完全可能产生暴乱，这可被视为又一灾祸。

察和分析发展的人，如吉尔伯特·艾蒂尼。他最近关于印度绿色革命的研究(1982年)引起了争议。他尖锐地指责了一些研究的真实性，这些研究利用国家统计抽样调查资料(如在印度)得出了骇人的、极度悲观的统计学结论(可参见T·N·斯林尼瓦森在《人口和发展评论》中对艾蒂安的精彩论述)。他令人信服地论证说，这些结论与通过观察所得到的事实相矛盾。他的这一论点来源于他在经过抽样调查的几个完全相同的村庄里长期逗留所收集到的第一手资料。他所做的是我所说的"在印度干你在中国干的事"，也就是说，无须理会那些在任何情况下都难以在中国得到的数字，而仅仅注意那些你的肉眼能看到的东西。过了一段时期，他又回到大都曾在十多年前深入细致地研究过的许多村庄去进行追踪研究。他观察、询问、考察和记录，如同扬·默达尔[1]在柳林写出的那篇著名的报告一样。但他所做的带有更多人类学、社会学和经济学的内容和较少的诗意。而他的结论正如我们所料：增长确实改善了几个贫穷地区的生活。无疑，一些贫困地区落在后面了，有些甚至愈加贫困。但是，正如阿瑟·刘易斯曾明智地指出过的那样，在发展过程中，一些人看到了机会并抓住了它，从而将别人抛在后面，直至后者也希望并能够随之跟上，这是发展过程中的固有现象。政治和经济都能抑制落伍者追赶先进的能力，因而，在某些情况中，绿色革命很可能引起农村中的财产分配两极分化，致使一些拥有贷款、化肥和水利便利的农民富裕起来，而不具有这些东西的农民更趋贫困，因此，一些极端分子公然希望这场绿色革命有助于带来一场赤色革命。然而，如果艾蒂安的结论是正确的，在他对印度村庄所作的剖析中，这种事情却从未在任何有意义的程度上发生过。[2]

---

① 扬·默达尔(1927～)瑞典—中国友好联合会主席。——译注

② 这似乎也是对M·普拉赫拉达查尔(1983年)为数众多的印度绿色革命研究的主要观点的全面抨击。

其次，许多对极度悲观者持怀疑态度的人评论说，印度不足以作为"脱贫"论点已告失败的有力的例子，因为增长本身就缺乏生气（参见斯林尼瓦森 1977 年的著作）。另一方面，有关实际工资的数据以及许多其它间接证据表明，一些快速发展的国家，如南朝鲜和台湾，[1] 在消除贫困方面取得了令人注目的成就。我们绝不能仅凭现有证据就处死被告；陪审团还在法庭外面。

此外，我要说，作为经济增长的一种选择方案，作为向贫穷开战的手段（即所谓中国式的选择），再分配政策最终也会受到怀疑，如同我们有些人在 50 年代对它的看法一样。如果中国那时不是以增长为发展方向，我们相信，至少在毛泽东政权的第一个回合，在它的第一次繁盛时期，这种政策在消灭贫困方面就取得了成功。从今天中国之窗已打开的一条狭窄的缝隙中，我们看到了文化大革命的后果和大跃进的失败。自此以后，我们知道，如果一个人只看到一个公社，他还没有了解到所有的公社。对于这一点，我的一位研究中国问题的同事，早在 1975 年对于中国试验的神话所作的犀利的评论中就指出过。我们还知道，赤脚医生一般是穿鞋的。他们的职业水平有时仅略高于普通的老祖母；当真正的医生们被派到农村去时，他们艰苦跋涉，几乎在各处都获得成功，直到后来事态确实发展到严重的程度，红卫兵和官方宣布的刘少奇的主要罪行包括对医生下乡运动进行阴谋破坏。未经充分广泛的分析，包括对非人口统计资料加以分析，就轻易地得出结论，断言中国的那场饥荒夺去了大约 1500 万人到 2500 万人的生命！这正象后来对中国一些成就持怀疑态度一样，可能是愚蠢的。尽管如此，多年来我们已经认识到，粗浅的人口统计学的分析看来已加深了这种认识，即中国在 1959 年没有能力对付一场巨大的饥荒。我们还听说，

[1] 原文如此。指我国台湾省。——译注

中国的平等是存在于公社内部，而不是在公社之间的平等概念：富裕的公社一般不与贫困的公社分享它们的财富。新政权还让我们了解到，还有超过10%的中国人可能尚处于极低的生活水准之下。再作进一步的考虑，我们知道，政府公布的这类材料，只提供最低限度的估算。这些有趣的关于中国向贫穷开战的星星点点的观察材料，几乎可以肯定不能组成一幅完整的画面，因为，细致的、无约束的、学术性的详尽研究在这里并不比在其它社会主义国家中有更多的可能。因此，恐怕我们不得不使自己习惯于这种令人不舒服的情景，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不知道中国以前的平均主义方法后来失败到什么程度，不知道这种失败是否产生于他们宣称的目的与他们真正的目的之间的不协调，或者是由于达到所宣称目的的方法上的限制所致。确实，对于可预见的将来来说，在中国问题上我们会遇到这种自相矛盾的情况：我们所闻愈多，知道的就愈少。

另一方面，有一种观点认为，若在增长的开始就实行公平的财产分配，通常意味着转而更好地分配新收入。这种论点当然非常合乎情理。在一段相当长的时期内，那种产生不公平的力量终究会导致不公平的结果；但是，经过一到两代人，最终的结果要比如果我们以不公平的财产分配开始时更公平。日本对于南朝鲜和台湾的占领带去了最初的财产拥有权的平等化，因此，那里的经验有力地证明了这种几乎是不言而喻的道理。在印度，一系列微观水平上的研究表明，财富所有权和新收入分配之间的联系环节许多情况下是一个重要的因素。印度的经验只是表现了一种才智，即用抵消这种倾向的政策措施来补充定向增长的方法。

财产的再分配先于增长，而增长被计划为对贫困的冲击。于是，这样一种"由增长伴随的再分配"政策被许多杰出的经济学家所推崇。[①] 如果这种分配能在政治上得以实施，而且不会造成经济

性破坏(如苏联的集体化),② 我们只会为此而欢欣鼓舞。然而,对于不可能做到这一点的国家来说,唯一符合逻辑的和重要的政策选择是对制度的结构进行重新定向和补充,以疏通新收入产生的渠道,这样,贫困阶层也有得到好处的可能。我认为,在战后时期的开始阶段,我们没有充分认识到这些补充措施的重要性;而今天却认识到了。我这样说是公正的,但是困难依然存在。面对不公平的财产分配和由此产生的不平等的基层政治权力,要成功地实现这种制度的变革是一项极其艰难的任务。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旨在推行这种变革的政策所获成功的程度,取决于穷人获得"起抵消作用的力量"的有效范围,这是通过社会行动团体和有政治权势的反对党的存在而达到的。③

但这次令人高兴的是,那些发展经济学家也曾同样地感到吃惊,他们以前夸大了对消耗支出(诸如在初级教育和保健方面)与旨在实现增长以及最终解决贫困问题之间平衡的担忧。如果我不进一步论述这一点,就是疏忽大意。今天,要正确评估50年代流行的关于初级教育的观点是困难的。这种观点是,早期教育仅是

① 参见阿德尔曼和莫里斯1983年的著作;以及彻纳里等1974年的著作。我要在这一总类策略中再加一个完全不同的提议。这一提议是我在1973年主持拉尔·巴哈杜尔·夏斯特里讲座时提供给印度规划者考虑的(《在世界经济中的印度:进步社会的政策结构》,海德拉巴,公共事业学会,1973年;经重印作为本卷第二章)。我提出在每个村庄(或类似的单位)实行土地部分国有化,可将其划分形成中国式的公社。那些希望走由依赖增长消灭贫困的缓慢而漫长的道路的赤贫者,可以在印度提供的策略中碰碰运气。但是那些希望即刻得到雇佣和一些收入的人可立刻加入中国式的公社。这两种策略的结合,或对于其中之一的选择,意味着印度的赤贫者不受到强迫,他们可以选择印度的自由而缓慢地摆脱贫困的方式,或者选择中国的方式,被强制地迁入公社,失去自由,但可以更快地摆脱赤贫状态。

② 中国似乎未受到这种危险的困扰,因为消灭富农似乎主要是在漫长的国内战争期间进行的。参见德赛,1975年的著作。

③ 从长远的观点看,我们不应忘记大幅度的增长本身是通过市场产生必要的抵消力量的一个因素;提高对劳动力的需求,增加其社会的代价。

一种"自然权力"，这种权力的实现反映了人力资源的可得性。然而，这作为促进生产力、导致增长和减少贫困可能采用的重要方法，并且因此在后来的伦理学上被验证，则是最后的现象。这对于保健开支也一样适用，人们开始对它热情不高，同样是因为他们担心，这一开支将会使人口增长恶化。后来人们才认为，保健开支有可能达到提高人口的生产力的效果，没有这笔开支，工作效率可能极差；甚至还有可能在一定的条件下降低出生率。这一条件是，以降低婴儿死亡率和提高存活率为手段，保健开支能促使父母亲减少生育，达到处于稳定状态的理想的家庭人口标准。虽然很少有人确切地知道，但确实有许多有关这方面的论述，使我们摆脱了对于教育和保健的开支是否一定会牺牲增长的担心。[①] 同样令人欣慰的是，当这种开支是为人口中那几部分贫穷的人而设立时，以上论点的实施就更为有力。在计划某些开支时，把重点放在改造穷人景况上，始终如一地贯彻发展战略，这种情况在今天看来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得到了加强。[②]

但是，我必须承认这样一个事实，战后的经验和实践已提出了

---

① 有关这一问题的文献的有价值的评论，参见保罗·斯特里坦等人的著作(1981年)，尤其是第4～6章。教育是生产力，是增长的关键这一观点主要是由"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家提出，如西奥多·舒尔茨和加里·贝克，这似乎具有讽刺意味！阿瑟·刘易斯曾提醒我，他早已强调过教育的投资价值(参见刘易斯1955年和1961年的著作)。然而，我还要补充一点。教育作为"人的资本"，虽然极为强大，也只是全部现实的部分反映。教育是筛分装置；教育是"社会化"方法；以及教育是在职业阶梯比赛"职业竞争"的手段，这是另外三种理论。这些理论竞相引起人们的注意，而且它们在发展中国家里也有相应的理论。有关"职业竞争"理论的评论，正式的阐述和分析，参见哈格瓦蒂和斯林尼瓦森的著作(1977年)。

② 另一方面，当政治制度由少数上层人物控制，要将经费有效地用于贫穷阶层的初级教育和保健是困难的，对此，我们有必要再次回顾一下。初级教育和高等教育在国家支出中的相对优先权及其与国家阶级性质的关系等问题，已由经济学家，如塞缪尔·鲍尔斯和我本人进行过详细的讨论；详见哈格瓦蒂(1973年)的分析。

改进增长过程的方法，以保证让收入流向穷人。即使这样，我们仍须面对一个早为社会学家所了解的困境：穷人可能把他们的收入用在非生活必需的虚饰上，而不是用于食物。正如日本的谚语所说：每条小虫都有自己的口味，有些就是喜爱荨麻。也许你们听说过流传于海员中关于一个海员的故事。这个海员继承了一大笔财产，而他将其中 1/3 花在女人身上，1/3 用在杜松子酒上，并将其余的钱"挥霍殆尽"。

在我们那些认为基本需要必须得到满足的人看来，经济学家们夸大地称为"消费者主权"的悲剧性论调使我们面临一种熟悉的道德-哲学问题。我们是否应采取家长式的手段来诱导穷人更好地实现我们称之为基本需要的东西？尤利塞斯① 在鸟身人面女妖走近他时，将自己锁在铁链上，并放弃对未来的自由作出选择，因为他知道，他将会在行为上失误。但我们不能采用这样的比喻，因为，我们的情况是，这样禁锢是外人强加的！自由意志主义者会看到 1984 年中这种家长式作风的阴暗面，一些细小的事物引起的重大后果，以及走向奴役的道路。但是我不认为如此。事实上，我看到的是家长式作法的长处：采用供应和转变口味的政策措施，引导穷人摄入更多的营养品，更多地用清洁水，以及其它做法。因而我是为了穷人而不是其他人才放弃自由选择这一重要原则的。显然，我采取的道德-哲学观点是我并不关心富人会因为吃了太多的蛋糕而营养不良，而对穷人在能用其收入同样买到他们挑选合适的营养品时，是否因为买了太少的面包而引起营养不良则甚为关注。在这一点上，我赞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罪与罚》中索菲娅·玛尔

① 尤利塞斯，即荷马史诗中的奥德赛，他是希腊某邦的国王。诗中描写了他在参加特洛伊战争后，漂泊多年，历尽艰险，回到故乡的情况。一次他在海上遇到用美妙的歌声诱人，使他们的船只倾翻的鸟身人面女妖。——译注

姆拉多娃的道德观：当她为了供养她贫穷的母亲而沦为娼妓时，她是为了更高的善举而放弃了贞操。

我如何来结束这个追溯往事的演讲呢？无疑，我们现在已意识到，发展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因而作为我们中心目标的消灭贫困的任务就更加艰巨。但是，自相矛盾的是，假如我们具备恰如其分的时代精神，这种意识就可能自身隐藏着一种新的乐观主义的种子。正象我开始的演讲一样，仍以讲一个关于日本的故事来结束我的演讲。这个故事是新加坡取得经济成就的建筑师吴庆瑞博士告诉我的。1915年8月18日的《日本时报》摘录了一位日本政府邀请的澳大利亚专家的报告内容，他讲了以下的话：

> 很遗憾，从商业上说，日本在做生意方面没有好名声。劣质产品，装运既不准时质量又差，已经引起无数的忧虑……
>
> 当我看到你们的人在工作时，我立刻对你们的廉价劳动力感到失望。无疑，付给他们的工资是微薄的，但是，利润也很低；看着你们工作，让我觉得你们是一个满足现状、不计较时间的民族。我和一些经理谈过这种想法，他们告诉我，要改变民族习性是不可能的。
>
> 需要有第一流的经理……来唤醒人们，摆脱目前看来已成为普遍现象的随随便便的作法。

在这一叙述中，我们几乎看不到现代日本的形象。实际上，这种难以置信的事今天却以完全相反的方式出现：一个在东京的旅游者在银座的一家日本照相机商店里看到了高质量的陈列品后，问人是否能买到便宜一些的照相机，人们告诉他：到街尽头的美国照相机商店去，他们卖那种蹩脚货！

也许，我们错误的根源在于理想主义；不发达国家的贫穷和落后使我们在心理上除了乐观外没有其它选择。但是，既然我们已经

历了使人清醒的现实，我们就没有理由陷于悲观。我要拾人牙慧，使用杰弗里·克罗瑟爵士关于《经济学家》的政治观点的一句名言：在这里，真正的智慧在于不偏不倚。我正是一贯这样认为的。

陆晓文 译

工业化与发展的估量*

海伦·休斯

很久以来，工业化一直是民族运动和反殖民主义运动的一个关键问题。美国独立战争的一个起因就是殖民地争取制造商品的权利。19世纪和20世纪初，非洲、亚洲和拉丁美洲发出越来越多的抱怨，对于处在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状况下无力发展制造工业表示不满。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时期的原料出口国的经验着重表明，有必要使经济多样化，至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工业化已成为发展中国家宏图大略的重要部分。发展中国家逐渐把工业化与发展等同起来，这种趋势在50年代与60年代变得更为强烈了。具有尖端技术和高度生产率的制造工业被看作欧洲和美利坚合众国迅速提高的生活水平和国家威望的根源，也是促使日本惊人发展的动力源泉。制造工业提供了高水平的生产物资，将其投入采矿业和农业，这些工业的冲击力也改变了运输、商业及其他服务性工业的面貌。

一　工业化的目的

从纯粹的经济观点来说，工业化的主要潜力可以在它对高速

* 本文选自普拉速普·K·戈什所编论文集《工业化与发展，第三世界的展望》，原载《工业和发展》，1978年，第2卷，联合国出版机构发行；作者海伦·休斯是世界银行经济分析和计划部主任。

的经济发展所作的贡献中看出来。① 当发展中国家在40年代末和50年代初开始制订它们的经济战略时，重点放在弥合本国同工业化国家之间生活水平的差距上。社会和物质基础结构的设施是根本性的，因此显而易见，社会、政治和经济方面的困难将延缓农村地区的发展。制造工业对地理结构的条件要求不太高，而能使生产率增长和资本积累迅速得多，因而再投资并取得进一步的经济增长，同时相应地提高生活水平也要快得多。

由于大部分发展中国家通过从工业化国家进口而在不同程度上开辟了工业品市场，因此进口取代为那些陷入经济困难和没有经验的新政府提供了一种现成的工业化战略，而大部分工业化国家却花了几代人的时间来克服这些困难。在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里，进口取代看来是一个吸引人的方法，可借此把当地企业家带入工业领域去。当地所需货物的特点被了解得一清二楚。如果新生的“幼儿”工业受到保护，免除进口货物的竞争，以前提供货物的外商总是急于在该处建立子公司，或与担任进口商的企业家合资，支持在当地建立生产。因此在许多采取进口取代战略的发展中国家里，外国投资早就开始起重要作用了。进口制造业程度较高的拉美国家发现，外国投资特别有用，几个东南亚国家、以及更近期间一些非洲国家也有同感。

一个供选择的途径是建立一些公有的制造业。对于那些关心工业所有制的社会和政治含义的国家来说，公有制企业被看成控制如炼油、碱性金属制造之类经济“制高点”的重要工具，更概括地说，也被看成避免实行垄断，以及避免经济、政治权力过分集中的手段。

工业化可望带来一个重要的副产品，即大大增加在生产中

① 罗森斯坦-罗丹：《东欧和东南欧》，载《经济杂志》，1943年6月—9月号。文中把发展同工业化联系起来。

的就业机会，这就减轻了农村的压力，提高了城乡的生活水平。由于生活水平的初步提高，特别是卫生条件的改善，导致人口迅速增长，由于社会经济力量的全面发展加快了城市化的步子，因而创造就业机会的重要性就增加了。

国际收支

当发展中国家开始脱离它们传统的经济生产结构时，对支付差额的考虑成了进口取代式工业化的又一有力的争论点。对大多数殖民地和新殖民地国家来说，大萧条早在1926年或1927年已经开始了，并持续到20世纪30年代的绝大部分时间。随之而来的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工业制成品供应中止。原料生产国受到沉重的压力，需要向参战的工业化国家提供原料，然而它们面临着工业制品的短缺。当地的制造工业得到促进，在某些情况下也出口制成品，但是投资受到了资本货物短缺的限制。因而，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许多发展中国家拥有十分强大的外汇储备，但当发展战略导致进口的比重迅速增加时，这些外汇储备很快就消耗殆尽，代之以长期出现国际收支的赤字。人们广泛地相信：发展中国家不能在出口工业制成品方面进行竞争，并相信，如同20年代那样，原料出口的贸易价格将下降。因此越来越把重点放在进口取代式的工业化上面，① 可是工业化过程本身就变成高水平进口的主要理由。② 发展中国家必须从工业化国家购得资本设备。许多

① 保罗·普雷维什：《不发达国家的商业政策》，载《美国经济评论》，1959年，5月号；K·N·拉吉和A·K·申：《出口收入徘徊不前情况下增长的取代模式》，载《牛津经济论文》，1961年，2月号。文章表达了取代进口工业化战略的精髓。

② 扬·利特尔、蒂博尔·西托夫斯基和莫里斯·斯科特：《一些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和贸易：比较研究》（伦敦，牛津大学出版社，1970年），以及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赞助下同时进行的6篇研究报告。这些著作注意到这一趋势，对此持批评态度，主张从进口取代转向一条更平衡地达到工业化的途径。

进口取代型工业开始时大部分是装配工序，要依靠进口的原料和零件，这些也必须从工业化国家购买。所以在20世纪60年代初，有些国家开始放弃"不惜代价取代进口"的想法。10年以后，出口工业制成品成为工业化战略的主要部分。

工业化的目的如同发展的目的一样，从来就不是局限于经济一个方面。操纵机器、管理复杂的工序以及生产合成产品的能力，从来就是与民族自信和军事能力密切相关的。使用现代化设备意味着结束缓慢的、使人精疲力尽但产量又很低的手工劳动。再说这种手工劳动的报酬又很少。对于那些其人民在日常生活中承受体力劳动的重担，又无舒适或安全可言的民族来说，工业化的象征——现代化的工厂、高耸的办公大楼、商品丰富的百货公司及其陈列的货物——给人以繁荣以及与工业化国家平起平坐的希望。①

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正在造成一场第二次"工业革命"；它不仅是发展中国家本身正在发生的变化中的关键性因素，同时也正在从根本上改变世界经济。18世纪和19世纪在大英帝国发生的变化就起了同样的作用。

二 工业的成就

在过去25年里，工业化国家工业制品的产量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增长，不过发展中国家工业制品的产量增长更迅速。有些发展中国家建立起一个制造业部门，虽然这些国家的收入仍较低，但已可以被看成实行了工业化；十一、二个国家显然已经是半工业化

---

① 见劳契林·库里：《发展的目的》，载《世界发展》，1978年，1月号。文章对与个人和国家有关的发展目的作了周详的分析。

了；大部分发展中国家早已进入了走向工业化的阶段；大概只有一些人口稀少的很小的小国依旧未进行工业化。对一些非常小的发展中国家来说，正像对一些非常小的高收入国家那样，由于相比较之下它们的优势在其他方面，所以工业化仍是一个有限的目标。

人们多次试图对工业化进行类型分析，他们以国内生产总值中工业制品产值所占份额的变化为依据，① 按照各种制造业部门的产值对整个制造业的产值的比例、② 每一单位所用的成本和劳力的价值，还根据工业制品产量中出口的份额和全部出口产品中出口工业制品的份额来判断。这些标记以及类似的标记都有助于了解制造业的成长及其在经济中的作用，但在不同的情况下它们具有不同的含义。两个传统的农业大国——中国和印度——各自发展了一个高度复杂和比较高级的工业结构，虽然它们全部国内生产总值中制造业产值所占的份额仍较低，它们应被看成半工业化国家。工业制品的输出不能被看成制造工业发展的标志，③ 但是随着工业的发展，制成品出口的性质是可能发生变化的。④ 如香港和新加坡那样的小"城市国家"，从它们开始工业化过程起，就具有高水平的工业制品出口额，因为它们置身于弹丸之地，要求高度专业化以适当地扩大生产规模，减少经济成本，而发展门类齐全的

① 西蒙·库兹涅茨所著10篇系列性论文：《在计量方面的国民经济成长》，载《1956—1967年经济发展和文化转变》。介绍了一种计量方法，并使用这一方法统计经济的连续发展。

② 霍利斯·B·切纳里和兰斯·泰勒：《各国历来的发展模式》，载《经济学和统计学评论》，1968年11月号。

③ 贝内尔吉和J·P·东吉斯：《经济发展和制成品出口模式》，基尔会议讨论稿第16篇（基尔，世界经济学院，1972年1月）。该文展示了对巴西、哥伦比亚、以色列、墨西哥、巴基斯坦、西班牙和南斯拉夫的工业化和出口进行研究的成果。

④ B·巴拉萨：《比较优势的"阶段"方法》，世界银行工作论文第256号（华盛顿特区，世界银行，1977年5月）。

"平衡"工业结构对它们来说是不明智的。

统计方面的困难又产生了概念问题。① 相对于非保护性的活动和其他保护程度较低的国家来说，对制造工业进行重点保护的国家将其制造业产品估计过高。② 为了降低城市生活费用而压低农产品价格同样总是对制造业生产估价过高。在一些国家里估计服务性工业产值的困难，以及随之发生的差异，使习惯上应用的统计工业制品产值同国内生产总值的比率的方法特别容易发生错误。把工业制品产值所占的份额同商品生产的产值进行比较，可能得到更有效的说明，因为它排除了估计服务性工业的困难问题，也可避免受到服务性工业在日益增长的经济中的重要性不断变化的影响。③ 国内生产总值中工业制品所占的比例低，商品生产的产值与工业制品在国内经济总值中所占的份额就相当接近，但当工业制品所占的比例较高时，两个指标就相差很大；因为在工业化的最初阶段，服务性行业相对来说发生衰退，随着高度工业化进入了高收入水平阶段后，服务性行业发展相当迅速。在识别出口的工业制品的数据，使这类数据与工业生产的数字相符时会有许多困难。④ 实行中央计划经济的国家和采用市场经济的国家在国民结算方法论上的不同，造成了比较中的严重困难。最后，数据一律换

---

① 维诺德·普拉卡什：《工业发展的统计标记——对基本数据的批判》，经济学部门工作论文第189号（华盛顿特区，国际复兴开发银行，1974年9月）。

② B·巴拉萨等，《发展中国家的保护结构》，（巴尔的摩，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出版社，1971年）。

③ B·巴拉萨和H·休斯，《工业发展水平的统计标记》，经济学部门工作论文第15号（华盛顿特区，国际复兴开发银行，1969年5月19日）。使用这一方法作为工业发展水平分类法的主要标记。它展示了共分4个级别的方案，后来被收入《世界银行的管理：区域计划和政策》（巴尔的摩，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出版社，1972年）中《工业部门工作论文》内。4个级别的分类法也被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采用，收入《工业发展调查》（联合国出版机构，销售号72.Ⅱ.B.15）。

④ V·普拉卡什：《估量工业出口：由定义不同而引起统计变动的比较研究》，世界银行职员工作论文第225号（华盛顿特区，世界银行，1976年2月）。（接下页）

算成官方汇率的美元会造成扭曲失实。

利用人力资源和物力资源是工业发展中的重要方面。适应和创新的能力对工业进步极其重要，因而创业能力、管理能力和技术能力也许是工业经济臻于成熟时最重要和最难以捉摸的标志了。工业化国家提供这种能力比之非工业化的发展中国家要充分得多，但至少在目前对这种能力的估计还未得出结果来。创业精神、企业管理和技术特长要求得到充分的劳力资源和资金来源的支持。提供劳力并不是单一因素。技术和技术潜力是很重要的。教育水平的标记是一般对人力资源进行估量的唯一可行的替代方法，因而勉强反映了人力资源的状况。

估量物力资源也不是容易的事。通常采用的方法是看获得和使用电力的情况，但是用电力代替工业化经济所需的综合公用事业设施也是很勉强的，还有就是看制造工业使用的固定投资资金的情况，这是一种更勉强的方法。"资金"仍会产生概念上的错觉，对它进行估量存在着种种问题，这是众所周知的，无须详述。①

商业基础——银行业、进出口、批发与零售贸易以及诸如市场研究和广告之类的辅助性服务行业——也是工业发展的重要方面。在许多国家里，同工业成长相关联的对外经济，来自与商业充分发展的交互作用。然而，要分辨有时是不利于工业发展的传统商业服务和补充工业发展的商业服务是有困难的，到目前为止也排

（接上页）在该文中对工业制品出口作了规定。这些规定被作为国际贸易标准分类的第5类至第8类，其中67和68款除外，保证尽可能涉及广大的国家。虽然这样分类把加工食品和其他工业制品排除在外，这样就低估了一些国家工业制品出口的总值，然而却把钻石和其他贵重但实际上未经加工的出口矿物包括在内，以致一些国家的制成品出口被夸大了。

① 戴尔·W·约根森：《投资行为的经济研究：一种探索》，载《经济文献杂志》，1971年，12月号。

除了作出估计的可能性。

这样，工业进步标记的综合指数就难以计算了。衡量工业化成熟程度最好的单一标记看来是商品生产中制造工业产值所占的份额，但表中也列出了使用得更普遍的国内生产总值所占的份额、按每人平均计算的工业制品的产值、在出口总数中工业制成品出口所占的份额。接着对国家进行的分类仍是臆测的，从还未开始实行工业化的国家到具有纯熟的工业制造能力的国家，基本上是凭一系列的经验对它们随意划线。在这一点上，从多方面来看，认识到排在系列末尾的发展中国家的不同点比认识它们的共同点更重要，这是事关重大的。

工业化国家

(工业制品份额占商品生产产值60%以上)

工业化国家大部分由欧洲和北美的高收入国家和澳大利亚、日本以及新西兰组成。在这些国家中，1976年工业制品产值大多占商品生产产值60%以上。一般人均工业制品产值在1500美元以上，在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上升到接近人均2500美元。需要指出，在一些具有成熟的工业结构的高收入国家里，初级工业的份量不到商品生产产值的60%。一些收入水平仍较低的发展中国家具有较发达的工业部门，因此它们的工业制品超过了商品生产的60%。在有些国家里，政府对制造工业实行高保护政策，结果对制造工业的产值估价过高，这样就描绘出一幅对工业化水平有些夸大的图景；因此，虽然阿根廷、巴西和墨西哥制造工业的份额超过或接近商品生产的60%，它们却被归入半工业化国家。

工业化国家拥有足够的企业家、经理和技术人员；在市场经济中，他们大部分供职于私人企业内；而在中央计划经济中，他们服务于公有企业。教育高度发达，工业和技术能力也同样发达。虽

然在这些国家的市场经济集团中有外国公司和经理人员，外国技术也自由地被采用，但这些大部分是双向流动。澳大利亚、加拿大和新西兰主要是外资接受国，而日本实际上直至最近还排除外国人经营和外资，只有这几个国家是双向流动的比较突出的例子。在中央计划经济中，已经有一股向国际投资流动的动向，实行计划经济的国家开始接受来自市场经济的有限形式的投资。

制造工业大部分集中在主要的中心城市，这些城市已发展起来，利用地理条件扩大生产，降低成本。不过在一些工业化国家，因没有规划好城市的发展而使社会费用成为沉重的负担。因此，在一些国家里，制造工业地点的选择、适当的城市规模和结构就成为重要的决策问题。

半工业化国家

（工业制品份额占商品生产产值的40％至60％）

半工业化国家集中在拉丁美洲，南朝鲜是东亚的一个主要例子。中东在这方面也有发展。香港和新加坡最近才从这一级别跳出去，如前所述，也应把中国和印度包括在这类国家中。

总的来说，半工业化国家建立了较好的私人或公有企业以及制造工业部门，它们也已经克服了早期阶段严重的人力和物力资源的短缺。它们的工业结构正由原料基地、规模、地理位置，以及由这些得天独厚的条件所反映的较优的政策考虑来决定，而不是由渐进的进口取代方式来决定的。在它们注意避免受到内向的、进口取代式的、过度保护的框架的束缚时，就更是如此。出口型的国家趋于专业化，而主要实行进口取代政策的国家倾向于采取“平衡”的工业发展模式，哪怕这在工业化的最初期间意味着生产规模不足。

比较而言，半工业化国家的制造工业集中在某一地区的程度

总是比工业化国家更大。工业化国家大部分制造工厂设在几个中心地区，那里可以取得物质基础设施。在半工业化国家，现在正在发展其他工业"极地"，但一般来说，与工业化国家相比，半工业化国家以制造工业为主、集中于城市的做法形成了更大的社会经济问题。因为半工业化国家不具备物质基础，不具备至少可以在经济上使城市结构迅速改善的收入水平，且不说政治上的改善。而高收入国家就有可能做到。

正在进行工业化的国家

（制造工业的份额占商品生产产值的20%至40%）

非洲、亚洲、拉丁美洲的大部分发展中国家都属于正在进行工业化的国家这一类型。有些国家的工业生产负担着沉重的矿产品加工，在许多情况下，高保护政策夸大了涉及工业的程度。

这些国家已远远不止是刚向工业化跨出最初几步了。绝大多数国家可以生产相当大一部分当地市场需要的消费品；生产一系列重要的中间产品，特别是建筑材料；它们也已经或正在开始制造生产资料。虽然印度尼西亚和尼日利亚的工业制品占商品生产产值的比率不到20%，很可能仍应归入这一类。再说，在这些相当大的国家中，农业部门淹没了已经建立起来的工业部门。除了一些大国以外，一种平衡的工业结构也往往是反映内向的进口取代战略和过分的小规模生产，体现不出工业上的成熟。

属于这一类的国家也已克服了开始实行工业化时缺乏人力和资金的困难。它们已储存起一批本国的企业家、经理人员、技术人员的力量，但尚不足以满足这些国家所期望的那样高速发展的工业生产的需要。这些正向工业化迈进的国家至少在一些领域也已建立了一些物质基础设施——港口、陆路运输、供水和电力——这是工业活动必需的。但在大多数情况下，与半工业化国家相比，它

们的基础设施不足。制造工业仍趋于集中在首都一个城市，或许另外还有一二个中心，在那里都会随之产生一些社会经济问题。曼谷、雅加达和马尼拉是具有严重城市发展问题的典型都市。不过这种现象也有例外：例如哥伦比亚和马来西亚，出于历史的原因，制造工业在同一国家的好几个中心发展，城市化的问题相应地不是那么急迫。

非工业化国家

（工业制品的份额低于商品生产产值的20%）

大约有30个国家属于非工业化国家的类型。拉丁美洲只有一个国家（海地）；亚洲和大洋洲有3个国家（斐济、尼泊尔和巴布亚一新几内亚）；其余的国家在非洲。这些国家的制造工业多半是由几个生产建筑材料、服装、纺织品、鞋类和加工食品的工厂组成，再进一步的生产大都是些简单的装配工序。这些国家严重缺乏人力资源——企业家、经理、技术人员和熟练工人严重短缺——因此每增建一座工厂都是非常困难的。这一类型中的大多数国家领土狭小，人均收入极低，对工业品的需求量很少，生产水平难以达到经济的程度。

属于这一类型的一些国家资源很丰富，特别是石油或其他矿藏，因而它们具有进行工业化的强大的财政基础。它们的主要问题在于找到一种合适的专门工业或其他专业性项目，最终将作为"主要的工业部门"，特别是在自然资源的家底耗尽以后仍能发挥作用。对这些国家中的某几国来说，基础广泛的工业化可能证明不是一条有利可图的发展道路。它们可能会发现，一些特殊的工业发展，同时加上面向国际的服务性活动，如运输和精心计划的有限的旅游业，可以比基础广泛的工业化带来更高的利润。对大多数国家来说，由于人口稀少和收入水平低，本国市场非常小，几乎

从开始进行工业化起就必须出口物资，以确保扩大生产规模，降低成本，从而保持适当的效率。这就使得跨出工业化的最初一步显得特别困难。

同目前正在进行工业化和已经成为半工业化的国家二三十年前面临的情况相比，非工业化国家处于更有利的状态。它们可以大量地吸取以往实现工业化过程中积累起来的经验；在主要城市中基础结构设施也已经存在。

总的趋势

把发展中国家看作一个集团，目前制造工业已在这些国家打下了牢固的基础。的确，一些半工业化国家正在挤进几个落在后面的工业化国家的行列，它们的工业成熟程度已与后进的工业化国家相当。拿巴西的圣保罗同意大利南部作比较，一致的地方更明显了。象阿根廷和葡萄牙那样的国家显然同时具有工业化和半工业化国家的特点。此外，半工业化国家占了发展中国家人口的大部分，特别是把中国和印度的全部人口计算在内的话。即使仅仅计入这些国家的工业化地区，情况也同样如此。另一方面，非工业化国家占发展中国家人口总数的一小部分。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由于工业化国家的工业增长也很迅速，发展中国家作为一个集团急起直追，以便在世界工业生产中占有与它们总人口相称的一份，但它们这样做还不太成功。那些工业增长迅速的国家当然弥补了差距，通常反映在它们人均收入的迅速增长上。总之，光把注意力集中在工业化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工业制品产量的差距上，而不看发展中国家的成就，这不仅仅是在酒杯一半是满的时候说它一半是空的，而是转移了注意力，忽略了在导致一些国家的工业化迅速发展的同时，阻碍了另一些国家发展的那些因素。

三　当前的工业化问题

鉴于国际经济关系的变化，以及对经济发展的优先考虑的理解发生变化，工业化问题的紧迫性加剧了。工业化程度不同的国家和具有不同政治目标的国家对这些问题的看法各不相同。不过也出现了一些普遍性的课题，成为20世纪80年代工业化问题的特征。

经济增长

在设想和实施工业化战略时，适当地利用数量不足的资源和取得生产效率始终是事关重要的，因为通过创立一个高度发展的生产部门来向发展中国家地区性的贫穷开战，一直是工业化的中心目标。① 工业化的实际经验极其强调对效益的关注。一些发展中国家已能利用适度的保护措施，稳步和有效地扩大工业制品的产量，但许多国家在工业发展过程中，既浪费了资金又浪费了劳力资源。经验指出，虽然在这些国家采用保护措施来支持新建的工业，它们相信巨额的利润将超过短期费用，但对制造工业实行保护的程度不断升级（和高昂的出口津贴），导致忽略和歧视农业和其他非制造业活动，放任高度无效益状态，与此同时，投资于制造工业的人力资源和资金本身产生的社会利润很低，虽然私人利润不一定低。过分保护制造工业提高了投放到农业、其他初级产品和服

---

① 对于早在20世纪30年代涉及贫困的言论，劳契林·库里于1978年1月评论："……我们必须分辨目的和政策两者，以达到目的。不要设想不直接向贫穷开战，就是不关心贫穷的表示。否则，我怕很可能会把消除贫穷来取代经济增长的速度，并作为压倒一切的目标。最后会加深贫困，出现事与愿违的后果。

务性工业中去的费用，而不是使扩大投资和投资变得低廉而成为可能，这也往往阻碍了全面的经济增长。由于过分地把资金吸引到大城市去，高保护措施加深了地区间的不平衡状况。它允许大量出现X效益，① 导致限制潜在的国内市场，过分限制生产规模，以及进一步追加费用，加重了经济的负担。

过分的保护措施产生了支付差额问题，它成了发展的阻力，而不是加速前进的手段。随着工业化的进展，支付差额问题并未象保护新建工业的支持者所希望的那样得到解决。保护措施执行过头了，这些问题确实恶化了。在大部分制成品都靠进口时，进口限制没有引起严重的社会困苦，因为进口汽车那样的奢侈品，可以在因国际收支出现差额而紧缩银根时加以限制，当出口收入允许时就解除限制。随着工业进步出现的国际收支平衡方面的重重困难，必然要求限制工业投放物的进口，而不是限制最终成品的进口，这就引起了失业。这样，"停一下再前进"的政策变得十分昂贵。过分受到保护的新建工业总是不能成长壮大，虽然其中有一些成了竞争性的出口工业。当外国投资者看到高水准的保护措施可以使他们获取垄断性利润，因而受到吸引时，在国际收支的问题上又出现了汇出巨额款项的困扰。

20 世纪 60 年代后期，一小批选择以出口为目标而进行工业化的国家取得了成功，于是人们开始把研究方向集中在过分保护对工业化的作用以及全面发展方面。② 接着，在政策上越来越强

---

① 见哈维·莱本施太因：《组织或摩擦平衡、x效益和创新速率》，载《经济学季刊》，1969 年 11 月号。

② 利特尔、斯科特和西托夫斯基被引用著作；巴拉萨被引用著作；以及J·B·哈格瓦蒂和A·O·克吕格尔：《交换控制、自由化与经济发展》，载《美国经济评论》，1973 年 5 月号，预先展示了 10 篇全国经济研究局关于外贸组织和经济发展的国例研究文章，及基尔讨论会研究文章的内容。

调工业化的国际竞争和面向出口，借以克服分配资金不当，和排除妨害经济效益和增长的障碍。一大批亚洲、拉丁美洲和地中海国家选择了出口工业制品，作为矫正过分地进口取代的方针。对有些国家来说，起初这意味着，在现存的刺激制造工业的做法之上又增加了大量的出口津贴，这样做有时造成了经济进一步扭曲变形。公开面向出口的经济倾向于忽视国内市场的成长。近年来，在取得了更多的经验后，已找出一条途径来避免过分地刺激出口，也避免了采取过分的保护措施。

过分地保护进口（或出口）当然不是无效益状态的唯一根源。不适当地发放生产许可证总是在无意中使本来不完善的市场变得恶化，造成在高保护贸易政策庇护下的全国性和地区性垄断，以及少数制造商操纵市场，导致本已摇摇欲坠的天平破碎，或者生产崩溃。有目的的价格和产量控制曾备受赞扬，不幸它在削弱国内和国际竞争方面时常产生副作用。许多缺乏投资、会计和其他公营部门标准的国家发现，公有企业的管理很困难。人们已经发现出于好意的免税期政策实在大可不必实行，它对提高效益是有害的。

从更广泛的范围来看，在达到全面效益方面，人们开始对工业化对农业和其他领域的影响提出质疑。制造工业的费用高昂往往阻碍农业发展和传统的出口，而未相应地获得经济增长。与此相反，农工业相互支持的政策强调农业生产加快了经济增长，改善了城市的分配，因而减轻了城市化引起的问题。

平等和福利

发展中国家跨出了工业化的最初几步后，如同在其他方面的发展那样，近年来越来越转向要求在工业进步中得到平等的待遇。它们也开始以平等的条件来看待许多涉及效益和增长的问题。保护结构有利于生产资料进口，（目的在于鼓励工业投资的）货币信

贷政策人为地造成资本价格低廉，这两种情况引起了资金密集以及资金利用率低，① 于是被认为导致了创造的就业机会很低。② 这反过来又使人关注劳力与资本取代的机会，关注根据对技术的选择来选择制造的产品，关注针对拥有各种不同的资源和不同的工业化水平采用适当的工艺的问题。③ 由此可见，收入水平，更严格地说是收入的分配影响产品组合，表明了工业增长、效益、收入分配问题和政策相互之间是有紧密联系的。

制造工业和其他生产领域，特别是和农业的关系，也开始被看成不仅是增长和效益的关系，而且是福利和收入分配的关系。牺牲其他领域，过分保护和抬高制造工业，加深了现存的收入差别，创造了新的差别。它反过来又限制了对工业制品的需求，对扩大生产规模以求降低成本和提高生产效率起了日益增强的恶化作用。一个享有特权的现代化工业部门孤零零地存在，脱离了其他城市活动——贸易商、工匠、甚至小制造商的传统的小规模生产部门——造成一种僵硬的二重性，限制了贸易的发展。各领域间资源的调动现在被看作另一个阻止工业迅速增长和经济全面增长的障碍。人们对影响大小不等的公司取得资源，特别是资金的政策，以及向小商号发放生产许可证和课税之类其他政策的作用也提出了质疑。④ 制造工业结构中的二重性可能是工业化进程中的一种

---

① 见G·温斯顿：《经济发展中的资金利用》，载《经济杂志》，1971年3月号；Y·C·金和G·温斯顿：《股本的最佳利用和经济发展水平》，载《经济界》，1974年11月号；并见罗梅奥·包蒂斯塔等：《发展中国家在制造工业中的资金利用》，世界银行职员工作论文第242号（华盛顿特区，世界银行，1976年9月）。

② 戴维·莫拉维茨：《发展中国家工业化中雇佣的含义：一种探索》，载《经济杂志》，1974年9月号。

③ 阿马蒂亚·申：《雇佣、技术和发展》（牛津，克拉伦顿出版社，1975年）。

④ 乔治·拜尔等：《发展中国家城市的将来任务》，载《世界发展》，第4卷，第5部分（1976年5月）。

健康有力的趋势，条件是在大规模的现代制造工业部门和更传统的小规模生产部门之间发生有生气的和创造性的相互作用，这一点近年来已变得明显起来。在东亚，小商号为大公司转包合同很久以来就被看作这种关系的一部分，①这鼓励了造就和加强企业能力，促进了适当地利用资金和劳力资源，同时强调大小商行的亲近关系。然而在许多国家里，这种有创造力的二重性尚有待实现；小规模生产部门受到过分的保护，或者更一般地说，受到限制和挤压，是提高效益和取得经济增长的障碍。

国家统一和独立

摆脱殖民地国家和新殖民地国家中泛滥成灾的经济依附，是实行工业化的努力的中心问题。许多发展中国家对殖民政权和半殖民政权剥削作出的反应是转向自给自足。但自给自足不应与自力更生混淆起来，大多数国家的内向经济只是一个有限的阶段，因为它们看到，虽然各种形式的国际经济关系要付出代价，但获得的利益远远超过了付出的代价，同时自给自足导致经济增长迟缓，没有多少改善福利的余地。

因此，放入外国投资——包括企业、管理和技术能力、资金、工艺，以及在某些情况下进入国际市场的途径这一揽子计划——对许多发展中国家实行工业化的努力曾经是重要的，但最初它们没有作出必要的努力来追求最大限度的利润，并限制这类外国投资的代价。外国投资往往受到高保护和免税期刺激②措施的吸引，

① 渡边前：《在日本制造工业中小企业内的企业家地位》，载《国际劳工评论》，1970年12月号。

② 杰克·赫勒和肯尼思·M·考夫曼：《在欠发达国家内以税收刺激工业》（剑桥，哈佛大学法学院，1963年）。作者对过度的税收刺激提出告诫，他们的告诫为经验证明是正确的。见《发展中国家的外国投资》，（联合国出版机构，销售号68.Ⅱ.D.2）。

并从外币汇率比值过高上进一步获利，外国公司能赚到垄断性的高额利润。在20世纪50年代里和进入60年代以后，许多发展中国家都未能利用外国公司的资金和能力来刺激工业制品出口的潮流。它们几乎不加反对地接受了对跨国公司的子公司及其联营公司的出口产品施加的限制。在那些为外资创造了有利的投资环境的国家里，不可避免地会对外资产生敌对情绪。未给予外国企业家在高保护性市场上获取垄断性利润机会的国家，以及利用跨国公司的生产和销售能力变成输出工业制品的出口国并不抱有这种情绪。近年来，更加面向出口的政策大体上降低了过高的利润，缓解了投资国外引起的国际收支的负担；[①]同时，一种"成本/收入"的解决方法日益成熟，它依靠在东道国进行老练的讨价还价，使东道国可以在外国投资利益中分得更平等的一份。由于一般的内部调拨价普遍不同于利用税收和其他刺激措施的市场价格，[②]掌管这类政策不是容易的事，需要跨国公司的母国的合作，但这种政策正在越来越成功地得到执行。

有些国家通过直接从跨国公司手中购买尖端技术和管理体系，不是经由银行渠道从国外独力借贷资金，就是依靠国内存款，从而使外国投资的一揽子项目解体。跨国公司对这些"不妥协"的安排变得日益顺从，因为这样就能把它们所冒的商业和政治风险减至最小。目前尚不清楚，一个采用这种不妥协方式的发展中国家获得的纯利润，是否总比更传统形式的外国投资高，特别是在保护程度低的国家和外国投资在出口生产中起重要作用的国家里。

① G·K·黑莱纳：《欠发达国家的工业制品出口和多国公司》，载《经济杂志》，1973年，3月号，以及迈克尔·夏普斯顿：《国际分转承包》，《牛津经济论文集》，1975年3月。阐述外国投资在发展中国家工业制品出口中的重要性。

② 桑贾亚·拉尔：《多国制造工业公司的转让费开价》，载《牛津经济学与统计学公报》，1973年8月。

一些发展中国家本身也成了国外投资者，虽然仍是小规模投资，开始了成为工业化国家特征的国外投资双向流动。① 因此人们逐渐认识到，只要一个国家的政策结构是恰当的，公司的国际活动能帮助改善资金的分配，提高效益，而无损于它的国际收支平衡和国家统一。

从工业化国家获得技术的费用是发展中国家的另一重要问题。它有两个主要方面：被转让技术是否对路和转让的净费用多少。这在很大程度上又要看一个国家工业政策的框架以及看它的教育、技术和科学政策。过去有些发展中国家不管其资金与劳力相比是否比较充裕，往往倾向于认为，高度复杂和资金密集的技术适合所有的制造工业。它们通过贸易和人为的低息政策，选择资金技术充足的各种工业混合体，总是忽视使技术适应本国的条件。而利用旧的、特别是最近刚过时的设备，在一个劳力充足的国家进口技术时，可能是节约费用的办法。但这种做法常常被故意排除掉。复杂的技术是操纵市场的或垄断性的一整套手段的一部分，费用总是十分高昂的。然而，随着工业化的进行，提高了发展中国家适应技术以及分析技术的费用和影响的能力，目前许多国家在致力于部署本国的科学技术政策，以便选择并发展合适的技术，将技术转让费减至最低。

当前的展望

大部分发展中国家同它们的评论家一样，了解自己面临的问题。不发达状态形成的压力迫使它们采取高保护措施，高度集中资金，避免国内竞争，但当不发达状态减轻后，这些措施仍未取消。

---

① 小路易斯·T·威尔斯：《发展中国家公司的国际化》，与卡洛斯·迪亚斯-亚历杰德罗：《拉丁美洲进行的外国投资》，载《小国里的多国公司》（剑桥，马萨诸塞州，麻省理工学院出版社，1977年）。

政策制订者和行政官员目前正在检讨工业化政策，使之更符合发展中国家具备的生产要素和进行国际生产的可能性，他们首先必须抛却过去的积累政策，才能有效地引进更合适的方法。以往20年左右的时间里，国际贸易迅速增长，从而比较容易做到用迅速增加出口来补偿国内方面的失误。在最近的将来，国际市场的前景并不象70年代初那样有利。

国际合作的可能性

发展中国家工业化对国际经济所起的作用在20世纪60年代末开始变得重要起来，那时发展中国家开始大量出口工业制品，在工业化国家引起了关注，担心会同它们本国的制造业者和工会竞争。随之而来的是，在关税会谈的肯尼迪回合中，降低象纺织品那样的劳动密集产品关税的谈判失败了，[①] 对发展中国家最易于出口的产品设置了“自愿”的或其他非关税限制，[②] 以及削减某些初级加工产品关税上升遭到失败，[③] 这些都限制了发展中国家工业制品出口的增长。但高收入国家市场经济设置的大部分关税是很低的；受到限制的出口产品，如纺织品继续以每年7%至8%左右的速度增加，从1965年到1976年间，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制品出口增加了15%或更多。一些效率更高的生产国受到贸易限制的促进，提高了它们出口产品的质量，并使之多样化，因而增加了出口所得。[④] 实际上，从60年代至70年代初这段期间，供应紧张比需

---

① 《肯尼迪回合，对关税壁垒影响的估价》（联合国出版机构）。

② R·E·鲍德温：《国际贸易的非关税畸形》（华盛顿特区，布鲁金斯研究所，1970年）。

③ 贝拉·巴拉萨：《工业化国家的保护结构及其对发展中国家加工出口产品的影响》，载前引《肯尼迪回合》。

④ 罗纳德·夏：《香港纺织品出口：自愿限制案例研究》，《亚太地区的贸易障碍》（渥太华，卡尔顿大学，1972年）。

求紧缩更为重要。一些发展中国家无力生产足够数量的货物来完成允许出口的配额。[1] 1974 年至 1975 年的经济衰退严重地紧缩了高收入国家的市场，但发展中国家中主要的工业制品出口国在 1976 年出现了复苏，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在 1977 年，随着高收入国家从发展中国家的进口比它们的全部进口增加更快，这些发展中国家的出口又有了重大的增长。

高收入国家经济增长速度放慢到低于 60 年代和 70 年代初的水平，目前预计可能会持续至 80 年代。世界贸易仍为高收入国家的市场经济所操纵，预料也可能会放慢下来。正如从 60 年代末与 70 年代初的工业制品出口迅速增长中看到无限乐观的前景那样，目前的形势助长了过分的悲观情绪。诚然，70 年代中期高收入国家市场经济的衰退和持续的高失业率导致了保护主义情绪复萌。但是保护主义行为受到了限制，多半已针对其他高收入国家。一些欧洲国家注意到价格具有竞争力的进口货物在短时期对反通货膨胀的作用，以及保持市场开放以维持经济效益的长期需要，坚定不移地反对保护主义者施加的压力。对许多正在走向工业化的国家和非工业化国家来说，供应紧张仍比需求紧缩更重要。

过去 25 年左右内工业化的成就，为发展中国家出口工业制品的政策开辟了新的选择机会。发展中国家向工业化国家出口劳动密集型工业制品有着更大的余地。就许多产品来说，工业化国家从发展中国家的进口与其全部消费的比率仍是低的。进一步摆脱劳动密集型生产是符合高收入国家的长远利益的，但是在高收入国家可能发生结构调整的速度是有限的。受到影响的工人中，女

① G・谢茨德，《1958——1967 年发展中国家向欧洲经济共同体和联合王国的棉纺织出口》，经济学部门工作论文第 52 号（华盛顿特区，国际复兴开发银行，1969 年）。

工占的比例很高，许多需要熟练技术的职位实际上仍对她们关闭大门，她们通常被看成次等工资收入者，鉴于这一原因，她们的职业流动性经常是很小的。发展中国家的劳动密集型产品也有生产过剩的危险，同茶叶、咖啡和其他热带作物产品发生过的危险差不多。① 因此，制造工业内部的多样化变得跟10年前以经济多样化为发端，开始建立制造工业时一样重要。

当前的趋势表明，这种多样化正在实现。虽然工艺简单的劳动密集型产品仍占发展中国家工业制品出口的大部分，现在，出口商品包括大多数门类的制造工业，其范围还在扩大，品种繁多、并不一定是劳动密集型的新颖出口产品正在迅速增加。② 发展中国家已逐渐占居了跨国公司工业制品出口中重要的一份。它们通过跨国公司使出口产品混合体多样化，这使发展中国家得以更深地渗入高收入国家的市场，并不招致保护主义者的偏见。

目前，大约35%的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制品出口到其他发展中国家去，但是中东富有石油资源的国家占了这些出口产品的一半。发展中国家之间贸易的迅速增长提高了效益，这可能表明对经济增长产生了效果。然而这类贸易不是轻易可达成的。主要障碍在于发展中国家对进口货，特别是其他发展中国家随时可以提供的进口货采取的高度保护措施，而且保护程度还在升级。发展中国家需要在谈判中作出努力，以使相互间的贸易大量增加，这要求有

---

① H·F·利达尔：《贸易和雇佣：扩大贸易对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就业的影响的研究》（日内瓦，国际劳工组织，1975年）。作者似乎在论证将劳动密集型制造工业全部转移到发展中国家去。

② 见哈尔·E·拉里：《从欠发达国家进口工业制品》（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1968年）；并见A·H·M·马赫富佐尔·拉赫曼：《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制品出口》（鹿特丹，鹿特丹大学出版社，1973年），叙述了劳动密集型工业制品出口的早期成长。巴拉萨前引著作："一个'分阶段'的途径……"，指出了20世纪60年代以来发展中国家实行工业制品多样化获得的进展。

耐心，谈判也是旷日持久的。迈出最初的几步特别困难，但当势头增加后，运输和商业服务发展了，就有可能更容易进行内部结构的调整。发展中国家之间的贸易当然不是取代与高收入国家的贸易，而应该是它的补充。高收入国家必须能增加它们的出口，以便从发展中国家进口更多的货物。只有在这种情况下，才能促进世界经济的繁荣。

建立地区性共同市场的前景看来可能性不大。当有关国家无甚工业发展，或这些国家处于不同的发展水平时，关税同盟或共同市场集团的标准收费要高得多。一些较小的发展中国家多年来已意识到它们单一市场的局限性，因而通过发展地区性市场以寻求避开国际贸易和资金流动的全面竞争中美洲共同市场是这类集团中最成功的。不过它的建立似乎由于过度的保护措施、密集的资金、歧视农业和使收入分配扭曲变形，加强了实施进口取代的趋势，较有利于高收入的城市集团，其后果是限制了经济的全面增长。事实证明，创立多国公司(与跨国公司企业不同)的困难是相当大的，特别是在非工业化地区的市场上。乍看起来，那里国内市场的狭窄使它们显得前途无量。当然，在指明长期政治性目标的广博教科书中，许多地区性贸易和共同市场集团都可以作为内容之一，但是单从经济和工业化目的来考虑时，人们对地区性集团的潜力的看法就变得谨小慎微了。因为更充分地了解建立多国公司企业的行之不易，从而更加强调范围广泛的贸易收益。

国际贸易同资金流动和移民之间是互为补充的，是可以替代的，因而不能孤立地考察它们。发展中国家向高收入国家的暂时和永久性移民，去谋取工业制造行业的职位，是最近20年来工业化国家经济增长的显著特点。但永久性移民的流动越来越受到限制，最近工业化国家的衰退导致停止"客籍"工人移居，引起了原籍国和东道国两方的舆论观点对这种局势的注意。工业化国家的资

金向发展中国家流动，以便生产向工业化国家出口的货物，这是一种取代从发展中国家向工业化国家移民的特别形式，但资金流动的效果有些不同。

全世界范围内人们对环境污染的关注越来越大，这也是国际工业地点迁移的另一重要原因。工业发展水平较低的发达国家，达到规定的污染控制标准所需费用通常要比制造工业地点密布的工业化国家少。许多发达国家拥有密集的工业地点，因此而关心迁移工业地点。然而，这不是因为发展中国家达到规定的污染控制标准费用较低，而是作为一种排除环境污染的形式。

四　政府在工业化中的作用

现在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已司空见惯，甚至在以市场经济为主的国家里也无孔不入，因此这已是名正言顺了。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和接着在经济思想上发生的凯恩斯革命表明，不能指望市场经济自我平衡。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政府越来越多地干预市场经济，日益认识到市场缺陷引起的经济和社会损失。20世纪下半期的社会抱负使早先可以接受的收入分配不平等状况变得不能容忍了。对于寻求发展道路典范的发展中国家来说，中央控制经济的迅速增长证明是具有说服力的，生产资料的所有制是许多部分组成的社会主义思想中的一块重要的积木。发展中国家的情况是，只有政府才能提供社会物质基础——学校、道路、铁路、港口、水电供应——实行工业化深深地依赖这些基础。

因此对发展中国家来说，政府在工业化中的作用就是为保证全面发展而加快增长和保证平等。

在工业化的最初阶段，缺乏有经验的制造业者，这时发展中国家政府的作用总是格外重要。技术发明、投资规模的变化、规模经

济学的出现，以及庞大的、富有经验的跨国公司在世界经济中的存在，这些导致了各种准地租(quasi-rents)的产生，以致市场的价格(包括投资利润)时常与社会价格大相径庭，因而需要进行干预使两者恢复一致。对制造工业的投资采取保护措施和给予补贴、税收让步、发放生产许可证以及建立公有企业，来影响国内市场价格，使之接近或偏离社会价格。新古典主义经济学教科书表述了长期的比较优势，国际价格并不是这种教科书中载明的稳定的竞争价格。因此价格的扭曲失真成了政府干预的理由，而这种干预往往造成了新的扭曲失真，需要进一步的干预。

如同工业化国家的情况那样，政府干预的作用是多种多样的。政府通过对企业实行计划、直接控制，直至占有，已经起到了企业家的作用，它已成为“一只无形的手”，向各独立的制造工业单位发出适当的价格讯号，以此对工业化施加影响。

政府作为企业家

一些发展中国家追随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榜样，仿效东欧的中央计划经济，利用有计划的工业发展来消除私有制中的摩擦和浪费。人们一般总是认为，由于资金匮乏，发展中国家经受不起失败和破产，而私有制处置投资失误的基本途径就是破产。

在许多国家里，国家计划单位从事于计划整体的经济发展，试图根据特定的经济和社会准则来计划制造工业的发展。即使在未采用中央计划经济的地方，政府也划出潜在的投资地区，在某些情况下，甚至找到了当地的和国外的投资者，在通常为潜在的实业家提供信息的作用外，更发挥了企业家的功能。政府官员的决断至少部分地取代了私人企业家的决断，借以提高制造工业投资的社会赢利。

在许多缺乏本国企业家的国家里，政府就直接介入，建立和经

管制造业。在有些国家里，政府通过公营发展银行或支持私人发展银行，鼓励促进企业的组建。一些国家随着制造工业的发展放弃了公有制；一些国家在企业混合所有制中保持了政府直接拥有的重要作用；一些国家选择制造工业部门的完全社会所有制。

政府发挥企业家的功能，就可以审核和制定社会以及金融计划，从而使行政人员掌管公有企业，审查工业家的建议，根据这些方案在社会与经济方面的优点，挑选出满意的制造工业方案。当初，对社会计划审定的方法很简单，只要粗略达到这样的标准，包括一个计划可能对工业产量和就业作出的贡献有多大，以及对收支平衡的影响。最近，人们试图系统审定社会价格以及计划对分配可能产生的影响。①利用对计划进行审定来改进计划的构想，起初只是计划审定方法的副产品，现在已是对工业发展特别有效的一股输入力量。不过对计划审定的方法和实践问题还没有全部解决，②更重要的是，对社会经济方面的审核大部分限制在新的和较大的制造工业计划。除了完全属中央计划控制的经济外，大部分投资决定——有关逐步扩展的投资和从小型到中型企业承担的投资——没有列入计划审定的网络系统，但是许多中小型公司当然都如期成了主要的生产者。在市场经济和混合经济中这类控制也是不受欢迎的。企图控制从小规模至中等规模私人企业决策的国家，总是对它们进行限制和压制，虽然这是出于无心的。

更大的困难在于不可能以合理的方法对相对优势作预测。在

---

① 特别参见伊·M·D·利特尔和詹姆斯·A·米尔利斯，《发展中国家工业计划分析便览》，第2卷：《社会成本——利益分析》（巴黎，经济合作和发展组织，1969年），及《计划估价的准则》（联合国出版机构）。

② 如参见贝拉·巴拉萨、M·F·G·斯科特、特伦特·J·伯特兰、拉温特拉·巴特拉和昕希芬·吉辛格关于影子汇率的论文，载《牛津经济论文集》，1974年7月，以及F·斯图尔特等人的论文：《发展中国家成本——利益分析和收入分配》，载《世界发展》，第6卷，第2号（1978年）。

工业化的早期阶段，一般不难决定该建立哪些制造工业；只有轻工业消费品、建筑材料，通常还有一部分外向型的制造业活动是可行的。但是，当工业化的过程扩大后，预测制造工业活动（或一个较大国家内制造工业某一部门的扩大）的成功变得充满风险。一个国家的自然资源优势会因世界自然资源的状况和技术发现的情况变化而发生转移，在国内和国外人们都会有时尚爱好的改变，国际上会有新的竞争国参加到制造业中来。不能预先肯定地测出相对优势；实际上，甚至以后是否能精确地鉴别这种优势，还是有些疑问的。在生产品种繁多的复杂的工业制成品的经济中，个别企业的失误，不管是私人企业还是公营企业，造成的浪费比中央指导失误造成的浪费可能要小些。中央计划经济在预测本国和国外的需求、特别是消费者的需求方面，往往具有严重的困难，就是在合理范围内达到准确也很难。中央计划经济也经常处于非常严重的国际收支的困境，因为在国际贸易中，相对优势特别难以预期。因此，一些国家正在试验各种方法，这些方法能在不放弃中央计划全面指导的情况下，在系统内部整编风险企业。虽然对计划审定的方法已趋于成熟，它仍不能消除预测投资是否成功中的主要风险，但在避免投资的社会代价过高方面是相当有益的。而且，对计划的审定也不能取代，使市场价格更接近于社会价格的改进政策；实际上，一旦让计划审定起了这种取代作用，使政府过分地发挥企业家的功能，就可能付出新的代价。

政府作为"一只无形的手"

如果市场经济要确保有一个能够竞争和有生气的制造工业部门，而这一部门又要能顺应变化无常的相对优势的话，它必须具有一个广泛的企业家决策基础。不论私人企业还是公营企业，必须允许它们作出企业家的决策。反映经济和社会优先考虑的策略与

经济因素交互作用，提出了决定企业行为的竞争规则。中央计划经济的决策确实直接构成了指令性计划，但是不管是以明确的或含蓄的方式，中央计划制订者与市场经济工业发展的决策者对相同的一系列策略作出决定，影响着对相对于现存的国内和国际价格的社会价格所作的判断。

工业化的战略由许多政策组成，这些政策由几个部门制订发布，其职权范围通常包括贸易、外汇和其他货币信贷政策，税收、劳工和土地规划政策。决策者面临市场缺陷过大和大部分工业制品的"国际"价格剧烈波动。实际上，"边缘"价格变成了梦魇般的大杂烩：质量问题，因出口国商情而异的到岸价格问题，如遇到生产资料，还有提供资金者的利息条件问题。许多政策最初是为了影响初级产品、运输、建筑和服务行业这样一些部门，或收入分配之类问题的，后来也影响到制造工业。一个新政府或一个新部长无法收拾残局，只好重新开始。据传，有时在一些具有古老的文化传统的国家里，新法令不断增加，而那里2000多年来从未废除过一条法令。

因此，构想工业化战略是比付诸实行简单得多的事，战略的实施须经历错综复杂的有关政策的变化。在几年间发展起来的现存政策凝聚力远远不够。这些政策的确经常自相冲突。在许多国家里，自相冲突的复杂的政策框架对企业和经济来说，代价太大。有效地执行政策与周密地制定政策同样重要，在通常情况下甚至更艰难。为填写表格和其他官僚主义手续而无穷无尽地浪费时间，会极大地减少发展中国家取得已经少得不能再少的资金的可能性，破坏企业家职能和企业经营。制造业者经常挤在政府各部的接待室里，而他们本来应该呆在工厂的厂房内。由于政策自相冲突，时而否定一种政策的意图，时而取消另一种政策的意图，致使垄断性的准地租或"重载"地租① 成倍地增加。在许多国家里，不

是国会和国家部长实行管理，而是由小官僚经管事务。正是这种情况造成了行政部门和私人经济部门巨大的既得利益，使政策改革极难推行。

对工业化的汇率政策、贸易政策，在较小程度上还有信贷政策作出的分析，已经总结出过去10年在这些领域内推行一系列政策改革的解决办法。虽然这种分析是根据局部平衡作出的，大都是静止的方法，它设想以市场框架作为出发点，但随后的讨论在识别工业发展的主要障碍方面是有效的。因此证明，这是改进工业化战略和推行有关的政策改革的有效工具。从长远来说，各种工业化战略趋于互相结合。"进口取代"国家、"基础工业"国家、"原料基地"国家和"外向型"国家趋于建立一个广泛的工业基础，如果是大中型国家，则具有重要的工业出口部门，若是中小型国家，则具有专业化更强、更加面向出口的制造工业模式。这些国家的工业化战略仅仅以粗笔勾勒描绘了它们的工业进展。消费品生产、利用加工自然资源的机会、较早地投入如建筑材料和运输设备那类中间产品和生产资料，广泛地成为所有工业发展的特征。但是，在工业化的进程中，政策的差异对制造工业进展的快慢似乎是关键性的。[②] 将现时采用的分析方法加以改进，把工业化战略的分析扩展到税收、土地规划和劳动领域，可能是加快工业发展的重要步骤。

邓新裕　译

---

① 安·克吕格尔：《寻求分裂的社会的政治经济》，载《美国经济评论》，1974年8月号。

② 霍利斯·B·切纳里和莫伊塞斯·西尔昆：《1950——1970年发展模式》（伦敦，牛津大学出版社，1975年）。根据国家的大小及其拥有自然资源的情况讨论了工业发展的模式。

国家发展战略的国际联系

——变化世界中的紧张和机会*

曼弗兰德·比内费尔德

为了国家发展而作出的努力必然发生在国际联系的范畴内，国际关系的形势风云变幻，决定了各种竞争对手处境的窘迫，也决定了他们的机会。本文提供了有关那样的国际联系的一种观点，强调了自从1945年以来这种联系经历的变化所具有的重要性，提出只有同那些变化联系起来，才能对每一个别国家的经验作出分析，并对此有所了解。

有一种观点设想：国际上的发展是外来的既成事实等同地冲击每个国家的结果。由于任何这样的观点是不充分的，它没有考虑到资源能力上的差异，因此，必须对在国际领域和各个不同的国家领域间传递讯号和影响的联系加以分析，从而更加重视民族国家的情况。因为国家具有能力，尽管这种能力是可变化和有限的，还是可以决定那种联系的。

下面的论述集中于竞争的经济关系，这些关系虽然相当模糊，但作为一种特别强大的传递影响的形式，使国家进行调整，以适应国际上发生的变化。文中提出，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

---

* 本文选自曼弗兰德·比内费尔德和马丁·戈德弗雷主编的《为发展而斗争：国际联系中的国家战略》，约翰·威利父子股份有限公司出版，1982年。

(经济合作和发展组织的)工业化国家经历了自由贸易理论提倡的那种竞争关系的良性循环,但又辩解,70年代的情况以及1945年以来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经验表明,这一结果有赖于一些条件,这些条件自从60年代以来已受到侵蚀破坏。

本文结尾处考虑了阐述发展战略的国际联系的含义,提出,虽然与国际经济更全面的结合是值得期望的,但这很容易破坏国家的有效能力。国家凭借这一能力,可对最终在经济竞争过程中所反映的和被判定的社会和物质条件加以限制,把经济(物质)增长过程导向某些特定的防御性社会目标。

把这一中心意义全部解释为一个国家和国际体系之间的经济联系,并非意味着经济因素支配一切,那种联系被认为是可变的这一事实,也不意味着任何国家都能指望把本国与外部世界完全隔绝开来,即使这在特定情况下被证明是值得的,也不能这样说。接着的论点确实强调了经济因素的衍生情况,通过强调一个国家永不休止地重新判定其应与外部世界保持的(符合社会目标的)适当的经济联系这一国内政治任务的重要性,着重指出贸易的潜在利益。而且,不仅这类"适当的联系"必须由特定的国家环境来决定,还必须根据对国际发展所作的估量而定,因而对国际发展作出分析,对于系统地阐述国家发展战略是不可缺少的。

在国际联系方面,不可能对关于发展的著作中构想的国际领域所采取的不同方式,或明或暗地作出足够的考察。值得注意,本章的阐述在许多重要方面同最盛行的各种选择方法不同,但同其中的许多方法必然具有共同的基础。

本文并不抱有目前强烈地重新抬头的自由贸易正统思想所持的乐观主义态度,① 这种思想最近甚至声称,在目前的情况下,如

① 这篇论文并不进行涉及自由贸易的理论争论。但必须注意,它在讨论(接下页)

给予市场讯号完全的自由，让它充分表达出来，调节的费用将会是“微不足道”的。本文在阐述中也对这种论点持不同意见：新兴工业国（即最近正在走向工业化的国家）戏剧性的经济增长，主要是这些国家采取的国内经济和贸易政策的结果，或者说这种增长可以从弗农的生产周期论的基础上来推知并加以推广，或者是一些有关概念提到的在技术阶梯上连续前进所致。

在论争的另一方面，本文同各种形式的马克思主义学说持相反观点。马克思主义学说带有以生产周期作为国际资本作用的最主要特征的基本原则，认为在技术专业化的新模式的基础上，它可能导致现存的国际等级制度的更新；马克思主义学说在发展中国家中普遍地看到在（从经济角度考虑的）国际市场占一席地位的民族资产阶级国家的繁荣发展；该学说认为，基本上可以不用参照资本的国家政治基础，就能对国际上的资本逻辑下定义，把它看成在多国公司庇护下主要是按照价值规律而展开的；这一学说极其着重商业资本与工业资本两者的区别，大都不参照资本的国别来讨论工业资本的国际作用；这种学说把主要的重点放在不平等交换的概念上或贸易的帝国主义政策上；还有，马克思主义学说主要是从第三世界在国际阶级斗争范畴内作出的政治反应中推导出危机的。最后，本文的阐述并不是以这样一些论点为前提，即主要从石油短缺或流通不足中推断当前的国际矛盾。

随后的论点得益于前面对许多理论见解和凭经验得来的见识进行的分析，试图提出一种综合方法，认为国际形势为四种长期趋

（接上页）中大量地依据了新李嘉图主义贸易理论的著作。这些著作向正统的贸易理论本身的理论根据提出了挑战，在此过程中提出了同“自由贸易概念”相对抗的理论基础。这种概念是从自由贸易思想体系派生引伸而来的。本论文的题材环绕着生产的社会，与技术条件大不相同的各种经济形式间的贸易联系，并考虑到它同因失业引起的严重经济失调的关系，来论述这种联系产生的有力后果。这些论题也都是新李嘉图主义在贸易问题论争中关切的中心问题。

势所左右，它们逐渐扩大成为某种严重的经济失调，直至形成为凶险的政治危机。这些趋势表现为：长期以来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各国的经济中利润比率不断下降；以美英为一方，日本、西德和法国为另一方，在生产率增长上发生重大差异；在某些重要原料的供需方面的平衡越来越处于危险状态；最后就是发展中国家要使它们的国际收支的平衡，同某种形式的经济增长结合起来，这种增长要求避免社会和政治上不稳定的威胁，而且不需要扩大政治压力，就能维持的。这些国家在这方面经历了极端的困难。

这表明，在这一范畴内来考虑国家和国际利益以及劳资利益的相互影响，才能更明确地看清经济、社会、政治领域之间关系的本质。这一论题正是下面部分的中心内容，它考虑到在全球范围内竞争的经济关系的含义。

竞争原则和政治上的相互依赖

归根到底生产是一种社会过程。它要求组织劳工为特定的目的而工作，需要在可以共同接受的条件下就劳动与报酬问题同劳工进行协调。在行会生产或社会主义经济的情况下，生产首先是一个社会过程这个事实是明确的。然而当产品的交换开始在竞争的条件下进行时，伴随着在组织生产方面发生的变化，会使这个事实变得模糊不清，它产生了一种假象，似乎现在生产过程可以通过使用经济术语而得到充分的理解。实际情况不是这样，不过引进竞争的原则不可避免地对生产和交换过程产生巨大的冲击，却是千真万确的。这种冲击的后果以及它在国际关系方面的含义是我们首先要关切的事。

从目前来看，一般认为，无论何时商品和其他类似产品一起在市场上出售，而对生产商品的社会条件不加限制或不予考虑，竞争

的原则总是适用的。因此可能在有的市场上制造商出售类似的产品，但因为所有的制造商都让他们的生产过程被某一行会小心地控制着，这一原则并不适用。然而，当不受控制的制造商刚从周围乡间进入这样的市场后，竞争原则就立即开始起作用，并且，正如最近关于前工业化的历史文献极好地表明的那样，强调了"公平"市场的重要性。

这一变化的巨大重要性在于这样一个事实：所有通过市场联系在一起的生产者被拉进一种相互依赖的关系中去，它对每个关系者意味着，视其社会和政治而定的生产组织的生存能力或生产力的充足开工，只能在对照"与它相联系"的其他单位达到的情况时才成立。当这样联系在一起的社会单位是专业化的生产者时，其效果最明显。在"(经济上)不是竞争就是毁灭!"的口号下，这样的生产者免不了要把价格调整到与他们最有效的竞争者一样(只要那种效率是其他生产者能效仿的，并且不是对某种稀缺投入而得到的租金)，在此过程中，他们必须降低消耗水平，改善或加强生产流程，或则降低原料投入的价格。即使这样联系起来的社会单位是如民族国家那样范围更大、形式更多样的生产单位，这一竞争原则作用的重要后果仍旧不变，不过在这种情况下，冲击并不是那么直接，可能作出反应的领域也要广泛得多。为了阐明这点，全面详尽地考虑一下这一竞争调整的过程是很值得的。

无疑，竞争经济中矛盾最深的因素，是使消耗达到最大限度成为理所当然之事，同时将消耗转换成生产成本。生产体制的逻辑迫使每个生产者把成本减到最小。在这个意义上，竞争体制接近于使重商主义思想显然的"荒谬性"具体化，这一思想的不合理处是通过居民的贫困达到国家的繁荣。今天，这种矛盾深植于关于效率的多方面概念之中。(与其他生产者有关的)效率在三条战线上取得：(通过所有制——这是明显的政治事实)以有利的条件取得

生产所需的原料；占有优越的知识——技术上或组织上的知识；或则生产者一方更少的消耗与更大的努力。因此，不管何时何地，假如取得资源的途径是"一定的"，技术差别又小，那末在竞争过程中的成功，或者不如说生存，依赖于生产者限制其所付出努力的每单位本身的消耗。① 如人所始料，处在这种情况下，即广大的生产者同那些对生产实行强制性控制的人相分离，同那些愿意接受较高层次的自我控制，并在生产者对这种体制的长期优越性失去信心之前能"代表"他们的人相分离，这时，就能达到最大限度的"效率"。这些人可能是普鲁士的容克地主、弗吉尼亚州的奴隶主、阿根廷的大庄园主或曼彻斯特的资本家——所有这些人在原则上是同竞争的体制相抵触的。而且，这些人必定都会对竞争体制施加的压力作出反应，每个生产者都具有改善生产效率的物质刺激方法——那就是降低生产成本。

然而，与资本主义的企业家不同，非资本主义的业主在受到经济崩溃的不断威胁时并不"作出反应"。如果从生产率看，他们的生产落后了，总收入就将下降，甚至业主的个人消费也可能受影响，但是并不危及企业的生存。与此形成对照，如果个人的资本主义企业落后了，可能发生的后果就是破产。因此，对所有的业主来说利润的目标是共同的，区别就在于对资本主义业主来说是生存的目标，使他只能遵循一个规律、一个诫条："积累！积累！"。对于资本家，龟兔赛跑这个寓言的教训从来不可能是"只要坚持，跑得慢也能赢"，而一定是，"无论在比赛中看来领先多么大，永远也不能停下，要时刻不停地回头看"。

此外，资本主义生产者寻求不断增长的效率的更强烈的动机，

① 用马克思主义术语来说，它指攫取绝对的剩余价值。这种情况支配了资本主义积累的早期阶段，当时技术差别小，劳力供应充沛。

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是与更大的灵活性相结合的。这是由于所有权分散，可供投资的剩余资金得到控制，以及出现了“自由的”雇佣劳动力。从历史上看，可以断言这两者的结合形成了它的优越性，这不是竞争市场的作用逻辑上的必然结果，而是因为在全球经济发展的早期阶段它总是被证明是最“有效”的。重要的是说明确实在这一意义上取得胜利的资本主义形式，了解那种胜利的原因，考虑从最近世界经济的经验中，提出以“最理想”(即在竞争上最成功的)形式改变社会的生产组织的可能性，将那一结论带给技术上较落后的国家，推动其经济努力，使之在当今的全球范围内发展。本文在接下来的部分中非常简略地讨论了前两个任务，第三个任务占去全章的余下部分，而第四个，也是最后一个任务主要在国别研究中讲，国别研究构成了本卷的余下部分。

生产的竞争形式：竞争关系中的自然选择

资本主义的历史在某种高度上可被看成是，使那场同时需要增加消耗和降低生产成本的潜在斗争烟消云散，这是惊人的成功。解除这一明显的悖理的现象的魔杖是技术、时间和现代民族国家。首先是技术，因为技术使生产成本下降，即使在劳动力消耗水平上升时也可保持竞争性；其次是时间，技术能力相等，必然使竞争过程放在通过削减工资或强化劳动使劳动力变得低廉，由于时间过程的能动性，在时间上可以避免那种状态永久持续下去；最后是民族国家，因为民族国家使竞争过程得到调节，有助于在空间上集中积累过程，以使充分就业在一些特定的国家里实际上成为可能，虽然这种可能性总是存在一些问题的。

鉴于这些成就的实现对许多集团和地区不是没有剥削的，或不是没有周期性的全球冲突的，简单地推断这一资本主义历史上

的进步的前景不是无懈可击的。此外，虽然资本主义的物质成就已经降临工业化世界，不过仍有罢工发生。那里的实际工资不断增加，从1860年至1960年之间上涨超过了500%，这并不改变这一事实：竞争的资本主义的根本逻辑继续含有在劳工供应过多的情况下，趋于逐步削减工资，直至达到充分就业，不管技术的精良程度和平均生产率如何占了压倒优势。再说，在原则上这股滚滚而下的压力根本不尊重社会和人道主义的界限，除非能另外为竞争的原则作出规定，对所有互相竞争的生产者加上一些有效的限制。否则的话，除了长期重复竞争过程外，这一过程也完全不会停留在一些"劳动力再生产的费用"上。①1848年爱尔兰饥荒最严重时，一方面几百万爱尔兰人正在挨饿，一方面爱尔兰粮食出口达到了高潮。纳索·西尼尔②说，他担心1848年爱尔兰饥荒不会饿死100万人以上，为了更有效那是稍嫌不够的。从竞争过程的范畴来看，西尼尔这样说完全合符逻辑，在技术上也是正确无误的。

这并不是旨在暗示工业化国家的实际工资水平立刻就要垮掉，倒不如说是要引起注意：需要看到工业化国家关于实际工资的经验，这不是在竞争的条件下实现生产率增加的自然结果，而是经济和政治环境结合的结果。这种结合关系导致了在全国范围内集中积累的过程，可以接近充分就业，尽管随后实际工资增长了，也能依靠持久的技术推动力和直接利用经济、政治、军事力量来保持工业化国家的竞争性，无论什么时候觉得必需和可能的话都能这

① 一些马克思主义者使用"再生产费用"这一概念的方式很容易使人误解，好象"再生产费用"是指一些工资。它保证了所需要的劳动力供应，从长远来说是资本的最理想工资。这忽视了资本主义的主要矛盾在于在市场诱导下的个体资本家的行为不必同总的资本的利润相一致这一事实。

② 纳索·西尼尔(1790—1864)：英国经济学家。曾参与调查社会问题并提出报告，据此制定了1834年英国的贫困法修正案。他声称资本是生产因素，资本家实行节俭可导致利润的自然增长。著有《政治经济学大纲》，力图以科学方法系统阐述古典经济学原则。——译注

样做。

由于在这些国家的经济中出现了经济主义的工会，这一过程在政治上已定形并形成制度化，工会经常推动增加实际工资，直至达到国际上依靠这种技术经济手段或政治军事手段能维持的限度。同时，这些组织在各国的工业经济中照样复制出这一国际模式各方面的情况，它们保证充分就业和提高各种不同类别的劳工的实际工资，即使全面充分就业的前景很渺茫，也依旧提薪。也许这一发展的最惊人的后果是：在许多工业国，持久的高失业率时期，即19世纪70年代、20世纪30年代和20世纪70年代，实际情况总是伴随着那些继续就业的人实际工资的增长，其幅度超过了他们各自在长时期内工资增长的趋势或与之持平。

换言之，在为工业化国家中的大部分人口对经济和社会目的取得相当程度(尽管仍带有深刻问题)的协调方面，资本主义做得比较成功，重要的是它立足于排斥和集中过程之上。这个过程实际上是由民族国家、公司、工会的行动形成的，这三者规定了竞争原则在其范围内起作用的界限。

所以不单是“资本主义生产”，它在历史上展示了在进行竞争的奋斗中的相对优越性，而是“组织起来作为一个有效率的现代民族国家的资本主义”，必须有权享有这份荣誉。最重要的是起一些限制作用。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没有一个取得高速经济增长的资本主义工业国不存在一个强大的国家，它能统一国内市场；能对同外部世界联系的环节实施有效的控制；为在国内集中投资成功地创造了有利条件；必要时能强行保卫国家在国外的利益；能建立一支“自由”的劳工力量，设立一些最低限度的、起社会保障作用的限制，在国内，竞争过程可在此范围内展开。19世纪德国、意大利、法国、日本、俄国和美国的历史都是这一前提的范例，但历史也说明了这些国家以各种各样的方式来完成这些条件。甚至大英帝国

的经验也无可置疑地表明了不列颠国家作用的重要性：在早期建立一个统一的国内市场；建立它对国际贸易路线的控制；以及获得有利条件进入各地的市场和取得原料的来源。

在考虑为什么这种国家形式的资本主义已证明是最成功的时候，一些因素是值得注意的。第一，资本是一种社会关系，这样，它就只能存在于某种政治实体的范畴内，这个政治实体创造了对它的存在所必需的社会和物质条件，这是明显的事实。第二，创造一个相对地保持社会同质性和社会稳定性的领域具有重要性，在此领域内，竞争过程能较平稳地展开，同时也能对这一领域加以保护，避免同领域外的竞争者发生起潜在破坏作用的接触。第三，国家政策引起资本积累采取密集（集中）型，而不是粗放（分散）型的形式，在此范围内，对技术革新的刺激（使竞争与改善了的社会条件和谐一致）加强了，技术革新的条件改善了。第四，可由增加实际（社会）工资达到更容易地控制劳工和提高劳工的技能，因此这些措施也有利于提高效率。这是一个互相关联的事实。第五，需要具有某种物质力量的手段，这样至少能防止他人可能通过阻止国家进入市场或获得原料，来寻求得到某种不正当的利益，或充其量是取得某种值得怀疑的经济利益。以此特定方式阐述，要是说这些因素在说明资本主义的成功时极其重要，那末，根据适者生存的原则，经过自然选择，资本主义的成功导致了持续不断地仿效产生现代民族国家的种种努力。

当民族国家经由竞争关系联系起来时，如前所述，其结果将是产生一种强大的相互依赖关系。生产的民族和社会过程在进展上的差异，改变了这些国家相关的竞争性，因而最终也改变了这些国家的国际收支（作为国家对外经济交易的结算）的状况。当然，只要听凭竞争原则去适应，任何差异都会产生一种进行调整的不可抗拒的压力，这种压力排除了社会和政治上的对抗。在这个意义

上，人们可以说经济学支配了政治学，同样出于这一原因，在一个竞争原则普遍适用的世界上，值得我们对国际经济的平衡特别加以注意。

然而这也不应该因而得出经济主义的谬论，不能说这种调节的需要可以用纯经济的概念来理解，或者说可以从经济学的范围内推导制定出需要付之实施的政策。原来的差异和需要使经济指标恢复平衡的变化反映了社会和政治因素，不能把这些因素当作仅仅是"依"变量，看成必然会按照一套特定的经济信号作出调整，或者应该这样来调整。这类经济信号的极大重要性在于它们传递信息的作用，作为对不同的社会形势作出某些比较的手段，但是形势"要求"作出的调整必须始终根据其社会和政治实质作出分析和估价。这是一个重要问题，因为每当问题涉及民族国家时，总会出现一些政治干预，国际竞争的压力能引起国内生产组织的调整，而政治干预对调整的方式和程度加以限制。所以，归根结底还是政治领域支配经济领域。

可以肯定，这种政治干预经常是错误的，在一个国家经选择而保持的社会生产条件下，如果它采取依赖外汇方针，当依赖程度超过了它赚取硬通货的能力时，那末不管进行多大的政治干预，国家也免不了要在一个较长的时期内平衡它的对外收支和进行调整。不过这类政治干预确实造成了一种环境，使采取外汇依赖方针能成为自觉的抉择，可与社会和经济政策的其他方面协调一致。

虽然不能在这里对这类干预的条件进行广泛的探讨，毫无疑问，这种条件当然是存在的。每当国家和国际的效率水平之间发生差异，无限制地应用竞争原则要求在社会和政治上作出一定程度的改变时，这些条件就产生了。由于社会原因或政治原因，或仅仅因为这损害了经济的长期竞争性，这些变化本来是达不到或不愿达到的。此外，在以下情况下，这类条件更可能得到应用：当有

待弥合的效率差异相当大时；当经济较薄弱的国家的技术水平低到必须寻求以降低劳动成本来保持竞争时；当全球经济远远达不到充分就业，特别是在主导经济中也出现这种情况时；当不同经济类型的国家之间转让技术相对受到禁止时；当某些特定国家很有远见，在全国范围内密切配合地集中调拨可投资资金，从而产生了令人注目的、生气勃勃的经济时。

在这些因素大都强调落后的经济要精心调节它们与外部竞争市场的联系的同时，这个问题对主导经济也具有巨大的潜在重要性。如果在一段漫长的时期内，较先进的国家能在技术力量、社会力量以及相关的政治军事力量的基础上保持它们的竞争性，甚至还不断地扩大它们的社会生产条件（即社会工资以及所需的劳动强度）和不发达国家中普遍存在的条件之间的差异，那种日益扩大的差距造成出现了竞争的压力，会变得越来越危险，其社会政治含义一下子也不能被人理解。要是先进的经济国家在技术上的领先地位受到侵蚀，例如遭受世界技术变动性的冲击，或者曾经维持这些差别趋势的市场力量在政治上和制度上衰落的话，那末从全球广大的劳动力储备的范畴来看，竞争过程将主要集中在工资成本的差别上，① 要是社会生产条件的悬殊真有天壤之别的话，还会带来潜在的爆炸性后果。

当然，国家根据与它们有关的经济形势进行调节，以免暴露在国际竞争压力下，这一趋势是资本主义历史的普遍特点。今天的工业强国中的早期保护主义，② 对20世纪30年代的条件的共同

---

① 这当然是指"社会工资"。在许多方位决定中，决定性因素可能显得象是资本补贴，这些决定必定体现了从社会（私人和公共）消费的总数推断出来的结论。

② 虽然水源有时会被一些论点搅浑，例如这些论点引述名义上的关税，称日本的早期发展不是保护主义的，但是却忽略了在日本的情况中起主导作用的其他形式的保护——即19世纪的运输费用、以及日本的文化差异和内聚（接下页）

反应，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这些国家把对国内食品生产的高额补贴，同时不发达国家制成品出口征收暴涨式的关税（随着制作程度的增加而升高）结合起来的政策，都说明了这种情况。当然，可能有人接受这些事实，但又争辩说，这些事实并不表明国家调整对外经济联系的必要性，而是说明了在竞争过程中经济上遇到不合理的政治干预是不可避免的，因此所有的保护主义要求一概被定为从宏观经济学来看是不合理的政治压力，认为这是由于特殊利益集团为取得短期的局部利益而施加压力，丢弃"全面利益"而产生的。此外，也可能有人争辩说，由于从历史上看，贸易自由化曾与高速的经济增长有松散的联系，尤其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贸易的自由流通是这种增长的原因。然而，实际上有必要考虑到这一可能性：贸易自由化的便于实施，本来就得益于促进高速经济增长的环境，即使贸易自由化在这种情况下毫无疑问地助长和加强了经济增长，并不能认为更自由的贸易总会千篇一律地产生这种有利的后果。诚然，当高速经济发展的条件不再具备时，进一步推行自由化甚至可能造成危险的分裂和不稳定状态。

下文要对1945年以来的时期加以阐述，并指出，至70年代末这种形势似乎已再度出现。

战后发展概论

战后时期的特点是一系列惊人的政治和经济发展。与本文的讨论关系最大的是：历史上空前未有的产品和消费的增长；独立的民族国家大大增加，同时最富国家与最穷国家之间在人均收入和消费方面的绝对差别大幅度增长，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同其

（接上页）力提供的天然保护，还有众所周知的利用经济手段控制资金和货物流入。这些情况甚至今天还如此重要。

他国家的绝对差别也扩大了；鉴于旅游和通讯爆炸性地增加，文化上的相互依赖增加了；由于资金和贸易流通的结果，经济上的相互依赖加深了，劳动力流通则起较小作用；尽管从国家角度考虑，国际生产的集中程度减弱了，从公司角度考虑却增加了；超国家组织的重要性增加了，国际经济政治体制加强了；某些原料输入在供应方面出现了一些重要的阻碍，伴随着原料消耗水平的迅速上升，带来了种种生态问题；高度的人口增长，伴随着世界大部分地区令人失望的粮食增长；政治方面，从主要是一个大国明星支配一个"阵营"的东西方两极分裂至70年代向多极态势转化；国际金融制度迅速发展.在60年代中期过后，在结构上向私有国际金融流通急剧转化。在几个半工业化国家（新兴工业国：特别是巴西、南朝鲜、台湾①、新加坡）出现了一个"奇迹般"的经济增长时期，时间上大部分开始于60年代的后半期；最后在70年代国际经济重新出现了深刻的问题，国际形势在经济和政治两方面都出现越来越严重的两极分化，情况日益变幻不定。

尽管开列了这张长长的单子，无疑仍有可能遗漏重要的领域。这张单子的目的仅在指出一些主要问题，下文将试图述说前面已指明的四种长期趋势的相互关系。

以下的讨论将依次考虑战后西-北方（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和南方的经验，接着是结论部分，简略地考虑了资本主义世界已认明的趋势相对的社会主义国家（东-北方）的经验。

工业化西方的黄金时代：产量增长、自由贸易和矛盾

从1945年至1973年间，工业国经历了高速增长和相互间加

① 原文如此，指我国台湾省。——译注

快结合的过程。这是受到马歇尔计划的刺激，并受到同布雷顿森林协议提供的稳定和流通的促进，特别是受到同黄金挂钩的美元可兑换性、汇率比较稳定、国际销售联合会消除对外支付中微小不平衡能力的推动。在普遍达到充分就业和物价较稳定的条件下，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各国经济之间的商品增加和资金流通，在很大幅度上超过了产量的增长。这些国家之间的贸易壁垒在60年代逐渐降低了，竞争原则的这一扩大是同社会和经济广泛得到顺利的发展分不开的。因为除日本外，有关国家的社会和文化趋同是相当大的。国家间最初的实际工资差异虽然很突出，但根据国际标准还是小的，并总是同生产率的差异相联系。而生产率的差异削弱了实际工资差异可能带来的竞争优势。因此，竞争原则扩大而传递的进行调整的压力并不太大，很容易就能得到调节。

美国正在慢慢失去强大的经济领先地位，如果美国在战争末期作出决定，认明西欧和日本的经济发展是防御法国和意大利共产主义的最好保障，也是在日本和德国变幻不定的政局下对付不稳局面或防范复仇主义的最好屏障，如果没有迅速的经济增长的话，那末，即使是那种渐进的压力也能很容易导致抵抗和冲突。这是一个宽洪大量和重要的决定，反映了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学得的教训。因为欧洲的重建短期内在经济上大大地满足了美国的需要，向美国提供了出售在战时膨胀起来的资本商品工业，又因为对未来竞争的担忧被美国占有的经济支配地位所减弱，使这些决定较容易实现。

对大多数观察家来说，这一过程使人觉得异常有信心。他们看到了工业国家之间的趋同，并可望看到与社会主义集团趋同，意识形态抗争的结束，甚至民族国家的衰落。从学术界的旷野里发出呼声，指出正在出现的问题，但是处在如此惬意的安乐窝里，“卡

桑德拉"①之流预言家的凶讯很容易被置若罔闻。当然还有戴高乐和日本人，他们以不同的方式似乎都执拗地死抱着显然是不相关的民族主义。可以这样认为，欧洲经济共同体可能注意前者，地缘的接近使中国和苏联注意后者。还有发展中世界，那里盛行着平衡的经济增长、进口取代之类的民族主义言论，但是看来可以相信，全球经济增长能产生足够的财力提供所需的资金，甚至能帮助发展中国家解决它们的特殊问题。

简言之，由于需要对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经济间的竞争环节传递的经济信号进行的调节与调整并不太大，以及起初美国对于看到它的经济领先地位受到侵蚀感到满意，总的政治"气氛"是贸易自由化、缓和、非殖民化和开发主义占压倒优势。从这个角度展望，很容易感到战前世界的问题已经被丢入历史的故纸堆，作为更早时代经济和政治无知的可悲的纪念碑了。

然而，回顾过去，可能会看到在此期间盛行于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世界中的和谐和稳定是表面的和靠不住的。实际情况是，在国民经济中起作用的根本的长期趋势是迥然不同的，因此，至60年代末，重要的调整已势在必行。此时世界又进入了一个阶段，包括工业国在内的所有国家的社会与政治布局受到了强大的、无尽头的和相对来说是不可预测的压力。这种压力是由这些国家与国际经济相联系的环节传递的。今天这些压力继续在增强，在地平线上一点也望不到能重新捕捉到前一时期那种和谐状况的"新秩序"。

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集团中起作用的两种趋势，最根本地破坏了表面上的和谐，这必须是分析更广泛的国际发展的出发点。第一种趋势是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中各国工业生产率增长的速度

---

① 在希腊神话中，卡桑德拉是特洛伊的公主。她具有预言凶讯的能力，所以总是不能被人接受。——译注

长期出现重大的差别。第二种趋势是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作为一个整体，常出现经济结构问题，这些问题在长期以来利润比率全面下降中表现出来。

第一种趋势主要反映了美国和英国的经济由于生产率增长缓慢，长期以来竞争力每况愈下。这一趋势早在战后时期就开始了，但因一些原因，长期来未引起关心。

第一，它最初代表了趋同的过程，缩小了国与国之间在社会生产条件上的差别，因为它导致逐步缩小美国（和加拿大）与其他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间的差距，特别是关于劳动力价格（"社会工资"）和将技术进步应用到生产方面的能力（革新能力）的差距。这进一步保证了通过国际竞争环节传递的调整压力不会起破坏作用，这一压力鼓励了贸易自由化，使各国间的需求类型更相似，增加贸易，并促进了工业内部的专业化。

第二，就目前所了解的趋同过程来看，它当然被认为是暂时的，仅仅反映了欧洲的重建过程以及日本"赶上"和重建的过程。这表明一旦差距缩小了，经济作用的差异也可望减弱。

第三，这一趋势的后果因美元作为储备货币的地位而变得不明确。其结果是美国可依靠向其他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成员国的资本输出，持续不断地把贸易盈余和国际收支的赤字结合起来。前者反映了美国经济在商品生产和知识方面的基本实力，后者反映了美国多国公司向欧洲生产的扩张，在偶然的情况下提供了国际经济增长必需的清偿能力。在此情况下，美国贸易盈余稍许减少，在短期和中期内并不要求作出紧急的调整。

第四，美国的巨额资本流向其他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的经济中，使美国经济得以分享其他国家有关的经济成就，美国资本在这些经济中的存在是意味深长的，这必然减轻了对于可能来自这些经济的最终竞争性挑战的担心。

第五，对自由贸易思想体系具有信心，减轻了这种忧虑。那些相信不可能发生总的需求不足以及市场总是趋于达到充分就业的平衡状态的人，没有一个会关心竞争者的增加。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内，工业内部的专业化的高速发展，伴随着持续出现充分就业这一事实确认了如下观点：主要工业部门内发生潜在破坏性转移是完全不可能的。只要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保持高度的就业状况，乐观主义者定将继续为历史证明是正确的。

最后，美国需要在大西洋和太平洋两方面有强大的盟国来保卫它奉行的制度，赖之维持其力量和繁荣。这一事实使美国对欧洲和日本的繁荣一直怀着利己的目的。在苏联集团的实力正在形成，发展中国家出现一些问题，和一些主要的欧洲国家政治局势不明朗的背景下，对这些情况的关注是向那些被认为是最敏感地区提供马歇尔援助计划和其他形式支持的极重要的原因。与此形成对照的是，美国在战时债务和战后援助方面对英国采取了强硬立场；英国被认为是一个政治上安全的潜在的竞争对手。这表明了政治经济上的实用主义考虑占了支配地位，而不是对某种单方面促进经济发展、最后普遍受惠的信条无限崇拜。

到了60年代后半期，在经济作用方面持续出现悬殊的情况，开始对趋同理论投下了疑点。那时虽然差距戏剧性地缩小了，各国的生产率的趋势仍然如同以往那样差距很大。其后果开始威胁到战后景气的经济、政治和制度基础。美国的贸易盈余缩减了(1971年记录下本世纪美国第一次出现贸易赤字)，由于入侵越南引起了资金不断外流，美国的收支情况急剧恶化了。

现在外国可以向美国提出兑换的美元在增加，至1971年11月达到了630亿美元，对美元作为储备货币的信心崩溃了，债权国更喜欢黄金了，至1971年黄金储备从1949年的246亿美元降低到101亿美元。此外，这还不仅仅是对汇率作技术性调整的信号，这

种现象反映了美国经济力量与它在全球所起的政治作用脱节。越战成了压断骆驼背脊的稻草，这个事实也可加强说明本文的论点。

至此，美元贬值已不可避免了，但因美元是支持在布雷顿森林建立起来的国际贸易制度的“稳定价值”，贬值带来了影响深远的后果。由于30年代的情况留在布雷顿森林谈判者的心中，他们害怕在高失业率时期会发生抑制贸易，以及出现浮动汇率潜在地破坏稳定的影响，而那时举行的谈判选择了美元同黄金挂钩和比较固定的汇率。目前，正当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内的失业水平将再次上升时，经济压力把这些防范都扫开了。1971年8月14日，尼克松总统在他有分寸地称之为“世界历史上一次最重要的决定”中，宣布结束美元和黄金挂钩，实际上终止了布雷顿森林制度。

美元贬值了，但由于受到越战的重压，以及为美国生产率增长较慢所苦，美国的国际收支状况继续在恶化。至1973年美国国际收支的赤字更大了，政府准备同欧洲国家进行更强硬的贸易谈判。如同1973年7月贸易部长的助理报告的那样，他们正在“为国际贸易谈判精心制订一个可能有争议的战略……(它的)目标是加强美国在贸易谈判中的实力……，缓解美国的国际收支赤字。连锁战略承认美国在贸易中讨价还价的地位软弱，寻求通过和其他问题连在一起谈判来加以抵消，在那些问题上美国的谈判力量较强……”。力量更强的领域是“防务、货币和能源问题”。在能源方面的战略特别率直明确，清楚地表明了与美国相比，油价大幅度上升更严重地影响它的主要工业竞争国，继而又提出，随之在中东积聚起来的资金对美国来说问题较小，因为“它拥有世界上最大的资本市场……将成为吸收阿拉伯投资的磁石”。战略最后指出，“除了几个公司以外，所有主要的石油合股公司都是美国所有的，如果能源问题到了极其危急的关头，其他国家当然有理由认为这些公司将照顾美国市场”。虽然发言人自觉地排除了这一战略等于是讹诈的

指责，它当然是试图凭借在最广泛的政治和经济意义上动用美国力量的威胁手段获得经济上的让步。显然，经济压力不是自动地导致作出社会和政治变化的，这种改变是避免这些压力造成危害所需的，倒不如说它显示了竞争的压力经由政治上的渠道在起作用，竞争的压力需要作出改变。简言之，看来象是经济问题的东西变成了一个政治经济问题。

贸易谈判失败了，此后两年出现了1945年以来最大的汇率变动、粮食危机①和石油危机。结果在70年代中期美国的收支状况缓和了，但是作为基础的生产率发展趋势却依然如故，至70年代末国际收支差额比1973年的水平更低了，这次是在没有越战包袱的情况下发生的。作为对事态作出的反应，在70年代后期可以看到：重要的军用物质出口浪潮，随着缓和的结束更大地使用防务作为讨价还价的杠杆；第二轮石油价格上涨，它对美国的竞争国的影响仍比美国受到的影响大得多，但从目前来看，由于美国消耗的全部石油中进口的比例增加了，差别也小了。

到了1979年10月，美国的国际收支状况被认为困难到了极点，以致急转直下，采取了传统上赤字国的挽救办法。尽管总统竞选运动就在眼前，依然采用了紧缩通货的政策（沃尔克货币制度），美国似乎变成了另一种经济；由于美元出口的"有害特权"，不再能无视它的对外收支出现赤字的情况了。1980年第一季度国内生产总值比上一年同期几乎下降了10%时，又出现了政策的逆转，阻止了产量下降，但任凭国际收支达到自行决定的水准，即380亿美元的赤字。这样做的教训是，国际竞争的压力要求作出的改变在

① "粮食"不是由于欧洲国家的共同农业政策而用来对付它们的威胁。但《纽约时报》在1975年广泛报道了中央情报局一份关于把粮食作为武器的研究报告，引述了农业部长厄尔·巴茨的话，说"粮食是美国外交武库中更有力的武器"。

美国政治上是不能接受的，因此通过美元出口又一次把问题掩盖起来。由于利用高利率来吸引更大部分正在不安稳的世界里寻求安全投资出路的大规模的国际流动资金，在短期内这个问题已进一步变得不明确，但这可能大大增加了外债并使燃料价格上涨，加强了美元而抑制了长期性投资。这样就减少了扭转生产率的长期趋势的机会。如果生产率的长期趋势未能扭转的话，不管怎么说，不是必须从政治和经济方面接受经济衰退，就是要对竞赛的规则作出十分重大的改变，这样做可能带来危险的和无法预测的经济和政治后果。

可以肯定，至70年代末，主要的挑战国——日本、西德和法国更强劲的经济势头已不是简单的重建的结果，也不是迅速取得现存的技术的后果，这一点越来越明确。虽然在经过了25年后，就资本的平均年龄来说，重建的潜在效果本应缩减到可以忽视的地步了，在这些国家的经济中，资本的平均年龄仍显著地低于美国（或联合王国）。此外，虽然这些挑战国的许多工业部门的技术已加入了最先进的行列，还没有证据表明生产率的长期趋势已经扭转了。

这个问题必须从60年代末起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内出现的第二个长期趋势的背景下来考虑。这涉及到利润比率的下降、工业生产力过剩的增加（与要求提高效率，使价格产生最低限度能接受的利润有关）、通货膨胀的加重，以及失业率的上升。这些变化在理论上和实际上都破坏了自由贸易赖以存在的基础。如果充分就业前景暗淡，那末在贸易方面将不可避免地变得更加离心，因为现在贸易将涉及分摊失业人数，而不仅仅是向任何一国的经济分配由其生产的商品混合体。

对这一趋势更深的原因进行探究超出了本文范围，引起这股向下趋势的一个主要原因是，受到长期持续的经济扩张的鼓励，出

现了(就实际上能被理解的意义来说)投资过多，特别是信贷结构使早期警报信号实际上变得模糊不清，以及贸易盈余——如从1967年起日本和西德的情况那样——使单一的国家经济保存较为有利的投资气候。这正确地说明了，当民族国家寻求保证"它们的资本"处于有利地位时，这些情况总是可能导致出现再三坚持的资本的"民族性"。

诚然，60年代后期，由于日本作为一个羽毛丰满的竞争者进入许多主要的工业制成品的国际销售市场，正在出现的工业生产过剩问题无疑恶化了。日本的工业制品向全球出口的情况从1965年的4.8%增至1970年的7.8%。冲击是特别巨大的，部分是因为这是长远的战略决定的结果，这涉及到大规模提高技术能力，面对当前的竞争国，必须经由降低单位成本来保持其生存能力；部分是因为日本进口的工业制成品仍保持在相当低的水平。

至1967年，由于利润比率下降，日本扩张的意图已变得明确，日本和西德两国都奉行进取性的国际收支政策，竞争的压力加强了。作为对此的反应，其他主要的西方工业国在经济结构上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其形式是出现了一个显著的合并浪潮。单在1967年至1968年间，英国在1967年初登记的资本为1000万镑或更高的公司就有"1/4以上被接管"。在整个60年代中期，同样的变化发生在美国、法国、意大利、瑞典和其他较小的欧洲国家的经济中，虽然较少带有戏剧性。

同时，最有力的经济大国德国和日本较少关心纯粹扩大规模，更多地关心创立一种关系。在这种关系下，依靠更长期的决策，可以使国民经济中各工业部门之间更为协调一致。在日本，国家和公司间的共生性既表现在财政方面，又表现在工业方面，最有效地取得了这一成果。在德国，"大部分经济命脉掌握在三大银行手中"以及"国家具有强烈的传统，各公司总是通过合作协议和谅解一起携

手工作的"。这一事实有助于达到同样的效果。法国对商业银行广泛实行具有指示性计划功能的国有化，寻求向同一方向发展，但是带有许多困难。

由于竞争的压力加强了，这种宏观经济的合理性变得比以往任何时候更重要了。经济成就越来越依靠保持有利的投资气候，以便持续不断地迅速革新，配合销售、汇率、补助金、外援、教育与技术方面的国家政策，协调一致，取得成效。缺乏这种环境，仅仅建立大公司不能解决问题。

出现生产能力过剩在一些工业部门和公司里急剧削减了生产率，但也导致了扩大性投资的衰落和合理性投资的增加。后果是使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中原先的产量与就业之间的稳定关系动摇了（韦尔杜恩法则）。当失业增加时，逐渐上升的国际竞争压力要求作出的调整变得越来越难以付诸实现，经济或政治对抗的危险增加了。

当前，这一危险还在增加，因为国际竞争压力以不可抗拒之势，影响到羁绊于这一体系中的一些国家内停滞不前和复杂的社会现实，造成阶级斗争的升级，同时使它们趋于在截然相反的两种方式上作出抉择：选择"市场激进主义"方式，还是选择国家方式，或称"社会激进主义"的方式。

"市场激进派"把重新建立竞争的平衡所必需的社会生产条件的变化（如同他们认为的那样）作为依变量，必须不惜一切代价按照"经济生活中的现实"加以调整。处于目前的经济环境下（一方得益引起另一方相应损失的"零点社会）"，不幸这条途径进一步加强了竞争性斗争，竞争对手相互把对方推到越来越极端的地位上去。

这样的战略的后果是以如下设想为依据的：通过如此调整的过程，竞争国家在可预见的将来能重新达到充分就业的"平衡状态"如全面经济扩张。只要实现那种设想的前景是遥远的，这种战略的

危险在于不可预见的、爆炸性的社会形势和政治形势。如果不顾短期和中期成本，一味固执地追求这些目标，这种形势就将出现。

"社会激进派"提出解决这些矛盾的方法有所不同。他们设想，在竞争的范畴内为调和当前的经济悬殊所需作出的社会调整的幅度既实现不了，又是不可取的。特别是在规定了试图做到这点所需的程度时，就更是如此。因而他们争辩说，必须通过国家干预贸易和生产来减少竞争原则的影响。他们要尽可能多地利用所需的保护贸易的办法，使国内的财力和投资有效地流动起来，以寻求提高经济增长，并增加贸易。这一选择的可行性最终要看在这种情况下动员国内财力的实际(技术、政治、行政)能力。

当然，现在这两种选择都可能造成国际经济冲突的加深，因而是危险的。那种危险性植根于当前的危机中，同时贸易比例的升高又加深了这一危险。这里可以注意到，至70年代末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内部相互依赖的程度(以全部工业制品消费中进口货物所占的份额来衡量)正回到1913年第一次自由贸易的黄金时期结束时相当普遍的状态，这是颇有趣味的，也隐约使人感到不安。由于对贸易的依赖达到如此高的程度，从而增强了国际竞争条件下变化的冲击力，影响了经济以有条理和有效的方式作出反应的能力。贸易比例增加与国际经济下降趋势相结合，大大地增加了动荡与冲突的危险。正是这些情况，带有威胁性地把竞争原则从刺激经济增长和促进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内部趋同的因素变成了引起冲突和国际危机的因素。

在此关系中，必须考虑到开首提到的第三种长期趋势，就是持续的经济增长对某些战略原料造成的压力。接着将从这个话题转入有关发展中世界的部分。

虽然一些杰出的理论家很久以来就辩解说，在作经济分析时应把不可更新的资源放在中心地位，这个问题通常仍然被关于生

产要素和生产可取代性的强硬设想及对技术进步的信念遮掩得黯然失色，从而被忽视了。只是在最近联系到石油危机时才受到更多的注意。相比之下，在国家范围内工作的政治家和政策制定者，总是更深入地认识这一问题的潜在重要性。欧洲和日本固然长期以来把这个问题作为当务之急，非常关切，有充分的理由相信，甚至资源高度自给自足的美国也对这个问题很注意，特别是在最近，美国资源自给的程度大大下降的时候。早在20世纪50年代，一个半官方的报告①不祥地指出它关于"本世纪的大部分时间内没有全面的资源短缺问题的结论特别适用于美国……（并且）不能自动扩大到其他国家去"；又指出，尤其对不发达国家来说，"不可能同样有把握地保证"取得原料来支持"持续提高的生活水平"。考虑到这些原料的重要部分都分布在发展中国家里，这是极大的讽刺。

从批判的意义上来说，这个报告证明是有先见之明的。当能源供应短缺时，发展中世界的大部分国家发现，自己在随后的争夺中处于极端软弱的地位，许多国家的生活水准下降了。但报告在其他方面错了。它大大低估了日本对原料需求增加的情况；它错误地排除了一些发展中国家加快工业化的可能性；在设想美国继续保持霸权上，报告也估计错了，结果摊牌比预期的来得更早，它的到来使美国经济发生了严重问题。即使是这样，在这场冲突中，明摆着的事实是，美国的政治力量最有效地帮助它补偿了经济上的弱点。确如报告设想的那样，这一有利条件仍能证明是起决定性作用的。当能源危机来临时，它与上面讨论过的两种长期趋势紧紧连在一起。它在短期内把竞争优势变得对美国的主要竞

① 由一个叫做"未来资源"的组织发表的《美国未来的资源》的报告，这个组织由福特基金会提供经费，成立的目的在于深入研究和扩大"美国总统物资政策委员会"的工作。该委员会在1952年提出了报告（"帕利报告"）。总统委员会主任W·S·帕利协助管理这一组织。

争国大为不利，毫无疑问，这一竞争优势在决定危机发生的时间和形式上曾起过作用。危机放慢了经济增长的速度，扩大了实际的经济容量与投资者盼望达到的能量间的差距，也有助于解决全球性的工业生产过剩问题。

同时，在短期内危机可能帮助缓和西方经济的中心结构问题，这是通过把收入转变成对生产国货物的需求来实现的——或是由石油输出国组织本身来购买，或是由使用为发展工业提供的国际回笼基金的债务国来购买。不过，由于这些债务国必须向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出口它们随后生产的大部分产品，以满足偿付债务的硬通货的财政需要，其更长期的效果也十分相同，似乎这些生产能力是建立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各国的经济之中，而这些国家的生产过剩限制了投资机会。考虑到正在发生或任何时刻立即会降临的某种重要输入物的供应阻塞，在某种意义上，这一过程仅仅是在现存的经济和社会条件下创造超出潜在的实际需求或者超出可能的生产水平的全球工业能力的进一步发展阶段。

南方的进步：迅速变化中的世界差异

过去35年里，南方的政治和经济力量增加了，但这一势力仍较小。它在全球生产中占的百分比增加了一些，但它所占的人口的比例增加更大，如果把石油排除在外，它在全球生产中的份额和消费没有上升。而且，南方总的影响甚至比这一点所意味的还要小，因为它的力量分散在这么多性质不同的国家中。同时，这种不一致性使一小部分发展中国家成为全球舞台上更突出的个别演员。

虽然在1945年以来的35年里，在发展中国家出现的趋势，受到了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发展的强烈影响，毋庸置疑，这些趋势也分别推动了全球发展和变化的进程。

集中注视发展中国家同国际市场的联系的特别恰当的，不仅因为考虑到这是在全球市场上国家相互依赖的一个有效的出发点，而且因为，今天的工业化国家与发展中国家间在收入和技术方面巨大的绝对差异是不发达的鲜明特征，因为这种悬殊情况不断引起极大的紧张，一方面是不发达国家发现国际上生产的不计其数的货物比它们国内生产的货物更有用，它们更需要这类货物（且不说支付能力）；另一方面是它们国内生产的货物只有少数能在国际市场上出售，范围有限。这种紧张关系确实是现代不发达状态占支配地位的特征，因而应该把一个国家寻求解决这一问题的方式看成该国发展的主要特点。

这种情况使任何发展中国家都把注意力集中在经济的出口能力和出口生产所能利用的现有劳动力的程度这两者的关系上。然而，从竞争的角度来看，可以最恰当地把不发达解释为：即使是维持物质生活的最低工资，也未能产生任何接近充分就业的状态。因此，对市场依赖总是产生（虽然程度不同的）共同的结果，这种结果用不同的方式表现出二重性，即保持前资本主义和非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置身于进步潮流外的边缘地带或人口过剩。这意味着需要设立生产的保护区，它能将现有劳动力用于生产，即使那种生产不符当前国际竞争的要求也罢。

这类政策常常产生了现在已为人熟知的进口取代危机；但也能打下技术、组织和社会基础，不是为实行比较更依靠本国的社会主义战略作准备，就是为最终转为面向出口的战略提供了条件，在这一战略中，出口的多样化和不受保护的进口取代方式将允许达到充分就业。这时就能创造一种良好的状况，分析一下，这样的国家不再被归入不发达国家了，但应直截了当地把它划为资本主义经济，尽管那决不意味着它永远具有持续充分就业的能力。

总的来说，随着石油输出国组织和新兴工业国开始占有越来

越显著的地位，战后时期，在发展中国家之间可以看出很大的区别。石油输出国组织的兴起固然跟石油租赁费大幅度上升是紧紧连在一起的，因而跟前面部分已讨论到的趋势有联系。而新兴工业国是值得注意的，因为这些国家广泛地被作为一般可行的模式，这种模式取得成功主要是依靠它们的国民经济政策，并对自由市场方针和消除国内消费生产和出口生产的差别待遇格外重视。

但是，对新兴工业国的现象作全面估计，必须联系到战后有关发展辩论和发展政策的演变来考虑；必须讨论应该怎样去理解新兴工业国作为前面概括的国际发展中的一个方面；必须探究新兴工业国的经济增长与全球趋势演变之间可能出现的未来关系。

战后时期刚开始时，分析家和决策者一致强烈地认为，发展中国家内的高失业率必须用积极的政策干预来消除。这反映了发展中国家内问题的严重性，但也并非与这一事实无关，即使涉及到发达国家，这种观点也是很流行的。

结果取得独立的(相对于仍处于殖民主义之下的国家)整个发展中世界差点全部实行保护主义的进口取代政策。战时生产与市场的瓦解使许多工业得以在"特殊保护"下建立起来，在一些国家，战后这些工业遭到的困难进一步推动了保护主义的进口取代政策。

在60年代的过程中，种种情况加起来证明了问题的急迫性和这一特定的"解决办法"的局限性，并引起了重视。问题的急迫性表现为吸收劳动力的数量不足，在社会上和经济上不能保持城市化的速度，随后产生"置身于进步潮流外的边缘地带的排斥性"的问题，以及伴随着这些发展日益增加的政治两极化，这是一方面。此外，与30年代前巨大的贸易扩张形成对照，现在初级商品贸易的增长落后于整个贸易的增长。这增加了改变结构以增加国内生产总值对出口的比率的需要，或增加了地区性关税同盟的需要，只

有这样，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才能超过初级商品出口的增长。这在原则上加强了进口取代的要求，只要发展中国家实际上局限于出口初级商品，至少会出现这种情况。

同时也证实了进口取代的情况综合起来显示出的那种“解决方法”的局限性。进口取代确实使国家生产总值对出口的比率发生了转移，于此同时也造成大部分工业项目中出现了高水平的进口量和高额的成本-劳动力比例，这意味着在外汇紧张的情况下，经济立刻上升了，在形式上保持着一种更大的约束力。其原因是鉴于进口对国内生产的重要性，现在进口短缺造成的影响比之以往要大几倍。更糟的是，在许多情况下，这些政策还可能减少出口的增长，就全面经济增长来说，抵消了从国内生产总值对出口的比率增加中得到的利益。

此外，这些新工业中有许多是效率不高的，这表现在经营中没有产生作为新工业存在的根本理由的强有力的外形，但是关于这一点的辩论由于以下情况完全混淆了：这样断言效率不高，常常是根据与当前的国际机会成本相联系的尺度基准来决定的。这种尺度设想把计划、生产要素可分性和可取代性、一个国际市场结构置于同等地位，使在竞争的条件下实现充分就业成为可能，①与其说它贬低进口取代的价值，倒不如说否定进口取代作为一种值得推行的政策的可能性。抛开这些设想不谈，它们关于

---

① 在本文的讨论中，这点是毫无保留的。因为这一论点提出，如果在出口生产中资金得到有效的利用——即更有效地转变为相等的硬通货——那末应把更多的资金用在这类出口生产上，直至这些“起码的效率”在充分就业方面得到补偿。否则的话，永远只是增加国内生产，即使不符当前国际效率标准也罢。当然有人可能会对这个结论发出非难，争论说，在短期内这样取得的增产可能发生抑制未来的效率、产量和就业水平的作用，这就把进口取代的论点颠倒过来了，声称（在面临失业的情况下）应该接受严格遵循市场信息的短期成本，因为那将产生长期的净利润。

从国际竞争标准来说进口取代工业"效率不高"的"发现"，在定义上显然是准确的。引起更大混乱的是，有证据表明，这类进口取代式生产实际上经常消耗掉更多的外汇，这些外汇本来是要用于进口制成品的。由于这些政策的长远利益的实现，通常需要的时日更长，甚至那些以更恰当、更有生气的语句全面地评价经验的人，迟早总会得出悲观的结论。

但是，如果说简单的进口取代政策走入了死胡同，它仍留下三条可以继续前进的途径，不过这三条路不是互相排斥的。第一条途径涉及寻求或需要对流入发展中国家的资金作重大增加，这既可通过援助，也可经由对初级商品出口贸易的实际条件作些改善。④第二条途径是根据这一概念：进口取代纲领的"激进化"或"民族化"，有能力从本质上改变经济的结构，和随时释放出现时未充分利用的劳动力中的生产潜力。如果撇开前面讨论的基本前提：即发展中国家实际上局限于出口初级商品，以及在这些国家的条件下，达到充分就业与面向出口的政策是不相容的，那末第三条途径就出现了。到了60年代中期，撇开这一前提迅速得到了支

---

① 有关"贸易条件"的争论历来甚嚣尘上，集中在关于名义贸易、易货贸易、代理商贸易或双重代理商贸易的条件变化的争执上，根据对时期，即延续期的开始点和结束点以及包括整组商品在内的选择，产生各种各样的结果。这类争论经常因为只是单方面的考虑问题而歪曲了这个论点。基本论点在于担心初级商品出口不能产生发展中世界高速经济增长所需的外汇数量。在面临许多限制生产的安排，和大力强调进口取代的情况下，初级商品的价格以某种方式运转起来了，因此这一发现远非决定性的。虽然战后的趋势对从发展中国家出口的大部分初级产品并不令人鼓舞，真正的问题是，如果发展中世界在其他产品之外普遍通过出口初级产品去寻求活路，可能会产生什么情况或者现在真的要发生什么事情？以这种方式来考虑，很难不同意那些认为将导致生产过剩，贸易条件对大部分初级产品生产国越来越坏的人的意见。如果一些个别出口商比较更为迅速地扩大生产，获取更大部分的市场的话，这也当然不否认他们总是处于有力的地位，比需求的全球价格的弹性更快地改善他们的收入。这一现象同样也表明了这种收益是在进一步损害落后的出口商的基础上取得的。

持，部分是因为从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经验来看，对于从自由贸易获得利益的信念变得更强了；部分是因为工业国家中充分就业看来能永久地持续下去；部分是因为只有这第三条“途径”，才跟以往对于国际市场的断言是真正一致的，是把发展中国家统统包括到全球经济增长的过程中去的主要途径。当时这一进程是由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支配着。

第一条途径终于证明对石油输出国组织的国家是可行的。由于贸易条件出现戏剧性的变化，这些国家使它们的经济环境发生了转变，但遗憾的是，经济增长的利益并不总是在更广泛的社会意义上与发展紧密结合在一起的。

第二条可能的前进道路，即在更大程度上依靠自力更生或社会主义的道路，在60年代得到数量日增的国家的采纳。一方面，社会利益往往相当高，经济稳步增长但并不显著，同时在所有这些“解决方法”中，各自特有的矛盾却在发展形成。加上有关国家中没有一个实行经济自给，因而经济活动一直受到70年代中期国际经济危机的损害。在实施这种战略的政治和物质基础特别薄弱的地方，如坦桑尼亚和埃塞俄比亚，实际上已无法忍受这些紧张状况了，在其他地方如古巴，则急剧增加对与社会主义集团订立优惠的贸易协定的依赖性。

不管这些经验最终的教训可能是什么，事实是在60年代后半期，这一选择似乎越来越具有吸引力了。有时，在那些国家里它好象只是唯一可行的选择，情况确实如此。那些国家正确地看到缺乏援助的渠道，它们看不到贸易条件有重大改善，它们所处的地位使之只能把大规模出口多种形式的工业制成品的提议看成相当蹩脚的笑话。然而香港和波多黎各不在此例。

总的来说，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警觉地看待这股走向“自力更生”的趋势，因为发展中国家追求赚取外汇的强烈程度的减

退，可能危及基本原料的供应，使实现过去投资的预期利润和未来销售或投资获利的前景黯淡。对此的反应包括封锁古巴和给予旨在倒转伊朗、印度尼西亚、危地马拉、巴西和智利以及其他地方的趋势的军事政变积极的支持。为了达到同样的目的而作出了更微妙的努力，这反映在美国的反颠覆活动①上，以及承担起有关的责任，以提供援助来作为选择的方式，这些援助集中体现在不幸的争取进步联盟上。

然而简单的事实是，只要工业制品出口这一可供选择的方式未成为更现实的选择，不管花多大力气进行压制②都不能阻止正在出现的社会和政治压力。至少在一些具有特殊的地理政治意义的"关键"性国家，情况是如此。看来这点已越来越明确了。

这种"政治"考虑本身并不足以使这第三种选择方式可能存在，这一选择是由全面缺少援助流入来说明的，援助不足是上述考虑的直接产物。但这些政治考虑的确创造了一种背景，有利于出现对经济合作与发展集团内部正在发展的矛盾作出特定的反应。由于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各生产国之间的竞争压力加强了，经济落后的国家利用发展中世界的廉价劳动力来改善它们的地位(从而保持利润和遏制通货膨胀)的诱惑力越来越变得不可抗拒了。英国和美国以微小的规模在香港和波多黎各开始的事业，现在戏剧性地扩展到南朝鲜、巴西、台湾、新加坡、墨西哥和欧洲边缘地区。加上在形形色色的国家里建立的完全象外国领土一样的出口加工

① 那种战略的要点是及早进行干预，防止发生爆炸性的局势，旨在"预先排除"进行军事干预的需要。这种早期干预计划依靠社会与财政援助相结合，并加强安全机构的能力。

② 在未撤销对致力于扭转过度"民族主义"、"自力更生"或"社会主义"政策的政权的支持时，显然一种高压手段是被接受的。越南、印度尼西亚、智利、萨尔瓦多、危地马拉，海地和其他国家的经验雄辩地证明了这一事实。

区，数量在不断增加。

在这一范畴内的一系列相对来说由不同成分的国家组成的经济，（除墨西哥和南斯拉夫外）全部在极右专制政权治理下，差不多同时作为新兴工业国崭露头角，最终被作为一些模式，受到推崇。这些模式证明，市场确实足以作为高速发展的最理想的机器。它们的经验成为把平衡经济学积极应用到发展中去的基础，根据实际上无限地采用国际价格作为相应的机会成本，无保留地采取成本-利润的方法，实际上无视早先的许多意见：把这种分析的框架同发展联系在一起是不恰当的。这发生在那种分析框架的不足在发达国家中变得最明显不过的时候，是有些挖苦意味的。

70年代期间这一新信念大大地增强了，那时一些较小的新兴工业国——南朝鲜、台湾、新加坡、香港——实际上已达到了充分就业，结果实际工资显著地提高了，尽管政治和工会的压制继续存在。这个明证决定性地加强了这一论点，即以市场为依据、开始时接受不平衡状态的政策，从经济上和社会上来说是值得在发展中国家的经济中推行的。经验再次表明，在一个恰当的时期内，如果资本主义积累过程能充分地集中在一个特定的经济领域，就有能力造成充分就业，从而将物质利益扩散到这一领域去。在这个意义上存在着涓滴细流的概念，如同曾在日本以及在此以前的其他工业化国家中存在过的那样。但它仍有待于决定，在什么条件下，包括国内和国际两方面的条件，才能在一段时间内使集中积累得以持续进行。在这方面，工业国家中充分就业的结束，等于是对单纯地把过分的乐观主义一般化的强烈警告。

因此，允许这种情况在新兴工业国发生的国际背景，是由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内不断产生的矛盾，以及60年代中期发展中世界出现的政治危机统治着。作为对这些矛盾作出的反应，60年代后半期国际经济模式发生了重大转移。这次转移以美英为前导，由

多国公司和某些发展中国家来完成。由于美国的财政赤字，使美元充斥欧洲美元市场，它的爆炸性扩张为这一转移提供了资金。美国首先创造了出现新兴工业国的三个最重要的条件，即为新兴工业国的出口商品提供了市场；鼓励投资和技术流向发展中世界；以及对有能力实行新政策，防止在短期内可能引起国内反对的政权提供政治和军事支持。

事实引人注目地说明了美国（在较小程度上还有英国）在早期作为发展中国家出口工业制品的市场的重要性，至1965年，粗略估计所有这类出口商品中的60%输往这两个市场。而且这些输入，不是由于总的贸易自由化给予所有发展中国家的出口更自由的途径的结果，而是在给予特定的供应国的一批扩大了的特别进口定额的背景下出现的（如同1973年的菲布尔多边协定），或是在以美国的尺度照附加关税条款第806条和第807条第3点来定价，只按净值和在美国投入原料的差价征收进口税的背景下出现的。换句话说，发达国家的市场以一种有控制的有限方式，经常向特定的国家和特有的产品开放。

同时，这种市场分配的效果、政府支持的出口信贷计划的加强以及扩大了的投资保证鼓励了投资的流入。在这方面，最初美国银行主要负责动员欧洲美元的集资，投放到发展中世界去。这样流入的资金数额足够大，足以集中在几个国家的经济上（10个国家约略占了发展中国家全部外债的60%），使它们得以克服进口取代的危机，① 使工业结构迅速扩大，实行现代化和面向出口。

对所提到的政权的军事支持继续是维持投资者信心的重要因

---

① 从更长期间来看，新兴工业国从国外来源产生的固定总资本的形成比例较小，在该战略的某些早期阶段，偶尔比例也会非常高——如在南朝鲜，1964年全部国内储金中80%以上是从国外来源取得的。

素，从这些国家的经济进入了国际金融界来看，当前这一因素也许比以往任何时候更有力。

这些国际环境对于了解新兴工业国的现象是必不可少的，那并不是喻示，这一现象是由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一手安排的，各发展中国家只是被动地受到环境影响。情况并非如此，在本文中有关的对一些个别国家所作的研究足以清楚地说明这点，这里应该特别着重指出。实际上，如果排除如爱尔兰、新加坡和香港那样一些微小的“地点”，它们理所当然能有机会大大地依靠流入的国际资本保持充分就业，在大部分取得成功的新兴工业国内，国家干预产生和分配可投资的资金的程度是惊人的。特别是在南朝鲜，那里强调长期战略投资的准则，同日本工业化的战略具有相似之处。这一点的重要性为巴西“奇迹”的早期设计师之一着重指出过，他提出，巴西当前的问题可能由于使用外国资本过度，特别是在它采取进口取代的早期，已变得更难对付了。这跟南朝鲜的经验形成鲜明的对照，那里早期的进口取代方式是依靠国内的，同日本一样，国家随后（至少在1981年以前）对外国在经济中的直接投资实行严格的控制，以便对金融、“战略”工业或“基础工业”保持有效的国内控制。

南朝鲜在这一方面的经验的确太重要了，它可与日本、西德和法国的经验并驾齐驱，加强了令人困扰的可能性：在20世纪下半叶的技术和经济条件下，尤其是联系到全面性的衰退，竞争过程正开始展示，社会生产组织最“有效”的方式可能是以一种比之早期的情况较为更相同、更集中的方式组织起来的资本主义。此外，由于科研和生产项目的规模扩大了，事前的准备酝酿期延长了，系统阐述和协调一致地实行长期的战略政策将变得更重要，这相当有可能侵蚀资本主义和自由民主之间那种松散的历史联系。尽管这种联系存在种种不足之处，在过去曾经是资本主义的力量源泉。共

同体国家的模式实际上把更大部分的社会生活带入其实质是一个经济企业的范围内，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基本上总是极权和教阶制度关系在这一领域内占统治地位。多国公司的联合大企业在使市场适宜、增加"非公平交易"的份额、扩展它们对劳工的直接控制时，显示了相同的倾向，但是现在看来共同体国家完全可能作为更具竞争形式的资本主义，因为这种国家形式控制组织生产的社会基础的职权范围更全面、更直接。

同时，在考虑新兴工业国的未来前景时，主要有三件事要记在心上。第一，除非主要的经济大国能解决生产过剩、获利可能性低和失业问题，新兴工业国的前景必定是无望的。因为它们的生产增加了全球的问题，而扩大国内消费的能力受到需要在日益困难的情况下平衡对外收支的限制。

第二，新兴工业国出口工业制成品的重要能力的发展，以相差极大的生产条件（指社会工资和劳动强度而言）投入直接竞争的经济中去。① 在新的形势下，这本身就一定会使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之间60年代的田园诗式的贸易扩展，不再是预示贸易自由化结果的良好的指南了。的确，甚至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内部，有关日本竞争以及大量地要求日本"自动限制出口"的"特殊"问题也证明了这一论点的重要性。就新兴工业国来说，在失业率高的背景下，自由贸易的竞争过程必然会传递如此具有"破坏性"的信息，以致不是这些信息将被排除，从而退到保护主义，就是只有在加强政治压力的情况下强制执行。

---

① 注意劳动的社会条件差别很大的各国经济间的竞争并不产生那种不平等交换贸易，因为这是竞争商品的贸易。这样，它不是造成一种涉及价值或收入完全转移的稳定状态，而是造成一种不是要进行调整就是带有不稳固保护性的不稳定状态。新李嘉图主义理论与对这样的局势作出分析是完全有关的，它强调分配关系是比较优势的决定因素，关心经济上的不稳定状态。

第三，如果设想竞争过程能在国际上扩大到它的逻辑极限，因此民族国家被取代，实际上成为一个提供资本的社会政治基础，那末在未能达到全球充分就业时，劳动的条件就要降低，使之达到平均。因为就劳动力投入一个为供应过多所苦的巨大市场来说，不管劳动力的平均生产率的高低，竞争原则将使工资受到越来越下降的压力。这是新古典派、古典派，特别是马克思主义观点得出的共同结论。

事实上，纯粹的劳动力市场当然是永远不可能存在的，因为把劳工当作商品在社会上和政治上是不可想象的，因此，实际上各部分劳工总是可以使"他们的"劳动力市场与一般的劳动力市场分离，[1]这样他们就能为自己取得较好的条件，会并入享有特惠的国内的外国投资区，这些外国投资区是企业跨国公司化理论的极其重要的特色。不过，如果上述论点成立的话，那末那个进程就不会从大部分人口都生活在这种"享有特惠"的投资区内的各经济中心向外扩展，不会扩展到发展中世界去了。而那里，比例日增的人口却正是这样被并入了外国投资区。代之以另一种情况，这样并入工业国家的人口比例将下降到某种程度，在国际上无甚变化，甚至在那里，资本主义将不再可望产生实质上的社会和政治一致，以及与之相连的那种形式的自由民主。处于享有特惠的外国投资区以外的边缘地区，未加入进步潮流的广大民众必将到处受到严酷的对待，巴西的"野蛮资本主义"将成为工业国家未来的幻像，跟代表发展中国家典范的工业国家相去甚远。

这种进程暂时还是不可能的，因为众多的证据显示，如同在过去的相似时期里，在国际一级出现的主要矛盾加强了资本的民族

---

[1] 这里注意到最近已提出，伊曼纽尔的干预说最经久的贡献可以说是，他坚持把劳动看成在竞争关系上是异质的，而不是同质的。这是颇有意思的。

性。"日本有限公司"看来确实被证明是最有竞争力的组织生产的方式，但是有不祥的信号提醒我们，必须反对影响日增的强大的政治——甚至军事——压力，来保卫这类经济成就。

除新兴工业国家外，当然还有"其他"发展中国家，那些没有石油、没有可以使它们参加排他的新兴工业国俱乐部的政治社会条件的国家。对这些国家的经济来说，70 年代是极端具有破坏性和痛苦的时期。由于国际收支平衡崩溃了，这些国家中的大部分只得削减国内经济活动和消费的水平，减少进口，让更多的资金流到出口生产方面去。同时发展中国家可得到的大部分国际资金现在直接从商业渠道流进来，这一事实意味着资金的调拨只是加强了市场指令。即使在某些情况下，资金紧缩后最低限额的援助转而流向最贫穷的国家，这也几乎不能抵消那种影响，尤其是因为对发达国家的压力加重的原因，非商业性流入正在进一步减少。

因而，这些最贫穷国家的经济前景极其暗淡。要具有在一个竞争性日益加强的国际市场上使出口产品多样化的能力，对许多国家纯粹是不切合实际的。同时，由于需求呆滞，以及全面加强的出口压力而引起的供应增加，这些国家的传统出口产品正在压缩，所以它们吸收国际商业资金的能力降低了。本质上这些国家正被迫退到更加"自力更生"的增长模式，但又处于这样一种情势下，在经济上和政治上戏剧性地出现了维持更加自力更生战略的困难的情况。

总的来说，在发展中世界，70 年代的危机为一些国家开辟了新的（虽然可能是暂时的）机会，它严厉地惩诫了其他国家。在后面那些国家的经济中呈现了社会和经济崩溃的威胁，工业化的西方，特别是美国，看来准备以武力来制止随后会发生的政治动乱，这并不是因为美国已忘记了越南，倒不如说它只有更小的选择余地，因为美国可能认为社会主义集团不象以前那么团结和强大

了，它觉得通过新兴工业国已加强了自己在大部分突出的发展中国家中的地位。

结论和关于社会主义集团的一些说明

本文表明了，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更需要获得信息，联系对国际上发展本质的判断，系统地制订国家政策。因为当前这些政策陷入了深刻的矛盾，变得越来越不明确。

至此，本文的论述涉及了资本主义世界的发展，那是理所当然的，因为大部分不发达国家实际上是那个世界的一部分。同时，社会主义集团内的发展显然是同这些趋势有联系的，所以，必须把社会主义的发展包括在讨论中，但在本文篇幅内只能指出一些主要的问题，需要在日后进一步加以研究和推敲。

在经济上，关于社会主义集团首先要指明的是，它在现象上呈现长期经济增长，使它得以增加在全球制造业生产中所占的份额，社会主义集团的生产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占了不到10%，但从1960年的18.1%增加到了1975年的27%，虽然实际情况是这一期间在资本主义世界也是历史上前所未有的繁荣时期。形成对比的是，包括新兴工业国在内的发展中世界在全球工业制品中所占的份额在1960年至1975年之间从6.9%上升到8.6%。

社会主义集团的这一经济扩张伴随着政治和军事影响的增加，至60年代，这一影响增加到能向那些寻求摆脱与国际市场存在的联系的政权，如古巴和越南，提供紧急援助的地步。这代表了国际形势中的一个重要的新因素，但它的意义没有继续发展下去，部分因为国际局势出现紧张，部分因为在社会主义集团内部出现了一系列的国际矛盾。

社会主义的矛盾部分是政治性的，反映了社会主义分享民主

的理想同更大程度的中央集权，以保证宏观经济的一贯性和继续增长的需要这两者之间永恒的斗争。这些矛盾部分是经济上的，反映了为越来越复杂的经济制订计划的困难。在一些国家发生的农业生产问题，和西方技术越来越大的吸引力，特别是社会主义国家本身的技术水平大大提高了，足以吸收西方技术和赚取更多购买技术所需的外汇。这些矛盾部分是社会上的，或者更正确地说，是社会心理方面的，这表现在，国家在那样的制度下所承担的责任范围扩大了，使之很容易成为自动增强的不满情绪的众矢之的。要是发生或真的出现经济困难时，就更是如此了。

但可能所有矛盾中最深刻的，就是社会主义的国际主义理论，与实际上社会主义国家发现它们处于的一种状态之间的矛盾。社会主义国家必须在国家的范围内，不断地就相关联的价值和所得作出痛苦的和潜在分裂的抉择，在此基础上必须每天使这种做法名正言顺。这加强了民族主义，为对抗的民族利益之间的斗争创造了条件，导致难以达成社会主义国际主义分工，难以扩大同发展中国家的合作，有时甚至导致社会主义国家间的军事冲突。

当这些倾向在不同的社会主义国家中逐渐发展时，社会主义集团似乎变得不再那么具有吸引力了，不再是国家发展中乐意考虑的选择方式了。社会主义变得越来越异质了，当这一集团内个别国家的经济扩大了同资本主义世界的贸易和金融联系时，它们本身已日益处于那个世界产生的竞争压力之下。这些发展已减弱了社会主义集团作为可供选择的发展战略，发挥潜在作用的重要性。然而它的确仍在发挥那种作用，至少，当前冷战变得热起来的部分原因，无疑是为了进一步在实际上削弱这种选择。

总的来说，社会主义集团内部（特别是波兰）的发展进一步加强了早些时候的结论：当前国际形势的不明朗，使得在对全球倾向作出现实估价的基础上决定国家发展战略更重要了，也更困

难了。

作为结论，显然，要详细制定合意的战略，仍必须是从特定的阶级观点，根据特定的地点和时间来决定的事，几乎无疑，一个强大的民族国家作为扩大物质生产、政治上能生存的有力过程的基础，它的历史重要性仍未减弱。只有国家能建立一整套连贯的和能支持的政治和社会结构，对于促进为某种社会目标而扩大物质生产，这是必不可少的。再说，同样也是这个国家，必须寻求保护这种内部的连贯性和动力，以防受到外部变化引起破坏；与外部世界保持联系有潜力产生巨大的利益，国家也必须利用这股优势，来与上面的保护作用达到一致。

任何一个国家如何来履行这些职责，要根据它所能支配的资源，对于分配这些资源具有的影响的大小，及其代表的利益而定。在80年代的世界上，正当经济压力加强的时候，可能的情况是，在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多的国家里，政府大都掌握在一小部分代表私人资本的少数人手中，他们拚命地保持自己的物质地位——往往是在国际援助下——实际上抛弃了把国家作为一个重要的经济或社会单位的概念，国家总的政治和经济力量变成在一个时期里为增加他们的利益而起作用了。

然而那些政府实际上代表人民大众的国家，必须立场鲜明，坚持不懈，以经济发展的能力在全国范围内刺激积累的过程，同时也要保证社会和物质利益，为把国家作为一个整体取得经济、社会、政治进步打下基础。

这样一种目标，可以在一个比较"开放"的经济里，通过资本主义积累来达到，这在理论上是行得通的。在几个幅员较小，但较先进的发展中国家里，这甚至可以说在实际上是可能的。但是，我们对70年代的经验，特别是对较大的新兴工业国的经验进行的估价启示，总的来说，这将需要一个强大的、起高度干预作用的民族主

义国家。这样一个国家逐渐使贸易“尽其所能地”自由化；它采取有进取性的出口战略；组织国内取得技术能力；保持对资金流动的有力控制；并贯彻一种工业战略，使长期目标同在过渡期间平衡对外结算的需要相一致。此外，由于允许新兴工业国的战略在一段时期内取得这样的成就的有利的国际环境现在正在消失，以致上述综合战略能够成功的可能性也在减退。尤为突出的是，极其紧要的取得廉价（负实际利率）资金和出口商品市场的可能性正在迅速减小。

这样一来，就只留下面向国家的战略选择了。它能以有生气的和有效的方式在全国（或地区）基础上使国内资金流通，与外部世界进行贸易，并使这一切可能在生产的社会条件和（对经济生存）合适的生产率不致被他处的条件所左右的情况下实现，而不管短期的社会和经济后果如何。在这样一种结构内，市场作为资金调拨者，扮演什么角色，竞争作为使努力与报酬相称的手段，起何种作用，将是一个差异相当大的问题。这样一种政策的必要条件在政治方面，即要求政府掌握在实际上代表广大劳动人民利益（仍留有许多利害冲突的余地）的政治力量手中，以及在实质上，亦即充分地控制经济的金融和物质基础，以保证那些资金将用于国家战略的范围内，但适合那一目标的所有制形式和控制方式将又是依各种特定情况而定的问题。

凯恩斯在1923年曾写道：自由贸易是根据了一些基本真理，“这些真理阐述其道，带有种种应有的限制，谁能明了这些话的含义，是无可争辩的”。至1933年他写道，“国家更大程度的自给自足，和各国间的经济孤立，而不是象1914年存在的情况那样，可能有助于维持和平事业，而不是与此相反的情况”，又写道，因为“下一代人不存在全世界范围内经济制度一体化的前景……我们都需要避免别处经济变化的干扰，以便进行对我们自己最有利的试验，

走向理想的未来社会共和国"。① 这对本文的论述是有些意义的。

凯恩斯的那些话不是表示了反对贸易的论点。它反对一种概念，认为通过竞争过程传递的信息总是合意的，能被接受作为对国家生产的社会条件的恰当与否作出判断。这一论点把贸易变成一种负责的、民主地形成的社会经济政策的仆人，而不是作为政策的主人。

邓新裕　译

① 凯恩斯的论点是最有趣的论点。他正确地告诫勿止"国家自给自足" 的危险，明确指出，他把这看成是达到一种目的的手段，但并非目的本身。他特别强调"金融主要在于国内"，这点多半是因为他力主"私人企业结构与我们的技术进步赋予我们的那种程度的福利是不相容的……(它) ……在接着的30年中可能要求把利率降低到接近零点"。然后他又得出结论，"处于在正常的金融力量的作用下，利率在全世界达到完全一致这样一种体制下……这是最不可能发生的"(凯恩斯，1933年)。这对我们的论点是有些意义的。